

目录

[第一部分 危機 7](#_Toc55747352)

[第一章 新的焦慮 7](#_Toc55747353)

[激情與務實 7](#_Toc55747354)

[社會民主主義的勝利與衰退 9](#_Toc55747355)

[糾正錯誤 12](#_Toc55747356)

[一項宣言 14](#_Toc55747357)

[第二部分 重建道德 16](#_Toc55747358)

[第二章 道德的基礎：從自私的基因到道德的團體 16](#_Toc55747359)

[愿望與義務 16](#_Toc55747360)

[互惠是如何出現的 18](#_Toc55747361)

[規范在組織中的戰略性使用 20](#_Toc55747362)

[軟性義務 23](#_Toc55747363)

[第三章 道德的國家 25](#_Toc55747364)

[道德國家的興起 26](#_Toc55747365)

[道德國家的衰落：社會民主主義社會是如何瓦解的 26](#_Toc55747366)

[共同身份消失的后果 28](#_Toc55747367)

[我們為什么警惕共同的國家認同 29](#_Toc55747368)

[難題 31](#_Toc55747369)

[歸屬、鄉土與愛國主義 32](#_Toc55747370)

[第四章 道德的企業 34](#_Toc55747371)

[道德的企業還是吸血烏賊？ 35](#_Toc55747372)

[誰控制企業？ 37](#_Toc55747373)

[將控制權授予所有者的后果 38](#_Toc55747374)

[對策是什么？ 39](#_Toc55747375)

[改變企業權力結構 39](#_Toc55747376)

[企業的棲息地：為生存而斗爭 41](#_Toc55747377)

[規則真的管用嗎？ 42](#_Toc55747378)

[公有化 43](#_Toc55747379)

[那么，有什么好辦法？ 43](#_Toc55747380)

[第五章 道德的家庭 46](#_Toc55747381)

[頂層發生的沖擊 46](#_Toc55747382)

[底層受到的沖擊 48](#_Toc55747383)

[社會分化的后果 49](#_Toc55747384)

[重建道德家庭？ 50](#_Toc55747385)

[基于個人經歷的附言 51](#_Toc55747386)

[第六章 道德的世界 52](#_Toc55747387)

[建設一個道德世界 52](#_Toc55747388)

[道德世界的衰落 54](#_Toc55747389)

[重建一個道德世界 54](#_Toc55747390)

[總結 56](#_Toc55747391)

[第三部分 重建包容性社會 57](#_Toc55747392)

[第七章 地域分化：繁榮的大都市，破敗的普通城市 57](#_Toc55747393)

[是什么造成了新的分化 57](#_Toc55747394)

[應對新分化 59](#_Toc55747395)

[稅收和大都市：“我們應得的收入”？ 60](#_Toc55747396)

[復興非都市城市：“銬在死尸上”？ 64](#_Toc55747397)

[結語：“不惜任何代價” 68](#_Toc55747398)

[第八章 階層分化：享有一切的家庭，分崩離析的家庭 68](#_Toc55747399)

[向承受壓力的家庭提供支持 69](#_Toc55747400)

[抑制享有一切的家庭 79](#_Toc55747401)

[結論：有鋒芒的社會母愛主義 83](#_Toc55747402)

[第九章 全球分化：贏家和落后群體[Ⅰ] 84](#_Toc55747403)

[在貿易問題上認錯 84](#_Toc55747404)

[在監管問題上認錯 84](#_Toc55747405)

[在移民問題上認錯 85](#_Toc55747406)

[結語：經濟學家的認錯 86](#_Toc55747407)

[第四部分 重建包容性政治 88](#_Toc55747408)

[第十章 戰勝極端派 88](#_Toc55747409)

[政治是如何兩極分化的？ 88](#_Toc55747410)

[重建中間派：一些政治機制 90](#_Toc55747411)

[重建中間派：知情的社會 90](#_Toc55747412)

[關于歸屬的政治 92](#_Toc55747413)

[致謝 94](#_Toc55747414)

[注釋 96](#_Toc55747415)

[第一章 新的焦慮 96](#_Toc55747416)

[第二章 道德的基礎 96](#_Toc55747417)

[第三章 道德的國家 97](#_Toc55747418)

[第四章 道德的企業 98](#_Toc55747419)

[第五章 道德的家庭 98](#_Toc55747420)

[第七章 地域分化 98](#_Toc55747421)

[第八章 階層分化 99](#_Toc55747422)

[第九章 全球分化 99](#_Toc55747423)

[第十章 戰勝極端派 100](#_Toc55747424)

[參考文獻 101](#_Toc55747425)



獻給休

生活使我們分離，焦慮令我們相聚

# 第一部分 危機

## 第一章 新的焦慮

### 激情與務實

深刻的裂痕正在撕裂我們社會的肌體。裂痕給我們的民眾帶來新的焦慮與憤怒，給我們的政治帶來新的激情。這種焦慮的社會基礎包括地理、教育和倫理因素。各地區皆在反叛大都市：英格蘭北部在反叛倫敦，內地在反叛沿海地區。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反叛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辛苦拼搏的勞動者在反叛“不勞而獲者”和“尋租者”。受教育程度較低、艱辛工作的鄉下人和小鎮居民已經取代勞工階層，成為社會的革命力量：“無酷漢”取代了“無褲漢”。[[Ⅰ]](#_I__Wu_Ku_Han___sans_culottes__H)那么，這些人在為什么而生氣呢？

地域已經成為造成新的不滿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此前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區域經濟差距不斷縮小，但近年來差距迅速拉大。在北美、歐洲和日本，大都市區域將其他地區甩在身后。大都市不僅變得比其他地區富裕得多，在社會意義上也變得疏離，不再能代表通常以它們作為首都的國家。

但即使在充滿活力的大都市里，這些非凡經濟成果的分配也嚴重失衡。新的成功者既不是資本家也不是普通勞動者，而是受過良好教育、擁有新技能的人。他們組成了一個新階層，他們在大學里相遇，形成新的共同身份，基于技能對彼此心懷尊重。他們甚至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道德，將少數族裔、性取向等特征上升為群體身份，將其視為受害者。他們宣稱只有自己關心受害者群體，從而對受教育程度低于自己的人主張道德優勢。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組成了一個新的統治階層，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信任政府并彼此信任。

一方面，受過良好教育的人財富飆升，拉高了全國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在大都市區域和全國范圍內，受教育不足者已陷入危機，被污名化為“白人勞工階層”（white working class）。衰退的首要表現是有實質意義的就業機會消失。全球化已經導致許多半熟練崗位轉移到亞洲，技術變革正在使許多其他崗位消失。受失業沖擊最大的是兩個年齡范圍的人群：大齡勞動者和找第一份工作的年輕人。

在大齡勞動者中，失業經常導致家庭破裂、吸毒、酗酒和暴力。這導致失業者心理崩潰、失去生活目標，在美國的表現是沒上過大學的白人的期望壽命不斷降低；與此同時，醫療技術以空前的速度取得進步，處于有利地位的群體的期望壽命正在迅速提高。[[1]](#_1_Case_and_Deaton__2017)歐洲雖因為有社會保障體系的存在，后果沒有這么觸目驚心，但這種現象也很普遍，在布萊克浦（Blackpool）等最破敗的城市，期望壽命也在下降。50多歲的失業者無所事事，喝著絕望的苦酒。但受教育程度低的年輕人也好不了多少。在歐洲很多地區，年輕人面臨著大規模失業：目前有三分之一的意大利年輕人處于失業中，上一次出現如此大規模的崗位不足還是在19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調查顯示，年輕人空前悲觀：大多數年輕人覺得自己未來的生活水準將低于父母的。這并不是錯覺：過去40年來，資本主義的經濟表現不斷惡化。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把這一點凸顯了出來，但其實從1980年代起，悲觀情緒就一直在緩慢滋長。資本主義贏得人心的核心理由——所有人生活水平的穩步提升，威信已經受損：一些人依然在從資本主義中獲益，但其他人沒有。在資本主義的象征性核心美國，1980年代出生的人中，有一半在絕對意義上比他們的父輩在同年齡時過得差。[[2]](#_2_Chetty_et_al___2017)資本主義并沒有幫助到他們。考慮到1980年以來科技與公共政策取得的巨大進步，這場失敗令人震驚。這些進步本身依賴于資本主義，本來完全可以顯著改善所有人的生活。但多數人現在預計子女將來會比自己過得差。在美國白人勞工階層中，持這種悲觀看法者的比例升到了驚人的76%。[[3]](#_3_Chua__2018___p__173)而歐洲人比美國人更悲觀。

受教育程度較低者的怨恨中夾雜著恐懼。他們認識到，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群體在社會上和文化上都在疏遠他們。他們斷定：這種疏遠以及（被視為利益攫取者的）更受偏愛的群體的興起，都在削弱他們求取援助的呼聲。正當他們更需要社會保障的時候，他們對社會保障的前景卻日益失去信心。

焦慮、憤怒和絕望粉碎了人們的政治忠誠、對政府的信任，甚至還有對彼此的信任。受教育程度較低者是一系列反叛的核心：在美國，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擊敗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在英國，脫歐派擊敗留歐派；在法國，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和讓—呂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領導的反叛政黨贏得了逾40%的選票（使當政的社會黨的選票縮減到不足10%）；在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與社會民主黨組成的聯盟得票數大減，導致極右的德國新選擇黨（Alternative for Germany, AfD）成為聯邦議會的最大反對黨。除教育水平鴻溝外，地域鴻溝也造成影響。多數倫敦人投票支持留歐，多數紐約人投票支持希拉里，巴黎人不支持勒龐和梅朗雄，法蘭克福人不支持德國新選擇黨。激進反對力量來自大都市之外的地區。這些對立與年齡有關，但不是簡單的年長者和年輕者的對立。自身技能失去價值從而被邊緣化的老工人變成了極端黨派的支持者，剛開始找工作便面對黯淡就業市場的年輕人亦然。大量法國年輕人投票給以新面目出現的極右翼政黨，英國和美國年輕人則投票給以新面目出現的極左翼政黨。

大自然厭惡真空，選民也一樣。現實與可能性之間的鴻溝導致的挫折感為兩種伺機而動的政客提供了動力——民粹主義者和意識形態分子。上一次資本主義脫離正常軌道的時候——1930年代，發生了同樣的事情。1932年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與1949年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精準刻畫了這些新出現的危險。1989年冷戰的結束似乎帶來一種可信的前景：所有這樣的災難都已經過去，我們已經抵達“歷史的終結”，一個永久的烏托邦。然而，我們現在卻面臨另一個非常可信的前景——我們即將見證的反烏托邦。

人們很快用各種舊意識形態來解答新的焦慮，導致左派與右派陳腐而過激的對抗再次出現。意識形態提供了一種誘人的組合，簡單的道德確定性和無所不能的分析，能夠為任何問題提供自信的答案。幾種復興的意識形態，諸如20世紀的法西斯主義和17世紀的宗教原教旨主義，都曾引誘著社會走向悲劇。由于這些意識形態失敗了，失去了大多數追隨者，所以能領導這場復興的意識形態型政客少之又少。僅存的一些此類人從屬于小型的殘余組織：他們持狂熱的偏執心理，太過沉溺以至于不愿直面已經發生的失敗。有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自己生活在“晚期資本主義”（late capitalism）的時代，這使得共產主義復興成為可能：關于“晚期資本主義”的書又開始大批出現。[[4]](#_4_Li_Ru__Mason__2015__Yi_Ji_Wo)

還有一類政客擁有與意識形態分子類似的誘惑力：克里斯馬式的民粹主義者。民粹主義者連意識形態的粗略分析也不做，直接跳向只有兩分鐘說服力的解決方案。因此，他們的策略是通過花樣百出的娛樂表達來吸引選民，使其不進行深入思考。擁有這些技能的領導人來自另一個小群體：媒體名流。

盡管意識形態分子和民粹主義者都因新裂痕導致的焦慮與憤怒而如魚得水，但他們沒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這些裂痕不是歷史的重現，而是復雜的新現象。但這些政客在實施其充滿激情的蹩腳“療法”過程中，可能造成巨大的傷害。對于我們社會中出現的破壞性進程，確實存在可行的補救方案，但這些方案無法從意識形態的道德激情和民粹主義的牽強附會中得出。這些方案建立在分析和證據的基礎之上，因此需要實用主義的冷靜頭腦。本書提出的所有政策都是務實的。

但激情有其用武之地，而且這本書就充滿了激情。我的人生跨越了我們社會中出現的三種嚴重裂痕。盡管我保持著冷靜的頭腦，但這些裂痕讓我百感交集。

我經歷了繁榮大都市與破敗的地方城市之間新出現的地理裂痕。我的家鄉謝菲爾德（Sheffield）成為典型的破敗城市，電影《光豬六壯士》（The Full Monty）反映了其鋼鐵業的毀滅。我就經歷過這樣的悲劇：我們的鄰居失業了，一位親戚找了一份清掃廁所的工作。而我搬到了牛津，那里是爭取大都市成功的首選之地：我的郵編所在區域現在有著全國最高的房價與收入之比。

我經歷過極度成功的家庭與陷入貧困的家庭在技能與志氣方面的鴻溝。14歲時，我和表妹情況相同：出生于同一天，父母都沒有受過多少教育，都憑自己的努力考入文法學校。她父親的早逝使她的生活走上歧途：沒有了父親的管教，她十幾歲就懷孕生子，失敗和污名隨之而來。而我先是念完了中學，然后又獲得牛津大學的獎學金，生活節節上升。[[Ⅱ]](#_II_Xiang_Wo_Yi_Yang__Ying_Guo_Z)接著我又一步一個臺階，在牛津、哈佛和巴黎獲得教職；我還獲得了更多讓我感到自豪的榮譽，工黨政府授予我大英帝國勛章，保守黨政府授予我爵士頭銜，英國科學院的同僚們授予我院長獎章。分化一旦開始就愈演愈烈。我表妹的女兒們在17歲時也懷孕生子，我17歲的孩子則獲得了英國最好的學校之一的獎學金。

最后，我經歷過富得流油的美、英、法（我曾在這幾國舒適地生活過一段時間）與窮得令人絕望的非洲（我現在在這里工作）之間的全球鴻溝。我的學生以非洲人為主，他們在畢業后做出人生抉擇時都要面對這一強烈反差。一位一直在英國做醫生的蘇丹學生最近要決定是留在英國還是回到蘇丹去總理辦公室工作。他已決定回去。他是個例外，在倫敦做醫生的蘇丹人比蘇丹全國的醫生還要多。

這三種可怕的分化不僅是我研究的問題，這些悲劇讓我明白了我的人生目標是什么。這就是我寫這本書的原因：我想改變這種狀況。

### 社會民主主義的勝利與衰退

謝菲爾德是一座過時的城市，但居民之間的紐帶卻因此而增強，這些紐帶曾經是強有力的政治力量。英格蘭北部城市最早經歷工業革命，此地居民也最早面臨工業革命帶來的新焦慮。謝菲爾德等地的社群認識到，他們都同樣依賴自己成長的地方，所以他們成立了合作組織來解決這些焦慮。他們利用這種親密關系成立了從互惠中獲益的組織。住房合作社使人們能為買房而儲蓄，在約克郡的另一座城鎮哈利法克斯（Halifax），誕生了后來英國最大的銀行，保險合作社使人們能降低風險，農業與零售業合作社賦予農民和消費者相對于大企業的議價權。從英格蘭北部誕生的合作社運動迅速擴展到歐洲大部分地區。

通過聯合，這些合作社成為中左翼政黨即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政黨的基礎。隨著社群擴大為國家，社群內互惠的好處也擴大了。像合作社一樣，新的政策議程也是務實的，針對困擾普通家庭生活的焦慮。在二戰后，許多這樣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歐洲各國上臺，利用這一政策議程實施一系列務實的政策，有效緩解了人們的焦慮。醫療、養老、教育、失業保險通過立法不斷涌現，改變了普通人的生活。事實證明這些政策很有價值，所以得到了政治中間派的普遍接受。中左翼與中右翼政黨交替上臺，但這些政策一直在實施。

但現在，作為一股政治力量的社會民主主義面臨著生存危機。過去十年里，各種災難接踵而至。中左翼方面，因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拉走一部分選民，希拉里·克林頓輸給了唐納德·特朗普；曾以布萊爾（Tony Blair）與布朗（Gordon Brown）為代表的英國工黨已經被馬克思主義者接手。在法國，奧朗德（François Hollande）總統甚至決定不尋求競選第二任期，而接替他成為社會黨候選人的貝努瓦·阿蒙（Benoît Hamon）僅獲得了8%的選票，慘敗出局。德國、意大利、荷蘭、挪威和西班牙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選民支持率都大幅下降。通常這會是中右翼政客的好消息，但在英國和美國，此類政客喪失了對本黨的控制，而在德國和法國，他們的支持率也遭受重挫。這是為什么呢？

原因是，左翼和右翼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都偏離了自己的本源——社群中的實踐性互惠，而被一個截然不同的、影響力超出應有程度的群體所俘獲，那就是中產階級知識分子。

左派知識分子被19世紀哲學家杰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的思想吸引。在邊沁的功利主義中，道德從理性原則中推導出，與人的本能價值觀相分離——判斷一個行為是否道德，要看它有沒有促進“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因為人的本能價值觀達不到這條神圣標準，所以社會需要道德健全的技術官僚作為先鋒隊來治理國家。這支先鋒隊、父愛主義的社會守護者，就是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描述的“衛國者”的更新版。另一位為功利主義奠基的思想家、邊沁的門徒約翰·斯圖爾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八歲時就開始讀希臘文原文的《理想國》了。

遺憾的是，邊沁和穆勒并不是近代的道德巨人，無法與摩西、耶穌和穆罕默德相提并論；他們都是奇怪的不合群的個體。邊沁行為怪異，今天人們認為他可能是自閉癥患者，無法形成任何團體意識。穆勒也無法像常人一樣：他從小就被有意地與其他孩子隔開，他對古希臘也許比對自己所處的社會還熟悉。考慮到這兩位創始人的情況，他們的追隨者信奉的倫理觀與其他人大相徑庭也就不足為奇了。[[5]](#_5_Bian_Qin_He_Mu_Le_Dui_Ya_Dang)

邊沁怪異的價值觀如果沒有被經濟學采納的話，本不會產生任何影響。我們將會看到，經濟學形成了一套針對人類行為的描述方式，與功利主義道德觀大相徑庭。經濟人（economic man）完全自私，無限貪婪，只關心自己。這是關于人類行為的經濟學理論的基石。但為了評估公共政策，經濟學需要一種衡量方法，把所有這些心理反常的個體的幸福感（或曰“效用”）加總。功利主義成為這種計算的理論基礎：“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條原則，碰巧適用于求最大化的標準數學方法。“效用”被認為來自消費，隨著消費的增加，效用的增量越來越小。在社會總消費量固定的情況下，要實現效用最大化，只需以一定方式進行收入再分配，以使每個人的消費完全相等。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家認識到，消費“蛋糕”的大小并不固定，稅收會降低人的工作熱情，使蛋糕縮小。為解決激勵問題，“最優稅收”和“委托—代理問題”這兩套高階理論逐漸成形。本質上，社會民主主義的公共政策就是利用稅收進行消費再分配，同時盡量減少稅收對工作熱情的負面影響，其具體方式在變得越來越復雜。

事實很快就證明，以機械的方式從個體的“效用”出發，推論出關于社會福祉的理論，是無論如何也達不到理論連貫性的基本標準的。經濟學界贊同這一點，但做法并沒有改變。大多數學院派哲學家拋棄了功利主義，認為該學說具有諸多不足之處，但經濟學家對此視而不見。他們發現功利主義是一套極為好用的學說。公允地說，功利主義對解決許多公共政策問題確實很有用；該學說的不足之處會不會導致嚴重后果，取決于具體的政策是什么。對于像“應不應該在這里修公路”這種相對簡單的問題來說，功利主義有時是可用的最好的方法。但對許多更大的問題來說，功利主義是絕對不適用的。

有了功利主義計算法后，經濟學迅速滲透進公共政策領域。柏拉圖設想的“衛國者”是哲學家，但實際上通常是經濟學家扮演了這一角色。他們設想普通人是精神反常者，借此使自己有權充當道德優越的先鋒；他們認為國家的目的是實現效用最大化，因此應該把消費再分配給“需求”最大的人。不經意間，社會民主主義政策發生了往往難以察覺的變化，不再關注構建所有公民的互惠性義務了。

這兩種假設結合在一起，產生了有害的結果。所有的道德義務都由頂層的國家承擔，責任由道德上可靠的先鋒肩負。公民不再被視為負有責任的道德行動者，而僅僅扮演消費者的角色。社會規劃者和作為先鋒的功利主義天使們是最高明的——父愛主義的社會管理取代了社群主義。

這種自信的父愛主義管理的典型例證是二戰后的城市政策。汽車越來越多，需要立交橋，人越來越多，需要住房。為解決這些問題，人們用推土機把成片的街道、居民區夷為平地，代之以現代化的立交橋和高樓大廈。但令功利主義先鋒困惑的是，這樣的做法遭到了強烈抑制。假如改善窮人的居住條件是唯一的問題，那把社區推倒重建就是合理政策。然而，這一政策危害了真正為人的生活賦予意義的社區。

最新的社會心理學研究使我們能更好地理解人們的這種反對態度。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一本精彩著作中考察了世界各地的基本價值觀。他發現幾乎所有人都珍視六種價值觀：忠誠、公平、自由、等級制、關愛和圣潔。[[6]](#_6_Haidt__2012)合作運動（co-operative movement）構建的互惠性義務是基于忠誠和公平的價值觀。推倒社區這種由功利主義先鋒隊實施的父愛主義管理手段，違背了忠誠、公平、自由的價值觀。而且在神經科學幫助下進行的最新的社會心理學研究發現，規劃者鐘愛的現代主義設計違背了人們共同的審美標準，故而降低了人們的幸福感。對于這些做法中存在的道德缺陷，功利主義先鋒為什么認識不到呢？海特對此也有回答：他們的價值觀是反常的。大多數人都有那六種價值觀，但這些功利主義先鋒的價值觀只剩兩種——關愛和平等。他們不僅價值觀有異于常人，他們的特征也與眾不同這些特征有：西方的（Western）、受過教育的（Educated）、工業化的（Industrial）、富裕的（Rich）、發達的（Developed）[[Ⅲ]](#_III_Qiao_Na_Sen__Hai_Te_Ti_Dao)，可以把五個詞的首字母連在一起簡寫為“怪異的”（WEIRD）。關愛和平等正是功利主義者的價值，所以那些“怪異的”人信奉的是怪異的功利主義者的價值觀。在最好的情況下，教育能擴大人的同理心，讓人能設身處地地為他人著想。[[Ⅷ]](#_VIII_19Shi_Ji_Zhong_Ye_Da_Zhong)但事實上教育經常產生與此相反的效果，讓成功者意識不到普通人的焦慮。功利主義先鋒相信自己才德兼備，憑著這樣的自信，他們毫不遲疑地自視為當代的柏拉圖“衛國者”，有權否定其他人的價值觀。我懷疑，海特若再深入研究將會發現，盡管這些“怪異者”表面上蔑視等級制，但蔑視的卻是歷史流傳下來的等級制。他們認為一種新的等級制天經地義：他們成為新的精英領導。

1970年代出現對父愛主義管理的反抗。這種反抗本來可以批評對忠誠與公平的蔑視，恢復社群主義，但功利主義先鋒沒有這么做，而是抨擊了對自由的蔑視，并要求通過恢復個人的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來保護其不受國家侵犯。邊沁曾將自然權利這個概念斥為“離奇的胡言亂語”，在這一點上我認為他是對的。但想贏得選舉的政客發現了宣布新權利這種方便的手段。比起承諾增加政府支出，權利聽起來更有原則性，而且具體的承諾可能受到成本與稅收方面的質疑，而在宣布權利時，實現這些權利所需承擔的義務則可秘而不宣。合作運動把權利和義務緊密聯系在一起；功利主義則將二者與個人分離，將其轉移給國家。現在，自由至上主義者（Libertarians）把權利歸還給了個人，但沒有把義務歸還給個人。

這場主張個人權利的行動與一場同樣主張權利的新政治運動結盟，即為弱勢群體主張權利的的運動。非裔美國人是這場運動的先鋒，女權主義者緊隨其后。他們也有自己的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羅爾斯反駁邊沁對自然權利的批評，提出了另一項總括性的理性原則：判斷一個社會是否道德，要看其法律制度是否有利于最弱勢的群體。這兩場運動的根本目的是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推動社會包容，而且非裔美國人和女性都有主張深刻社會變革的充分理由。正如我們將看到的，社會模式的慣性很強大，因此要實現平等包容，就必然需要一個反歧視的過渡階段。50年后的今天我們依然沒有完成這場轉型，但在這個過程中，最初爭取包容的運動（也許不經意地）變得僵化，演化出相互對立的群體身份，人們通過設想某個敵對群體來激發斗志。[[Ⅳ]](#_IV_Zhe_Shi_Fa_Xi_Si_Zhu_Yi_Deng)關于權利的話語激增，包括個人反對父愛主義政府的權利，政客周期性地承諾給選民的權利，尋求特殊待遇的新受害者群體的權利。這三類權利幾乎沒有共同點，但都與社會民主主義在堅持其社群主義根源時的做法——實現權利與義務的包容性匹配——背道而馳。

功利主義事業由經濟學家推動，權利事業由職業法律人推動。這兩支先鋒隊在一些問題上觀點一致，這使他們成為兩股極強大的游說力量。在另一些問題上他們有沖突：羅爾斯及其追隨者認同，某些雖能讓小的弱勢群體掌握自己的命運，但會使其余所有人的境況變差的權利，而這種權利不符合功利主義的標準。在經濟專家與職業法律人的競爭中，形勢最初有利于經濟學家：實現“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一承諾吸引了追求選票的政客。但握有法庭這個核武器的職業法律人后來逐漸占了上風。

盡管這兩種意識形態的差異越來越大，但它們都沒有給曾引導合作運動的思想留下多少余地。功利主義者、羅爾斯主義者和自由至上主義者都強調個人而非集體；功利主義經濟學家和羅爾斯主義的職業法律人都強調群體之間的差異，前者是基于收入的，后者是基于地位的高低。他們都影響了社會民主主義政策。功利主義經濟學家要求按需求進行再分配；逐漸地，福利制度被重新設計，以使權利與貢獻不再相關，在此過程中，公平這一常規的人類價值被摒棄。沒有做出過貢獻的人比做出過貢獻的人更受優待。羅爾斯主義的職業法律人要求以弱勢者為導向做糾正。例如，對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人來說，在2018年的聯合政府談判中，難民權利成為最受關注的訴求。該黨領袖馬丁·舒爾茨（Martin Schultz）堅稱：“不管國民情緒如何，德國必須遵守國際法。”[[7]](#_7_Financial_Times__5_January_20)這句“不管國民情緒如何”是道德先鋒的典型表達方式；邊沁和羅爾斯都會為舒爾茨喝彩，但不到一個月，一場大眾反叛就把他趕下了臺。這兩種意識形態都摒棄互惠與應得性的常規道德本能，抬高一個單一的理性原則（盡管二者的理性內涵內容不同），并主張由專家組成的先鋒隊來將這項原則強加于社會。而合作運動是建立在那些常規道德本能之上的，是可以追溯到大衛·休謨（David Hume）和亞當·斯密（Adam Smith）那里的哲學傳統。事實上喬納森·海特明確承認自己受益于這個傳統，并把自己的工作視為“恢復休謨學說的第一步”。

當左派知識分子放棄實踐性社群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轉奉功利主義與羅爾斯主義的意識形態時，中右翼政黨要么僵化地懷舊，在思想方面無所建樹，要么被另一群同樣誤入歧途的知識分子所俘獲。以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和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為代表的歐陸基督教民主黨人，大多數走了懷舊路線；英語世界的保守黨和共和黨則選擇了意識形態。羅伯特·諾齊克（Robert Nozick）反駁了羅爾斯的哲學，他認為個人擁有凌駕于集體利益之上的自由權利。這一思想自然地與諾貝爾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領銜的新經濟學說結盟。該派學說認為，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在僅受競爭制約的情況下能產生比公共監管和規劃更好的結果。該學說為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的政策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礎。盡管左右派的新意識形態呈現出截然對立的面貌，但它們都強調個人，并推崇精英統治：左派推崇的道德優越的精英與右派推崇的經濟能力優越的精英競爭。左派眼中的超級明星是很有德行的人，右派眼中的超級明星則是極為富有的人。[[Ⅴ]](#_V_Xiang_Ying_Di__Na_Xie_Bu_He_C)

那么，社會民主主義究竟有什么大問題，乃至于同時被左派和右派拋棄？在社會民主主義如日中天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它沒有什么大問題。但盡管社會民主主義當時是公共政策領域的主導性思想力量，它仍是那個時代的產物。社會民主主義并不是對普遍真理的概括（那是所有意識形態的標志性主張），而是建立在獨特的社會條件之上，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才是有效的。隨著情況的變化，它曾具有的普遍真理表象也被粉碎了。到1970年代末，英美的社會平等程度達到頂峰時，社會民主主義所依賴的條件已經開始動搖了；把里根和撒切爾送上權力寶座的大眾反叛如火如荼。社會民主主義之所以從1945年到1970年代末行之有效，是因為它依賴于二戰期間積累起來的一項巨大、不可量化的無形資產——在一場至高無上的、成功的國家努力中形成的共同身份。隨著這筆財產逐漸貶值，父愛主義政府掌握的權力也越來越遭人憎恨。

像它的社會基礎一樣，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基礎也動搖了。隨著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這一新領域的興起，像柏拉圖式“衛國者”那樣無所不知的社會規劃者也被人唾棄。公共選擇理論認識到，公共政策決定通常不是由超然的圣人做出的，而是通過平衡包括官僚集團自身在內的不同利益集團的訴求而形成的。只有當決策者像二戰那一代人一樣對國家利益充滿激情時，才能確保社會規劃者是無私的。在哲學界，功利主義依然有少數追隨者，但尖銳的批評意見越來越多。[[8]](#_8_Yi_Ben_Ju_You_Ke_Du_Xing_De_X)此外，還有社會心理學家如海特也在批評功利主義，揭示出功利主義所主張的價值觀根本不是普遍真理。絕大多數人類并不像功利主義經濟學描繪的那樣是自私的愚人，人們不僅珍視關愛，還珍視公平、忠誠、自由、圣潔和等級制。他們并不比社會民主主義先鋒更自私，而是更為全面完滿。

當事實證明右派的新自由至上主義比預期更具破壞性且更低效時，左派重新掌權，但沒有恢復社群主義，而是被新的意識形態分子控制了。這支新先鋒隊取代了社群主義者，甚至可能連他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普通家庭注意到了，主要原因是，這支先鋒隊支持的一些政策脫離了社群，具有破壞性且不受歡迎。他們在繁榮的大都市治理整個國家，把援助分給被認為最需要幫助的群體——“受害者”。陷入新焦慮的人群常常不符合“受害者”的標準，但無論在絕對意義上還是相對于更受青睞的“受害者”群體來說，他們的境況都在惡化。人被歸為“受害者”，必然意味著他們不能再對自己的處境負責了。即使當勞工階層符合一些“受害者”的特征時，他們也只因此而有權享受一些額外的經濟救濟，那正是功利主義再分配的焦點。但諸如歸屬、應得性、尊嚴，以及因履行義務而應受到尊重這樣的觀念因為與功利主義過于不相容而徹底從專業討論中消失了。但白人勞工階層通常是無法得到“受害者”地位的，例如，絕對“怪異”的《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雜志關于白人勞工階層期望壽命下降是這么說的：“他們就該死。”[[9]](#_9_Chua__2018)顯然，盡管所有受害者都是平等的，但一些受害者比另一些更平等。

我們生活在一場悲劇中。我這一代人經歷了受社群社會民主主義約束的資本主義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新的先鋒隊取代了社會民主主義，帶來了他們自己的倫理觀和優先議題。隨著新經濟力量的破壞性副作用不斷沖擊我們的社會，這些新倫理觀的缺陷昭然若揭。由新意識形態統轄的資本主義當前遭遇的失敗與之前社會民主主義取得的成功一樣明顯。錯誤已明，是時候研究該如何糾正它了。

### 糾正錯誤

我們的政客、報紙、雜志和書籍有很多聽起來很明智的建議，比如我們應該對勞動者進行再培訓，幫助陷入困境的家庭，對富人增稅。很多這樣的建議在精神上是正確的，但只針對了新焦慮的一個方面；這些建議不能為我們社會遭遇的情況提供系統性的解決方案。這些建議很少能形成可執行的戰略，展現出令人信服的效果。而且和意識形態分子的建議不同，這些建議并不是明確地建立在某種倫理框架之上的。我則想要做得更好一些，一方面努力對社會中出現的問題做出系統性的評判，另一方面試圖就如何彌合我們社會的三大裂痕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社會民主主義需要在思想上得到調整，擺脫生存危機，重新成為跨越政治光譜、左派和中右派都支持的思想。我開啟這項聽起來很宏偉的計劃是因為，60多年前一本很有影響力的書曾經做到了這點。安東尼·克羅斯蘭（Anthony Crosland）的著作《社會主義的未來》（The Future of Socialism）在社會民主主義處于全盛期時連貫系統地闡述了它的思想基礎。這本書決絕地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分道揚鑣，因為它承認資本主義非但不是普遍繁榮的障礙，反而是必需的。資本主義催生并約束企業，人通過企業利用規模生產與專業化中蘊含的生產力。馬克思認為這會造成異化：在大企業里為資本家工作將不可避免地剝奪勞動的樂趣，而專業化“（把人）禁錮為整體的一小部分”。然而異化并不是社會為實現繁榮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接受資本主義并不是和魔鬼做交易。許多好的現代企業賦予員工一種使命感，并給予他們足夠的自主權來承擔實現這種使命的責任。這些企業的員工不僅是從賺的錢中，更從自己做的事中獲得滿足。還有很多企業不是這樣，許多人陷入效率低下、讓人沒有動力的工作中。要讓資本主義對所有人都有利，就需要治理資本主義，使之除生產商品以外還能提供使命感。而這正是我們要做的事：我們需要治理而不是打倒資本主義。

克羅斯蘭是一位實用主義者：評價某種政策要看其是否行之有效，而非是否符合某種意識形態的信條。實用主義哲學的一項核心主張是，因為社會在不斷變化，所以我們不應期待有永恒的真理。《社會主義的未來》并不是指導未來的圣經，而是適合其所處時代的戰略。這本書盡管對功利主義先鋒隊傲慢的父愛主義作風持健康的懷疑態度，但它自己的幸福觀也是經過簡化的，它將幸福等同于個人消費的均衡化。《資本主義的未來》并不是《社會主義的未來》的翻版。本書試圖提供一系列成體系的補救方案，以應對我們時代的新焦慮。

學術界日益被分割為相互隔絕的專業領域。這對于增進知識的深度有好處，但目前的任務跨越了多個專業領域。我從與眾多世界知名專家的合作中學到了很多，沒有他們就不會有這本書。新的社會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社會身份的變化驅動的；從喬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那里，我學到了關于人在群體中如何行動的新的行為經濟學知識。新的社會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出了問題的全球化驅動的；從托尼·維納布爾斯（Tony Venables）那里，我理解了關于大城市聚集效應的新經濟動態，以及城市為何會崩潰。這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企業行為的敗壞導致的；從科林·邁耶（Colin Mayer）那里，我了解了對于企業使命感的喪失，可以采取什么補救措施。導致這種現象的最根本原因是功利主義者接管了公共政策；從蒂莫西·貝斯利（Tim Besley）那里，我學到了道德理論與政治經濟學的一種新融合，從克里斯·胡克韋（Chris Hookway）那里，我了解了實用主義的哲學源頭。

我努力把這些思想大師的深刻見解結合在一起，為我提出的務實的補救措施提供基礎，但最終的結論僅由我本人負責。[[10]](#_10_Qiao_Zhi__A_Ke_Luo_Fu_Shi_Nu)批評家會在閱讀本書時尋找可以質疑的地方，而且肯定能找到。但本書是在嚴肅地試圖用學術分析的新潮流來應對困擾我們社會的新焦慮。我希望，像《社會主義的未來》一樣，本書能為陷入困境的政治中間派提供一個重建的基礎。

資本主義社會必須既合乎道德又繁榮昌盛。在下一章里我將質疑把人類描述為貪婪而自私的“經濟人”的做法。遺憾的是，目前有無可爭辯的證據表明，經濟學學習者事實上已經開始按這種行為模式行事，但這樣是反常的。對大多數人來說，人際關系對生活有根本性的意義，而人際關系必然涉及義務。至關重要的是，人們會做出互惠性承諾，這是社群的根本要素。自私與互惠性義務之間的斗爭，即個人主義與社群之間的斗爭，在三種主導人類生活的組織中展開：國家、企業和家庭。近幾十年來，個人主義在這三種組織中迅猛擴張，而社群則節節敗退。我會就這三種組織提出建議，該如何恢復社群道德，以及該如何通過重新平衡權力的政策鞏固這種道德。

我將基于這種實操性的社群主義探討那些撕裂我們社會倫理的分歧。繁榮的大都市和破敗的中小城市之間的新地理裂痕是可以彌合的，但這需要嶄新的思維。大都市產生了巨大的經濟租金（economic rents），這些租金應當由社會享有，但要實現這一點，就需要對稅制進行大規模的重新設計。破敗的城市可以恢復生機，但迄今為止在這方面的嘗試成效不佳。市場和公共干預都不是很有效。要取得成功，就需要系統性地實施并維持一系列的創新政策。

受教育程度高的富人和受教育程度低的絕望者之間的新差距也是可以縮小的。但單一的政策無法消除絕望：它不像功利主義堅持認為的那樣只要靠消費就能解決，這個問題的性質很復雜，通過提高福利來增加消費是無法解決的。我們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來改變人們的生活機遇，不僅針對個人，還有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比解決破敗城市問題所需要的政策還要廣泛。這種社會干預旨在支持承受壓力的家庭，而不是親自扮演家長的角色。受過良好教育、有優秀技能的人所采取的自以為是的策略，也致使一些絕望的問題變得更復雜。對最具破壞性的問題加以緩解，是有一定可能的；同樣，這也不僅僅是因為消費過度，只需要以稅收來抑制消費就可以了。

至于全球的差異，自信的父愛主義先鋒隊一直對全球化很放心，全球化誘使他們展望一個超越國家的未來。然而，面對全球性機會做出的基于個人利益的理性選擇，未必對社會也有益。經濟學家本來有充分的理由反對高貿易壁壘，這種反對已簡化成了對自由化的毫無保留的熱情。貿易通常會帶給各國足夠的好處，使受益者能夠完全補償利益受損者。但盡管經濟學家大力支持貿易，卻對補償問題卻三緘其口。沒有補償，就沒有任何理由說社會境況良好。與此相似，本來有充分的理由支持少數族裔權利，也被簡化為無條件支持移民。然而，貿易和移民盡管都貼著全球化的標簽，卻是兩個大不相同的經濟過程，前者由比較優勢驅動，后者由絕對優勢驅動。我們不能默認移民會給他們加入或離開的社會帶來收益，唯一明確的收益是移民自己的收益。

### 一項宣言

資本主義制度取得了很多成就，是獲得繁榮的關鍵，但它不是邦葛羅斯博士（Dr Pangloss）[[Ⅵ]](#_VI_Fu_Er_Tai_Xiao_Shuo___Lao_Sh)的經濟學。三種新的社會裂痕都無法單靠市場或個體利己主義力量來彌合。只呼吁人們“振作起來，享受征程”不僅是無視現實，而且是自鳴得意。我們需要積極的公共政策，但父愛主義社會管理已經一再失敗。左派以為政府最了解情況，但很不幸，這是錯的。由先鋒隊引導的政府被認為是三種組織中唯一以倫理為指導的，這嚴重夸大了政府的倫理能力，相應地也貶低了家庭與企業的倫理能力。右派堅信，打破國家監管的枷鎖（這是自由至上主義者的口頭禪）就能釋放利己主義的力量，讓所有人都富裕起來。這嚴重夸大了市場的魔力，相應地也否定了倫理約束。我們需要政府發揮積極作用，但也需要政府接受一種更為有限的角色；我們需要市場，但也要用植根于完備倫理的堅實方向感來駕馭市場。

因為沒有更好的術語，我姑且把我提出的這些彌合分歧的政策統稱為“社會母愛主義”（social maternalism）。我主張政府在經濟和社會領域發揮積極作用，但政府不能公然給自己授權。政府的稅收政策應遏制強者攫取其不應得的收益，但不能熱衷于把富人的收入分給窮人。政府監管應賦予“創造性破壞”（競爭驅動經濟進步的過程）中的受損者索取補償的權利，而不能試圖阻撓這個賦予資本主義驚人活力的進程本身。[[Ⅶ]](#_VII__Chuang_Zao_Xing_Po_Huai__S)政府倡導的愛國主義應當具有凝聚力，取代對支離破碎的受害者身份認同的強調。要討論這些問題，首先得意識形態。我不是指把一堆雜亂的觀點拼湊在一起，而是指要接受人們多樣化和本能的價值觀，并接受基于這種多樣性而做出的務實取舍。訴諸某種單一的絕對原則，使其凌駕于各種價值觀之上，這種做法注定會導致分裂。接受人們多樣化的價值觀是基于大衛·休謨和亞當·斯密的哲學。本書提出的政策跨越了左右兩派，左右之爭是上世紀最有害的特征，如今正卷土重來。[[Ⅸ]](#_IX_Zhe_Xie_Zheng_Ce_De_Suo_You)

20世紀諸多災難的制造者包括兩類政治領袖（通常是男性），一類狂熱地擁護某種意識形態，即有原則的人，另一類兜售民粹主義，即有領袖魅力的人。與這些意識形態分子和民粹主義者不同，20世紀最成功的領導人都是實用主義者。面對一個腐敗泛濫、貧困不堪的社會，李光耀迎難而上，處理腐敗問題，把新加坡變成了21世紀最成功的社會。面對一個內部矛盾重重、瀕臨分裂的國家，皮埃爾·特魯多（Pierre Trudeau）平息了魁北克的分離主義，建設出一個自豪的國家。在種族滅絕的廢墟之上，保羅·卡加梅（Paul Kagame）重建盧旺達，使其成為一個運轉良好的社會。在《國家挑戰》（The Fix）一書中，喬納森·泰珀曼（Jonathan Tepperman）研究了十位這樣的領導人，探尋他們各自解決嚴峻問題的方式。他總結說，他們的共同點是避開意識形態，專注于針對核心問題尋找務實的解決方案，并根據情況的變化進行調整。[[11]](#_11_Tepperman__2016)他們在必要時保持強硬，堅決拒絕給強大的集團輸送利益以換取支持，這是成功者的共同特征之一。李光耀不惜把他的朋友們送進監獄；作為一個魁北克人，特魯多拒絕給予魁北克人渴望的獨立；卡加梅不讓與他同族的圖西族人按慣例享受軍事勝利后的戰利品。在最終取得成功之前，他們都曾面臨激烈的批評。

本書所持的實用主義始終堅定地建立在道德價值觀的基礎之上。但本書拒斥意識形態，所以必然會讓信仰各種意識形態的人感到不滿。這樣的人正統治著媒體。“作為左派”的身份認同已成為一種自覺道德優越的懶惰方式，“作為右派”的身份認同已成為一種自以為“現實”的懶惰方式。我們即將開啟一場對道德資本主義（ethical capitalism）未來的探索：歡迎加入“務實的中間派”（hard centre）。

[[Ⅰ]](#_I)“無褲漢”（sans culottes），或譯“無套褲漢”，指法國大革命初期的革命者，主要來自法國社會底層，因穿著長褲以區別于上層階級的套褲（culottes）而得名；“無酷漢”（sans cool），是化用此語來形容鄉下人與大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差異，后者的生活更“酷”。——譯者注

[[Ⅱ]](#_II)像我一樣，英國著名劇作家艾倫·貝內特（Alan Bennett）的父母也是沒有受過什么教育的約克郡人。《歷史系男孩》（The History Boys）講述了他以卑微的出身進入牛津大學的階層躍升故事，與我頗為相似。但他是在更時尚的利茲（Leeds）長大的。為了強調他跨越的社會鴻溝，他把這部劇的故事發生地設定在我的家鄉，而不是他的家鄉。在第一幕結尾，主人公以不斷升高的語調羅列自己的弱勢：“我個子矮，是同性戀，來自謝菲爾德！”來自謝菲爾德的是我，不是他。事實上，貝內特把該劇的故事發生地設定在我就讀的中學，與貝內特本人相比，我更像貨真價實的“歷史系男孩”。

[[Ⅲ]](#_III)喬納森·海特提到的“怪異者”（WEIRD）概念來自于Joseph Henrich等人所著的文章“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其中“D”指的是“民主的”（Democratic）。此處應系作者筆誤。——編注

[[Ⅷ]](#_VIII)19世紀中葉大眾識字率提升，閱讀小說成為一時的風尚，平克（Pinker, 2011）對此做過精彩的論述。通過閱讀小說，人們培養了同理心，學會從他人的角度看問題，之前常見的大眾圍觀絞刑的場面因此而消失了。

[[Ⅳ]](#_IV)這是法西斯主義等采用的政治策略。

[[Ⅴ]](#_V)相應地，那些不合常規的既有德行又很富有的人，如我的老朋友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成為兩邊都不信任的超級惡棍。

[[Ⅵ]](#_VI)伏爾泰小說《老實人》中的人物，樂觀主義的代名詞。——譯者注

[[Ⅶ]](#_VII)“創造性破壞”是指高效企業通過市場競爭擠垮低效企業的過程。這是平均收入持續增長的主要源頭。這個術語是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1942年創造的，他將其描述為“資本主義最基本的事實”。這也是為什么所有其他“主義”，無論具有何種浪漫的吸引力，都充其量是無關緊要的。我們社會的未來有賴于改革資本主義，而不是推翻它。

[[Ⅸ]](#_IX)這些政策的所有基石，包括實用主義、繁榮、社群、倫理和社會心理學，都是連貫一致的，因為它們都可以回溯到大衛·休謨和他的朋友亞當·斯密。正如為斯密作傳的杰西·諾曼（Jesse Norman）所說（2018年）：斯密是一位實用主義者。同時，在斯密那里也能看到實用主義的源頭：“皮爾斯（Peirce）的著作，對他牛頓主義科學哲學的含義進行了最杰出的現代探索。”皮爾斯是實用主義的奠基人。明白無誤的是，斯密和休謨都持社群主義的倫理觀；正如諾曼細心闡明的那樣，二人并不是功利主義者的鼻祖。

# 第二部分 重建道德

## 第二章 道德的基礎：從自私的基因到道德的團體

現代資本主義有潛力讓全人類走向空前的繁榮，但它在道德上已經破產，正在走向悲劇。人類需要一種目標感，這是資本主義目前沒有提供的。但它能夠提供。現代資本主義的正當目標是實現普遍富裕（prosperity）。也許是因為我出身貧寒，而且工作涉及貧困的社會，所以知道這是一個有價值的目標。但這還不夠。在成功的社會里，人們繁榮富足（flourish），既享受富裕的生活，也擁有歸屬感和自尊。富裕可以用收入來衡量，其對立面是令人絕望的貧困；目前而言與繁榮富足最接近的概念是幸福（well-being），其對立面除了貧困，還有孤立和羞辱。

作為經濟學家，我知道資本主義的核心——分散的、以市場為基礎的競爭，是實現富裕的唯一途徑，但幸福的其他方面其源頭是什么呢？盡管“經濟人”被認為是懶惰的，但像工作這樣有目的的行為是尊嚴感的重要來源。[[Ⅰ]](#_I_Mu_Qian__Heng_Liang_Xing_Fu_Z)盡管“經濟人”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但歸屬感依賴于相互尊重。一種符合道德的資本主義，在實現富裕的同時，既支持尊嚴感又支持歸屬感，這并不是自相矛盾的。但可以理解的是，許多人認為它是矛盾的。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有一個致命的污點：它依賴貪婪這個唯一的驅動力。

遭到這種批評時，資本主義的支持者經常借用馬克思主義的信條“目的正當則手段正當”（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這是一個根本性大錯；僅以貪婪為驅動力的資本主義一樣會出現嚴重問題，造成羞辱和分裂，而不是普遍富裕。事實上，資本主義目前正把社會帶向這條道路。本書提出另一條道路，其中的各種手段都充滿了道德目的。這場資本主義的重啟，不能只靠企業公關部門或“達沃斯人”（Davos man）精心設計的暖心口號。

本書將在第二部分闡述這些解決方案的倫理基礎，在第三部分提出彌合日益擴大的社會裂痕的實際方案。本章探討的是人類道德如何與情感聯系在一起，它們如何發展演變，以及事情是如何出錯的。[[1]](#_1_You_Chong_Fen_De_Li_You_Zheng)

### 愿望與義務

主張“目的正當則手段正當”的圓滑的資本主義支持者會援引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著名命題：追求私人利益會使公眾受益。“貪婪是好事”是里根和撒切爾改革的擁躉的理論基礎。斯密的主張可貴地糾正了一種天真觀念——唯有動機良好的行為才是好的。但由《國富論》于1776年開啟的現代經濟學，是以一種完全可鄙的人性為基礎的。“經濟人”自私、貪婪、懶惰。世界上確實有這樣的人，你可能也會碰到他們。但即使億萬富翁也不是這么生活的，我認識的億萬富翁都是工作狂，他們的人生目標遠遠超出對消費的追求。許多經濟學家愿意承認這些局限性，但他們的自稱無辜在殘酷的事實面前黯然失色：學習經濟學課程的學生會變得比常人更自私；[[2]](#_2_Etzioni__2015)同時，我們用以指導政策的經濟模型，其有害假設也影響了嚴肅的討論。[[Ⅱ]](#_II_Yi_Ge_Li_Zi_Shi_Jiang_Jiang)

但斯密并不認為我們是“經濟人”。[[3]](#_3_Wo_Gang_Xie_Wan___Zi_Ben_Zhu)他認為屠夫和面包師不僅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個體，也是受道德觀驅動的社會人。電腦會根據理性利己主義的原理來預測“經濟人”的行為。我們在預測屠夫和面包師的行為時，會設想自己處于他們的境地時會怎么做，這被稱為“心智理論”（theory of mind）。斯密認識到，從內心看別人，不僅能讓我們理解他們，還能促使我們關心他們，評估他們的道德品質。斯密認為這種同情和評價的情感是道德的基礎，把我們想做的與我們覺得應該做的區分開來。道德源于我們的情感而非理性。他在1759年的著作《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闡述了這一點，描述了三種不同強度的義務。

最強烈的義務來自親密關系。對我們的子女和近親來說，這種義務最為深廣，而且是無條件的，但它也會擴展到我們認識的人身上。最弱的義務是幫助遠方處于困境中的人。在一段著名的文字里，斯密舉例說，如果中國發生了一場地震，一個18世紀的英國人不會為此悲傷得吃不下飯，而在21世紀，盡管有社交媒體和非政府組織，中國的地震也不會太影響夜晚去酒吧取樂的英國人的興致。在探討難民危機的《難民》（Refuge）一書中，亞歷克斯·貝茨（Alex Betts）和我提到了這一義務，稱之為“援救義務”（duty of rescue）。斯密認為該義務與公正感有關：客觀來說，我們知道在像地震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應該提供幫助。在《最底層的10億人》（The Bottom Billion）一書中，我提到了另一種援救義務。有10億人面臨著令人絕望的貧困，即使你不是圣人也會認識到，我們應該盡己所能地為他們創造希望。

介于親密關系與援救義務之間的是斯密在他的書中重點關注的情感：溫和的壓力，如羞恥和尊重，促使我們交換義務——如果你愿意幫助我，我就愿意幫助你。使上述交換成為可能的信任，是建立在某種令人不愿違背諾言的情感上的。這些情感并不是“經濟人”心理的組成部分，那么人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情感？答案是，根據人會感到歉疚等事實來看，用“社會人”（social man）一語來描述人類才更妥帖。“社會人”關心別人怎么看待他：他想得到別人的尊重。“社會人”仍然是理性的（他追求效用最大化），但其效用的來源不只是自身消費，還包括別人的尊重。就像貪婪和歸屬感一樣，這是一種基本的驅動力。

在諾貝爾獎得主弗農·史密斯（Vernon Smith）看來，《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建立在一個共同的理念之上：交換的互利性。交換商品的場所是市場，交換義務的場所是網絡化群體，即本章探討的主題。兩百年來，經濟學家曾以為亞當·斯密寫了兩本互不相容的書，于是忽略了《道德情操論》。近年來，斯密才被人正確理解：并沒有兩個斯密，他被忽視的思想具有深遠的重要性。[[4]](#_4_Norman__2018)

人既受《國富論》中描述的“愿望”驅動，也受《道德情操論》中描述的“義務”驅動。無論愿望還是義務，斯密都認為，從自給自足到互相交易的轉變是革命性的，但他自己似乎認為《道德情操論》更重要，義務的交易比愿望的交易更重要。“義務”僅僅是心中喋喋不休的低語嗎？行為難道不是像教科書和資本主義的批評者所暗示的那樣，僅僅是由“愿望”或貪婪塑造的嗎？

社會科學現在有證據揭示二者在心理上的相對重要性，行為學實驗也發現，義務和愿望都很重要。下面舉一些非常簡單的新證據來證明何者更重要。人們被要求回憶他們曾做過的最后悔的決定，并將其排序。我們都會犯錯誤，最嚴重的錯誤令人痛心；人們的回答被分成幾類。我們知道“經濟人”會對什么最后悔：“假如我當初買了那棟房子”，“假如我沒有把那次面試搞砸”，“假如我當初買了蘋果公司的股票”——我們的后悔源于未能實現自己的“愿望”。但在這項調查研究中，這種回答很少出現。人們犯下過很多這樣的錯誤，但他們很少為此悔恨不休。讓人們耿耿于懷的絕大部分是未能履行“義務”的情形，如辜負別人的期待或失職。[[5]](#_5_Towers_et_al___2016)我們從這樣的自責中汲取教訓，更好地履行未來的義務。盡管我們容易一時犯蠢，但當我們評估自己的行為時，“義務”通常都是比愿望更重要的因素。

社會心理學也證明斯密的觀點是正確的，即道德源于價值觀而非理性。[[6]](#_6_Zhe_Shi_Xiu_Mo_He_Kang_De_Zhi)喬納森·海特已找到證據顯示的確如此。人們試圖通過舉出理由來證明自身價值觀的正當性，但當這個理由被推翻時就會想出其他理由，而不是修正自己的價值觀。研究揭示，這些理由是一種自我欺騙的假象，一種叫做“動機性推理”的假象。[[7]](#_7_Haidt__2012)理性基于價值觀，而不是價值觀基于理性，或者正如斯密那句形象的話：“理性是激情的奴隸。”對“理性經濟人”來說，這種反差就更強了。在被公認為做出了重大突破的《理性之謎》（The Enigma of Reason）一書中，雨果·梅西耶（Hugo Mercier）和丹·斯珀伯（Dan Sperber）證明，理性本身是為說服他人而進化出來的，而不是為了改進我們自己的決策。[[8]](#_8_Mercier_and_Sperber__2017)動機性推理是我們培養推理能力的原因所在，并且我們通常也正是這樣使用推理能力的。而更根本的是，過去200年間人類大腦的大規模擴容是由社交需求驅動的。[[9]](#_9_Gamble_et_al___2018)斯密的觀點看起來一點也不古舊，相反，這些觀點勾勒出了經濟學教科書的未來發展方向。

價值觀通常相互補益，進而形成各種規范。海特發現很常見的兩種價值觀——公平與忠誠，共同支撐著互惠的規范；我們追求尊重的基本動力與我們在違反義務時感到的羞愧內疚，就是由互惠的規范聯系在一起的。實驗顯示，互惠是一個最佳點，即使苛刻的義務也能因之持續。雖然援救義務的基礎是關愛的價值觀，但當樂于助人者組成一個團體時，他們可以利用公平與忠誠的價值觀來構建相互承諾：“如果你愿意幫助我，我就愿意幫助你”。就像我們學著將愿望排序一樣，我們也會將價值觀排序。通過務實的思慮，我們可以調整改進乍看上去相互沖突的價值觀，根據具體情況進行折中協調。

斯密和休謨的想法也是這樣。以此為基礎，實用主義哲學主張將共同的道德價值觀與實踐理性相結合。實用主義從一開始就持社群主義觀點，認為道德的任務是盡可能地使我們的行為符合所處社群的價值觀以及具體的情況。[[Ⅲ]](#_III_Shi_Yong_Zhu_Yi_De_Dian_Ji)我們應運用實踐理性來判斷應采取什么樣的行動；實用主義拒絕意識形態，沒有一種價值觀是至高無上、絕對和永恒的。在現實的社群中，不同價值觀的相對重要性不斷發生變化；實用主義會問：“對于當前的具體情況，怎么做最可能奏效？”

與此相反，每一種意識形態都自稱源于理性，凌駕于不同意見者之上。至高無上的意識形態的守護者是由專家組成的先鋒隊。宗教原教旨主義者認為某個獨特的神圣存在是終極權威，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是階級體系中的“無產階級”專政，[[10]](#_10_Lie_Ning_Zhu_Yi_De__Min_Zhu)功利主義者認為是個體效用的加總，羅爾斯主義者認為是（他們自己定義的）“公正”。[[11]](#_11_Ru_Hai_Te__2012_Suo_Shuo___Y)實用主義既與意識形態對立，也反對民粹主義。意識形態把某種“理性”置于多姿多彩的人類價值觀之上；民粹主義無視基于證據的實踐理性，粗魯地從激情直接跳躍到政策。我們的價值觀與實踐理性交織在一起，是心與腦的結合。民粹主義提供給人們的是無腦之心，意識形態提供給人們的是無心之腦。

實用主義也有其危險性。根據具體情況推斷什么樣的行為符合道德，在發揮這樣的自由時，我們應當考慮到自身固有的局限性。推理是需要下功夫的，但我們的毅力和能力都是有限的。更糟糕的是，我們經常傾向于為自己的價值觀尋找理由。而最糟糕的是，正如我們的知識有限一樣，我們的判斷力也有限。實用主義者承認這些局限性：個體的道德判斷是可能出錯的。所有社會都形成了應對問題的方式：我們運用經驗法則，有一些被固定下來，成為制度。在最好的情況下，制度是對累積的社會認知的概括，這些認知來源于林林總總、非單個人所能知曉的經驗。在做出許多道德決定時，以制度為指導是最好的途徑。有些政治哲學家對個體的實踐理性能力極度懷疑，他們看重蓄積在制度里的智慧，這是保守主義。[[Ⅳ]](#_IV_You_De_Ren_Lan_Yong__Bao_Sho)有些政治哲學家信任個體的理性，且看重其帶來的自由，這是自由主義。[[Ⅴ]](#_V_You_De_Ren_Lan_Yong__Zi_You_Z)這兩種考慮都有充分的依據，我們應該做的是折中平衡。

### 互惠是如何出現的

互惠義務對幸福有決定性的意義，但這些義務是如何產生的呢？任何解釋都必須符合進化論，包括作為互惠基礎的欲望與價值觀。不難理解，貪婪的人會在爭奪食物的競爭中勝出，而利他主義者則會被淘汰。但我們為什么也渴望歸屬感與尊重呢？我們為什么會珍視忠誠、公平和關愛，或者說，我們為什么會有價值觀？進化一直是一個殘酷的過程，具備優勢特征者勝出，所以自私的物質主義似乎是我們需要的：尊嚴和歸屬感是不能吃的，價值觀也會讓你束手束腳。表面上看起來，“經濟人”似乎是“自私的基因”的放大版。

但我們知道這不對，自私的基因并沒有創造自私的人。千萬年來，人類唯有通過群體合作才能生存，單干就意味著死亡。不渴望尊重與歸屬感的“經濟人”太自私，群體容不下他，會將他放逐。自然選擇淘汰“理性經濟人”（rational economic man），挑出“理性社會人”（rational social woman）：我們天生就既渴望食物，也渴望歸屬感與尊重。但這些共同的價值觀從何而來？

早期人類是生活在一個個群體中的，這些群體構成了許多網絡，人們可以在其中相互交流，通過模仿來傳播共同的行為方式。智人出現以后，我們仍然是生活在群體中，彼此模仿，至今依然如此。人們會不經意地影響自己朋友的行為，而且會進一步影響朋友的朋友的行為。[[12]](#_12_Dijksterhuis__2005___Christa)但智人發展出了一種獨特而有力的交流工具——語言。語言為什么是一種巨大的優勢？因為唯有語言能傳遞敘事。當人們交談時，傳開來的敘事傳遞了一系列想法。這種活動是人類區別于其他物種的根本特征。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弄顛倒了：我們不是從自身推導出世界，而是從所處的世界推導出自身。構成人類社會的最小單位不是思慮的個體，而是我們自出生就居于其中的關系。“狼孩”（由狼養大的孩子）身上的反常情況能幫助我們理解這一點。他們真的像羅慕路斯（Romulus）與雷穆斯（Remus）的神話所說，長大后會創建羅馬嗎？如果把羅馬時代的故事放到現代，我們可能會認為它在邏輯上推翻了安·蘭德（Ayn Rand）的假說。安·蘭德認為，如果人能不受社會束縛長大，就會成為像阿特拉斯（Atlas）一樣有獨立思想的創新者。但事實上，狼孩變成了悲劇性的生物，沒有了人的樣子。一個著名例子是18世紀在法國森林里發現的一個九歲大的孩子。盡管接受了大量訓練，他也未學會說話，更不用說像正常人一樣生活了。當代的類似例子是東歐劇變之前羅馬尼亞那些在國家寄養所里長大的嬰兒。

在不斷接觸的敘事中，兒童會快速形成對一個群體和地方的歸屬感。我們獲得這種感覺的時間遠在形成推理能力之前。家庭認同是在幼兒時期建立的，即使是國家認同通常也在11歲時就形成了，而推理能力則要到14歲左右才發展起來。[[13]](#_13_Hood__2014)我自視為約克郡人，我在千百種關于約克郡身份的敘事中長大，這樣的敘事代代相傳：寫到這里我想起，每晚我都會用約克口音給我11歲的兒子亞歷克斯讀《約克郡童話集》（Daft Yorkshire Fairy Tales）。

綿羊沒有復雜語言的能力，但它們也會形成歸屬于某個地方的某個群體的意識。一旦這種意識形成，牧羊人的工作就容易多了，因為它們會老老實實地待在山坡上不亂跑，這個過程稱為“定坡”（hefting）。我們知道，一旦一群羊被定下來，這種歸屬認知就會從母羊傳給羊羔。“定坡”過程發生得很快，不可能是通過遺傳塑造的，而是后天習得的行為。但盡管如此，這種行為模式也需要許多代羊才能定型。羊為什么學得這么慢？在此我提供一種基于社會科學的解釋，而不是牧羊人的解釋。[[Ⅵ]](#_VI_Wo_Bu_Fou_Ren_Ling_Yi_Zhong)羊群中的羊面臨一個協調問題。羊互相模仿，因此要讓羊群待在山坡上，它們都需要明白不要走開，也不要追隨任何走開的羊。現代實驗心理學告訴我們，解決協調問題的關鍵是“共同認知”；也就是說，從“所有人都知道一件事”，發展到“所有人都知道我們知道這件事”。[[14]](#_14_Thomas_et_al___2014)一個群體要產生共同認知，可以通過共同觀察（所有人同時看一件事），也可以通過共同敘事。我估計綿羊需要幾百年時間來形成共同認知，因為它們只能用共同觀察這種方式，因此會面臨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羊需要觀察到，所有其他羊都待在山坡上，但在羊群學會這么做之前不會出現這種情況以供它們觀察；要等到一次很巧合的行為偶然發生，羊才會學到這一點。而智人可以通過用語言來傳播“我們屬于這里”的敘事，從而很快塑造出共同的歸屬感。[[ⅩⅣ]](#_XIV_Mian_Yang_Hui_Shuo__Mie___X)

敘事不僅讓我們產生歸屬感，還能告訴我們應該做什么，即形成群體準則。童年時我們就學會了這些，并學會為了獲得尊重而遵守準則。當我們把這些準則內化為自己的價值觀時，通過遵守準則，我們也獲得了自尊。違背準則會讓人得不到尊重，正如我們已看到的，這樣做會令人產生悔意。我們的一些價值觀是先于語言的，比如父母關心孩子是本能，并不以一個群體有語言為前提。但大群體之間形成互惠義務，需要很復雜的協調，這樣的協調需要敘事，因而需要語言。[[Ⅶ]](#_VII_You_Yi_Duan_Shi_Jian__Sheng)

敘事還有第三種功能：我們通過把行為與結果聯系起來的故事來了解世界是如何運轉的。我們的行為因而變得有目的性。實驗表明，與直接觀察或直覺相比，我們更依賴故事。我們把行為連接成一個因果鏈，于是不符合我們眼下利益的行為就有可能變為看起來理性的行為，這就創造出一種開明的自利。在最好的情況下，這能拓展我們的知識；在最糟的情況下，這導致我們相信的東西與現實脫節，即“假新聞”這樣的敘事。[[15]](#_15_Ru_Cialdini__2007)故事無論真假，都很有影響力。諾貝爾獎得主喬治·阿克洛夫和羅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在對本次金融危機的驚人分析中總結道：“故事已不僅僅是在解釋事實了，故事就是事實。”[[16]](#_16_Akerlof_and_Shiller__2009)這既適用于金融危機，也適用于爆發大規模暴力行為的情形。新的研究發現，預測這種爆發的最好途徑是密切關注媒體上流傳的敘事。[[17]](#_17_Mueller_and_Rauh__2017)

歸屬感、義務和因果關系，這三種敘事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張互惠義務之網。義務敘事給我們灌輸公平觀和忠誠觀，告訴我們為什么要去履行互惠性義務。關于共同歸屬的敘事告訴我們參與者都有誰：互惠義務只適用于接受這些義務的確定群體。因果關系敘事告訴我們，為什么我們必須采取的行動是有目的性的。三者結合構成一套信念體系，改變我們的行為。信念體系能將地獄般的混亂轉變為團結，把“骯臟、粗野、短命”的人類社會變成“繁榮”的社會。敘事是智人的獨特能力：我們不只是類人猿。

處在同一個網絡中的人會聽到同樣的敘事，并且知道彼此都知曉這些敘事。在一個網絡里，關于歸屬、義務和因果關系的具體敘事往往會和諧契合。具有潛在破壞性的敘事可能被視為禁忌，從而被禁止流傳，或由于人們一致否定而被排擠。[[18]](#_18_Guan_Yu_Jin_Ji__Ke_Can_Kao_B)人們不斷調整觀念，在此過程中觀念彼此強化。這些觀念將一種共同身份與一項目標和關于如何實現這項目標的主張聯系起來。“虔信者”通過“經常祈禱”來尋求“天堂”，“牛津教授”渴望通過“注重教學”來“打造一所了不起的大學”。[[19]](#_19_Zai_Collier__2016_Zhong__Wo)

信念體系可能導致一些可怕的后果，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民族主義，我將在下一章探討這些問題。但信念體系也有一種不可估量的好處：它將自私的“經濟人”變成以義務為驅動力的人，他們自視為某個團體的一分子，在這樣的團體中，人們不是恐懼或冷漠地看待彼此，而是認定存在著相互尊重。經濟學教科書設想的世界似乎只需要一個個自利的個人就夠了，但一個完全由“經濟人”組成的世界將不會像其設想的那樣成為和諧美好的樂園。這些教科書預設了社會中已經存在人們一致認可并尊重的規則。初級經濟學的起點，奠基于高級的社會心理學與政治學研究之上。經濟學家正在承認這一點，盡管有些遲，這方面的先行者是喬治·阿克洛夫和他的學術搭檔蕾切爾·克蘭頓（Rachel Kranton）。[[20]](#_20_Yi_Bu_Hen_Hao_De_Jie_Shao_Xi)但經濟學在追趕的過程中，也帶來了一些有益的洞見。

最近的一項有巨大影響的研究與倫理規范的演變有關。提出者是蒂莫西·貝斯利，他從生物學中獲得靈感：規范像基因一樣，是從父母傳給子女的，[[21]](#_21_Besley__2016)但具體過程很不一樣。蒂莫西先是提出，在一個想象的社會中，一些人保持一種規范，另一些人保持另一種規范。人們選擇婚姻伴侶時傾向與跟自己持相同規范的人交往，但有時丘比特之箭會亂射，所持規范不同的夫妻結婚后，他們的子女會采用誰的規范呢？蒂莫西假設了一個簡單的過程，這也是一個人通過調整觀念以避免不協調的觀念產生精神壓力的例子。蒂莫西假設，孩子會傾向于接受父母中更快樂的一方的觀念。至于父母誰更快樂，在一個多數派得勢的政治體系中，通常是觀念更主流的一方更快樂。[[22]](#_22_Ru_Guo_Ni_Dui_Xi_Jie_Gan_Xin)由此出發，可以得出兩項引人注目的有趣結果。

在自然選擇過程中，如果一座島嶼有白色的峭壁，那么生活在島上的鳥類就會演化成白色，無論它們從其他島嶼飛來時有多少種顏色的羽毛。生物演化是為了適應棲息地。而與此相反，即使在兩個完全相同的居住地，人的規范也可能演變出很不同的樣貌，這是由不同規范的遵循者初始比例的微小差異造成的。人群就是環境，人們演化是為了相互適應。[[Ⅷ]](#_VIII_Zi_Ran_Xuan_Ze_Guo_Cheng_Z)一個社會的起點決定了它的終點，在演化過程中，初始差異被放大。這顯然符合我們在世界上觀察到的現實：不同社會有非常不同的主導性規范，每一種規范在其所處的社會中都具有持續性。但第二句話才是要害。在自然選擇過程中，種群最終形成“最適合于”棲息地的特征。在白色峭壁的環境里，白色的鳥活得更好。但絕不能說人的規范也一定會這么演化。盡管一些規范對每個個體來說都是好的，但考慮到其他人所持的規范，最終對整體來說卻會很糟糕。為了說明社會規范的演化與自然選擇過程相比有多怪異，可以試想：如果最初大多數鳥是藍色的，所以所有鳥都進化成了藍色，但在白色峭壁的環境中，這樣的鳥都更容易被捕食者吃掉。[[ⅩⅤ]](#_XV_You_Shi__Ru_Sheng_Tai_Wei_Go)這兩個有趣結果合在一起暗示著，一個人類網絡最終很可能形成某種穩定但僵化失調的規范結構。它是穩定的（即不會發生進一步的變化），但這僅僅是因為所有人都被其他人持有的規范鎖住了。

這些結果可以產生一個很重要的推論：保守主義政治哲學不可能是完全正確的。保守派推崇歷史沉淀下來的社會制度，視其為經驗智慧的濃縮，但制度也很可能將一些高度僵化失調的規范正式化了。然而這不等于反過來承認理性至上就是對的：有動機的理性思考也可能導致災難。

### 規范在組織中的戰略性使用

過去的幾千年里，大多數人不再以結成小型群體進行采集狩獵的方式生活。現代物質生活的前提是，人們在大型組織中合作，得以收獲規模和專業化帶來的效率。

三種類型的組織支配著我們的生活，每一種都適合于一類不同的活動。最小但最基本的是家庭：86%的歐洲人與家人同住，大多數兒童都是在家庭中長大的。盡管家庭是常態，但一些意識形態敵視家庭。社會主義“基布茲”（kibbutzim）徹底廢除了家庭；共產主義時代的羅馬尼亞也曾讓成千上萬的兒童與父母分離，以集體的方式撫養他們。斯大林主義和原教旨主義教派的領袖都鼓勵兒童告發自己的父母。我們將要看到，資本主義目前也沒有促進家庭的發展，在很多地方家庭正在解體。但家庭主導著兒童養育，這是有充分理由的。事實證明，任何其他撫養兒童的方式都不成功。

當人們工作時，他們通常會組成企業：規模是現代生產率能達到如此水平的關鍵。美國94%的人在企業中工作，英國為86%。[[Ⅸ]](#_IX_Zhe_Liang_Ge_Shu_Zi_Di_Yu_Sh)一些意識形態像敵視家庭一樣敵視企業。懷舊浪漫主義者主張回到一個由工匠、農民和公社組成的社會。新潮浪漫主義者對亞馬遜、愛彼迎、優步、易貝等能讓人們直接交易的電子平臺熱情高漲。但亞馬遜和優步本身也已成為大雇主。在非洲社會，大多數人以工匠或小農身份獨自工作。這種方式有其優點，但后果是生產率長期處于低水平，所以人們貧困不堪。我們需要現代企業，非洲人也需要：非洲不僅是世界上最不繁榮的地區，也是最不幸福的地區。[[23]](#_23_World_Happiness_Report__2017)

在最宏大的層面上，許多事項由國家來組織是最好的，如監管、公共物品與服務的供給和收入再分配。這方面的數據更為驚人：所有繁榮的社會都是以國家形式組織起來的，所有不以國家形式存在的社會都極度貧困。[[Ⅹ]](#_X_Shao_Shu_She_Hui_Zai_Mei_You)像對家庭、企業一樣，一些意識形態敵視國家。馬克思主義者在實踐中建立了歷史上最為國家中心主義的社會組織形式，但他們理論上的目標截然不同：他們認為國家將“逐漸消失”。但目前最有影響的反國家意識形態是硅谷的自由至上主義者們所持的意識形態。根據他們的說法，比特幣將取代國家發行的貨幣，大家會逐漸放棄官方貨幣。擁有此類新電子設施的超人們將各自獨立決定如何最好地使用它們，無視或挫敗國家強加的管制。人與人之間在技術支持下的全球性聯系將取代有明確邊界的民族國家社會。“工業世界的各國政府，你們這些令人生厭的鋼鐵巨人，別干涉我們。”從政府手中解放出來后，我們都將融入一個巨大的整體：“隱私不再是一種社會規范。”[[24]](#_24_Zhe_Fen_Bie_Shi_Yue_Han__Pei)這個結果在道德上和實踐上都更好。但是，我覺得恐怕未必。

已經把全世界聯系在一起的“硅谷”巨頭們想象，他們正在通過這種方式開啟一個團結在其自由至上主義價值觀周圍的全球社會。這是很難實現的。連接人與人的新技術正在取代偶然地由地域決定的人類網絡化群體（地方社會或國家）。新的電子網絡群體的成員，其身份是基于自我的選擇而非偶然形成的：在“回音室”里，人們更喜歡與觀點一致者建立聯系。[[25]](#_25_Miao_Shu_Zhe_Yi_Xian_Xiang_D)在該過程中，敘事創造信念，信念與人們共同生活的空間日益脫節。但我們的政治單位依然是由我們的居住地決定的。我們的選票是按地域劃區計票的，源于政治的公共服務和政策是按地域提供和適用的。所以，之前導致不同政體之間的規范存在巨大差異的過程，在新技術帶來的地域連通性下，正在導致各政體內部出現巨大的規范差異。政體內的觀念變得更加兩極分化；分歧更容易轉化為人身攻擊；幾百年來導致政體之間對立的仇恨，正在每個政體內部導致信念體系的對立。歷史上政體之間的仇恨演變為大規模的有組織暴力。政體內部的仇恨將產生不同結果，但同樣可能是令人悲傷的。

家庭、企業和國家是塑造我們生活的重要場所。構建家庭、企業和國家最快捷的方式是建立層級結構，頂層向基層發布命令。這樣的結構雖然很容易建立，但運行效率通常都不高：只有在指揮者的監督下，人們才會遵守命令。漸漸地，許多組織認識到更有效的做法是將層級軟化，構建具有明確目標感的相互依存的角色，賦予人們扮演這些角色的自主性和責任。從依靠權力管理的層級結構變成目標化管理的相互依存結構，意味著領導方式的相應改變。領導者不再是總指揮，而是總溝通者。胡蘿卜加大棒演變成了敘事。

在現代家庭里，父母和孩子地位平等，要哄著他們承擔責任。企業和政府里的層級結構已經大幅度地扁平化。例如，英國央行過去有六個不同的餐廳，如此程度的區別對待放在現在是不可想象的。領導機制并沒有被廢除，但領導的角色變了。保留領導機制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其他空想式的做法都失敗了。

在家庭、企業與國家里處于更高層級的人比下面的人擁有更多權力，但通常他們要負的責任遠遠大于掌有的權力。為了履行職責，他們需要組織里的其他人服從，但他們的執行手段有限。作為父親，我試圖要求亞歷克斯晚上上床睡覺。但純粹的權力用起來很不容易，而且不是很有效：亞歷克斯會躲在被窩里看書。在所有成功的組織中，包括家庭、企業和國家，領導者發現通過創造一種義務感，他們能使遵從的情況大大改善。亞歷克斯不想睡覺，而想看書，但如果我能說服他他應該去睡覺，執行的難度就會降低。當實現了這一點時，我的權力就會轉化為權威。更宏觀地說，這是出于戰略目的構建道德規范。領導者的關鍵權力不是指揮權，而是他們位于網絡中心的地位。他們有說服別人的力量。[[Ⅺ]](#_XI_Zhe_Ye_Bu_Shi_Zui_Jin_Cai_Ch)說領導者在戰略性地利用道德來塑造我們的生活，這聽起來有些居心不良，但通常事實恰好相反：這是健康的過程，使現代社會變得比所有以前的社會都要好。我們還可以讓社會變得更好。

但在實際情況中，領導人如何戰略性地利用語言來創造義務感呢？請看1943年強生公司董事長羅伯特·伍德·約翰遜（Robert Wood Johnson）的例子。他把強生的道德準則刻在石頭上，名為“我們的信條”。開頭是：“我們相信，我們的首要責任是對使用我們產品的人負責。”注意用詞：是“我們”和“我們的”，不是“我”和“我的”。這是強生公司里每個人的信條。接著是以降序排列其他責任：對雇員的，對當地社會的，最后是對股東的責任。通過使用敘事的方式，該信條已經延續了三代人的時間：現在訪問強生的網站仍然能看到這個圍繞著“故事”組織起來的信條。這有沒有讓公司成員的行為發生變化？

1982年強生遇到一場禍事。芝加哥有七人死亡，經追查死因是被放在泰諾瓶子里的毒藥，泰諾是強生的暢銷產品。強生接下來的做法不同凡響，直到今天仍被商學院作為案例來研究。不等高管做出反應，當地分部的經理就主動行動，把所有的泰諾撤下超市貨架，并承諾對商店進行全額賠償。這在今天看起來并不特別，那是因為，自此事件起，這已經成為商業界的標準做法。但在1982年之前，企業并不召回產品，通常做法是拒絕承擔責任。強生的基層員工之所以有信心主動采取這一給強生造成約1億美元損失的舉措，是因為他們從公司的信條中明白，泰諾的使用者是他們的優先服務對象。[[26]](#_26_Zheng_Ru_Mai_Jin_Tai_Er__Mac)后來最高管理層完全支持他們采取的快速行動。這樣的行動不僅符合道德，還被證明是良好的經營之道。與預測相反，強生很快就恢復了市場份額。[[Ⅻ]](#_XII_Qiang_Sheng_De_Xin_Nian_Ti)

亞當·斯密所接受的經濟學的堅實基礎是承認非互惠性的利他主義只限于援救義務：這不足以對抗利己主義。互惠義務至關重要，但得由人來構建。這就是關于歸屬感、義務與目的性行動的敘事結合在一起后可以實現的。[[27]](#_27_Wo_Yi_An_Fen_Xi_Xing_Shun_Xu)我按歸屬感、義務、目的性行動的順序展開論述，但順序并不重要；如果一項共同行動能給許多人帶來好處，它就有可能同時成為共同身份與共同義務的基礎。

敘事有強大的力量，但不能太偏離現實：領導者既向眾人講話，也受眾人觀察，所以他們不能言行不一，否則后果嚴重。他們的行為必須與敘事保持一致。一邊說你和我都是“我們”，一邊把你自己放在我們之上，會顯示歸屬感敘事是謊言；說我們對彼此都負有義務，行事卻自私，會顯示義務敘事是謊言。假如強生的CEO一直在剝削基層員工，他們就不可能當機立斷地主動行動，把泰諾撤下貨架。相反，這位CEO的行為堪稱楷模：他甚至連在榮獲總統自由勛章時都是以所有員工的名義接受的。

領導人會因言行不一而破壞信念體系，也可以通過戰略性地規劃自身行為的方式強化信念體系。假設聽眾懷疑你心口不一：“信條”上說“用戶重于利潤”，但這么寫是不是為了討用戶開心？面對這樣的懷疑你能怎么辦？經濟學家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用信號傳遞理論（Theory of Signalling）解決了這個問題，從而贏得了諾貝爾獎。顯然，只說“這真是我的本意”是沒用的，因為即使你不這么想也會這么說。行動勝于言語。具體而言，如果你真的認為“用戶重于利潤”，那就應該做一件成本高得令人無法接受的事。即使在你確實懷有這樣信念的情況下，僅有的行之有效的行動也可能是令人痛苦的，但這是你為樹立信譽而必須付出的代價。這樣的信號能增強信念體系的可信性，但敘事仍然至關重要：信號帶來可信性，但敘事帶來精確性。二者相輔相成。

權力轉變為權威，對于在龐大人群之間構建互惠關系（如所有人都接受納稅義務）至關重要。領導者不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但他們能駕馭我們的情緒。只依賴強制力的領導是危險的。可貴的領導會利用自身處于網絡化群體中心和作為總溝通者的地位，通過規劃敘事與行動來取得影響力。所有領導者都會增加并改進符合團隊信念體系的敘事，但偉大的領導者會構建一套完整的信念體系。[[28]](#_28_You_Guan_Ji_Ben_Li_Lun_He_Zh)

近期一個在網絡化群體中使用敘事發揮領導力的典型例子是“伊斯蘭國”（ISIS）。“伊斯蘭國”的領導人認識到了通過社交網絡傳播有力的新敘事的力量。歸屬敘事讓之前自認為是瑞典人、摩洛哥人、比利時人、突尼斯人、澳大利亞人等身份各異的年輕人，結成一種新的共同身份——“虔信者”。關于互惠義務的敘事使他們為贏得戰友的尊重必須不斷采取野蠻行為。新的敘事把他們的恐怖行為與“哈里發國”的現實目標聯系在一起，從而打造了一條因果鏈，讓他們的服從有了目標感。由于炮灰供應源源不斷，加上支持者的資金，“伊斯蘭國”迅速成為世界舞臺上的重要角色；該組織像法西斯主義一樣，唯有在壓倒性武力的打擊下才被打垮。作為一套信仰體系，它具有內在一致性，因而有穩定性。孤立地看“伊斯蘭國”的每個成員都很令人反感，而這正在他們和其他人之間劃出一道鴻溝，從而強化了其團體認同。

“伊斯蘭國”戰略性地利用敘事讓社會回到12世紀。而我們的領導人可以利用敘事更好地達成目的。

### 軟性義務

我們從現代資本主義正在面臨的道德危機開啟本書：一個社會可以沒有道德，因為利己主義會讓我們進入普遍繁榮的天堂；“貪婪是好的”，因為欲望越旺盛，人們工作就越努力，我們所有人都會變得越富裕。事實與此截然不同。我們是社會性的存在，既不是“經濟人”，也不是無私的圣人。我們渴望尊重和歸屬，這是我們道德價值觀的基礎。全世界的人有六種共同的價值觀，沒有一種是由理性創造的。從進化角度看，關愛和自由也許是原始觀念。忠誠和圣潔也許是作為支撐群體的規范演化出來的；群體成員將其作為準則來遵守，并將其內化為價值觀，因為這樣做能換來歸屬感。同樣，公平與等級規范也許是為維持群體內秩序而演化出來的，這樣做能換來尊重。

我們的價值觀很重要，這是因為價值觀所要求的行為，即我們的義務，重要性勝于愿望。值得注意的是，從這六個價值觀中，我們學會了如何借助敘事塑造的信念體系，在具有信號作用的行動的支持下，創造出無限多的義務。處在網絡（家庭、企業與社會）中心的領導者可以有意識地構建這些信念體系。根據敘事的具體內容，他們可以創造截然不同的群體行為，我們的共同價值觀和共同愿望是這些行為的最終支撐。

所有這些都關系到我們社會目前面臨的抉擇。各種意識形態吸引著人們：每一種都把道德從我們共同的價值觀中剝離出去，每一種意識形態都把理性放在了首位，把一種價值觀凌駕于其他價值觀之上。因此，每一種意識形態都不可避免地與我們的一些價值觀及其心理基礎發生沖突。如果對更高目標的追求破壞了歸屬感，那也沒關系；如果這使一些人遭受羞辱，那又怎樣？所有意識形態都覺得“傷及一些無辜”、“打破幾個雞蛋”不是什么事。所有意識形態都主張理性至高無上，但具體是哪種理性，它們卻有分歧。因此意識形態道路必然會導致不可化解的社會沖突。意識形態不太可能把我們帶入想象中的烏托邦，更可能重現“骯臟、粗野、短命”的人類生活。

民粹主義者也在爭取我們的支持。他們以我們的價值觀和渴望為榮，但不顧反映在我們實踐理性與制度中的、歷經千百年積累的社會認知，忽視我們構建互惠關系的能力。他們也會導致社會倒退。

本書提出了一條不同的路徑：一種符合特定標準的道德資本主義，這種標準建立在我們價值觀之上，經過了實踐理性的磨礪，而且社會本身可以再生。這句話看起來簡單，卻存在許多復雜、極具爭議性的問題。意識形態分子不贊成“建立在我們的價值觀之上”，民粹主義者不贊成“經過實踐理性的磨礪”。此外，“社會本身可以再生”這句話意味著什么？我不是指永恒完美的烏托邦，無論是柏拉圖的理想國、馬克思主義者們的天堂，還是“歷史終結”的勝利宣告，這些都是荒謬的。我說的“再生”是指社會規范不會走向自我毀滅。用社會科學的語言來說，我們在尋找有局部穩定性的東西。社會周期性地遭受沖擊，比如氣候變化的自然沖擊、新興宗教的思想沖擊，這樣的沖擊可能導致社會偏離其局部平衡，轉向完全不同的規范。但我們的規范不應因自身矛盾的重壓而崩潰。

我們現在有了一幅連貫的圖像，顯示義務如何塑造個體行為，個體行為為什么重要，為什么會惡化，以及如何糾正。很快我就將把這些見解應用于支配我們生活的三種組織——家庭、企業和社會。我將展示這些群體的領導者可以怎樣構建互惠義務以重建資本主義，使其與我們核心的共同價值觀相輔相成而非相互對立。

我對互惠義務的強調與流行的政治話語截然不同，后者把道德的內涵縮小為對個人權利與應享權利的主張，義務歸由政府承擔。但要一個人有權利，就必須要另一個人有義務。一項新義務迫使人的行為發生變化，使一項新權利的行使成為可能：如果沒有相應的義務，新權利就是空洞的。互惠義務能確保這一點，每一項新權利都與其相應的新義務搭配。

權利意味著義務，但義務不一定意味著權利。父母對孩子的義務遠遠超越他們享受的法定權利。援救義務也不需要與權利搭配：我們援救一個池塘中溺水的女孩是因為她遭難，不是基于她的權利。一個能夠成功創造義務的社會可能比一個只依賴權利的社會更慷慨和諧。義務之于權利，正如稅收之于公共支出，也就是說，是必需的。大多數西方選民明白，在討論公共支出時必須考慮福利與資金來源的平衡，否則，政客在選舉期間承諾增加公共支出，選舉后支出超過財政收入的問題只能靠通脹來解決。[[29]](#_29_Zhe_Ge_Xian_Xiang_Bei_Cheng)新的義務就像提高財政收入，新權利的創設就像增加支出。權利的規模可能是合理的，但確定這一點的唯一途徑是對相應的義務進行公共討論。

假如沒有這樣的討論，那么從舊文本中演繹出新權利的過程就像印鈔一樣：個人權利會像鈔票一樣源源涌出。我們必須創設新義務以與之匹配，否則為了彌補赤字，一些東西就得被犧牲。如果人們不愿承擔為滿足新的法定權利而出現的義務，那些不與法定權利搭配的義務——如互惠默契和一些援救義務，就可能被損害。

對權利的關注給了職業法律人特殊的地位。通常職業法律人從一些書面文本（如一項法律或條約）出發，試圖推論出其中可能隱含的權利。然后，每一項判決都可能成為判斷是否隱含某種新權利的先例。這個職業法律人“發現”舊文本隱含的新權利的過程，已導致社會面臨一個不斷擴大的鴻溝：他們“發現”的權利，日益超過大多數人視為道德上合理的權利。舉一個近期在英國發生的小案例：法院裁定學校不得再使用“父親”和“母親”這兩個詞，因為這侵犯了一項被“發現”出來的同性伴侶享有的權利。在這個案例中，法官為少數人的利益創設的一項新權利，破壞了幫助無數其他家庭撫養子女的基本敘事模式。這項要求造成了廣泛的害處，帶來的好處則很小，顯示出意識形態戰勝了實用主義，自私的權利主張妨礙了相互尊重。

當我們承認對他人負有的新義務時，我們的社會更有希望實現繁榮；當我們忽視這些義務時，社會便會遠離繁榮。資本主義社會經歷了一個忽視義務的過程，其主要癥狀是社會信任度的下降。要預測未來幾十年信任度的演變趨勢，首要的指標是目前美國青少年的信任度發生的變化，因為今天的青少年就是明天的成年人，而美國的趨勢會影響歐洲。在美國青少年中，信任度已經下跌了40%。[[ⅩⅢ]](#_XIII_Ju_Ti_Er_Yan__Diao_Cha_De)所有社會階層的信任度都在下滑，但窮人的情況最明顯。如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所說，這揭示的不是日益加重的心理偏執，“而是他們生活在其中的丑惡社會現實”。[[30]](#_30_Putnam__2016___p__221)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非但未能實現造就繁榮的承諾，反而為當下帶來了欺凌、羞辱與恐懼，一種“羅威納社會”[[ⅩⅥ]](#_XVI_Rottweiler_Luo_Wei_Na_Quan)。為了實現承諾的繁榮，我們就必須恢復相互尊重。實用主義告訴我們，這需要考慮具體背景和基于證據的推理。這就是我在下一章要做的。

[[Ⅰ]](#_I_1)目前，衡量幸福最好的實踐方法是使用一種描述“生活階梯”（從最糟糕情況到最理想情況）的十級量表。事實證明，這是一種比直接詢問幸福感更穩定的方法，后者會受到被訪者當時情緒的影響。《2017年世界幸福報告》記錄了用“生活階梯”做的調查的結果。

[[Ⅱ]](#_II_1)一個例子是將獎金文化引入公共服務領域。

[[Ⅲ]](#_III_1)實用主義的奠基人之一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寫道：“無論大小，任何一種社會組織的存在，都是因為每個成員在履行自身義務的同時，相信其他成員也會同時履行其義務。每當眾多獨立個人以這樣的合作取得預期的結果，實現結果的原因都純粹是，那些與該合作直接相關的人彼此間先已有信任。一個政府，一支軍隊，一套商業體系，一艘船，一所大學，一支運動隊，都是以此為前提而存在的，沒有它，人們不僅無法做成任何事，甚至都不會嘗試。”（James, 1896）本章將展示這種信任是如何建立起來的。

[[Ⅳ]](#_IV_1)有的人濫用“保守主義”這個詞來指代各種道德敗壞，不要將這些人口中的“保守主義”與這個詞的真實含義混淆。

[[Ⅴ]](#_V_1)有的人濫用“自由主義”這個詞來指代各種道德敗壞，不要將這些人口中的“自由主義”與這個詞的真實含義混淆。

[[Ⅵ]](#_VI_1)我不否認另一種解釋：綿羊非常笨。

[[Ⅶ]](#_VII_1)有一段時間，生物社會學家認為基于族群的自然選擇本身可能產生天生的親社會價值觀（如互惠），但現在大量研究表明，我們的親社會價值觀的形成不能以此來解釋。蜜蜂的親社會行為只需用身體語言就能形成，但那是因為它們的繁殖方式不同。最近關于這一問題的明確討論參見Martin（2018）。

[[Ⅷ]](#_VIII_1)自然選擇過程中與此最接近的類似情況是“生態位構建”（niche construction）現象，如海貍改造其所處的自然環境。

[[Ⅸ]](#_IX_1)這兩個數字低于實際水平，因為許多個體經營者（即非受雇者）實際上是為企業工作的，為了避稅而申報為個體經營。

[[Ⅹ]](#_X)少數社會在沒有經濟繁榮的情況下實現了幸福，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不丹。但不丹絕不是無政府社會的例子，它只是與其他國家不同，將人生意義和歸屬感（特別是強調保存民族文化）而不是收入作為優先目標。不丹是亞洲居民幸福感最高的國家。

[[Ⅺ]](#_XI)這也不是最近才出現的情況：這是政治學家理查德·諾伊斯塔特（Richard Neustadt）在1960年分析美國總統權力時的名言。

[[Ⅻ]](#_XII)強生的信念體系分為三部分：圍繞一個共同的道德目標建立的共同身份，其內容是強生“信條”中規定的向客戶提供物美價廉的健康產品；員工為實現這一目標而努力的互惠義務；一條通往開明自利的因果關系鏈——這一模式是企業和員工就業可持續性的基礎。正如強生的網站指出的，它是為數不多的存活了一個世紀的公司之一。我要感謝約翰·凱（John Kay）提供這個例子。

[[ⅩⅢ]](#_XIII)具體而言，調查的時間區間是過去35年，青少年被問及是否同意“大多數人是可以信任的”這句話。

[[ⅩⅣ]](#_XIV)綿羊會說“咩”，許多其他動物也能使用基本語言，但只有人類掌握了塑造敘事所需的復雜語法。見Feldman Barrett（2017），第五章。

[[ⅩⅤ]](#_XV)有時（如生態位構建的情況），棲息地也會逐漸發生變化以適應這些特征。藍色的鳥不會把峭壁涂藍，但海貍會改變溪流的流向。但是，人類調整規范的方式與生態位構建截然不同：人類的“棲息地”只不過是他人所持的規范。

[[ⅩⅥ]](#_XVI)Rottweiler，羅威納犬是一種猛犬，攻擊性強，給人咄咄逼人的感覺。科利爾以羅威納犬的特點來形容西方社會，認為生活在這一社會中的人自私自利，忽視對他人的義務，缺乏彼此尊重。——譯者注

## 第三章 道德的國家

將良好理念與道德目標聯系在一起的國家總會創造奇跡。我這一代人就是在這樣一段時間里長大的，即1945—1970年。我們經歷了迅速的繁榮，而實現這種繁榮的手段，是國家有意識地駕馭資本主義為社會利益服務。這并不常見，也不是現在的情況。

我的父母在1930年代時還是青年，通過他們，我了解到那時國家崩潰的情況多么嚴重。通過他們講述的故事，我明白了國家崩潰導致大規模失業的悲劇。國家，以及國家所反映的社會，缺乏把充分就業視為自身職責的道德使命感。當時國家也缺乏這方面的理論指導，因此對資本主義的管理嚴重失當。雖然法西斯主義僅在德國和意大利得手，但已足以引發一場全球性災難。在毀滅慘景的沖擊下，各國及各國社會才找到了這種遲來的使命感。在美國，羅斯福總統接受了國家有義務提供就業的理念，即他的“新政”。他能夠當選是因為民眾認同“新政”是符合倫理的。新的理論也出現了：凱恩斯（Keynes）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提供了解決大規模失業問題的學說。但各國政府最初并不愿接受。盡管這本書出版于1936年，但大蕭條的結束是因為各國重整軍備剛好提振了需求。正如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調侃的那樣，二戰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經濟刺激計劃。但在戰后，凱恩斯的學說被用于維持充分就業，1970年代通脹上升后，該學說逐漸變得不足為用。

在1930年代，國家辜負了國民，現在又發生了同樣的情況。目前，一提到“資本主義”這個詞，人們便普遍心懷鄙視。但這個被人怨恨的詞匯代表著一種市場、規則與企業網絡體系，它既創造過1945—1970年的奇跡，也制造了1929—1939年的悲劇。我這一代人沒有經歷那場悲劇，我們生活在奇跡年代，而且滿心以為奇跡必然會延續下去。當前這代人認識到事情并非如此。新的焦慮植根于經濟差異。繁榮的大都市和衰敗的中小城市之間的地域差距正在擴大；一道不斷拉大的鴻溝兩個群體分隔開來，一邊是擁有受人尊重和富有成就感的工作的人，另一邊是職業前景黯淡甚至失業的人。

就像1930年代“大蕭條”時的情況一樣，資本主義造成了這些新焦慮。國家需要彌合這些由結構性變化導致的社會分裂。但就像1930年代一樣，國家，以及國家所反映的社會，遲遲不愿承認它們負有應對這些新問題的道德義務；這些新問題不僅沒有被消滅在萌芽狀態，反而在縱容之下演變成危機。國家不可能比國民更有道德，不過國家可以鞏固互惠義務，可以逐漸說服我們接受新的義務。但如果國家試圖將一套迥異的價值觀強加給它的公民，就會失去國民信任，權威也會受損。國家的道德界限是由社會的道德界限確定的。當前國家缺乏道德使命感，反映了社會道德使命感的衰落：隨著社會分裂的加劇，人們愈發不愿寬宏地對待裂痕另一邊的人了。

與1930年代相似，如今除了缺乏使命感之外，還缺乏實用性的新思維。在第三部分中，我將努力填補創新思維的空白，提出彌合這些破壞性分裂的實用方法。但首先，我們必須認真理解國家在道德方面的失敗之處，以及這種失敗在我們社會的道德變化中的根源。

### 道德國家的興起

道德國家的鼎盛時期是戰后的頭20年。在一個充滿道德使命感的輝煌時代，各國史無前例地創造了大量的互惠義務。“從搖籃到墳墓”和“新政”這兩種簡潔敘事囊括了在國家管理之下公民之間相互負有的極多的新義務。從孕期醫療保健到養老金，通過繳納國家管理的國民保險，人們等于是在相互投保：這是社群社會民主主義的首要倫理準則。這一準則得到了左右兩邊政治派別的一致支持。在美國，它開創了兩黨在國會中融洽合作的時代；在德國，它帶來了“社會市場經濟”的時代；在英國則是標志性的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它由保守黨領導的聯合政府中的一名自由黨人設計，由工黨政府實施，并由多屆保守黨政府維持。1945—1970年，在北美和歐洲，盡管表面上有政治競爭的喧囂和煙霧，但主流政黨領袖之間的政治分歧微乎其微。[[Ⅰ]](#_I_1950Nian_Dai__Ren_Men_Yong__B)

但社會民主主義成功的基礎是一項明顯到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遺產。大蕭條的結束絕不只是二戰無意間發揮的經濟刺激產生的效果，更是一場大規模的共同事業，在走出蕭條的過程中，各國領導人精心構建了關于歸屬感和共同義務的敘事。這樣做的遺產是把每個國家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共同體，一個有著強烈認同感、義務感和互惠意識的社會。人們樂意遵循社會民主主義敘事，把個人行為與集體后果聯系在一起看待。在戰后的頭幾十年里，富人愿意繳納高達80%以上的所得稅率；年輕人服從征兵制度；在英國，連犯罪分子都因為警察不配備武器而自覺克制。這使國家的職能大大擴張，這就是社會民主主義議程。

但功利主義和羅爾斯主義的先鋒逐漸接管了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國家，道德國家演變為父愛主義國家。假如這些新先鋒認識到這項非凡的遺產依賴于不斷更新的共同身份，上述變化本不至于產生那么大的影響。但他們非但沒形成這種認識，反而逆向而行。功利主義先鋒隊是全球主義者，羅爾斯主義者則強調受害者群體的獨特身份。漸漸地，社會民主主義議程的基礎瓦解了。到2017年，西方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都被選民拋棄了，這些政黨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危機。[[1]](#_1_Ou_Zhou_Ge_Guo_She_Hui_Dang_H)借助第二章介紹的概念，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一情況發生的原因。

### 道德國家的衰落：社會民主主義社會是如何瓦解的

社會民主主義的崩潰是雙重打擊造成的：人們相互負擔的義務逐漸減輕，同時，隨著經濟結構變化導致越來越多人的生活被破壞，人們對這種義務的需求日益增加。這一時期可觀的經濟增長是以經濟結構日趨復雜為代價的，更為復雜的經濟結構需要更多專業技能，進而意味著需要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這促成了高等教育的空前擴張。這場大規模的結構變化對身份認同產生了影響。

為了說明為什么這對社會民主主義產生了致命打擊，接下來我將描繪一個模型。一個好模型會從可以簡化問題的假設出發，假設雖不驚人，模型卻能得出驚人的結論。理想情況下，它能展示某種你原本沒認識到但經揭示后卻洞若觀火的情況。通常一個模型會用一系列方程式來表示，但我將試著用幾句話來描述這個模型。[[2]](#_2_Wo_Zai_Collier__2018b_Zhong_G)雖然這個模型相當簡單，但需要一點耐心才能理解其原理。而耐心的回報是它頗能發人深省。這個模型一開始會涉及心理學，隨后還會沾一點經濟學。

它涉及的是簡化的心理學理論，但絕不像怪誕病態的“理性經濟人”概念那么粗糙。如前所述，“理性經濟人”在石器時代就消亡了，被“理性社會人”取代。我還借鑒了喬治·阿克洛夫和蕾切爾·克蘭頓開創的身份經濟學理論來闡述“理性社會人”的行為方式。假設我們都有兩個客觀身份：工作和國籍。身份是獲得尊重的來源，而這兩個身份都能帶來一些尊重。為了明確每種身份帶來多少尊重，假設工作帶來的尊重是由其產生的收入反映出來的，國籍帶來的尊重由國家的威望決定。現在加入一個選項——突出性（salience）。盡管工作和國籍這兩個客觀身份不是我們能控制的，但我們可以選擇更重視哪個。我認為突出的那種身份對我的尊嚴影響更大。設想這就像一張牌，我把它放在哪個身份上面，該身份帶來的尊重就翻一倍。打這張牌還有一個更深的影響：能把我們分成兩個新群體——突出工作的人和突出國籍的人。在選擇突出哪個身份時，我也是在選擇歸屬于哪個群體。歸屬于該群體的身份給我帶來更多尊重，其程度取決于該群體有多么受尊重。

綜上所述，每個人有四個獲得尊重的來源。一是我們的工作，二是我們的國籍，三是我們選擇突出哪個身份，四是與像我們一樣選擇突出該身份的人組成的群體。最后這種來源帶來的尊重，它的具體水平可以設想為該群體每個成員從前三個來源中所獲得尊重的平均值。那么我們會如何選擇突出哪個身份？[[Ⅱ]](#_II_Dang_Ran__Wo_Men_Xu_Yao_Zuo)這里就需要用到經濟學了：“理性社會人”從尊重中得到效用，并將其最大化，這就是此處“理性”一詞的意思。我們現在就可以把這個小模型應用于戰后社會史了。

二戰后的工資水平差異較小，而國家的聲望隆盛，所以即使是收入最高的工作者也會選擇突出自己的國籍而非工作，以此將從尊重中獲得的效用最大化。把尊重的四個來源加起來，我們能看到，尊重在全社會的分布是相當平等的。每個人都從國籍身份中得到同等的尊重，因為他們都選擇突出國籍，所以國籍帶來的尊重都會翻一倍，因為每個人都選擇突出國籍，所以他們組成的群體所帶給他們的尊重也是人人相同。因此，造成尊重差異的唯一原因是工資的有限差距。

接著看看這個愉快的結果是如何崩潰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經濟復雜性的提升，越來越多的人得到了優質的教育和與之匹配的優質工作，優質的工作帶來更高的生產率，薪資便相應提高。達到一定程度后，技能水平最高的人就會將自己選擇突出的身份從國籍改成工作，因為這樣做能最大化他們獲得的尊重。

當這個過程發生時，尊重的最后一個來源——與其他人選擇突出同一種身份所帶來的尊重，開始出現分化。選擇突出工作身份的人，因加入做出該選擇的群體而獲得更多尊重；而繼續突出國籍身份的人得到的尊重會變少。[[Ⅱ]](#_VII_Zhe_Bu_Shi_You_Yu_Ta_Men_Du)這種分化本身會誘使更多人把突出的身份從國籍改為工作。這最終會帶來什么結果？

也許每個人最終都會改變突出的對象，這是可能發生的。但更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從事低技能水平工作的人繼續突出他們的國籍。把這一結局與最初的社會狀態進行比較會發現，高技能水平者已不再選擇突出國籍，功利主義先鋒隊就在他們的隊伍中。他們脫離突出國籍身份的群體后得到的尊重比之前更多。而繼續突出國籍的低技能水平者所得到的尊重變少了，因為最受尊重的人已經脫離，所以繼續留在這個群體中便沒那么受人尊重了。

像所有模型一樣，這個模型是極為簡化的。但它讓我們無須深陷細節的泥沼，有助于解釋我們的社會是為何以及如何分崩離析的。整個過程中，所有人只是在努力把自己獲得的尊重最大化。但由于經濟的結構性變化，一道裂痕出現了。高技能水平者把突出的身份改成了自己的工作。時任《紐約時報》國際版編輯的蘇珊·奇拉（Susan Chira）在接受艾莉森·沃爾夫（Alison Wolf）的采訪時對這一選擇做出了一種完美的表達：“工作很有成就感，已經與身份緊密交織在一起。”[[3]](#_3_Wolf__2013___p__32__Zhe_Ju_Hu)同時，受教育程度較低、自身工作較缺乏成就感的人會繼續突出國籍，但開始感到被邊緣化。

因為自鳴得意的高技能水平者比被邊緣化者得到更多尊重，所以他們熱衷于向其他人表明他們的確更突出自己的技能身份。我們現在可以利用邁克爾·斯賓塞的信息傳遞理論中的一項重要洞見來預測他們將如何突出這種身份。為了讓別人相信我已選擇放棄將國籍作為我的突出身份，我需要做一些在未放棄的情況下不會做的事：我需要貶低國家。這有助于解釋為什么社會精英頻繁地貶低自己的國家——他們是在尋求尊重。這能把他們與社會地位較低的人清楚地分開。通過退出共同的國家認同，他們減少了繼續認同國家者得到的尊重，所以別人對他們產生怨恨就不足為奇了。我希望你會覺得這里的一些描述很眼熟。

受過良好教育、擁有技能的人組成的新階層既包括右派人士也包括左派人士，右派信奉自由至上主義的意識形態，主張自由地從個人技能中獲得財富，左派信奉功利主義或羅爾斯主義主張的權利。后者不僅放棄了自身的國家認同，還鼓勵其他人這么做。他們鼓勵某些具有受害者群體特征的人把受害者身份作為自己的突出身份。

### 共同身份消失的后果

共同身份的瓦解影響了社會運轉。隨著身份分化為技能與國籍，人們對社會頂層人士的信任開始消失。[[4]](#_4_Can_Jian_Edelman_Trust_Barome)這又是怎么發生的？

讓我們回顧一下第二章的主要內容。幫助他人的意愿是通過結合三種敘事而產生的：對一個群體的共同歸屬感；群體內部的互惠義務；行為與群體幸福之間的聯系，這種聯系表明行為是有目的的。因此，如果共同身份瓦解，幸運者就不再那么愿意接受他們對較不幸者負有的義務。

大多數慷慨行為的基礎是互惠。互惠帶來的改變是一種飛躍：沒有互惠，我們只能依靠利他主義與援救義務產生的微弱動力，互惠意識則更為有力，可以促使人們接受高稅率。但互惠面臨著一個協調問題：如果你已經接受義務是互惠的，那么我愿意接受我對你負有某種義務，但我怎么能知道你接受這種義務？你又怎么能知道我接受對你負有某種義務？我們如何能相信彼此在需要盡義務時都能履行義務？

實驗社會心理學告訴我們，答案是我們需要共同認知。我們都需要知道，對方知道我們接受這個義務，“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以遞歸的方式回響。在一個網絡化群體中傳播的關于歸屬感、義務和目標的共同敘事，就是以這樣的方式逐漸形成的。共同歸屬的邊界決定了互惠的限度，而我們對同處相同敘事之中的意識能讓我們認識到共同認知的實際邊界，從而鞏固這一邊界。因為敘事主要以語言表達，所以群體的規模有一個難以逾越的天然上限——共同語言。[[5]](#_5_Wei_Ying_Dui_Jiao_Lu_Wen_Ti_E)但并沒有類似的下限：在一個語言群體內，身份可以呈現高度分裂狀態。共同身份的破壞既會削弱實行互惠的明確群體，也會妨礙互惠義務跨越不同群體的實際可行性。

毋庸置疑，我們的社會確實已經兩極分化：一方是收入高于平均水平者，他們已放棄國家認同，轉而認同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是社會下層，他們堅持國家認同。而且在特朗普當選、英國脫歐、勒龐崛起等情況出現后，兩個群體無疑對這種兩極分化已有清楚的認知。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看到：大多數高技能、高教育程度者不再以國籍作為自己的核心身份，而較不幸者繼續固守著他們不斷下降的地位；這進而導致了整個社會中共同認同的弱化；這削弱了幸運者對較不幸者的義務感，進而破壞了1945年后形成的敘事——富人應該自愿接受具有再分配性質的高稅負來幫助窮人。1970年后最高稅率的大幅下調，與這一情況至少是邏輯一致的。

現在我們可以再進一步。較不幸者已意識到，幸運者的義務感削弱了，畢竟這個情況很明顯，而且它對低收入者確實很重要。在這種情況下，普通人對“過得更好的人”的信任程度會受到影響嗎？答案一望可知：信任會削弱。如果受過良好教育者自視與其他人不同，對其他人所負的義務也變少了，那么只有愚蠢的人才會像過去所有人都突出同一種身份時那樣信任他們。如果我們相信自己能預測他人的行為，我們就會信任他人。如果我們能穩妥地使用“心智理論”的方法——通過設想自己處在你的情況下會怎么做來預測你的行為——我們就會對自己的預測更有信心。但只有在能確定我們共持同一個信念體系的情況下，使用這種方法才是可靠的。如果我們的信念體系截然不同，我就不能和你換位思考，因為我并不生活在塑造你行為的心理世界里。我無法信任你。

功利主義先鋒隊甚至提出了一項理論，預測了信任的下滑，并就如何阻止下滑提出建議。劍橋大學道德哲學教授、邊沁的忠實追隨者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稱，解決方案是讓居于統治地位的先鋒隊向其他人隱瞞其真實目的。欺騙可以阻止信任的下滑。[[Ⅲ]](#_III_Hou_Lai_De_Ling_Yi_Wei_Jian)當然，1970年代以來人們發現主導公共政策的先鋒隊未能緩解新的社會分歧，這加重了信任的嚴重下滑。但西季威克離譜、弄巧成拙的主張卻暗示著，問題不只在于分歧沒有得到緩解，其根源要深得多。

社會民主主義瓦解的后果不僅是信任下滑，信任下滑接著又影響了人們的合作能力。在一個復雜的社會中，密布的關系網絡依賴于信任。因此，當信任崩潰時，合作也開始瓦解。人們開始更多依賴法律機制來確保良好行為的落實（這對職業法律人是好消息，但對其他人不一定）。因為不再突出同一種身份，高技能者負有的對同胞的義務感減弱，人的行為因此也變得越來越投機。高技能者甚至會把其他人視為“笨蛋”，并為自己欺詐傻瓜的技能感到自豪。從電子郵件披露的情況來看，這似乎是金融高層中流行的一種情緒。正如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夕精準描述的那樣，華爾街的商業模式就是“找傻瓜”。顯然，這會增強社會中加劇不平等的潛在結構性經濟力量。

### 我們為什么警惕共同的國家認同

人們警惕共同的國家認同，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民族主義曾造成可怕的后果。所有身份認同都隱含排他性，但如果它做出明確、敵對的排他性規定則是有害的。如果“我們”被定義為“不是他們”，“他們”成為仇恨的對象，我們希望他們不好，這就是對立性的身份認同。在一些情況下，對立性身份認同其實可以是合理正常的。例如，認清對手的運動隊可以發揮得更好，許多企業也是這樣。這樣的競爭對所有人都有好處，能激勵人更努力，這是資本主義被低估的優點之一。但歷史地看，最具破壞性的對立性身份認同是種族、宗教、民族等大群體認同。這些認同導致了大屠殺、“圣戰”和世界大戰。

對立性身份認同對德國的傷害可謂罕有其匹。17世紀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的“三十年戰爭”徹底摧毀了曾經繁榮的德國社會。最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結束了戰爭，在本質上，該和約將首要的身份認同從宗教變成了民族國家。它確實恢復了和平，但最終使德國陷入地獄：納粹主義、大屠殺、世界大戰和戰敗。很自然地，現在大多數德國人想要一種更大的身份認同，故而成了熱忱的歐洲主義者。

但歐洲不只是一塊供某種政體依附于其上的土地。如前所述，如果政治權力單位與共同身份相一致，政體就能更好地運轉。如果不一致，要么身份認同要為適應權力而變，要么權力需要為適應身份認同而變。在所有現代社會里，政治權力都依賴輕度的強制和高度的自愿服從。自愿服從讓我們回想起前文所述的義務感，使權力變為權威。如果沒有這種義務感，權力只能面臨三個選擇：一是通過有效的強制手段迫使人們服從；二是因嘗試實現這一模式而挑起針對國家的有組織的暴力反抗，即敘利亞模式；三是權力承認自身局限性并退居幕后，掌權者發布明知道要被忽視的命令，接受命令者找到某種既避免服從又不致造成太多冒犯的辦法，這是歐盟委員會在促使成員國遵守財政紀律目標時的做法——除芬蘭外，所有成員國都曾違反過該財政紀律。

現代繁榮社會中的人是在權力已經轉化為權威的環境里長大的，所以把這視為理所當然。我一生都在試圖實現這種轉化的社會里工作，這樣的人生經歷讓我認識到，成功的轉化是珍貴的、有挑戰性的，也具有潛在的脆弱性。要把歐洲建成一個政治實體，就必須構建一種新的大型身份認同，但這是一個極難的任務。如此大規模的共同事業很難組織起來。身份敘事與義務敘事的媒介——語言，本身是高度分化的：歐洲沒有一種共同語言。[[Ⅳ]](#_IV__Ou_Zhou_Xue_Xiao_Ji_Hua__Be)可能出現的情況是，試圖把權威移交給一個幾乎沒有人認同的中央實體會導致權威失效，結果可能是出現四分五裂的地區身份認同，并進一步崩解為個人主義：由“經濟人”組成的地獄。

事實上，許多人不僅沒有構建更大的身份認同，反而退回到更小的身份認同中。500多年來，加泰羅尼亞人有西班牙人與加泰羅尼亞人這兩種身份認同，但現在他們中的許多人想回到只做加泰羅尼亞人的狀態。300多年來，蘇格蘭人有英國人和蘇格蘭人這兩種身份認同，但現在他們中的許多人想回到只做蘇格蘭人的狀態，從大共同體轉向小共同體。在意大利統一150多年后，“北方聯盟”

想回到只保留“北方”身份的狀態。斯洛文尼亞人在做了50多年的南斯拉夫人后實現了獨立夢想，這給其他南斯拉夫人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在我撰寫本書時，巴西南部地區正在效仿加泰羅尼亞人尋求獨立。而最驚人的是，在尼日利亞，比亞法拉獨立運動（Biafra）

又出現了，50年前的獨立企圖導致了一場慘烈的尼日利亞內戰，而現在獨立運動死灰復燃。所有這些看似各不相同的分離運動都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涉及一國內的富裕地區試圖擺脫對其余地區所負的義務。加泰羅尼亞是西班牙17個地區里最富裕的，不愿繳稅支持較窮的地區。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的競選口號一直是“這是蘇格蘭的石油”（盡管油田其實遠在北海海底）。意大利北部是全國最富的地區，當地的分離主義者因為對較窮地區的財政轉移政策而充滿了怨言。猜猜南斯拉夫哪個地區最富？猜猜巴西哪三個地區最富？猜猜尼日利亞的油田在哪里？在主張自決權的姿態背后，這些政治運動進一步反映了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的瓦解，代表了對建立在廣泛共同身份之上的互惠義務的怨恨。它和資本主義一樣充滿貪婪和自私，之所以沒有被這樣形容是公關做得好。

我們需要大型的共同身份，但民族主義不是構建這種身份認同的合理方式。政治民粹主義者正在利用民族主義，借助對其他國民的仇恨敘事建立自己的支持基礎。其整個戰略是通過制造與其他民眾的裂痕，凝聚起一部分民眾。由此造成的對立性身份認同足以摧毀慷慨、信任和合作。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反對這么做，這是對的。但目前，他們沒有提出任何可供構建共同身份的替代性基礎。實際上，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現在表示，他們與其他公民已經沒有共同身份了。他們的方法是借助功利主義原則，不再區分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同胞和外國人。由于強烈的義務（互惠義務）必須以共同身份為前提，這意味著他們對非精英公民和生活在任何其他地方的外國人所負的義務是一樣的。

通過新的民意調查證據，我們能看到這個義務感正在減弱的過程。在英國，目前媒體普遍認為年輕人會比其父母更慷慨地對待社會中的窮人。2017年進行的一次大規模隨機民意調查請受訪者在兩種對立觀點中做選擇，一個是“人們納稅的義務比其個人財富更重要”，另一個是“少征稅可以獎勵勤奮工作的人”。與媒體營造的神話相反（但完全符合共同身份已經被削弱的理論），35歲以上群體支持納稅義務，而18—34歲群體更支持盡量少納稅的個人主義倫理觀。[[6]](#_6_Elliott_and_Kanagasooriam__20)

隨著遵守義務行為的減少，權利變得無法實現，人們對政府的信任度下滑。這是席卷西方各國的強烈趨勢。實際上，義務結構的變化，即從社會內部的互惠義務變為非互惠的全球性義務（從一國公民變為“世界公民”），意味著三種截然不同的可能。也許你可以問問自己符合哪一種。

第一種可能是，像1945—1970年基于共同的國家認同建立起全國稅制的那代人一樣，你對窮人依然抱著慷慨的態度，但你現在想把窮人定義為全球的窮人，而非本國的窮人。由此可以得出一些事關重大的推論。在現代發達經濟體中，平均而言，40%左右的收入會被作為稅收征收，以各種形式重新分配，比如向窮人直接轉移，或用于讓窮人受益的社會支出，以及用于幾乎對所有人有利的基礎設施。所以，對于以稅收形式征收全國40%的收入這一點，你依然是支持的，但你現在希望在全球而非限于在本國范圍內分配這些錢：你覺得對本國同胞負的義務和對其他人負的義務一樣。考慮到全球不平等，這將導致流向貧窮國家的援助大幅增加；以稅收形式征收的40%的收入中，有一大部分將送給窮國。像這樣把稅收轉送給全球范圍內的窮人，一個必然后果是本國窮人的境況將嚴重惡化。你可能認為這在道德上無關緊要，因為你正在幫助的人比他們更需要救濟，但他們有理由對此感到警惕。

第二種可能是，你和上代人一樣對本國同胞抱著慷慨的態度，但你現在想讓這種程度的慷慨普及全球。由此得出的推論就更事關重大了：稅收需要大幅增加。高技能水平者的稅后收入必須大幅減少，這樣才能既像以前一樣慷慨地對待同胞，又像對待同胞一樣慷慨地對待全球人口。單憑一國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因為要那樣做的話，很多高技能人口將會移民，也將導致本國窮人處境惡化。這是有心無腦的人會實行的政策。

第三種可能是，你改變自己突出身份的真實含義并不是你對世界各地的人的義務感顯著增強了，而是你對本國同胞的義務感減弱了。在這種情況下，你等于是愉快地擺脫了束縛。稅是可以下調的，因為那個不斷嘮叨著要你慷慨助人的煩人的“義務”已經沉默了：“你賺的錢可以留給自己了。”“他們”，即那些比你窮的同胞，境況將惡化。這是有腦無心的人會實行的政策。

受教育程度高者對國家認同的蔑視奮力擠上了道德高地：我們關愛所有人，而你們可鄙可悲。但真的能說他們站上了道德高地嗎？再往后推一代人，想象一下，屆時“世界公民”這種新身份認同已牢牢扎根，充分反映在公共政策中，[[7]](#_7_Dui_Guo_Min_Shen_Fen_Yu_Quan)基于國民身份的稅收政策已經被取代，以上三種對“世界公民”身份的詮釋，哪一種最有可能成為主流？我認為很可能是介于第一種和第三種之間：在一定程度上對全球范圍內的窮人變得更慷慨，但主要還是對本國窮人變得更吝嗇。

### 難題

繁榮的現代社會正面臨著一個難題。殘酷的現實是，公共政策的場域必然是“空間性”的。批準公共政策的政治進程限于一定空間，全國和地方選舉產生的官員只能在一定地域內行使職權。政策本身最終的適用范圍有空間性：學校和醫療保健都有服務覆蓋區域，基礎設施適用于特定空間，稅收和福利實行區域化管理。我們的政治單位受限于空間，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事實上，政治單位主要是“全國性”的。但我們的身份認同，以及基于這一身份認同的社會網絡，正在日益擺脫這個特征。

1945—1970年的社會民主主義時代奠基于一段特殊的歷史，在那段時期，我們的共同體意識擴大，涵蓋了整個國家。如今，經濟結構日趨復雜，導致人與人之間出現技能鴻溝，我們空間性的身份認同和社會網絡因而已經萎縮。對空間性共同身份的新一波沖擊目前正在出現：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正在改變我們的行為方式。智能手機代表著極端的個人主義：人們把自拍不分對象地向所有“好友”展示，希望能吸引最多的“贊”。我們目睹著空間性社群的萎縮，事實上，當我們身處公共空間中的時候，我們就會經歷這個過程：我們坐在咖啡館、火車里，周圍的人離得很近，但我們盯著屏幕，仿佛看不到他們。從公共政策角度看，處在同一空間里的人是一體的，但從社會角度看卻已經不再是這樣了。空間性社群在遭受兩方面的沖擊：作為替代性社群的網絡回音室，以及更徹底地避開面對面交流、沉入焦慮性自戀的孤立狀態。我們的政治單位仍是空間性的，但連接我們的紐帶不再是了。我的預測是，除非扭轉這種分化，否則我們的社會就會倒退，變得更吝嗇、缺乏信任和難以合作。這些趨勢已經在形成之中了。

理論上，我們可以重新設計政治單位，使之非空間化。可能一些硅谷的技術“極客”已經在饒有興致地設想這樣一種未來：一種可自由進出的政治單位，每個人不管住在哪里都能自由選擇。每個政治單位都能擁有自己的貨幣——各選自己的加密貨幣。每個政治單位都可以有自己的稅率、福利和醫保計劃。有人設想修建不在任何國家管轄范圍內的浮島。聽起來是不是很吸引人？如果是，可以想象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富人可能選擇加入實行低稅率的人造政治實體。億萬富翁們已經在這么做了：把名下企業注冊地從經營地遷到摩納哥，自己也遷移過去。而病人會選擇加入擁有慷慨醫療體系的政治實體，該實體必將因過重的負擔而崩潰。

這種非空間性政治單位是一種空想，所以唯一現實的選擇是重建空間性紐帶。不幸的是，對大多數政治實體而言，最切實可行的單位是國家，所以我們需要一種共同的國家認同。但我們知道國家認同可能是有害的。是否可能形成這樣的紐帶：既足以維系一個可行的政治實體，又不造成危險？這是社會科學研究必須解決的核心問題。我們社會的未來取決于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民族主義者已近乎將國家認同概念認定為自己的知識產權。事實上，他們似乎認為自己延續了歷史上的國家認同傳統，但這種認識是不對的。在許多社會，傳統的國家認同真的可以容納社會里的每一個人。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一位居住在英國的奧地利猶太人，在一戰爆發后清楚地認識到自己有義務回到奧地利，為祖國而戰。與這種傳統形式的民族主義相反，新的民族主義者想用種族、宗教等標準界定國民身份。這種民族主義的變種是較晚出現的，是對法西斯主義的繼承，根據國民身份的這種新定義，無數生活在社會里的公民都會被排除出去。這些新民族主義者不僅非常明確地把社會分為“我們”和“他們”，而且會在他們自定義的“我們”內部引發進一步的分裂，因為他們的做法會引發許多人的不滿。他們的崛起嚴重分裂了社會。瑪麗娜·勒龐沒有把法國團結起來，而是使之分裂為支持她的三分之一和反對她的三分之二。唐納德·特朗普使美國社會一分兩半。因此，這樣的民族主義絕不是恢復共同身份的可行途徑，雖然正是共同身份的喪失為之提供了動力；它只會徹底摧毀恢復共同身份的希望。這將破壞共同身份所促進的信任與合作，以及信任、合作所促進的相互尊重和慷慨大度。

另一個群體，受教育程度高的“世界公民”，正在放棄自己的國家認同。他們享受著顯示自己社會地位優越的樂趣，同時努力讓自己相信，這種自私行為能讓自己登上道德高地。嚴酷的結論是，這兩個新近崛起的公民群體都會破壞費盡千辛萬苦建立的共同身份。

我們需要出路。維特根斯坦曾洞悉陷入令人困惑的觀念里無法脫身的困境，我們需要像他說的那樣，讓蠅子飛出困蠅瓶。

試試愛國主義（patriotism）吧。

### 歸屬、鄉土與愛國主義

為了使每個人都能幸福，一個社會需要一種強烈的共同身份認同。無須問這個命題對不對，否定社會凝聚力的意義和否認氣候變化的人一樣愚蠢。全球最幸福的國家丹麥、挪威、冰島、芬蘭的成功都證明了這一點，亞洲最幸福的國家不丹也證明了這一點。但不幸的是，這五個國家所采用的形成社會凝聚力的戰略，都是其他社會無法使用的。五國都圍繞一種獨特的共同文化構建了共同身份。我懷疑文化的實際內容并不是特別重要：“呼嘎”[[Ⅴ]](#_V_hygge_Dan_Mai_Ren_He_Nuo_Wei)和佛寺幾乎沒有共同點。但大多數社會要么文化上一直很多樣，要么已經變得很多樣，導致這無法成為一種可行的戰略。我們不應為我們社會的這一面悲嘆，而應制定一項可行的戰略，重建與現代性相容的共同身份。

過去成功地在全國建立共同身份的方法已不再可用。在史前的不列顛，建立共同身份的途徑可能是萬眾一心修建巨石陣，這是“一項團結性工程，反映了全島有同一種文化理念”。[[8]](#_8_Zhe_Ju_Yin_Yu_Lai_Zi_Nicholas)在14世紀的英格蘭，共同身份是通過與法國的戰爭構建的，戰爭把宿怨甚深的不同人群融合在了一起：諾曼人（Normans），盎格魯—撒克遜人（Anglo-Saxons，他們的首領曾被諾曼人屠殺），維京人（Vikings，他們曾屠殺過盎格魯—撒克遜人），以及布立吞人（Britons，他們的文化曾被盎格魯—撒克遜征服者毀滅）。在19世紀的歐洲各國，共同身份是通過種族純潔的神話構建的。在20世紀中期，共同身份是通過戰爭建立并以文化特質維系的：美國人打棒球，英國人喝茶，德國人吃豬肉喝啤酒。目前隨著我們的社會變成多元文化社會，連棒球、茶、豬肉配啤酒這樣的特征也在逐漸消逝：這些都不可能賦予我們一種構建身份認同的穩健戰略。

一個聽起來有吸引力的戰略是圍繞共同價值觀構建共同身份。這個想法很流行，因為所有人都相信自己的價值觀，并認為應該以其為基礎構建共同身份。問題在于，在任何現代社會里，人們的價值觀都差異巨大，這是現代性的特征之一。如果要求共同價值觀，我們最終會陷入一種排他性很強的情況：“如果你不認同我們的價值觀就滾出去。”唐納德·特朗普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都是美國人，但我打賭我們找不到任何兩人共有的、可以使美國區別于其他國家的價值觀。大多數西方國家也都如此。一個國家里所有國民都堅守的價值觀少之又少，無法構成與其他國家相區分的特征，因此我們無法在這些價值觀的范圍內構建互惠義務。

隨著國家認同變得過時，價值觀認同強化了，結果則是有害的。人們可以更容易地只與自己贊同的人發生社會交往（“回音室”現象），這也強化了價值觀認同。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回音室”絕不是塑造社會凝聚力的途徑，而只會撕裂西方社會。在以價值觀為基礎的網絡化群體中出現的侮辱、誹謗與暴力威脅（簡言之，仇恨）的程度，現在可能已經超過了種族與宗教性質的辱罵。

那么，如果像種族和宗教一樣，價值觀也無法成為共同身份的標準的話，我們還有別的選擇嗎？我們是不是應該解散國家并將所有政治權力都上交給聯合國，以使世界公民議程變得具有可行性？事實上，正如“聯合國”這個名字暗示的，該組織以國家而非個人作為政治權威的基石，因為很顯然，在大多數社會里，國家都是可以承載共同身份的最大有效實體。假如把政治權力集中在全球層面，人們就難以自愿遵守政治權力的決定，權力就不會轉化為權威。世界政府將會成為類似于一種全球版本的索馬里。

如何構建可行且包容的身份認同？答案就在我們鼻子底下——對地方的歸屬感。比如說，為什么我自視為約克郡人？沒錯，我喜歡約克郡的價值觀：直言不諱，不做作。但這一點其實并不是原因。最近我和賽伊達·瓦爾西女男爵（Baroness Sayeeda Warsi）一起參加一個早間廣播節目，她是首位成為英國內閣大臣的穆斯林女性。我們之前沒見過面，這次電臺談話節目安排我們各談自己的新書，這并不是一個自然的能讓我們親近的場合。但我很快就覺得和她在一起很自在：她在布拉德福德（Bradford）長大，口音很順耳，我也是聽著這種口音長大的，只不過在牛津住了50年，生疏了。所以我感覺，我對她的親近感比她對我的強。但本質上，我們有對同一個地方的歸屬感，那里的人操著不易察覺的獨特口音與詞匯。我注意到，我們都向主辦方BBC說請“沖茶”（mashed）而不是“泡茶”（brewed）。

我們可以把這樣的軼事歸納成一個具有相當普遍性的框架。人類有基本的歸屬性需求，歸屬感的關鍵維度包括歸屬于誰和歸屬于哪里。這兩點都是自小形成的，通常會持續一生。我們通過對某個群體的認同來確定第一點（這是身份經濟學迄今為止所關注的），通過把某個地方視為家來確定第二點。問問你自己，你說的“家”是什么意思。對大多數人而言，那是指他們自小長大的地方。

最適合在現代環境中維系的國民身份概念，就是用對同一地方的歸屬感把人們團結在一起。“地方”就像洋蔥一樣分成多層，最核心是我們的家；但我們賦予家的認同，很大程度上來自家所處的城市或地區。與此類似，城市的意義很大程度上來自國家，而在歐洲，歸屬感在一定程度上延展到了歐盟身上。通常一個國家的人有多樣化的外貌特征，也有多樣化的價值觀，但他們的家都在同一個地方。這就足以構成身份認同的合理基礎嗎？

一個有利的原因是，基于地方的身份認同是在進化中形成的人類心靈深處最根深蒂固的特征之一，不屬于那些相對較晚時因使用語言而形成的軟性價值觀。基于地方的身份認同不僅根深蒂固，而且很強烈。沖突研究中的一個標準概念是，保證進攻獲勝所需的進攻者與防御者的數目比。顯然這會受到軍事科技的影響，但總的來說，在人類沖突史上，防御者會比進攻者更努力地作戰，所以這個比率大約是3:1。令人驚訝的是，許多物種都遵循這個比率。追溯這些物種的進化史可以發現，領土意識似乎是從約400萬年前就開始扎根了。[[9]](#_9_Johnson_and_Toft__2014)保衛領土的本能有很深的根源，家園感與我們形影相隨。

所以，從“激情”的遺傳情況來看，我們有強烈的對空間的歸屬感。但正如第二章所述，因敘事而形成的軟性價值觀也很重要。敘事促進記憶，這讓我們把家鄉不僅僅視為其當前的樣貌，還視為一個演變的過程：我們對家鄉城市所經歷的重重變化的理解，增強了我們對當前眼中的這座城市的歸屬感。對所有在這座城市里長大的人來說，這些記憶是共同認知，它們強化了我們的共同身份。

但幾十年來，主流政客一直有意識地對歸屬敘事避而不談。事實上，他們一直積極地貶斥這些敘事。政客處在全國社會網絡的中心，是我們的總溝通者。通過積極地破壞共同歸屬意識，他們加速了我們的幸福所憑依的互惠義務的衰落。他們的倫理敘事大多是功利主義或羅爾斯主義的，他們認為自己站在“父愛主義國家”的頂峰。于是很自然地，國家歸屬敘事就落到了民族主義者手里，他們挾持了這些敘事，為自己分裂社會的計劃服務，而在這個過程中，“道德國家”也消亡了。

2017年，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打破了這一不負責任的模式。他率先提出一對詞匯來區分兩種形式的全國性認同——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他說自己是愛國者而不是民族主義者。以歸屬于同一個地域為定義的愛國主義敘事，既可以用來把歸屬的定義從民族主義者那里奪回來，也可以用來恢復地域歸屬作為人的核心身份認同的地位。一項對英國人的新調查為這一戰略的可行性提供了進一步的支持。這項調查測試了英國人對“愛國主義”一詞的聯想，并將其與許多其他政治概念作比較。[[10]](#_10_Elliott_and_Kanagasooriam__2)調查結果很令人振奮：說到“愛國主義”，英國人最常聯想起的四個詞是“吸引人的”“鼓舞人心的”“令人滿意的”和“打動人心的”。在這一點上，它與調查中測試的所有意識形態形成鮮明反差。最引人注目的是，所有年齡段和各種政治與社會偏好的人都對“愛國主義”做出了上述正面回應，而政治與社會偏好不同者在其他方面通常有激烈分歧。

在對國家間關系的態度上，愛國主義也和民族主義明顯有別。民族主義者使用的吹噓本國“優先”的話語把國際關系描繪為零和博弈，誰最強硬誰就是贏家。以馬克龍總統為范例的愛國主義則傳播互利合作的話語。他非常明確地試圖在歐洲內部就經濟問題，在北約內部就薩赫勒地區[[Ⅵ]](#_VI_Sahel_Shi_Heng_Kua_Fei_Zhou)安全問題，在全球層面就氣候變化問題，建立新的互惠承諾。但馬克龍為法國的利益服務。當一家意大利公司試圖收購法國最重要的造船廠時，他介入干預，以確保法國利益得到保護。他不是一個功利主義者。但至關重要的是，與民族主義相反，愛國主義不具有侵略性。

像所有敘事一樣，如果行動與敘事不符，關于共同歸屬于鄉土的敘事就將失去可信性。這種洋蔥結構的中央是家：如果我們和家的聯系很弱，洋蔥的外層也會軟弱無力。年輕人正在失去歸屬感的一個原因是，買房變得困難多了。人口中自有住房的比例是衡量核心歸屬感的實用指標，重新提高自有住房比例需要明智的公共政策，我們將在后文詳述。

盡管地域是共同歸屬感的心理基礎，但目的性行動可以強化歸屬感。國家是實施許多公共政策的自然單位，因此，我們的共同身份源于共同目標，基于這樣的目標，我們采取行動增強我們的共同福祉。關于目的性行為的敘事可以闡明，通過接受界定了互惠領域的共同身份，履行我們對彼此的義務可以逐漸增進所有人的福祉。我們來聽聽政客對目的性行為怎么說，我們可以把他們的敘事分為構建和破壞共同身份兩類。顯然，在戰爭時期，絕大多數關于目的性行為的敘事意味著共同利益，因此能強化共同身份；在1945—1970年的奇跡年代，大多數公共敘事屬于這一類。現在政客不負責任地鼓吹的關于目的性行為的敘事，會讓人懷疑我們的利益與其他群體的利益相對立。他們積極鼓勵人們形成對立身份，而對立身份對社會是有害的。宣揚利益對立的每個敘事孤立地看都有可能是對的，但這些敘事累積起來就具有很大的破壞性，導致集體福祉惡化。

政客首先是溝通者，在一個有多元文化和價值觀的社會里建立共同身份認同，對共同的福祉是必要的，但也是有挑戰性的：這是領導者的首要職責。政客一直回避關于共同歸屬的敘事，無論是關于地域還是目的的，這無意中進一步削弱了父愛主義國家履行職責的能力。幸運的是，我們還有充足的時間可以亡羊補牢。

[[Ⅰ]](#_I_2)1950年代，人們用“巴特茨克主義”（Butskellism）一語來形容保守黨首要的思想家拉博·巴特勒（Rab Butler）與工黨領袖休·蓋茨克（Hugh Gaitskell）的根本一致性。

[[Ⅱ]](#_II_2)當然，我們需要做出的決定還包括如何滿足自身“愿望”，但在這里我們可以不考慮這個問題。

[[Ⅲ]](#_III_2)后來的另一位劍橋大學教授伯納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猛烈批判了這一觀點，稱其為“總督府”功利主義。

[[Ⅳ]](#_IV_2)“歐洲學校計劃”本欲構建一種新的歐洲身份認同，至少是在精英學生中。但新的研究表明，這些學生被深刻灌輸了這樣的意識形態——歐洲身份等同于自由主義的世界主義。所以他們開始認為，不這么想的人不是真正的歐洲人。這絕不是在構建共同身份，而是又一個精英與其所處社會的身份認同分離的過程。

[[Ⅴ]](#_V_2)hygge，丹麥人和挪威人用以形容溫馨舒適的感覺，代表一種生活方式。——譯者注

[[Ⅵ]](#_VI_2)Sahel，是橫跨非洲北部，北抵撒哈拉沙漠，南界蘇丹草原的一條狹長地帶。——編者注

[[Ⅶ]](#_II_3)這不是由于他們對本國的自豪感下降，而是由于在高技能水平者離開后，留在突出國籍群體中所能帶來的尊重不如以前了。

## 第四章 道德的企業

在我年輕時，英國最受尊敬的公司是帝國化學工業有限公司（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該公司把科學創新和規模相結合，獲得了巨大的聲譽，為該公司工作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這反映在它的使命宣言中：“我們力爭成為全世界最好的化工企業。”但在1990年代，帝國化工把使命宣言改成了“我們力爭讓股東價值最大化”。這是怎么回事？它為什么重要？

企業是資本主義的核心。人們認為資本主義貪婪、自私、腐敗，這種普遍的蔑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業行為日益惡化。經濟學家也助長了這個趨勢。諾貝爾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大肆宣揚企業的唯一目的是盈利（最早于1970年發表在《紐約時報》上）。隨著弗里德曼的思想在企業管理層的傳播，這一觀點逐漸成為商學院的標準觀點，并滲透到了像帝國化工這樣的大公司。這產生了毀滅性的后果。

如果說現代資本主義有一個讓人最反感的特征，那就是沉迷于盈利。目前，如果讓人們選擇“企業的主要目的應該是盈利”還是“盈利只應是眾多考慮之一”，反對弗里德曼的人是贊同者的三倍，無論對其他問題持有什么看法，無論什么年齡段，都是如此。[[1]](#_1_Zhe_Shi_Ying_Guo_2017Nian_De)

弗里德曼和公眾誰的意見是正確的？帝國化工接下來的經歷提供了一條線索。受弗里德曼思想啟發而提出的新使命宣言激勵該公司職員攀上新高峰了嗎？有沒有任何公司的員工早上起床時想著“我今天要讓股東價值最大化”？帝國化工使命宣言的變化反映了其董事會關注焦點的改變。此前，它試圖成為一家世界級的化工公司，這意味著要關注員工、客戶和未來。現在它試圖用股息來取悅股東。如果你還不到40歲，你恐怕沒聽說過帝國化工，這是因為它改變關注焦點的行為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該公司逐漸衰落，最后被收購了。[[Ⅰ]](#_I_Yi_Shi_You_Shi_Neng_Qie_Zhong)

學術觀點現在與公眾意見一致。2017年英國科學院將“企業的未來”作為旗艦項目推出，由牛津大學金融學教授、前商學院院長科林·邁耶領銜。該項目的核心主張是，企業經營的目的是履行對客戶和員工的義務。盈利不是目標，而是為在可持續基礎上實現這些目標而必須滿足的條件。之前企業為什么走錯了路？如何以公共政策來糾正？

### 道德的企業還是吸血烏賊？

偉大的企業不必像吸血烏賊那樣行事。[[Ⅶ]](#_VII_Zhe_Shi_Ren_Men_Yong_Lai_Pi)想想一家大企業，如聯合利華、福特或雀巢，你覺得這樣一家企業的普通員工會怎么看待企業的目標？你覺得他們會說“為股東賺錢”嗎？真的按這樣的理念運營的企業很少。聯合利華的員工可能告訴你，他們工作是為了提供價格合理的食品和肥皂，受益對象往往是一些受貧窮與疾病之苦的社會，這使得他們的貢獻比非政府組織的自我標榜要更有價值。比非政府組織的自我標榜更有價值。福特的員工可能會告訴你他們正在制造的汽車的特性。在去印度尼西亞的一次旅行中，我遇到了一群經營乳品店的雀巢員工，他們為當地農民帶來了巨大機遇。在當地公共秩序崩潰的時期，農民們來到鎮上，把乳品店圍起來，以保護它不受搶劫。這樣的經營目標是人們可以引以為豪的成就：企業創造就業機會，通過這些機會，人們可以為社會做出貢獻。

但在一些企業里，員工真的認為企業的目標就是賺錢。一家投資銀行毫不掩飾地向員工宣稱這一點，并把嘲弄式的使命宣言展示在了一進門的大堂里：“我們不制造任何東西，只賺錢。”在這種可悲理念的鼓勵下，一些聰明的員工逐漸把這句話變成了“我們不制造任何東西，只為自己賺錢”。這個信條為該公司最聰明的員工開放了一些可行的策略，這些策略是該公司接受弗里德曼訓導的管理層所不可能想到的。事實證明員工可以用一種高效的方法為自己賺錢：做自己能拿到提成卻讓公司面臨未來損失風險的交易。果不其然，員工的這種行為導致了該公司的破產。這家公司的名字是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它的破產引發了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給全球造成了巨大損失，其規模可以與兩次世界大戰造成的損失匹敵。[[Ⅱ]](#_II_Zai_Mei_Guo_Cai_Zheng_Bu_Yao)單給美國造成的損失據估計就達10萬億美元。

帝國化工和貝爾斯登的命運說明了一個關鍵問題：一家公司需要使命感。CEO可以利用他們的地位來培育這樣的共同使命感。這的確是高管的核心職責和能力要求。前文講過做到這點的實際例子：羅伯特·伍德·約翰遜樹立的“信條”明確闡述了強生的使命，并在幾十年后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50年前最成功的企業是通用汽車，它利潤豐厚，規模龐大，但在2009年破產了。這場不可阻擋的衰落是個典型案例，所以得到了很詳細的研究，包括在衰落期間（當時它不斷地請管理顧問來診斷問題）和破產之后。是誰殺死了通用汽車？答案是豐田。[[2]](#_2_Gibbons_and_Henderson__2012)

當豐田開始打入美國汽車市場時，通用汽車高管層的最初評估是，這是一個局限于特定地域的問題。購買豐田的只有沿海地區的居民，通用汽車的內陸市場依然穩固，所以這個現象是完全可以解釋的：沿海地區的人口味有點怪，但這個現象將會逐漸消失。對通用汽車來說不幸的是，事實證明這個自大的分析是錯的，沿海地區對豐田的喜好在向內陸蔓延。通用汽車又做了新的分析，認為是科技原因：日本人擁有機器人。自始至終豐田一直很配合，邀請通用汽車考察他們的日本工廠。通用汽車CEO對訪問團的指示是“把一切都拍下來：如果他們有機器人，我們就也得有”。訪問團徹底執行了這一策略，但結果明確顯示豐田的秘訣絕不是機器人。接下來豐田很大度地提議和通用汽車在加利福尼亞州辦一個合資企業，制造同樣的汽車。在這些相同的汽車走下裝配線時，會按奇偶數順序分別貼上通用汽車和豐田的標志，然后進入相應的銷售渠道。那時，豐田已經在產品可靠性方面建立起了牢固的聲譽：它的汽車幾乎不會出故障。事實上，1998年我和妻子來到美國時買了一輛豐田汽車，20年后的現在我們還在開它。這樣的聲譽在市場上得到了回報：同樣是從該合資廠的生產線里出來的汽車，如果帶豐田的標志，售價就會高出3,000美元。那么，如果說關鍵就是豐田產品質量高的話，造成這種質量差異的原因是什么？

早在幾十年前，豐田就率先與員工建立了一種新型關系。裝配線上的普通工人分成名為“質量組”的小組，由這些小組負責質量控制。（諷刺的是，質量組概念是美國人提出的。日本人熱情地接受了該理念，可能是因為這與日本文化很契合。）關鍵的措施是要求每個組盡可能快地在其負責的那段生產線上發現故障。豐田管理層推崇的口號是“故障就是財富”。如果一名工人發現一處故障，他應該怎么辦呢？豐田管理層采取的最重大的措施是在整個裝配線上安裝“安東拉繩”（Andon cords）。裝配線上的任何工人發現故障時，都應該拉動最近的拉繩，整個裝配線就會立即停下來。裝配線生產的每個環節是緊密結合的，停下來意味著極高的成本。生產線每停1分鐘的成本是1萬美元。如果一名工人不必要地把裝配線停下來，短短幾分鐘里給公司造成的成本就會遠遠超過他一整年創造的價值。所以這項政策意味著，豐田管理層真心相信員工是為公司做貢獻的，而不是存心不良。換言之，該政策的前提是員工有與公司一致的使命感。我估計他們工作時應該沒有在想“我要努力讓股東價值最大化”。

這與通用汽車采用的質量控制方法完全不同。通用汽車用的是傳統方法：對制造好的汽車做抽樣檢查。最終，通用汽車的新CEO理解了問題所在：企業文化需要調整。通用汽車管理層和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得要結束對抗關系，相互信任。“如果他們有機器人，我們就也得有”的策略改成了“如果他們有安東拉繩，我們就也得有”。在CEO的命令下，通用汽車全生產線都設置了安東拉繩。CEO可以宣布改變生產文化，但謹慎的裝配線分管經理們知道這樣做會發生什么，他們更了解普通工人的心態。幾十年積累的怨氣不可能在一夜間化解。對少數工人來說，有給公司造成慘重損失的機會，他們是一定會抓住的。工人會找借的拉安東拉繩，生產效率將會大幅下滑，裝配線分管經理們將被追究責任。面對這樣的現實，他們把安東拉繩安在了天花板上。[[Ⅲ]](#_III_Ke_Yi_Dui_Bi_Yi_Xia_Tong_Yo)CEO改變生產文化的努力以這樣的方式告終無異于宣告管理層不信任自己的員工。二者之間的身份對立進一步激化。

在與供應商的關系方面，豐田和通用汽車之間也有類似的區別。多年來，豐田與供應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他們面臨著共同的挑戰：生產出質量更好的零部件，從而提高最終產品的質量。這需要長遠的眼光。在市場周期中，在豐田與其供應商的關系中，有時豐田會占上風，有時供應商會占上風。如果雙方都利用暫時的優勢來壓榨對方，長遠而言他們會兩敗俱傷。漸漸地，他們學會了彼此信任。相反，通用汽車一直以強硬者自居，盡其所能把供應商壓榨到極限。等通用汽車意識到需要改變時為時已晚。像和員工的關系一樣，通用汽車發現業已形成的信念體系使自己陷入了困境。

多年來，總部位于沃爾夫斯堡（Wolfsburg）的大眾汽車的員工會告訴你，他們公司的目標是制造真正好的汽車。牛津曾是英國的沃爾夫斯堡——英國汽車公司（British Motor Corporation）的總部。兩家企業文化的反差與豐田和通用汽車的差別有相似之處。我記得在德國一座體育場觀看一場國際足球比賽時，人群自豪地在攝像機前揮舞著寫有“大眾”字樣的橫幅，當時我看呆了。英國汽車公司的員工是不可能這么做的，最終，罷工導致該公司破產。但在2016年，大眾公司遭遇了一場重大丑聞。它的柴油汽車在美國接受尾氣排放測試時安裝了作弊裝置。設計該作弊置的員工的動機是什么？他們只是想得到個人好處嗎？我對此表示懷疑。更有可能的是，這些員工的行為完全符合公司的宗旨，但他們不接受美國法律規定該項測試的目的。他們很可能把這項法律視為美國為限制進口德國汽車而耍的花招，或者他們只把通過該項測試視為例行公事。當然，他們這么做是完全錯誤的：他們未能更新何為“好車”的理念，未把污染考慮在內。即使就對大眾汽車的影響而言，他們的選擇最終也是災難性的。但對像我一樣在待遇優厚的公共部門工作的許多人來說，想象私營部門的工人以貪婪和恐懼為驅動力，是一種無禮的錯覺。證據表明，私營部門的工作滿意度其實要高得多；例如，人們以生病為由不上班的情況要少得多。

所以，資本主義并不帶有任何本質上骯臟的東西。利潤是企業的一種動力，而不能定義企業的使命。但貝爾斯登、帝國化工和通用汽車的故事顯示出了某些嚴重的問題。具體是什么問題呢？

### 誰控制企業？

答案是，控制權落入了錯誤的人手中。資本主義的得名緣由是，為企業提供風險資本的人得到企業的所有權。理由是承擔風險的人最需要控制企業，同時也有最強烈的動機去嚴格監督經理。但這一理由已經越來越偏離現實。

如果一家企業倒閉了，許多人都會遭殃，承擔風險的人遠不止投入資本的人。損失最大的可能是企業的長期員工，因為他們積累的技能和聲譽可能只對該企業有價值。此外，如果該企業是某地的重要雇主，每個在該地擁有住房的人都將蒙受巨大的資本損失。

客戶也將受損。就小的方面而言，2017年英國君主航空公司（Monarch Airlines）破產后，取消的航班產生了10萬名滯留旅客。更嚴重地說，現代供應鏈使企業形成了相互依賴關系，通過這一傳導機制，一家企業的破產會像病毒一樣在全球經濟中傳播。本次金融危機中，雷曼兄弟這樣的中型投資銀行的破產導致巨大破壞，就是由于這個原因。

以貸款形式為企業提供資金的人和股東都會遭受損失，但只有股東才擁有因持股所享有的權力。相比之下，股東可能根本不會受損。作為一名教授，我有權從一個覆蓋所有大學的基金中獲得養老金。該基金的資金來自對企業的持股。那么，假如某個企業倒閉，我的養老金會受影響嗎？謝天謝地，不會，因為這個責任會由整個大學系統集體承擔；根據合同，即使連一些大學都倒閉了，責任也會由沒倒閉的大學來承擔。大學將如何填補缺口？最終，為我支付養老金的責任可能傳遞到好幾代大學生的身上。讀到這段話的大學生們，我誠摯地向你們表示深深的謝意。然而，盡管你們承擔了這樣的風險，對于我的養老基金持有股份的那些企業，你們又有多大的控制權呢？

企業的負責人必須積極關注企業的長期業績，并足夠了解情況從而能發現管理中的問題。如果股權高度分散，就會出現搭便車問題：沒人有動力去弄明白管理層的長期戰略是否明智。在德國，銀行扮演著這種監管角色，它們代表股東持股，積極參與企業的管理。在美國及世界上的許多地區，扮演該角色的是創辦成功企業并保留了控股權的家族。只有一個國家不折不扣地執行了弗里德曼的思想。該國的企業與無數股東的利潤捆綁在一起，只要利潤不持續增長，股東就在市場上出售股份，這是股東讓企業負責的方式。英國一直是一種經濟意識形態的試驗品。英國的銀行已經遠離企業管理。由于稅制設計的原因，企業的創始家族已經放棄了他們的股份。法定的企業控制權完全掌握在股東手中，而80%的股東是養老基金和保險公司。它們信奉這樣的原則：“不喜歡這個企業，就把它的股票賣掉。”現在它們的決定主要是基于計算機里的算法，根據股價的新走勢做出復雜的推斷：約60%的股市交易是自動進行的。社會中最有數學頭腦的人成了超級明星，他們設計出天才的算法來窺察價格變化的規律。在這個過程中缺少的是對企業、管理層、員工及發展前景的直接了解，這種直接了解只有靠長期參與企業運營才能獲得。

為什么企業的管理層要關心養老基金有沒有賣出公司的股票？在英國，對管理層的終極威脅是企業被競爭對手兼并，而企業的股價越低，兼并的難度就越低。兩家巧克力企業，美國的好時（Hershey）和英國的吉百利（Cadbury），說明了不同所有權帶來的截然不同的結果。好時家族保留了控股權，而作為“貴格派”慈善精神典范的吉百利家族在市場上出售了自己的股份。當卡夫（Kraft）試圖擴大其在巧克力市場中的份額時瞄準了吉百利，各養老基金隨即出售了自己的股份：吉百利從此不再作為一個獨立的實體存在。因此，企業的董事會掌握著有效權力，可以避免這一命運的發生。董事會預警性地關注季度利潤，以決定是否更換CEO。目前CEO的平均任期只有四年。

逐漸，CEO的薪酬越來越與短期業績指標掛鉤。這個問題在英國和美國最為嚴重，這兩個國家的金融市場最“發達”，CEO的任期也最短。這已經漸漸地影響到了非金融企業CEO的薪酬安排。CEO薪酬的增速已經遠遠超過企業員工的平均薪酬增速，這反映了風險的提升。30年來，英國CEO的薪酬從普通員工的30倍升到了150倍。但與美國同行相比，他們仍是克制的典范，30年來美國CEO薪酬從普通員工的20倍升到了231倍。但在此期間，企業績效從客觀指標來看并沒有得到全面提升。提高的CEO薪酬顯然不是對業績改善的酬報，也不僅僅是對風險提升的補償。大企業薪酬委員會的成員構成了一個新的網絡化群體。像所有網絡化群體一樣，敘事逐漸塑造了一個信念體系。正如我在前一章所述，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的社會已經從一致的國家身份認同分化為基于技能的身份認同。這個大過程的一個縮影是，在CEO看來，與自己身份相同的人已經不再是本企業的同事，而是其他企業的CEO。因此，企業薪酬委員會成員們認定“公平”薪酬的標準也逐漸上升了。一位企業高管據說聽到過這么一句話：“他賺500萬美元而我只賺400萬美元，這不公平。”其中的關鍵甚至不是貪婪，許多CEO不是享樂主義者，而是工作狂。關鍵在于，身份認同的界線改變后，同身份人士間尊重的源頭也變了。賺400萬美元的CEO腦子里想的可能不是如果多賺100萬美元他能買些什么，而是念念不忘下次在達沃斯論壇見到那位賺500萬的CEO時，對方那種居高臨下的同情態度。

金融業實踐了它宣揚的理念。如果應該用高薪來刺激企業的短期業績的話，金融企業自身就應該采用這樣的模式。他們對此也毫不避諱。在CEO薪酬相對于員工大幅上漲的潮流中，他們就站在潮頭。目前銀行CEO的薪酬已經是員工的500倍，絲毫未受金融危機影響。這導致在那些爬到頂層的人中，道德追求不高的人變多了。德意志銀行任命埃德森·米切爾（Edson Mitchell）為CEO，在他的影響下，該行的企業文化從德國式穩重變成了狂野放縱：“他招入唯利是圖的人……他們不關心道德。”[[3]](#_3_Zhe_Xie_Hua_Shi_Yi_Ming_Qian)道德真空出現了：在周五晚上，交易團隊會一起去看鋼管舞；圣誕節晚會上請來妓女供高級職員取樂；米切爾公開對家庭義務表示蔑視。德意志銀行本來蒸蒸日上，有望成為全球最大銀行，但這些管理者的道德水平更適于經營妓院。米切爾因飛機墜毀去世，德意志銀行也遭遇了類似的命運。

在食物鏈的下游，評估基金經理業績依據的是他們負責的投資組合的季度估值。資產管理行業似乎正適合實行這樣的評估方式，因為他們的績效很適合用單一標準來衡量。但要設計出激勵機制獎勵企業真正需要的行為是很難的。資產管理者因短期業績而獲得豐厚回報，因此他們也以同樣的標準評判他們投資的企業。

### 將控制權授予所有者的后果

對養老基金來說，這最終是一個明智的策略嗎？管理一家企業已經變成一場殊死斗爭：拼命維持季度利潤上漲，直到股票期權生效，CEO可以駕著黃金降落傘離開。那么對CEO來說，明智的策略是什么？顯然是盡可能快地提高季度利潤。英國工業聯合會（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總干事卡羅琳·費爾貝恩（Carolyn Fairbairn）擔心“存在著一種以犧牲使命感為代價的對股東價值的執迷”。[[4]](#_4_Financial_Times__23_October_2)該機構是為英國大企業服務的游說團體，它的總干事可不是什么理想主義的激進分子。

如果CEO想提高季度利潤應該怎么做？我們可以考慮三種做法。第一種是打造一個像強生一樣的企業，企業與員工、供應商、客戶之間保持友善互信的關系。這最終會帶來豐厚的回報，但問題是需要很長時間。第二種做法是砍掉所有對生產不重要的支出。這聽上去似乎是要提升企業效率，盡管對企業是痛苦的，但對社會有價值。但由于以前的CEO們已經削減了支出，剩下來最容易削減而又不會很快影響生產的最主要的支出類別是投資。當然，削減投資會導致之后的產出減少，但在這段時間里CEO即使不削減投資也可能被炒。第三種做法是不把時間浪費在任何有關生產或投資的真正決定上，而是重做賬目。普通人通常以為會計行業已經就如何編制賬目確立了明確規則，但實際上有許多灰色地帶可人為地增減利潤，或者在不同子公司之間轉移利潤。[[5]](#_5_Zhe_Ye_Shi_Zhi_Ye_Dao_De_Lun)

假如你是CEO，你會選擇怎么做？我們能看到第二種做法在美國和英國的企業界正在產生的后果。盡管利潤率很高，但企業選擇不投資。能證明存在這種情況的顯著證據是，上市企業與私人持股且股份不能在市場上出售的企業，二者的投資率存在巨大差異。前者的投資率是2.7%，后者是9%。英國金融部門占經濟總量的比重在各主要國家中最大，而英國企業對研發的投資遠低于發達經濟體的平均水平。[[6]](#_6_Zhan_GDPDe_1_7__Er_Jing_Ji_He)

不足為怪的是，與擁有長遠目光的企業相比，追逐季度利潤的企業的長期業績即使以利潤率衡量也更差。但假如以前的CEO們已經把投資減到不能再低的水平，也許你就只能選擇第三種做法了。這種隱秘做法本身難以被外界察覺，除非騙局達到紙包不住火的程度。這樣的情況時常發生。在美國，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安然公司（Enron）。與安然相似的英國例子是鏡報集團（Mirror Group Newspapers）CEO羅伯特·麥克斯韋爾（Robert Maxwell）和BHS百貨集團的CEO菲利普·格林（Philip Green）。政府官員曾調查麥克斯韋爾，發現他“不適合經營上市公司”，而格林竟曾被封為爵士。二人都導致企業失去了職工的養老基金，使成千上萬的員工陷入貧困。騙局即將曝光時，麥克斯韋爾從他的巨型游艇走了下來；而格林則保住了自己的巨型游艇，抨擊他的人諷刺地稱該游艇為“BHS毀滅者”[[Ⅳ]](#_IV_Yuan_Wen_destroyerJi_Neng_Zh)。也許一家企業的CEO擁有巨型游艇可以被視為存在“創意性”做賬的首要跡象？

后兩種做法都會對社會造成嚴重損害。前者的后果是大企業的經營缺乏充足的長遠考慮，后者則使企業披露的賬目變得不可信。

還有更嚴重的后果：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看到CEO越來越把精力用在短期花招方面，而不為打造偉大企業進行長期努力。但在薪酬差距拉大的情況下，即使是想放眼長遠發展的CEO和董事會也更難實現目標了。正如強生、帝國化工、大眾汽車和豐田的例子所證明的，打造長期戰略的一個關鍵是說服員工對企業形成認同。敘事只有在不與行為矛盾的情況下才能發揮神奇效果。一邊對員工說“咱們同舟共濟”，一邊賺著比普通員工高500倍的薪酬，員工就很可能覺得你是在惺惺作態。生產線上的工人可能會想：“既然你在以權謀私、中飽私囊，那么我想做手腳時就故意拉安東拉繩，把生產線停下來。”只發指示而不以身作則通常是不行的。

那么養老基金目前的策略明智嗎？顯然不明智。它們有一項明確的義務：向其成員按時支付合理的養老金。能不能履行支付義務只取決于一點——它們所持資產的長期回報。這又取決于它們投資的企業的長期業績。總的來說，養老基金無法跑贏市場，所以它履行義務的能力取決于經濟體中企業的總體長期業績。養老基金的做法導致企業管理層不再專注于提升長期業績，這最終損害了養老基金自身履行義務的能力。

### 對策是什么？

講了這一連串令人灰心喪氣的失敗之后，該談談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了。幸運的是，這些問題并不是資本主義自身帶有的不可避免的特征，而只是公共政策失誤的后果，而這些失誤是可以糾正的。公共政策出錯的原因是陳舊意識形態之間的尖銳斗爭導致人們聚焦于不重要的問題。右翼意識形態主張信仰“市場”，貶斥所有政策干預，其解決方案是：“政府不要再騎在企業背上，取消監管！”左翼意識形態貶斥資本主義，譴責企業和基金管理者貪得無厭，其解決方案是國家控制企業，將戰略經濟領域國有化。這兩種原教旨主義意識形態都是站不住腳的，但這種二元對立左右了公共討論，妨礙了創造性思想的涌現。

尋找新方法的起點是要認識到，大企業在社會中的角色問題從來沒有得到認真思考。管理大企業的董事會做出的決定對社會有重大影響。但董事會當前的結構是由零散不統一的個體決策塑造的，每項決策都偶發性地導致了一些超出預料的新決策。以《聯邦黨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為代表的激烈而機智的公共討論，催生了美國的憲法與國家治理體系，像這樣的討論過程在公司治理體系中并不存在。針對企業的公共政策一直是漸進的，所以從來沒有妥當處理控制權這個根本問題。尋找可行解決方案必須以此為起點：重新平衡被法律賦予控制權的各方的利益。

### 改變企業權力結構

目前在盎格魯—撒克遜經濟體中，法律要求董事為企業所有者的利益經營企業。例如，人們通常就是這么解讀英國《公司法》的措辭的，盡管該文本也不排除對更寬泛利益的考慮。[[Ⅴ]](#_V_Yue_Han__Kai_Xiang_Wo_Zhi_Chu)而企業所有者只包括企業的持股者。這一體系并不是內生于資本主義的，該體系出現的原因是，在18世紀企業發展的早期階段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高風險投資需要達到一定規模，而這種安排有助于確保資金到位。那個時代早已逝去了，現在財務損失的風險通常是靠以下方式防范的：多樣化、信息披露和對公司治理的監督。愿意加入高風險投資的資金很多（互聯網熱潮及其后的證券化抵押貸款熱潮便是例證）。人們現在愿意購買無投票權的股票：他們與其他股東承擔相同的風險，但沒有控制權。目前在未通過多樣化得到分散的風險中，最主要的可能是長期雇員和客戶承擔的風險。長期雇員將自身人力資本投入一家公司，客戶被鎖定在長期供應結構中，而他們通常在董事會中沒有代表。讓他們的代表進入董事會是完全可行的，這種情況有時也會發生，這樣的企業被稱為“共同企業”（mutuals）。

現在英國最受尊敬的企業已不是帝國化工，而是約翰·劉易斯合伙企業（John Lewis Partnership）。這家基業長青、極其成功的企業有著極不尋常的權力結構。企業的所有者是一家為其員工利益服務的信托，員工每年獲得公司利潤的相當大一部分作為獎金。而且企業對CEO和助理店員一視同仁，基層員工得到的分成和CEO一樣。通過一系列的基層、地區與全國委員會，員工選出該企業80%的管理委員會成員，所有員工都對企業經營有發言權。約翰·劉易斯是“共同企業”的范例，它不是由股東擁有，而是由員工、客戶等與企業有直接利益關系的人集體擁有。新員工加入或者企業獲得新客戶后，這些員工和客戶擁有的權益逐漸增多，漸漸取代離開的人。根據該機制，所有權和控制權屬于那些參與企業運作因而與企業業績有直接利益關系的人。

過去很多企業都有這樣的組織結構，但這種結構容易被一種致命誘惑毀掉。當前擁有所有權和控制權的人，在法律上有權把企業從“共同企業”變成可以在公開市場上交易股權的企業。經過這種轉變后，當前的“所有者”獲得企業的全部資本價值，代價是后續參與者都無法分享企業價值。在英國，1986年的一次修法為“去共同化”創造了空間，而在這次修法之前，作為法律基礎的社會規范認為這樣的改變是不道德的。但1980年代的新金融文化削弱了義務規范。有時，誘惑實在太強大。

在美國，高盛的一小群合伙人抓住了新倫理規范提供的機會。高盛人素來以極度機敏而非正派聞名。憑借著這種機敏，他們擺脫了以前所有合伙人經歷的極度貧窮。在英國，大多數建房互助協會（building societies；美國人稱為“儲蓄與貸款協會”，loan associations）都經歷了“去共同化”。最大的哈利法克斯建房互助協會是一家歷史悠久的龐大企業，最初在英格蘭北部的一座小鎮里默默無聞，經過了150年的發展，成了一家巨型金融機構，有效地為數百萬人提供抵押貸款，并為數百萬小儲戶提供安全保障。所有權結構的變化使這家偉大企業的管理擺脫了由企業成員進行業余控制的笨拙方式；它已經發展為全英國最大的銀行，由關注季度利潤的基金經理對它進行職業化的細致管理。約翰·凱作為董事會成員觀察了這一轉變的結果。[[7]](#_7_Kay__2011)為提升季度利潤，被解放的管理層決定拓展業務范圍，不再局限于吸收小儲戶存款后再貸給買房人的枯燥模式。在金融衍生品市場上博弈才能掙大錢。凱指出，在金融衍生品市場上掙錢的前提是其他參與者要虧錢。他問道，為什么哈利法克斯銀行覺得自己能贏？該行CEO解釋說，他們招募了一隊腦瓜極靈光的市場玩家。凱對這一吹噓的簡短評論是，在與該團隊見面后，他發現這吹得有些過分了。盡管他表示疑慮，但實行這項新戰略后哈利法克斯銀行的利潤扶搖直上，這似乎證明了CEO決策的正確性。然而，接下來的事情卻急轉直下。該行不得不接受另一家銀行的救助，巨額虧損逐漸浮出水面。此前哈利法克斯作為一家“共同企業”已發展了150年，從微不足道的小機構成長為世界級的大企業，而在職業基金經理接手不到20年后，管理方面的嚴重愚蠢錯誤就導致該企業走向破產。但我個人對此不能有怨言。很久以前，母親為我的零用錢開了一個哈利法克斯建房互助協會的儲蓄賬戶，而我一直沒有抽出時間去注銷該賬戶；該行轉型后，因為我的利息被轉成了股票，我得了一小筆意外之財，隨后我及時賣出了這些股票。

看完這些不同做法的結局，我們應當支持賦予代表工人利益的成員參與企業董事會的權利。這樣的改變也并非不切實際：長期以來德國法律都規定企業應包含工人代表。這樣的規定并沒有導致災難，相反，德國企業一直表現優異。但是，如何防止員工與企業所有者合謀，侵害在企業中無代表權者——最顯而易見的就是用戶——的利益？

### 企業的棲息地：為生存而斗爭

企業生存于一塊棲息地，各自在其中找到了一塊自己的小天地。在這塊棲息地里為生存而斗爭是迫使企業為客戶利益服務的法則。將生物學語言翻譯成經濟學語言，棲息地就是市場，為生存而斗爭便是競爭，使生物適應環境的進化力量，對應著經濟學里資本主義的良性動力。在為生存而斗爭的過程中，企業努力生產質優價廉的產品，而我們都從中受益。

競爭的敵人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利用權勢，通過一系列策略來設置競爭障礙。其最合法的策略是游說，這已發展為一個巨大的行業，耗費大量資源來索求特權。腐敗也是其中一個備選策略：濫用公職，把行政許可與法院判決當作商品出售，授予壟斷權。當前披露的證據顯示，南非前總統祖馬（Zuma）利用公職為古普塔家族（Gupta family）的商業帝國服務，幫其謀取利益。這種行為發展至極端便是把整個國家都置于囊中。

集權使政府不用向國民負責，導致既得利益者猖獗不已，大多數人都明白這一點。全能國家不是對既得利益的制衡，而是既得利益的終極勝利。市場這個棲息地遭到鏟除，結果導致社會機能失調，盡管存在著嚴厲的政治鎮壓，其國民仍會紛紛用腳投票。最先提出“建墻！”這個口號的并不是想阻止外國人入境的唐納德·特朗普，而是拼命要阻止國民外逃的集權政權。我小時候，電視上經常播放他們試圖攀越高墻的畫面，但年輕人沒有這樣的記憶：他們只能從書本里了解這段歷史，但書籍更重視其他歷史。我十歲的孩子知道哈德良長城（Hadrian's Wall）但不知道柏林墻。你可以試著問問你們的孩子。

自市場出現以來，有權勢者一直試圖限制競爭，避免競爭損害自身優勢。既得利益者對自身優勢的了解遠遠超過政府官員。既得利益者作為范圍狹窄的小群體，容易為自身利益而組織起共同行動，而作為其對立面的分散的公共利益群體則難以有效組織起來。競爭能克服這種障礙。同行業的企業擁有類似的信息，所以一旦這些企業展開競爭，既得利益者將喪失優勢，無論政府官員是否了解這些既得利益者。公眾一旦認識到維護競爭原則的意義，就能利用該原則來擊退既得利益者的每一次劫奪企圖。反對競爭的人辯稱這樣做不公平，具有破壞性，而且忽視了一些據稱由壟斷者提供的其實并不存在的“福利”。這些主張的背后隱藏著利己主義：這是動機性推理。

懲罰通用汽車和貝爾斯登的是市場，而不是公共干預。但有時只有競爭是不夠的。針對這些更棘手的情況，我們需要積極的公共政策。

一方面既得利益者試圖人為地設置競爭障礙，另一方面，在經濟的一些領域，由于異常強大的規模經濟效應，也存在一些技術障礙。當經濟活動依賴網絡時，規模經濟效應最顯著。供電需要電網，供水需要管道網，鐵路運輸服務需要鐵路網。有時可以將服務與網絡分離：火車公司可以在共享鐵路網上競爭，發電廠可以在共享電網上競爭。但網絡本身是一種自然壟斷。互聯網經濟的出現創造了一些新的網絡式產業，可以拓展為全球性壟斷。這些企業需要的設備、建筑物等傳統意義上的有形資產很少，它們的價值在于無形資產——它們構建的網絡。[[8]](#_8_Haskel_and_Westlake__2017)和有形資產不同，這些網絡很難被競爭者仿制；同時作為無形資產，網絡也沒有固定的地點以確定其受哪里的公共政策統轄。一些特定利基市場（niches）里的網絡傾向于形成全球性的自然壟斷，如Facebook、谷歌、亞馬遜、eBay和優步。它們作為不受監管的私營自然壟斷企業，有很高的危險性。

在經濟的許多其他領域，同樣的過程也在發生，只是沒有那么明顯。生產率提升必然意味著經濟的復雜性穩步增大，這導致其他產業也出現了一些網絡化特征。[[9]](#_9_Hidalgo__2015)因此，這些產業中的頭部企業都擁有了更強的支配地位。沃爾瑪將物流的新網絡化特征用于零售業，頂級銀行在金融領域收獲了新的規模效應。生產率和企業利潤的增長集中于這樣的頂級企業。[[10]](#_10_Autor_et_al___2017)盡管不像自然壟斷那么極端，但規模效應帶來的收益使它們獲得了高于較小競爭對手的資本回報率。對這些企業控股權的競爭推高了它們的股價，使初始股東像撿到意外之財一樣獲得規模經濟效應產生的溢價。

技術原因導致盈利能力因規模而變得極強，在這種情況下競爭變得無力，無論是在自然壟斷的極端情況下，還是在頭部企業賺得超額利潤的情況下。我們需要更有針對性的公共政策工具。傳統的做法是監管和公有化，二者均有其局限性。

### 規則真的管用嗎？

無論董事會的初衷有多好，有時外部監管仍然是必需的。外部規則能確保所有企業遵從同樣的政策，若是交由董事會來做判斷，結果就會各不相同。例如，假如一部分企業在減少碳排放方面比其他企業付出更多努力，則意味著低效和不公平。

但是，當用規則來解決剝削性企業的問題時，就會出現相當大的局限性。管制的目標要么是打破自然壟斷，要么是控制這類企業向消費者收取的價格。打破壟斷可以迫使該行業出現競爭，但由于技術性規模經濟效應仍會推動壟斷出現，政策干預必須持久。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政策要阻止規模經濟效應的發揮，也會造成效率損失。價格控制旨在限制企業利用規模經濟效應為自身謀利，迫使企業把利益轉移給消費者。這一做法的局限性是信息不對稱，我們此前已在另一個情景中看到過該問題，那就是管理層和基金經理之間的認知差距。此處的信息不對稱發生在企業管理層和監管機構之間。最顯著的信息不對稱發生在金融市場上，在監管機構和銀行之間，但這個問題是普遍存在的。企業了解自己的成本和市場，監管機構是無法達到同等程度的了解的，因此這個問題永遠無法得到徹底解決。

解決這一問題的最好辦法可能就是通過拍賣壟斷權，將對價格水平的最合理猜測和人為控制的競爭結合起來。拍賣的好處可以以英國政府出售3G網絡牌照為例。最初，財政部想基于對潛在利潤的預測為該網絡牌照設定一個合理價格，最終決定以20億英鎊作為目標價格。幸運的是，經濟學家說服財政部相信這里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所以這個估價可能是不準確的，于是財政部轉而對該網絡牌照進行拍賣。最后的成交價是200億英鎊。顯然，無論中標的企業是支付20億英鎊還是200億英鎊，它都會在允許范圍內盡最大可能地從該網絡的用戶中榨取出最大利潤，但至少通過拍賣這種方式，壟斷給用戶造成的損失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為政府財政收入所彌補。

阻礙拍賣發揮效果的一個因素是政府承諾的信譽。企業競標這樣的合同時會犯錯誤，當然，因為他們掌握的信息比監管機構多得多，所以錯誤不會像后者那么大。如果企業出價過高，未來經營時會利潤不足，極端情況下會破產，導致合同無法履行。只有存在相應的收益上漲前景，企業才愿意承擔這一下行風險。而且假如所有企業都低估了潛在利潤，中標價就會過低。[[Ⅵ]](#_VI__Ying_Jia_Zu_Zhou__Xiao_Ying)但是，假如在企業競標成功后的經營過程中，因選舉壓力而短視的政客認為該企業賺取了暴利，就會想推翻監管機構的決定。企業越擔心這種干預發生的可能性，他們在競標時的出價就越低，贏家將獲得的利潤率就越高，政治干預發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于是造成低信任度的惡性循環。

假如這是唯一的問題，解決方案就是縮短合同有效期，使之與政治選舉周期合拍；可以簽訂一系列中期合同，以盡量減輕下一次選舉帶來的壓力。但企業的不良行為并不局限于剝削性定價。水電等公用事業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就應該將大部分利潤用于再投資，但合同期限越短，企業就越不愿意做出符合社會需要的投資決策。理論上監管機構可以嘗試監管投資，但這比確定定價需要的信息還要多。實際上，監管機構幾乎無法確定哪些投資符合社會需要，也無法確定投資的成本。監管是有局限性的。

在全球性網絡公用事業方面，監管問題更是極為復雜。這樣的監管往往得是全球性的，但到目前為止，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該監管能力都受國界限制。導致國際合作更困難的因素是絕大多數電子科技公司都是美國公司，因此美國政府對國際合作充其量持模棱兩可的態度。職業反壟斷律師加里·瑞貝克（Gary Reback）如此評論：“歐盟想用反壟斷法來約束美國大科技公司的力量，能成功嗎？不能……歐盟松軟無力的反壟斷執法措施永遠無法取得實際效果。”而且，即使有監管措施產生效果，科技公司也可以輕易斥其為反美行為。規則起不了作用。

因此，鑒于監管存在的這些固有問題，目前最流行的替代方案是公有化。

### 公有化

目前在英國，人們對受監管的私營公用事業有強烈的不滿，所以絕大多數人贊成將鐵路和水電公司收歸國有。這很諷刺，因為最初所有公用事業都是公有壟斷企業，正是因為公眾對其表現不滿才改制為商業企業的。不過，公眾抱怨公有制缺陷的時代比柏林墻的時代還要早十年。在公有制下，公用事業被其雇員綁架，這表現為罷工頻發，以及出于政治原因壓低公用服務定價，進而導致投資不足。目前的討論圍繞著意識形態呈兩極分化：諷刺的是，左派希望將這些產業國有化，但不希望民眾有國家意識；右派希望民眾有國家意識，但不希望將產業國有化。

現實中，在受監管的私人企業經營下，一些行業運轉得比較好，另一些則運轉得比較差，這和不同行業內信息不對稱程度的巨大差異相一致。以合理標準來衡量，鐵路運轉得較好，供水業運轉得較差。私營鐵路運轉較好，最明顯的證據來自使用情況：無論怎么抱怨，人們都是用腳投票的。在1998年鐵路私有化之前幾十年的公有制時期，鐵路使用量每年都在下降；1998年以來則每年都處于強勁上升的態勢。而供水業運轉較差的主要跡象是經營者提取了很大一部分利潤作為紅利。

### 那么，有什么好辦法？

既然監管和公有化都有嚴重的局限性，是不是還有我們尚未考慮到的其他做法？以下列出三種。

稅收

在企業規模越大、生產率與利潤越高的行業，規模經濟效應帶來的額外收益是一種“經濟租金”。這是經濟學里的重要概念，在后面探討大都市與破敗城市的分化問題時，該概念將起到核心作用。經濟學家所說的“經濟租金”是指從一項經濟活動的收益中除去為吸引勞動者、資金與企業家所需的成本之后的那部分收益。如果租金蒸發，一直在攫取租金的人就將受損，但這項經濟活動仍可正常進行。私人壟斷者可以獲得經濟租金；在企業規模最大就意味著生產率超高的行業里則是最大的那些企業獲得經濟租金，只是不如私人壟斷者的情況明顯。未來的稅收應該做的是更好地征收這些租金。與其他稅收不同，這種稅收的性質決定了它不會抑制生產活動；它征收的租金既非勞動所得或延遲消費而積累的儲蓄，也非承擔風險所贏得的收益。

在企業規模最大就意味著生產率最高的行業里，也許可以根據企業規模設置差異化稅率。學者借以證明大企業更賺錢的數據正可以用來設計差異化稅率。這么做不是為了抑制規模經濟效應，而是為了征收企業的部分收益，用于服務社會。諷刺的是，我們已經在區別對待規模不同的企業了，但方向是反的：亞馬遜等新的網絡壟斷企業不用像其他企業那樣納稅，這給它們帶來巨大好處。因為征稅的效果無法充分預知，所以明智的做法是循序漸進，先對規模大的企業適度課征新稅，然后評估效果。一個后果是可以預料的：大公司將會積極通過游說來反對這種政策。

讓公共利益代表參加企業董事會

董事會的許多決策都會產生外部影響，但又不適合通過監管來約束，因為監管是一種粗糙的武器，可能帶來較大傷害。一個例子是CEO傾向于吝惜投資。但假如我們制定法規，要求企業將一定比例的利潤用于投資，這就將導致像蘇聯的計劃經濟一樣的惡果。明智的投資決策須基于大量詳細信息和嚴謹判斷，不是靠幾條法規就能產生的。

克服上述局限性的最佳途徑不是增強監管，而是讓公共利益介入做出決策的指揮部：必須為公共利益在董事會中設立直接代表席位。這不是說要把企業辦成慈善機構，由著某些“公共利益”代表的性子來犧牲企業利益。盡管企業的總目標應當與社會的長期利益保持一致，但實現這一點的首要方式是專注于提升企業的自身實力。不過這個總目標確實意味著，董事會決策不能為了企業的小利益而犧牲明確、顯著的公共利益。

把公共利益考慮納入董事會，什么方式最合理？可以修改法律，強制要求所有董事充分考慮公共利益。一旦明確法律責任，如果董事故意忽視某項重要的公共利益，他們便可能在法庭上面臨民事或刑事起訴。可以制定這樣的法律：它不要求企業為了微小的公共利益而承受巨大損失，但假如有充分理由認為企業為了微小的自身利益而造成了巨大的公共損失，就可以起訴它。既然知道有這樣的風險，明智的董事會在需要做出決策時就一定會進行系統全面的討論，并記錄下討論的情況。判例法將以早期判決為基礎逐漸積累成形，假如實踐結果顯示該法律向企業或公共利益一方偏袒過度，也可以修改它。

美國已經有這樣的先例，它設置了一種新的企業類別——公共利益企業（Public Interest Companies）。這些企業肩負著商業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雙重使命，董事會必須把二者都納入考慮。這是正確的想法，但實際上公共利益企業終歸只能占企業的一小部分。事實上，這些企業的存在本身就表明所有其他企業在運營時都不應以公共利益為目標運營。當前極少的公共利益企業其實只能算作試點。通過研究這些企業的行為，這個想法可以得到進一步完善，直至可以穩妥地要求所有企業都肩負一定的公共使命。

維護公共利益

每一項監管都可能因僵化的執行而失效，每一項稅收都可以用狡猾的做賬規避，每一項職責都會因動機性推理而遭到推卸。防范此類行為的唯一機制是一支監督一切的維護力量。這不是指窺視社會的父愛主義國家，而是指普通人作為公民來監督。

一旦社會有了足夠多理解企業的正確使命，并視該使命為一項標準的公民，我們本身就能成為促使企業妥當行事的力量。我們對善行與惡舉的反應就來自尊嚴感與恥辱感所施加的溫和壓力，和維持著作為所有成功社會特征的巨大的互惠關系網絡。這種溫和的維護角色并不需要所有人都參與：只要有一個關鍵的參與者群體，對他們來說，企業不良行為造成的風險令人難以承受，就可以了。在任何大企業里，許多人都不可避免地會知道重要的決策。只要有少數人以符合道德的方式行動，就能迫使企業采取合乎道德的做法。通常，只要少數人指出存在著公共利益被犧牲的危險，就沒有人會犯眾怒地說公共利益無關緊要。在極少數情況下，即使只有一個勇敢的揭發者也足夠了。所有企業都有很多正派的員工愿意在已有身份之外接受新身份，他們會為成為公共利益守護者感到自豪。在銀行業繁榮的鼎盛時期，一家頂級規模的投資銀行決定創建一個促進社會事業發展的小部門。加入該部門的人需要放棄獎金，而獎金被認為可以打造充滿活力的企業文化。該投行的管理層一度懷疑沒有員工愿意轉入該部門。最終，這四個新職位傳遍了整個公司，因為有1,000名員工提出了申請。大企業里不乏動機良好、有使命感的人。

鼓勵你的企業形成道德使命感是你對社會做出的貢獻，而繼續為一家缺乏使命感的企業工作是對個人靈魂的摧殘。我們將在下一章看到，幸福并非來自金錢方面的成功。如果你為一家缺乏社會使命感的企業工作，而你又無法改變這家企業，那么如果可能的話就換個工作吧。我很幸運地擁有幾位天資很高的侄子，而我現在最敬佩的是曾經做過汽車推銷員的那個。他所在的公司想耍這一行常用的把戲，就像高盛在被泄露的電子郵件里把客戶稱為“笨蛋”一樣。作為一名有敏銳道德使命感的年輕人，他換了個工作，新工作雖然錢少，但可以提供更多幫助客戶的機會。他告訴我他現在幸福多了。

這些新的身份認同、規范和敘事將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好，讓我們對生活更滿意，但我們首先必須構建它們。單靠一家企業是不行的。在表面上，如果一家企業要求員工把公共利益作為本企業的導向，員工可能會把它看作一種新的公關手段。但從更深層面來看，一家企業里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業界流行的文化。一些社會成功地建立了良好的企業行為文化。豐田之所以能采用源于美國的理念，信任裝配線上的工人自覺監控生產汽車的質量，原因也許是日本有著比美國更深厚的員工與企業合作文化。同樣，戰后德國的勞資關系政策也深受英國工會聯合會提出的一項建議的影響。與戰前英國對抗式的勞資關系不同，該建議所主張的政策能夠更好地處理勞資關系。英國工會從英國體制的缺陷中總結出來的處理勞資關系的做法被戰后的德國學到手。德國在二戰中戰敗，既得利益集團被打破，這使德國能重建一套政策，而英國的戰勝卻使既得利益集團得到了鞏固。[[11]](#_11_Scheidel__2017)

重建企業行為中的互惠義務這項代表巨大公共利益的行為必須由政府來完成。第二章概述了如何建立新義務。我們需要形成一個關鍵的“道德公民”群體。道德公民理解企業的使命，以及企業能為社會做出的重大貢獻；他們理解這種使命所要求的規范，并能通過尊重和反對的雙重壓力鼓勵企業履行這些義務。

多年來政府向公民耳朵里灌了很多好話，人們已經習慣了不屑一顧，所以重建信任是一個必需的起步。如何讓充滿懷疑的對方相信你意圖良好？前文已經談到了解決這個難題的方法——信號作用。這里重述一下要點：信號能讓懷疑你的對方看到你事實上是哪種人。這是怎么實現的呢？諾貝爾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發現，唯一的方式是采取這樣一種行動：假如你是對方所懷疑的那種人，那么這個行動對你而言將意味著極高的成本，導致你不敢實施。幾乎可以肯定的是，該行動會讓你付出很大的代價，即使你不是他們擔心的那種不可信的人。你需要找到一種行動，它既可以幫你贏得信任，所要付出的代價對你來說又是可以接受的，但對他們懷疑的那種人來說，卻是不可承受的。那么以這一深刻理論為指導，在當前形勢下政府可以怎么做呢？

想想之前說的，現在的公民蔑視企業，普遍認為企業貪婪、腐敗、剝削成性。我們必須改變這種主導性敘事，但假如你上來就說“企業對社會很有用”，許多人都會轉過頭去不再理你。你可以做一些不同尋常的事。許多人為沒有一個銀行高管因金融危機期間的行為入獄而義憤填膺。這是因為引發金融危機的銀行高管并非故意要毀掉他的企業，而只是魯莽不負責任。如果一名駕車者因魯莽致人死亡，我們將此歸為過失殺人罪，與故意殺人罪有所區別。針對所有具有系統重要性的企業，我們需要一個相應的新罪名——過失致銀行破產罪。假如CEO們知道就算他們已經駕著黃金降落傘退休，我們也能把他們從高爾夫球場拖走，讓他們為過去的錯誤承擔責任，他們就可能集中心思搞好企業。

在展示一定的魄力后，政府可以進一步用簡單的語言來闡述國家戰略。也許可以從企業的使命開始：以可持續的方式造福社會，重新實現生活水準的持續上升。再分析為什么許多企業偏離了這個使命，并論述政府為糾正這一狀況所采取的措施。最關鍵的是，要坦陳這些政策的局限性。政府隨后可以邀請所有人接受作為道德公民的新角色。像所有成功的敘事一樣，變革不可能一夜實現，這需要許多不同的政府部門持續傳遞一致的信息。而且像所有敘事一樣，言行不一將導致敘事失效。但在大多數西方國家，1945—1970年的政府領導人成功建立了許多新的互惠義務。盡管這些敘事并不是特為改變企業行為而建立的，但道德企業成為主流也許有其一份功勞。要記得，當時企業CEO的薪酬僅為員工的20倍，而現在這個數字是231倍。道德企業已經被吸血烏賊取代。時代已經改變，需要讓它回到從前的樣子。

[[Ⅰ]](#_I_3)軼事有時能切中要害。2018年1月我在巴基斯坦央行發表年度公開演講，并以帝國化工為例說明一個公司如何失去使命感。發言結束后，一位器宇不凡的先生走了過來，原來他曾是帝國化工的高管。我原準備道歉說我可能了解有限，但他卻與我握手，并確認說在一次次會議上管理層都沉迷于股東價值。在他看來，真正使命感的喪失毀掉了這家公司。

[[Ⅱ]](#_II_4)在美國財政部要求下，摩根大通救助了貝爾斯登，但它破產的消息導致比它大得多的銀行雷曼兄弟遭遇擠兌。當時人們覺得雷曼兄弟太大了無法救助，但事實證明，這么大一家銀行的倒閉必然導致災難性后果。

[[Ⅲ]](#_III_3)可以對比一下通用汽車基層管理者的這一做法與“泰諾”危機期間強生基層管理者的做法，看看這種差異背后的原因。

[[Ⅳ]](#_IV_3)原文destroyer既能指“驅逐艦”也能指“毀滅者”。——譯者注

[[Ⅴ]](#_V_3)約翰·凱向我指出，該法的詳細措辭鼓勵董事會從更大的視角看問題，但當我向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長提到這一點時，他搖著頭向我保證，法律只要求他關注股東的利益。文本總是在具體的文化氛圍中被解讀的。

[[Ⅵ]](#_VI_3)“贏家詛咒”效應的存在意味著這種情況發生的概率不太高。

[[Ⅶ]](#_VII_2)這是人們用來批判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的比喻。無論這是不是對高盛的歪曲，近來的研究顯示這至少不是對烏賊的歪曲。烏賊散發出精明、自私、貪婪的惡意，經濟學家一直錯誤地把這樣的惡意說成是人類的特征。

## 第五章 道德的家庭

在使我們超越個體的所有實體中，家庭是最堅強的。丈夫和妻子公開承諾對對方負有義務；情感把父母與子女連在一起，父母關愛子女，通常情況下，多年后子女也會關愛父母。但人們很少把這種潛在的互惠性認定為一種權利。盡管老人得到關愛是好事，但父母向孩子提供關愛是無條件的，而不是作為一種交易。但子女經常把回報父母視為義務。有個絕妙的約克郡老笑話就利用義務和權利之間的這一微小差距，揭露了一個兒子的道德缺陷：“媽媽，你為我辛苦了一輩子，現在……出去為自己辛苦吧。”義務之網的范圍可以遠超夫妻和子女。在古代社會，人們對七代旁系表親這樣現在看來很遠的親戚也要負家族義務。

家庭本身也是網絡。在典型的三代核心家庭里，作為中間一代的父母構成核心，不過他們往往會重復前代人傳下來的敘事。這種從敘事中產生道德規范的基本模式在家庭層面的體現甚至比在國家、企業層面更明顯。家庭是創造歸屬感的自然單位，因為我們從出生起就在家庭的養育中成長。物理上的親近被關于歸屬的故事進一步拉近：這些故事把每一代新人都納入家庭，創造一個“我們”的概念。家庭中關于義務的故事點明責任，其他敘事把我們的行動與結果聯系起來。像所有家庭一樣，我的家庭里也有很多這樣的故事，其中既有英雄也有敗家子。現在回想這些故事很有趣，可以將其分為關于歸屬、義務和開明自利的故事。

像在所有網絡化群體中一樣，這些敘事在成員間口耳相傳，最終形成一個有內在協調性的整體——一套信念體系。家族的血緣聯系使相互對立的信念體系得以互相容忍，但在1945年，有一種信念體系在西方社會幾乎是普遍性的，我在此稱其為“道德家庭”（the ethical family）。我并不是說這是唯一符合道德的信念體系，它事實上與今天許多家庭的價值觀截然不同。我只是用此來強調當時家庭中普遍長期存在的道德結構。

在1945年的道德家庭中，構成中間一代的夫妻接受對子女和父母的雙重義務。這往往意味著不小的負擔，但因為每個人都會從最小的一代逐漸變成最老的一代，所以人們把它作為一個階段性的責任接受下來。這個結構是一套非常穩定的信念體系：開明自利支持一種共同身份，共同身份界定了一種具有區別性的互惠性所適用的范圍。歸屬于家庭的共同身份很容易建立，因為它是一種日常生活的現實：“相互尊重”的范圍。互惠性承諾的規范是情感的自然延伸，而且使命感能增強這些規范：如果有足夠多的人遵從，所有人就能得到長期性的物質利益，這就是“開明的自利”。

1945年時幾乎每個人都屬于這樣的家庭，但接下來的幾十年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西方各國，人們開始拋棄對家庭的義務。離婚率飆升，美國于1980年左右達到頂峰，英國稍晚。而隨著受教育程度不同者之間出現新的分化，這種變化更為明顯了。

各種沖擊動搖了長期以來強大的道德家庭信念體系；隨著道德家庭的消逝，社會分化加劇，引發了很惡劣的后果。

### 頂層發生的沖擊

道德家庭規范受到的第一個沖擊是技術沖擊。避孕藥為年輕女性提供了掌控人生的機會：性行為可以不再像以前那樣導致懷孕了。這使得尋找合適伴侶更為方便。短期性關系變得不那么危險了，所以“苦尋佳偶”的舊方式被婚前同居的新方式取代，這種尋覓配偶的方式要可靠得多。拉金（Philip Larkin）有一句一針見血的詩就曾寫道：“性行為開始/于1963年”。

這場解放始于技術輔助的性行為，但很快就遠遠超出了這個范圍。一場深刻的思想沖擊解放了個人，使我們不必再受道德家庭的許多陳舊規范束縛。對家庭的義務讓位于新的對自己的義務：通過個人成就實現自我。人們修改了法律，讓離婚變得更容易。而離婚更容易意味著它不再會遭受指責，不再被視為某一方的過錯。

不意外的是，這場思想沖擊始于大學校園，所以主要影響的是受教育程度高的新階層。這場沖擊從根本上挑戰了道德家庭的觀念——尊嚴來自履行義務。新的倫理觀用自我取代了家庭的位置；尊嚴不再源于履行義務，新倫理觀認為尊嚴源于自我實現。吸引女性的自我實現倫理觀是女權主義，吸引男性的是《花花公子》雜志（Playboy）。以前被視為需要抵制的誘惑行為，現在被視為需要把握住的自我實現時刻。許多新階層家庭的夫妻都發現，要想實現自我就必須離婚。

隨著人們接受了這些新規范，精英婚姻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另一項沖擊——大學的大規模擴張——推動了這樣的變化。由于大學的擴張，受過良好教育的男性與女性的人數趨向一致，這又使尋找合適配偶變得方便多了。人們學會了如何尋找合適的伴侶（目前因網上交友技術改進，這個趨勢還在延續）。很快墮胎合法化又加快了這一趨勢，墮胎成為避孕之外的又一道保險。以前作為中間一代的夫妻遵循的規范是性別等級制和對上下兩代人負有的共同義務，經此變化之后，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的規范成了互相鼓勵通過個人成就去實現自我。[[1]](#_1_Wo_Dui_Jia_Ting_Gui_Fan_Bian)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通過同居和選擇婚配結成了和諧佳侶，所以離婚率下降了。事業有成的父母渴望把自己的成功傳給后代，所以，過去反映在子女教育中的性別等級，讓位于夫妻共同培養子女的做法。

我小時候做家庭作業沒有得到過任何幫助：沒有父母的指導和監督，也沒有私人家教。我父母的知識水平和經濟實力都不允許他們這么做。但對我來說幸運的是，我上學時即使精英家庭子女獲得的課外幫助也極少，所以我能和他們競爭。但我和妻子身為知識精英，我教11歲的亞歷克斯科學，我妻子教他拉丁文，我們還聘請了一位家教。他班里的其他所有孩子都得到了類似的課外教育。規范發生了劇烈變化。假如沒有遭受另一場沖擊——中產階層的大規模擴大，以前的體系也許會維持下去。中產階層擴大后，上大學的競爭也變得更激烈了。我就讀的牛津大學現在收的本科生中英國人比例較1960年代下降了不少；牛津已經實行了全球化錄取，這通常意味著錄取外國精英的子女。但隨著英國中產階層的擴大，希望子女上牛津的家庭比過去增加了很多。一旦部分父母開始通過家庭教育來讓子女獲得優勢，其他父母就不得不效仿，否則他們的子女考上好大學的機會就會進一步減少。這一沖擊破壞了舊規范所處的穩定環境，導致舊規范崩潰。結果，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在養育子女上花費的時間增加了，于是夫妻選擇少生孩子，家庭規模因而縮小。[[2]](#_2_Ji_Shi_Dao_Le_1975Nian__Xiang)“用來炫耀的妻子”被“用來炫耀的孩子”（我就養了一個）替代。[[Ⅰ]](#_I_Xiang_Shao_Shu_Que_Fa_You_Mo)

受教育程度高的階層的這種新的自我實現觀念確實提升了很多人的幸福度，但離婚的流行也使一些人淪為犧牲者，我們都認識這樣的人。在我看來突出的情況是：丈夫為自我實現而另尋佳偶，被拋棄的妻子因而與她的子女分離；妻子為自我實現而另尋佳偶，被拋棄的丈夫因而與他的子女分離。那些最看重自我實現的人無疑會編出一些為自身辯解的敘事。但是，即使在離婚率下降之后，離婚給社會規范造成的影響也未消失。對那些受教育程度高的單身人士而言，無論出于什么原因，“在形成穩定關系前不生孩子”這一道德家庭的規范已經失效了。如果自我實現需要一個孩子，那就生一個，至少在西方社會是這樣。在這方面，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不一樣。在日本，養育“用來炫耀的孩子”的壓力比西方社會大得多，所以單親家庭無法和雙親家庭競爭。因此，受教育程度高的日本單身女性更傾向于養寵物，而不是無法讓自己感到驕傲的孩子。[[3]](#_3_Wo_Yao_Gan_Xie_Yan_Jiu_Ri_Ben)

夫妻會細心照顧下一代，但不會這樣對待上一代。在道德家庭里，老年人通常在中間一代的家里或附近得到贍養。我寡居的祖母住在她一個孩子的隔壁，我喪偶的外祖父和他的兩個孩子住在一起。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有個伯伯一直住在隔壁臥室。像這樣的家庭結構目前仍在一些社區存在，但已經不常見了。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與其子女同住的情況變少了，不僅如此，此前父母可能從子女那里得到一些經濟支持，而現在主要則是父母在支持子女。在一定程度上，這反映出受教育程度高的退休者更富有了，但祖父母與父母之間的一種新的代際合作也鞏固了這一趨勢，他們的共同目標是養育成功的第三代。具有目的性的開明自利敘事曾經強化了道德家庭中的互惠義務規范，而由于上述情況的發生，這種敘事變得不再符合事實：對子女履行義務不再意味著成年子女應對年邁父母履行同等義務。

同樣，在核心家庭范圍之外，相互義務也在減弱。家庭規模縮小，高技能水平人士在不同地域間流動，在這兩種壓力下，大家族萎縮了。我再舉一個極端的例子說明這一變化。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我家方圓8公里以內住著12位姑伯姨舅，而在我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周圍沒有一個這樣的親戚。道德大家族已讓位于王朝式的核心家庭。

當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成為一個階層后，他們發展出了一種新式家庭，恢復甚至強化了一些互惠義務。我們能從數據中看到這一模式。1965年，這個階層的婚外子女很少見，僅為5%，如今該比例依然是5%。[[4]](#_4_Wolf__2013___p__236__Zhe_Shi)離婚率經歷最初的上升后已經下降，到2010年降至六分之一。因為婚外子女很少，離婚也少，所以在受教育程度高的群體中單親家庭的比例也回到了很低的水平，現在降回到十分之一以下。

這種通過個人成就來實現自我的新倫理有一些負面影響，但與受教育程度低的階層所受沖擊造成的影響相比，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 底層受到的沖擊

就像硅谷的技術人士預測新形式的社會聯系將減少仇恨一樣，人們也曾預測避孕藥和墮胎將減少父母不想要的孩子。數據顯示，受教育程度較低的那一半青少年女性的性行為因此大增。1960年代她們中只有5%在16歲之前發生性行為，到2000年已上升到了23%。相比而言，即使到了2000年，順利從高中畢業的女生中也只有11%在成年前發生過性行為。[[5]](#_5_Ibid___p__183)

但是，只有當事人心懷謹慎的遠慮，避孕藥才能阻止懷孕，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有這種遠慮。事實證明，墮胎這種決定盡管與追求個人實現的新倫理信念體系不沖突，卻與強調家庭義務的舊體系格格不入，所以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也更易接受墮胎。由此造成的結果是，在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群中，少女懷孕的情況激增，而她們與男方無法結成持久關系。這樣的“少女媽媽”有四個可能的選擇。一種是舊模式，嫁給孩子的父親——奉子成婚有長久的傳統。另一種也是舊模式：她和嬰孩繼續與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我的曾祖母就是靠這種方式在村子里生活的，沒有遇到任何可怕的后果。第三種選擇是模仿一些高知女性追求個人實現的新模式，做單身母親獨立生活，父愛主義國家會為她們提供資金支持和社會性住房。最后一種選擇是開始一種同居的新模式：與意味著公開承諾的婚姻相比，孩子的父親往往更愿意同居。當然，不結婚的男女也能維持穩定關系，但大多數同居都不能演變為持久關系；同居關系平均只能維持14個月。[[6]](#_6_Putnam__2016___p__67)

底層受到的最后一種沖擊是經濟沖擊。隨著制造業衰落，中年男性失業。許多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從未接受過強調自我實現的新倫理，許多夫妻繼續持守道德家庭的規范：丈夫是一家之主，他的權威來自他養家糊口的角色。這個角色會導致人們產生一種令人難受的看法：一旦在工廠里成為多余的人就意味著在家里也是多余的人了。原本婚姻是相互尊重的緊密網絡，現在卻變得不對稱了；妻子依然保有自己的尊嚴，但她的存在卻會加重丈夫喪失尊嚴感的情緒。有時丈夫會采取暴力，試圖以此恢復權威，有時丈夫則會陷入消沉。這些情況都會導致離婚。[[7]](#_7_Eliason__2012)

這一情況也有數據為證。與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情況一樣，受教育較低的人群起初離婚率上升。但與前者相反的是，后者的離婚率一直上升，到2010年達到每三對夫妻就有一對離婚，是前者的兩倍。

道德家庭對兒童負擔的義務被父愛主義國家以“兒童權利”的名義取代。由親生父母從出生撫養到成年這樣的權利并不包含在這些新權利中。相反，“兒童權利”要求，如果有理由認為兒童遭到虐待，政府有義務把兒童從親生父母身邊帶走。一些父母殺死自己孩子的案件被廣泛報道后，政府的這一義務被逐步鞏固。例如，在美國，假如醫生發現孩子身上有傷，除非能確認那不是父母造成的，否則就有義務向政府部門報告，政府部門則有義務把孩子從父母身邊帶走。但相應地，“兒童權利”要求只有在滿足最高標準的情況下，有意愿的家庭才能收養這些兒童，這就又意味著要經過繁瑣的官僚化審查程序，以確保政府部門做出的任何改換撫養權的決定都不會遭到公眾的批評。把兒童從親生父母身邊帶走的情況很多，孩子成功遷入新家庭的情況則較少，所以不可避免的結果是，越來越多的兒童處在進退兩難的境地。目前在英國有7萬名這樣的兒童。實踐中，這樣的情況意味著政府得出資請其他夫妻暫時養育孩子，孩子往往要不停地變換寄住家庭。很明顯，這種方式不符合撫養兒童必須滿足的重要條件：兒童需要真實的愛，而這種方式形成的是一種半商業化的關系；兒童需要持久關系，而這種方式形成的關系顯然是暫時的。而且這種關系無法讓兒童產生歸屬感。

### 社會分化的后果

這種選擇性的家庭義務失效對兒童的影響最為深遠。這些影響在美國表現得最明顯，而歐洲未來也可能在文化上步美國的后塵。在美國，現在有超過一半的兒童可能要在18歲以前經歷單親家庭的生活。[[8]](#_8_Putnam__2016___p__70)正如前面的分析所顯示的，這一現象在很大程度上因階層而異。在美國社會上層——受教育程度高的那一半家庭里，家庭對兒童的義務基本上被恢復和增強了。相比而言，在另一半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家庭里，單親兒童或孤兒已是司空習慣，占該階層兒童群體的三分之二。

這會造成影響嗎？不幸的是，會。盡管存在著反對污名化單親家庭的合理、有力的呼聲，但目前嚴謹的社會科學研究已經證明，由親生父母全程共同撫養會使兒童成長得更好。[[9]](#_9_Ibid___p__78)現在很多兒童連單親家庭也無法擁有了。撫養兒童的責任日漸從父母的肩上轉向政府的手中。但由社會充當家長的做法歷來效果很差。這并不奇怪，政府提供的撫養，無論是在孤兒院里還是在寄養家庭中，都存在著一個弊端：有些東西“用錢買不到”［就像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Sandel）在其他情境中描述的］。花錢請人照顧兒童可以作為輔助手段，但無法替代父母的作用。

一方面，在受教育程度較低的那部分人中，許多家庭正在解體，成為空殼，另一方面，在受教育程度較高的那部分人中，王朝式家庭正在激增。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采用的精心培養的新育兒方式大大增加了父母的投入，這些家庭的子女與父母展開密集、具有目的性的互動，這樣的教育方式是以前的兒童從未享受過的。

隨著日積月累，精心育兒的做法造成了結果的差異。這種差異很早就開始顯現了。事實上，目前認為兒童的學前經歷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根據6歲兒童的情況，我們已經能預測經過10年學校教育之后兒童的不同表現。簡言之，家庭在兒童入學前幾年里的教育比學校負責的12年教育更重要。

其中的區別源于父母的不同目標和實現目標的不同教育方式。經濟拮據的單身父母壓力更大，他們的首要考慮不是精心育兒，而是應付生活中更平常的混亂。本身就輟學過的父母更喜歡要求孩子服從而非自立，兩種要求對應的父母比例達到4:1；而接受過研究生教育的父母恰好相反。研究發現，父母因壓力而采取的這種教育方式會損害兒童非認知能力的發展，而我們現在知道這種能力至少與認知能力同樣重要。[[10]](#_10_Heckman__Stixrud_and_Ursua)但認知能力也在嬰幼兒期就開始分化。最早被測知的差異是語言能力：精心育兒意味著會和嬰幼兒講話。一項著名的研究發現，到孩子上幼兒園時，不同群組在語言經歷方面的差異達到1,300萬個單詞。兒童聽到的這些單詞本身也有差異：高知人士對孩子說的話里，鼓勵性詞匯是打擊性詞匯的8倍；靠救濟生活的父母則只有4倍。然后是閱讀方面的差異。父母給孩子讀書可以促進兒童成長，這是影響兒童入學時能力的最大因素。當然，還有金錢方面的差異。隨著教育方式向精心育兒的做法轉變，教育開支大幅增加。但自1980年代以來，位于收入排名前十分之一的美國家庭在這方面的平均花費翻了個倍，達到6,600美元，而收入排名后十分之一的美國家庭平均的教育花費則降至750美元，而且這一差異在決定性的學前階段表現得最大。

在兒童上學期間，這一差距繼續不斷擴大。在美國，到2001年，這兩個收入群組的兒童在數學與閱讀水平方面的差距比上一代人拉大了約三分之一。不僅這一趨勢仍在延續，而且推動該趨勢的原因始終沒變：兩種家庭之間的深層差異。

受教育程度高與低的兩個階層之間的這種分化造成的最顯著后果是最近羅伯特·帕特南在關于美國兒童的一項具有開創性意義的研究中發現的。他根據兒童認知能力將其分組，然后分析了他們上大學的可能性。當然我們可以預料，受教育程度較高階層的子女上大學的可能性更高，因為他們可能繼承了更高的認知能力。但帕特南發現，即便是該階層的子女中認知能力排名全國最末的那組，他們上大學的可能性也比父母受教育程度較低，但認知能力位于全國前列的子女們更高。新的精心育兒法不僅培養出了值得炫耀的孩子，還培養出了華而不實的孩子。

社會不平等加劇、社會流動性下降的趨勢是近年來出現的，統計數據基本上反映了從我這一代到之后一代這段時間里發生的變化。但最令人擔憂的消息是，這些已經被觀察到的變化很可能大大低估了社會不平等的真實固化程度。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在一本引人注目的新書里研究了家庭間的不平等連續多代的傳遞，書名很幽默——《兒子照常升起》[[Ⅱ]](#_II_Shu_Ming_The_Son_Also_Rises)。[[11]](#_11_Clark__2014) 通常人們只會通過比較前后兩代人來衡量社會階層流動性，但他偶然發現了一個巧妙的辦法：利用罕見姓氏可以輕易地追溯幾百年間的變化。顯然，這樣追溯起來通常是男性一線，而在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男性確實扮演著一家之主的角色。他發現，家庭的成功具有高度的持久性，通常可以持續幾百年。克拉克發現，評估社會流動性的傳統做法，也就是基于前后代傳遞的方式，無法解釋這種持久的不平等狀況，而他為這種持久性提供了一個合理的解釋。一些資產被代代相傳而未被消耗掉，它會是什么呢？金錢財富不大可能以這種方式代代傳遞：出一個敗家子就能把家財敗光，俗話說的“富不過三代”就是基于這個道理。他把原因歸結為兩種無法被消耗掉的資產。一種是基因，但是基因遺傳雖很重要，經過幾代人之后特別有用的基因就很可能會被婚姻稀釋。另一種可能性是克拉克所說的家族文化。家族文化是一種簡略的說法，詳細來說，就是一定的信念體系所包含的規范和敘事，它們塑造了作為網絡化群體的家族成員的行為模式。一家之主作為家族的核心可以促成這種連續性。我們知道，作為精英的父母會花大力氣把自己的文化傳給后代，[[12]](#_12_Bisin_and_Verdier__2000)而且他們尤其重視的可能是那些有助于成功的特質，盡管具體的特質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變化。

也可以用追溯罕見姓氏的方法來衡量社會另一端的情況——一代代被困在社會底層的家族。克拉克發現了同樣的多代固化的情況：失敗一代代地傳遞。因為子女并不繼承父母的債務，所以財富匱乏的代際傳遞并不能合理解釋他們的失敗。事實上，在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大多數人沒有金錢財富，所以他們都沒什么好繼承的。

克拉克解釋了為什么基于相鄰兩代人的情況衡量社會流動性的傳統方式可能高估了社會流動性。為了突出要點，我們簡單說。假設每一代的成功只取決于兩個要素——家族文化和運氣，每一代都繼承一種家族文化，而運氣是隨機決定的。假如家族文化被完整地傳遞給后代，那么社會流動性的唯一來源就是運氣。但我們拿后續任何一代人與第一代人作比較時，運氣變化的概率都是相同的，無論是第二代還是第十二代。在這個我們為了說明方便而夸張化的例子里，第一代與第二代之間的社會流動性，可能和第一代與第十二代之間的相同。只衡量前者，可能讓人誤以為社會流動性很高。

### 重建道德家庭？

道德家庭的某些方面是權力與欺凌關系的拙劣偽裝，扔掉這些東西再好不過。但從中“解放”出來的很多不過是偽裝成自我發現的自私。與此類似，一邊以功利主義態度關心“全世界的窮人”，一邊否認對家庭的責任，這并不是什么道德覺醒，而是為了擺出道德姿態而獲得的廉價快感罷了。狄更斯在《荒涼山莊》（Bleak House）里通過描繪杰利比太太（Mrs Jellyby）這個人物諷刺了這種態度。

更根本的是，通過個人成就實現自我的倫理觀壓倒了對家庭履行義務的倫理觀，現在從心理學角度看起來具有缺陷。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在極具顛覆性的著作《通往人格之路》（The Road to Character）中，從常見的對前一種倫理觀的奉揚開始，然后筆鋒一轉，提出未來的趨勢是通過履行對他人的義務來實現自我的倫理觀將會恢復。[[13]](#_13_Brooks__2015)“我們通過關注自己來發現自己”這一誘人命題，被一個強有力的相反敘事所反駁。表達后一種敘事的最佳范例也許是迪特里希·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的《獄中書簡》（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那是他在等待納粹殺害他時的內心獨白。他寫道，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在其他人的斗爭中“失去自我”，以這樣的途徑來發現自我。自由不在于為自我服務，而在于逃離自我。社會心理學領域的新證據支持朋霍費爾和布魯克斯的觀點。我們因缺乏個人成就感到的遺憾與我們因未能履行義務感到的遺憾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杰出的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對人如何獲得幸福進行了持續的研究。他的結論很明確：“假如你只關心成就，你就得不到想要的幸福……密切的人際關系雖不是生活的一切，但卻是生活的核心要素。”[[14]](#_14_Seligman__2012)這樣看來，“主張權利的個人”取代“道德家庭”與其說是勝利，不如說是悲劇。

與上面完全不同的是，經濟學領域的一項重大突破表明，“變弱”可能意味著“變強”。一個人也許有必要放棄一些權力，以便做出可信的承諾，并從中獲益。能夠做出承諾是開明自利的特征。說得花哨點就是一種“責任手段”解決了“時間不一致性問題”。該技術的發現者們獲得了諾貝爾獎。解決通脹問題的責任手段是讓央行獨立，解決兒童撫養問題的責任手段是婚姻。矛盾的是，在同一段歷史時期里，西方社會確立了制服通脹的責任手段，卻系統性地摧毀了確保兒童有權被親生父母養大的責任手段。就像政治化的央行能通過印鈔在短時間里制造虛假的經濟增長一樣，摧毀婚姻的紐帶也制造了虛假的解放感。在許多西方國家，婚姻與宗教的關系令它染上了污名，所以我們需要一種純粹世俗性的婚姻論。這并不是什么革命性的新思維：在所有西方國家，基督教化之前就有婚姻，而且宗教與世俗形式的公共承諾可以毫無沖突地并存。這兩種情形中，責任手段的力量都源于公開明確地接受相互義務：尊嚴感和恥辱感是責任手段所憑依的力量。之前說過，責任手段符合其使用者的自身利益。就像前文所舉的例子，這也是一種“開明的”自利，也就是說，它為服從注入了使命感。一旦人們理解了能帶來自己想要的結果的因果鏈條，共同遵從就會成為理性行為。就像開明自利可以補充和鞏固其他互惠義務一樣，經濟學揭示公共承諾的價值，心理學揭示履行這些義務的價值，它們都具有補充作用。

這兩種學科的洞見結合起來可以有力地對抗通過個人成就實現自我價值這種有些枯燥的愿望。但這樣做不足以應對家庭領域縮小、道德大家庭轉變為王朝式核心家庭的新現實。如何應對這些情況呢？幸運的是，技術進步帶來的一個重大成果可以抵消這一趨勢的影響，那就是壽命的延長。[[Ⅲ]](#_III_Wo_Dui_Zhe_Yi_Qian_Jing_Yue)家庭雖然在橫向廣度上縮小了，但在縱向深度上擴大了，許多家庭現在是四世同堂而不是三代同堂。在這樣的家庭里，最年長的一代下面有很多家人。如果每一代人有兩個孩子，那么任何一個活著的曾祖父或曾祖母下面的三代里，將有四個核心家庭和二十個家人。這些家長不一定要退出家庭事務渾噩度日。可以讓他們發揮重建尊重的力量，監督大道德家庭里的人履行義務。

### 基于個人經歷的附言

10年前，我和妻子面臨著一個道德抉擇。我堂兄剛出生不久的孫子和孫女在命運分化的道路上又前進了一步，被父愛主義國家“撫養”（這是奧威爾式的委婉用語）了。由于當前英國新一代教育精英的習慣做法，我們沒有面臨任何要接納這兩個嬰孩的社會壓力，相應地，我的家族也并不苛求我們擔負責任。我希望我能說我們當時是毫不猶豫的。現在回想起來很難重現當時細微的想法，但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是，假如我父母在世的話，他們會期待我們怎么做。去世后的他們依然會給我們巨大的道德壓力，要求我們自尊自重。另一個有力的影響是，由于長期接觸非洲文化，我們很尊崇非洲式的道德大家庭風俗。幸運的是，這在政府那里不難辦，因為新的立法規定，遠親可以繞過折磨人的收養申請程序，通過簡便程序收養兒童。由于政府和家族意見的一致，我們只用了八個月（孩子人生中最初的幾個月是最關鍵的）就辦完了填表、審查、付費等手續。那一年，在這個有6,500萬人的國家，只有60名兒童經標準程序被收養。這也是為什么現在英國有7萬名兒童被暫時寄養，陷于進退兩難的境地，而且這個數字每年都在上升。

兩個小家伙到我家時，我們的非洲朋友們的反應是聳聳肩表示“歡迎來到我們的俱樂部”。英國朋友們則說我們“很大膽”，這是在以電視劇《是，大臣》（Yes Minister）里的方式暗示“你們會后悔的”。現在十年過去了，我們不僅沒后悔，反而更清楚了自己對家族的義務。我們的這種做法在非洲很正常，西方社會也應該這樣。但若是在一個富裕且有道德的社會里，我們的行為應該是天經地義的才對。

[[Ⅰ]](#_I_4)向少數缺乏幽默感的讀者解釋一下：這句借用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的名言的話只是在開玩笑。雖然我們的長子的確有“用來炫耀的孩子”通常所擁有的條件，但假如他聽到有人說他的成就在任何意義上是拜父母所賜，他一定會義憤填膺、不肯相信，他有這樣的態度也是有充分理由的。

[[Ⅱ]](#_II_5)書名The Son Also Rises，模仿了海明威的名著《太陽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譯者注

[[Ⅲ]](#_III_4)我對這一前景越來越樂觀。

## 第六章 道德的世界

道德的世界會是什么樣子？意識形態分子們各有各的想法。功利主義的意識形態會要求一個父愛主義的全球政府負責安排財政轉移，以實現“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對于聯合國關于“人權”的主張，羅爾斯主義的職業法律人變得越來越有影響力。情緒激昂的民粹主義者也加入了這場喧囂：有心無腦群體的代言人之一安吉麗娜·朱莉（Angelina Jolie）說希望“全球和平”。

假如我們換一種做法，應用第二章講述的核心原則，就能設想一個類似于道德國家、道德企業與道德家庭的道德世界。

原則1 承認對其他社會的非互惠性義務——援救義務。這包括對如下主體的義務：難民等群體，面臨大規模絕望的社會，以及缺乏基本正義的社會。

原則2 在那些愿意在原則1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的國家之間，建立更深遠的互惠義務。

原則3 這種互惠性的基礎是各方承認同屬于一個集體，該集體基于共同的目的性行為，這些行為會增進所有各方開明的自我利益。

1945年的國際局勢與這樣一種道德世界相距遙遠。當時發生了四段漫長的噩夢。在我父母那一代，三分之一的人生都活在世界大戰中。他們出生時全球經濟繁榮，接著就經歷了全球經濟的崩潰，各國競相投機取巧，推出以鄰為壑（beggar-thy-neighbour）的保護主義政策，最終導致各國都陷入貧困。他們經歷了一段帝國時代，有英帝國、法蘭西帝國、俄羅斯帝國、日本帝國、奧匈帝國、葡萄牙帝國、比利時帝國、德意志帝國和意大利帝國，這些帝國在道德上荒唐至極，最終被這種明顯的荒唐壓垮，轟然倒塌。他們還經歷了法西斯主義等意識形態造成的恐怖，這些意識形態在德國、俄國、西班牙和意大利掌權。除了這些前人遺留下來的災難之外，二戰的結束曾帶來了兩個新的變故：咄咄逼人的共產主義政權已經控制了全球約三分之一的地方，并試圖進一步控制全世界；緊接著便是中歐混亂，導致大量難民出現。

可以設想，當時的政治領導人心中有一種極強烈的想法：“現在不是建設道德世界的時候。”但他們還是開始用上述三個核心概念來構建一個道德世界。他們承認對其他社會負有義務，也即援救義務，并開始履行這些義務，無論對方對此有無回報。他們開始建立為實現特定目標服務的新俱樂部，以開發國家間互惠義務蘊藏的巨大潛力。他們用因果關系敘事鞏固了這些俱樂部，這些新敘事倡導開明自利，而不再是投機取巧追求眼前私利。這是令人震驚的成就，而且取得了回報：世界逐漸向更好的方向轉變了。

但下一代幸運的領導人繼承了這項成功的遺產，卻沒有領會創造這一成功的過程。前代人通過明智的實用主義從浩劫的廢墟中建起成功的大廈；功利主義和羅爾斯主義意識形態分子用誘人的敘事取代了明智的實用主義，逐漸破壞了前代人的遺產。與1945年的世界相比，當前的世界距離道德世界近得多，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本章將依次論述前人取得的非凡成就，其遺產被破壞的過程，以及未來的任務。

### 建設一個道德世界

1945年各國領導人最重要的洞見是不能任由單個國家采取機會主義行為了，必須通過各國間的壓力來使共同義務得到執行。但這種壓力產生的前提是各國認可一個共同身份，這在1930年代是缺失的。他們逐漸建立了新的俱樂部，其成員愿意接受互惠義務；圍繞著有目的的行為，出現了共同的歸屬感。

最大的當務之急是世界和平。針對蘇聯制造的恐懼氣氛，1949年，一個新的俱樂部成立了，那就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它的核心原則是成員國相互保證安全。成員國共同身份是面臨共同威脅的民主國家聯盟。當時有少數幾個搭便車國家，但一種非常可信的開明自利敘事鞏固了這一新義務：合則生，分則亡。令言行保持一致的關鍵時刻是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和1980年代初巡航導彈的部署。新的互惠義務成功維持了和平，與此同時，共產主義陣營的許多內部沖突逐漸積聚起來。

盡管蘇聯是新的威脅，但在歐洲內部，依然有德國這個舊的恐懼。法國在短短70年里和德國打了三場生死大戰。盡管選擇開明自利的必要性很明顯，但幾次戰爭遺留的仇恨仍是阻礙因素。解決方案是從1951年開始，各國務實地緩慢推進，穩扎穩打，共同成立了歐洲經濟共同體（EEC）。和北約一樣，這個俱樂部的核心原則是接受互惠義務。

為了防止1930年代以鄰為壑的保護主義重演，另一個俱樂部形成——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形成了。1947—1964年，關貿總協定完成了六輪互惠性貿易自由化談判，其中的關鍵驅動力依然是開明自利，所有人都清楚保護主義將導致何種惡果。

為了避免1930年代的大蕭條重演，又一個新的國家俱樂部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是一家公共銀行，有明確的成員界定，由各成員國出資并共同承諾遵守一套規則和監管機制；作為回報，成員國在發生危機時有權獲得貸款。這本質上是一個巨大的互助保險系統。

作為這些俱樂部共同基礎的互惠原則又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所增強，該機構的目的是在共同體內部創造壓力。它通過排名［如評價教育表現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排名］和各國相互間的政策審議鼓勵對各國表現進行比較。

這些追求特定目標的俱樂部每一個都有明確和有限的成員，團體內部既有互惠義務，又奉行可信的開明自利，憑著這些，它們逐漸改變了世界。每一個俱樂部都按自己的速度結出果實，但它們積累起來的成就令人震驚。

1989年，在北約的壓力下世界大變，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在歐洲內部，歐共體逐步將西班牙、希臘、葡萄牙等國納入民主體系，同時深化貿易一體化，使較窮的成員國能追趕上較富的成員國。1986年關貿總協定完成最后一輪談判，為隨后創造巨大經濟效益的全球貿易擴張打下了基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阻遏危機，在這整個時期里，其規模最大的救助是針對1976年陷入政治危機的英國。當時《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文章《再見了，英國，很高興認識你》，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救助挫敗了該文的預言。英國之所以得救，是因為凱恩斯及其他前一代的英國官員為應對這種不測之災而創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揮了作用。他們應當被視為國民英雄。

除這些以互惠義務為基礎的俱樂部外，各國領導人還成立了一些旨在履行援救義務的新組織。在這方面他們也很明智。他們不是讓個別的富裕國家親自履行援救義務，而是成立全球性機構，利用富裕國家之間的互惠原則來執行新的規范——讓富裕國家履行對其他國家的義務。為向難民提供幫助成立了聯合國難民署，為在饑荒期間提供糧食成立了聯合國糧食計劃署，為改善最貧困社會的衛生狀況成立了世界衛生組織。但集體行動的最高成就是世界銀行。世界銀行的成員國分為兩組：彼此約束對方繳納資金的富裕國家，和接受這些資金的貧窮國家。

當時，各國為履行援救義務發起了史無前例的集體行動，這些高尚的行動與互惠義務的增多相得益彰。大家對應當集體履行這些援救義務沒有質疑，回頭來看，這一點令人贊嘆。

除了新的俱樂部和履行援救義務的機構外，1945年的各國領導人還重建了一個初具規模的世界政府，一個世界各國的聯合體。聯合國取代了一戰后成立的、因遭遇失敗而不復存在的國際聯盟，其中的聯合國安理會負責維護世界秩序。盡管代表著巨大的美好愿望，但聯合國與國際聯盟一樣在絕大多數時候是起不到作用的。安理會有五個常任理事國，因為范圍足夠小，所以本應可以形成互惠安排，但美國和蘇聯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極端對立，使這五國無法相互信任，而相互信任是開明自利的前提。無心插柳柳成蔭，聯合國取得的最大成功是它變成了一個被排斥國家的俱樂部：那些在俱樂部組織中缺乏有效發言權的國家組成了77國集團。

### 道德世界的衰落

這些俱樂部以忠誠與公平規范為基礎，憑借互惠性而發揮作用。隨著意識形態取代實用主義，這些規范也被“怪異者”（WEIRD）崇尚的關愛與公平規范取而代之，他們進而要求把所有想加入的國家都納入進來。為了回應這一崇高的抱負，這些俱樂部的成員增加了，雄心也膨脹了。

北約東擴，從最初的12個成員國發展到目前的29個。最初的北約有一些真實的互惠性元素，但東擴實質上相當于把美國提供安全保證的范圍擴大到一些缺乏軍事實力的國家。最初有6個成員的歐共體擴大為有28個成員國的歐盟。共同規則的范圍大大擴張，從只涉及貿易和民主擴展至公共政策的大多數方面。關貿總協定演變為世界貿易組織（WTO），其成員幾乎囊括了全球所有國家，共同規范的領域也相應地大幅擴張，延伸到農業、服務業和知識產權。同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也擴充到幾乎囊括全球的程度，組織的職權范圍也擴大了。

隨著這些原本邊界明確的組織一步步擴大，原本確保互惠義務執行的內部凝聚力開始減弱。[[Ⅰ]](#_I_Ying_Guo_Zheng_Fu_Te_Bie_Re_Z)在這種情況下，這些組織要么效率降低，要么轉變成由核心成員控制的準帝國，通過對從屬成員施加懲罰來執行規則。一些組織走了前一條路，另一些走了后一條。

先看走上低效之路的組織。在北約內部，即使在初始成員國之間，協同行動的情況也減少了。北約規定成員國的防務開支應占GDP的2%，現在的29個成員國里只有5個達到了要求。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對維護北約的意愿開始減弱。但是，從高效俱樂部退化為覆蓋全球的低效組織的典型例證其實是世貿組織。關貿總協定在成立后的17年里完成了六輪共同貿易談判，而世貿組織運行23年來連一輪談判都沒有完成。

再看看更具爭議性的走向帝國之路的組織。歐共體擴大為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從一個為自身成員服務的共同銀行擴大為一個為貧窮國家服務的全球性基金，它們都變成了準帝國組織；一些政府通過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對其他政府指手畫腳。在歐盟內部，曾促使成員國為追求使命而自愿遵從的開明自利已經退場，取而代之的是覆蓋廣闊領域的指導性規范。這些規范由一個內部團體設置并執行，該團體目前與三組索求者爭執不下：東部成員國、南部成員國和英國。我不想對這些規范做出評判，也不想夸大這場變化的影響。在其他方面，歐盟仍是一個極有價值的俱樂部，并有潛力發揮更多作用。但是，歐盟已不再是一個大家毫不含糊地相互支持的俱樂部了，而是在日益變成強國指揮其他國家的組織。

像世界銀行一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變成了全球性基金，而世界銀行的職責本是履行援救義務。就其本質而言，援救義務既不是互惠性的，也不應附加條件。但由出資國組成的核心已主宰這兩個機構，并把義務變成了權力。首先，捐助國要求受惠國必須采用特定的經濟政策才能給予支援，但這個本身就很糟糕的想法很快就被那些擁有強大政治影響力的非政府組織（NGO）挾持了。目前西方援助的條件是受惠國滿足環保與人權方面的標準，這些標準往往很嚴格，連富裕國家也達不到。例如，世界銀行的所有項目都必須經過“環境影響評估”。由于NGO認為水電項目侵犯人權，這些項目已無法獲得融資。連城市道路拓寬計劃也被西方人權活動人士阻止。[[Ⅱ]](#_II_Shi_Jie_Yin_Xing_Xing_Chang)世界銀行在貧窮國家的項目被要求遵守的碳排放標準比高收入國家實行的標準高得多。由于非洲存在嚴重的電力短缺問題，這引起了強烈不滿。[[Ⅴ]](#_V_Yi_Wei_Bei_Shou_Zun_Jing_De_F)和對歐盟的看法一樣，我不想夸大其詞，這兩個機構依然在做很多好事，我們要想更好地履行援救義務，主要還得通過它們。但它們關注的事務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 重建一個道德世界

我們既需要互惠性俱樂部發揮作用，也需要援救義務起作用。我們需要這些俱樂部是因為父愛主義的世界政府既不可能實現，也不值得追求。如果這樣的政府要治理全人類，它必將遭遇普遍的不服從，并走向破產。相比于復興舊的俱樂部，更容易的做法也許是成立一個能反映當前世界經濟與軍事力量分布現實的新的多功能俱樂部。這樣一個俱樂部應該能找到許多機會來構建對全球有益的互惠義務。G20的成員國范圍足夠廣，但在實際運作中它太大，太分散，隨機性太強，因而效率不是很高，而且還受搭便車問題困擾。相比起來G7更小更嚴密，但目前其成員國的組成情況不合理，中國和印度都不在其中。如果中國、印度、美國、歐盟、俄羅斯和日本能組成一個較小的集團，則將囊括全球經濟與軍事實力的主要部分，因此解決全球性問題將符合該集團的集體利益，即使在該集團以外的成員選擇搭便車也沒關系。而且該集團的每個成員都將明白，假如自己選擇搭便車，其他成員也會這么做，由于每個成員的規模都很大，搭便車的成本會變得很高。

成立這樣一個俱樂部將面臨兩項挑戰。一是這六方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同時各自的地緣政治利益存在沖突。但是，由于氣候變化、流行疾病、脆弱國家等全球性問題的存在，它們的共同利益將日益增多。它們也將認識到彼此的共同特征：它們，也只有它們，具有足夠的規模能集體解決這些問題，同時這種規模也使它們無法搭其他人的便車。另一項挑戰是，有心無腦的理想主義者可能會反對：被排除在外的國家怎么辦？但是，有這么一個成員數目足夠少，從而可以克服世界集體行動難題的集團，對被排除在外的國家是很有利的。只要六方非正式地同意每一方都必須采取行動，其他國家也可以加入承諾。這六方差異極大，所以他們幾乎不可能就某件對集團外所有國家都不利的事達成一致。我們就需要這么一個新俱樂部。它需要很多年才能建立，但我們現在必須就重大的全球問題采取有效行動，在這個基本邏輯驅動下，這個結果可能會逐漸實現。

除俱樂部外，我們需要能更有效地履行援救義務的組織。這是我關注的領域：我成年后一直致力于促使富裕國家的民眾接受我們對其他人負有這樣的義務。一直以來我們在這方面做得很不好，嘩眾取寵的誘惑導致了實際工作的低效。這從以下的例子中就能看出。

難民[[Ⅲ]](#_III_Ben_Jie_Ji_Yu_Betts_and_Col)

先看我們對難民的援救義務。目前全世界有6,500萬人因恐懼或饑餓逃離家園。其中的三分之一已淪為難民。他們奮力想恢復正常的生活：找一個熟悉的地方生活，找個工作養家糊口，與本社區的其他人聚居同處。這些都是合理的需求，但要鄰國政府滿足這些需求也許有困難。通常情況是，鄰國本身也很窮困，難以滿足難民的需求。

各國和它們的鄰居有著天然的互惠關系，確實對這些鄰居負有可能比非互惠性的援救義務更大的義務。但在發生像難民潮這樣劇烈的大規模災難時，也存在著一種全球性的援救義務。作為避風港的鄰國如果發現世界任由他們孤軍奮戰，他們就有理由抱怨。盡管鄰國應該允許難民入境，但你更富裕：你們雙方應該能夠形成合作，既履行他們對鄰居的義務，也履行你的援救義務。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同時以愛心原則和理智原則為指導。愛心原則要求我們與處在危機邊緣的社會保持團結，理智原則告訴我們，應該根據我們的比較優勢來劃分各自的責任。

通過思考得出的解決方法并不復雜。由鄰近社會提供避風港再合適不過，它距離更近，所以往返容易，而且它可能與難民的原住地更相似，從而能夠提供一個熟悉的環境。我在寫這一段時，委內瑞拉難民正在向鄰國哥倫比亞遷移。富裕國家擁有可以帶去就業機會的跨國企業，還擁有幫助難民家庭度過適應期、重建自立能力，以及補償接收國的財力。近年來的難民政策已陷入混亂，未來我們應該采取這樣的策略。

HIV病毒感染者[[Ⅳ]](#_IV_Ben_Jie_Ji_Yu_Collier_and_St)

通常，一個社會內部的互惠力量會催生對同胞的義務，這種義務強于我們對外國人的義務。但有時，我們對別國一些公民的義務會強過該國同胞對其所負的義務。貧窮國家的HIV感染者就屬于這一類。在現代抗逆轉錄病毒藥物的幫助下，HIV感染者可以正常生活很多年，平均每年的花費不到1,000美元。值得給予道德贊譽的是，法國前總統希拉克和美國前總統喬治·W. 布什認識到，這正是他們應該履行的援救義務。沒有這筆錢，成千上萬的可以確認的非洲窮人將面臨迫在眉睫的死亡。希拉克和布什覺得兩國有足夠的財力來做這件拯救生命的事，民眾將會集體同意掏這筆錢。

那么“怪異者”（WEIRD）們的反應是什么？滿腦子功利主義意識形態的衛生經濟學家反對這么花錢。他們完全忽視援救義務的道德必要性，而認為用這筆錢來對一系列其他疾病進行預防性干預，從而小幅降低這些患者的死亡率，可以讓被救者多活的總年數變得更多。任由非洲感染HIV的人死去更具成本效益。同時，有心無腦的民粹主義者對另一種明顯的拯救生命的做法感到不安。HIV通常通過性行為傳染。如果能說服人們不要保持多個性伴侶，傳染率將馬上大幅下降。烏干達總統穆塞韋尼（Museveni）通過全國廣播告訴人們這一點，就實現了這個效果。但呼吁人們改變行為的運動遭到了反對，因為這樣的運動可能讓人誤以為HIV感染者可能對自己行為的結果負有某種道德責任，從而導致他們被污名化。記得前文說過的嗎？在這些人看來，受害者絕不能是道德行為的主體。

援救大規模絕望者的義務

目前，很多非洲年輕人憧憬一個美好的未來——逃到歐洲。這是個悲劇。作為解決大規模絕望的方法，這顯然行不通，而且最聰明最有能力的人外流通常只會讓貧窮國家的問題變得更深重。在一個道德世界里，每個社會都應該能讓年輕人對未來產生可靠的憧憬。富裕國家的責任不是引誘少數聰明的年輕人前來，生活在富裕國家社會的邊緣，而是要把機遇帶給留在貧窮國家的大眾。

所有的援救義務都要以尊重被救者為起點。援救是要讓人重新自立自強，而不是向其強加權威。國際支援不能把一大堆社會與政治條件奉為神圣箴言推銷給貧窮國家，而是要致力于吸引道德的企業進入急需這些企業的社會，同時限制腐敗企業的活動。脆弱國家急需現代企業所能提供的就業機會，但絕大多數正派企業因為這些市場規模小、風險高而不愿去。為改變這一狀況，應該用公共財政資金補償給貧窮國家創造就業機會和公共福祉的企業。2017年，世界銀行和英國率先使用補助來支持各自旗下的機構——國際金融公司（IFC）和英聯邦開發公司（CDC）來與企業展開合作。有心無腦的民粹主義者對此感到震驚，他們認為應該把援助資金用在他們看重的那些最上鏡的事情上。

### 總結

把頭腦與愛心結合起來可以指導我們具體應該成立什么樣的新的互惠性俱樂部，從而應對迫在眉睫的全球性焦慮，并為需要援救的人提供有效的救助。二戰后那一代全球領袖面臨的形勢遠比今天危險，但他們同時實現了這兩個目標，送給后人一個雖遠算不上完美但卻得到顯著改善的世界。他們的后繼者坐擁這份遺產，卻沉溺于意識形態和民粹主義。結果是國際俱樂部弱化，援救義務變味，我們正在為此付出代價。但只要回到實用主義的思路，我們不僅能重建道德世界，而且能使它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好。

[[Ⅰ]](#_I_5)英國政府特別熱衷于擴大歐盟，就是出于這個原因。

[[Ⅱ]](#_II_6)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向我表達了他的沮喪之情：一些投機分子事先占據為道路拓寬所準備的土地，賴著不走；盡管世界銀行承諾給他們可觀的補償，但人權游說組織依然發揮強大的力量阻止了計劃。

[[Ⅲ]](#_III_5)本節基于Betts and Collier (2017)。

[[Ⅳ]](#_IV_4)本節基于Collier and Sterck (2018)。

[[Ⅴ]](#_V_4)一位備受尊敬的非洲國家退休總統向我解釋說：“我告訴部長們，絕不能對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說不，那太危險，但也絕不能把它們的建議付諸實施，我們不能相信它們。”

# 第三部分 重建包容性社會

## 第七章 地域分化：繁榮的大都市，破敗的普通城市

倫敦、紐約、東京、巴黎、米蘭——在西方各國，大都市遠遠地將其他地區甩在了身后，無論是在收入、就業機會、經濟增速還是房價方面，這一裂痕都在擴大。這是從離現在并不遙遠的1980年左右開始的，在那之前，不同地區間的收入差距一直在縮小。美國的情況很典型：一個世紀以來，差距縮小的速度為每年近2%。但自1980年至今，一邊是大都市迅猛勃興，另一邊是其他城市的經濟大幅下滑。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新分析發現，在高收入國家里，過去20年少數最發達地區和其余地區之間的生產率差距擴大了60%。英國的情況也很典型：1977年以來每年人口都從北往南遷移，收入差距持續擴大。1997年，英國除倫敦以外的地區經濟總量是倫敦的4.3倍，到2015年這個數字已經變成3.3倍。

不意外的是，這一切是在新的政治分化背景下上演的。其他地區憤憤不平，而大都市則懷著不屑一顧的自信。美國人把大都市以外的城市蔑稱為“飛機越過的城市”（flyover cities），最近英國《金融時報》政治評論員嘉南·加內什（Janan Ganesh）說得更過分，他稱之為“銬在死尸上的城市”。在這些稱呼里有同情心嗎？有互惠義務意識嗎？人們粗暴地否定同情和互惠義務，以前把大都市與其他地區團結在一起的共同身份不復存在后，這些意識也消失了。反映在現實之中就是，特朗普、英國的脫歐派、勒龐和“五星運動”掀起的反叛運動受到大都市選民的群起反對，但破敗城市卻對他們產生了好感。

那么，推動這場新分化的經濟力量是什么？如何應對這場分化？

### 是什么造成了新的分化

造成這種新分化的力量是基于兩種可追溯到工業革命的簡單關系。一是生產率和專業化之間的關系，通常的說法是“在實踐中學習”（learning by doing）。專注于更少任務的人能培養出更高超的技能。二是生產率和規模之間的關系，通常的說法是“規模經濟”。

為了利用規模經濟和專業分工，人們需要聚集在城市。企業要規模化運營就需要大量勞動者和客戶，并在空間上靠近與自己相似的企業。專業化的勞動者需要在自己工作地周圍有具備互補性專業技能的其他勞動者。人口稠密的城市為所有這些連通性提供了條件。但城市需要向地鐵、公路、高層建筑、機場和鐵路樞紐大規模投資才能實現緊密的內部連通性。1980年代之前，只有歐洲和北美的城市有財力這么做。

連通性能帶來驚人的生產率回報。許多城市密集發展了一大批特定行業的企業，從而使之達到世界領先水平。我的家鄉謝菲爾德就建立了這樣一個由專業鋼鐵制造商組成的產業集群，并為之配備了高度專業化的勞動力隊伍。到1980年左右，與沒有產業集群的其他地方的工人相比，謝菲爾德等城市工人的平均生產率高得驚人。由于收入通常與生產率相一致，這些城市的居民也富裕得多。

從1980年左右開始，兩段恰巧同時發生但截然不同的進程打破了這一狀況，那就是知識爆炸和全球化。知識爆炸導致專業化與城市化之間的舊關系發生劇烈變化，使最大的那些城市出現驚人的發展。全球化為利用規模經濟創造了新機遇，也讓已經建立的產業集群面臨新的競爭，有的便因此衰亡。

知識革命與大都市的崛起

1980年代以來，知識經濟呈指數增長，其推動力有兩個：大學中基礎研究的空前增多，以及與此互補的公司中應用研究的增多。利用物質造福人類的潛力僅受到物理基本定律的限制。我們目前還在這個過程的初級階段，因為復雜的物質世界極難掌握。通過一個個科學發現，我們探索著這個復雜世界，這可能逐漸使生產率發生革命性突破。但人類要憑有限的能力掌握復雜物質世界，唯一途徑是讓能力最強的人變得越來越專業化。15世紀之后，再沒有人能嚴肅地表示自己知道所有已知知識了。今天，最聰明的人會抵達某個狹窄領域的知識前沿，形成極為深入的理解，而相應地會遠離其他領域的前沿。不僅研究是這樣，具有商業價值的技能也是如此。例如，法律越來越復雜，所以不同法律分支變得更精細了。大學的擴張不僅催生研究，而且培養了有能力掌握這類技能的畢業生。

但專業化和城市之間的基本關系仍然符合現實。只有在不同專家彼此靠近的情況下，高度的專業化才會創造效率。因此，隨著專業化程度提高，能互補的專家也要結成更大的密集群落，相應地，附近要出現更大的潛在客戶群。在倫敦，一名專業律師與具備其他專業能力的同儕離得很近，與需要他的專業服務能力的客戶離得很近，與法院離得也很近。若是在某個小城鎮，這樣的律師就會大半年無事可做。

職業人士的這種聚集需要大都市提供高度便捷的連通性。英國兩個主要的國際機場都位于倫敦及其周邊地區，倫敦有通往巴黎和布魯塞爾的“歐洲之星”高速鐵路，倫敦是英國所有干線鐵路和大部分高速公路的中樞。倫敦有地鐵：在倫敦市中心，普通勞動者可以在45分鐘內與250萬勞動者中的任何一個見面。倫敦還是政府所在地，所以任何需要與公共政策走得近的活動都最好在倫敦進行。

國際貿易壁壘的消除使企業的潛在市場從全國擴展到全球，高度專業化人士聚集所帶來的好處也因此而提高了。過去，集中在倫敦的專業服務主要以英國為市場，現在則是以全世界為市場。所以，目前的市場支持更專業化的律師，他們的技能和生產率也相應增強了，他們因而賺到了驚人的收入。

大量收入極高的人進而又需要其他人提供的娛樂服務，這又形成了一個服務市場。距離近很重要：餐館、劇院和商店大量涌現，滿足這些錢多、時間少的人五花八門的需求。大都市的燈紅酒綠又吸引了另一批人涌入：全球范圍內的富人。倫敦、紐約和巴黎都有這樣的億萬富翁居民：他們在其他地方發財致富，但在這里享受消費的快樂。

瞧呀（Voila），這就是蓬勃發展的大都市！

全球化革命與非都市城市的衰敗

謝菲爾德、底特律或里爾可不是這個樣子。我記得1960年一位來到謝菲爾德的人說：“天哪，這是一座繁華的城市！”到1990年就沒有人會這么說了。

謝菲爾德在1960年代擁有的那種世界領先企業的集群相對于新競爭對手擁有巨大優勢，但并非堅不可摧。在鋼鐵制造領域，謝菲爾德沒有任何天然優勢。最初謝菲爾德之所以能吸引企業前來扎堆，是由于這里河水湍急，能為磨輪提供動力。到20世紀時，它只剩下了一個優勢：這里有現成的企業和熟練工人。企業之所以設在這里，是因為其他企業在這里。勞動力的生產效率很高，但這也反映在了他們的工資里，所以企業利潤率并不是特別高。

在世界的另一邊，新興市場經濟體韓國正在打造新興的鋼鐵業。韓國在打造自己的企業集群時擁有另一項優勢——價格低廉得多的勞動力。到1980年，在韓國制造鋼鐵已經比在謝菲爾德劃算一些了，于是韓國企業開始在世界市場上超越謝菲爾德的企業。謝菲爾德的鋼鐵業開始萎縮，韓國的鋼鐵業開始擴張。當謝菲爾德的企業集群縮小時，必須彼此接近、相互依賴的企業所獲得的收益（即所謂的“集聚效應”）也變少了。結果是成本上升。隨著韓國的產業集群擴大，它的成本降低了。結果觸目驚心：最早在喬叟（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里就被提及的謝菲爾德鋼鐵業以驚人的速度崩潰了。這些代代相承的熟練工人失業了，沒法再找到一份技術性工作。這場連鎖沖擊造成的人類悲劇引人矚目，被記錄在了電影《光豬六壯士》里面。這部電影以災難為背景，借助辛辣、自嘲的幽默，絕妙地刻畫了這場悲劇。作為謝菲爾德人，我對其中的痛苦感同身受，但很多一度繁榮的城市都發生了同樣的事，例如在斯托克（Stoke），由喬賽亞·韋奇伍德（Josiah Wedgwood）創立的瓷器產業集群崩潰了。而1980年代以來底特律的慘痛經歷更是無與倫比。

這樣的城市能復興嗎？右派意識形態分子相信，只要政府不干預，市場力量就會解決這個問題。遺憾的是，這只是一種意識形態信念。要了解切實的情況，我們需要專家。

市場會對產業集群的崩潰做出反應，但不會以新的產業集群取而代之。最初的市場反應是住宅和商業地產價格的大幅下跌。房屋所有者陷入負資產困境，難以遷到房價高得多的繁榮城市。商業地產價格的下跌確實能吸引一些經濟活動，但都是國民經濟中的低級成分：為當地服務的倉庫，生產率較低、僅在廠房非常便宜的情況下才能生存的制造業企業，依賴廉價辦公場所和低薪臨時工的呼叫中心。當城市里充斥著這樣的經濟活動時，房地產價格和工資水平部分回升，但城市已經陷入了死胡同。這些經濟活動對技能要求不高，所以復雜專業化帶來的生產率持續上升已經與這里的勞動力無關了。[[1]](#_1_Venables__2018a__2018b)大都市里的超級明星企業依然處在科技前沿，所以大都市居民的收入不斷上升，但無論是科技還是收入，都不會惠及破敗城市了。例如，美國的新統計數字表明，高工資、高科技的就業機會日趨集中在最大的產業集群里。[[2]](#_2_Qing_Jian_Jed_KolkoDe_Jin_Qi)用時髦的專業術語說，科技從領先地區到落后地區的擴散速度已經放緩。[[3]](#_3_Zhe_Yi_Ling_Ren_Bu_An_De_Shi)

這就是破敗城市——這里就不用興奮地說“瞧啊”了。

### 應對新分化

上述分析有助于解釋，為什么各發達經濟體內的大都市在蓬勃發展，而許多中小城市卻遭遇了屈辱性的衰落。如何應對這種狀況？有很多聽起來耳熟的“解決方案”。意識形態分子輕率地拋出這些方案，但這只能把我們引入過度自信導致的死胡同。

應對這種新分化，民粹主義者的想法最簡單。因為這場分化是新出現的，所以他們建議把時鐘撥回分化發生之前。他們為此提出的政策是保護主義，逆轉市場的全球化。讀者也許會對此嗤之以鼻，但我們應該認識到這個方案的荒謬性并非不證自明的。如果對許多人來說過去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比現在強，那么采取重建昔日經濟的策略看起來就的確可行又安全。他們早就學會了不去相信那些承諾他們如果接受進一步變化一切最終都將變好的說辭。

盡管如此，撥回時鐘的策略是注定要失敗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像韓國這樣已經建立自己的世界領先產業集群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對撥回時鐘毫無興趣。全球化使這些經濟體實現了史無前例的脫貧成就。只要韓國繼續主宰鋼鐵業，英國實行再激烈的保護主義都無法讓謝菲爾德奪回在世界市場上的領先地位。這么做充其量能讓謝菲爾德占領全部英國市場，但這個市場不夠大，不足以讓謝菲爾德的鋼鐵生產率恢復到以前的高度，而且在此過程中，英國鋼鐵成本的升高將損害所有需要鋼鐵的產業。

保護主義非但無法讓謝菲爾德復興，一系列限制性措施還有可能讓倫敦不再繁榮。正像被事實證明的謝菲爾德的鋼鐵業集群很容易外流一樣，倫敦的金融業集群也可以被毀滅。苦熬苦拼的英格蘭其他地區對浮華繁榮的倫敦金融業感到氣憤，因此英國部分地區會很熱烈地歡迎它的毀滅。但這也將是愚蠢的策略。像倫敦這樣的大都市甚至比油田更好，因為它永不會枯竭。盡管這只下金蛋的鵝可能的確令人惱火，但比起扭斷它的脖子來，還有更好的策略。不幸的是，本書寫作時英國正準備扭斷它的脖子，英國采取的脫歐策略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導致金融業向歐洲其他城市轉移。

為什么不換一種做法——撿金鵝蛋呢？換言之，為什么不對大都市征稅，利用由此獲得的財政收入來復興其他城市呢？

面對這一提議，意識形態分子都會心癢欲言。右派將莊嚴警告高稅收對經濟活動的抑制作用，同時抱怨這會把除倫敦外的各地變成一個充斥著乞丐的巨大“福利街”[[Ⅰ]](#_I_Zhi_Jue_Da_Duo_Shu_Ju_Min_Kao)，即“銬在死尸上”。左派可能會過度熱衷于薅倫敦金融城的羊毛，這在客觀上會導致大量企業驚恐撤離，破壞集聚帶來的經濟效益。

雙方觀點中包含的道理僅能說服其追隨者，但都不完全正確。右派認識到的道理是，政策目標絕不能是把地方城市變成“福利街”。幸福依賴于尊嚴和使命感，而不僅僅取決于人的消費能力。用公共福利來補貼沒有成就感的工作，這樣的策略絕不等同于創造需要特定技能、勞動者掌握該技能后會感到自豪的就業機會。所以，政策目標應該是創造高生產率的就業機會，而不是用公共財政來補貼從事低生產率工作的人。左派認定的道理是，憑借在大都市里的高薪專業工作富得流油又洋洋得意的人，在道德上是令人反感的。這些人認為他們的收入都是應得的，而我將證明不是這回事。

我提出的策略自然要兩面兼顧：一方面對大都市征稅，另一方面復興其他城市。兩面都需要單獨分析。

### 稅收和大都市：“我們應得的收入”？

稅收應該以道德準則和效率為指導。道德準則很重要，一是由于道德準則固有的價值，二是由于人們會抵制和逃避不道德的征稅。效率很重要，因為“稅收楔子”會影響價格，例如導致消費者支付的價格高于生產者獲得的收入，這樣的“稅收楔子”會扭曲資源配置，從而導致效率降低。

左右兩派自以為是的稅收觀已經導致我們的政治極度分化，充滿敵意。實用主義能把我們解放出來：在道德和效率兩個標準上，明智的新稅種都比現有稅種更好。

稅收的道德基礎可能比稅收的效率更重要。稅收管理主要依靠自愿遵從。分析道德命題的標準哲學方法是實踐理性。盡管實踐理性對稅收政策至關重要，但傳統的經濟學方法論并沒有采納它。因此，經濟學家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稅收的道德基礎。各國財政部顧問提出的稅收經常會打破在他們看來愚蠢的承諾（他們很可能在這個判斷上是對的）。事實上，經濟學家似乎認為他們在處理道德問題時只需考慮收入不平等問題，而不平等問題是通過標準的功利主義演算來分析的。[[Ⅱ]](#_II_Sui_Zhu_Shou_Ru_Zeng_Jia__Qi)正如喬納森·海特發現的，對大多數人來說，公平意味著比例性和應得性，而不是平等。但經濟學家忽略了這一點。[[4]](#_4_Wo_Yao_Gan_Xie_Di_Mo_Xi__Bei)別管應得性，如果游手好閑的人比努力工作的人更窮，那么轉移收入就會增加“效用”；別管資格，如果畢生努力積累養老金的人比天天在海灘上度假的人更富裕，那么轉移就會增加“效用”；別管義務，這里我就不用再舉例了。功利主義經濟學家也許會警告說，一些轉移可能會產生對經濟的抑制作用，因而“不經濟”，但他們不認為這些轉移“不道德”。這樣無視更廣泛意義上的道德考慮正說明了一個更大問題：這些人是“怪異者”（WEIRD）。

一旦我們承認稅制設計應當充分考慮應得性問題，那么它就會對我們如何看待集聚經濟效益產生有力的影響。最早發現這個問題的是19世紀美國記者和政治經濟學家亨利·喬治（Henry George）。他的想法在當時引起了轟動。

亨利·喬治的大膽思想

喬治為就集聚效應產生的經濟效益征稅提出了道德上的依據。他看到了為什么集聚效益具有道德上的獨特性，并得出結論：正確的政策是對城市土地的增值部分征稅。

要理解他的深刻見解，我們可以提一連串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集聚經濟效益落到誰手里了？”為理解這個問題，可以程式化地描述一下工業革命的過程。最初所有人都是農民，工業在一座新城市里出現后，人們紛紛遷入城，到工廠里工作。隨著工廠集群的擴大，人們的生產率開始超出過去務農時的生產率：增加的生產率就是所謂的“集聚經濟效益”。增加的生產率反映在工資中，因為企業要為得到工人而彼此競爭。但要在工廠里工作，人們就必須住在工廠附近，因此人們需要租地，出租者是日益成型的城市內土地的所有者。因此，遷入城市所產生的收益是更高的工資減去這筆經濟租金。[[Ⅲ]](#_III_Wei_Jian_Hua_Qi_Jian__Jia_S)只要這筆租金低于農業與工業之間的生產率差距，就會有更多的人遷入城市。但隨著他們的遷入，租金也會因人口增加而被抬高。這個過程將一直持續，直到租金上漲到相當于農業與工業的生產率差距。到這時人們便不再有遷入城市的動力，用經濟學的行話來說就是達到了均衡狀態。但更令人興奮的是，我們得到了一個重要且簡單的結論能回答我們一開始提出的問題：所有集聚經濟效益都成了租金，為土地所有者獲得。看到這里，一些右派人士可能會有些不舒服，但請放心，這不是馬克思主義，喬治不是社會主義者。但他是一位聰明的經濟學家：他去世多年后，兩位經濟學家證明了他的結論，且沒有貪功，而是將之命名為“亨利·喬治定理”。[[5]](#_5_Arnott_and_Stiglitz__1979)

亨利·喬治接著提出第二個問題，一個在傳統經濟學框架里無法理解的問題：“土地所有者應該得到這些收益嗎？”對這個問題，經濟學家會覺得無法理解，但所有其他人都百分百地理解。回答這個問題不需要任何定理，只需要實踐理性。要判斷一個人是否應該得到一筆收入，我們要追溯他的哪種行為創造了這筆收入。但如果追溯集聚經濟效益的源頭，我們會發現：創造這些效益的行為，其主體是所有到這座城市里工作的人。通過在這座城市里工作，每個人都為生產率的總體增長做出了貢獻。集聚經濟效益是由人們之間的互動創造的，所以這是一項讓所有人獲益的集體成就。這就是經濟學家所說的公共品。那么在這個過程中土地所有者發揮了什么作用？他們就算天天躺在海灘上也一樣會有這樣的結果——他們很可能確實就是這么過來的。他們獲得這筆收入的原因是，人們聚集的那片土地恰好歸他們所有，他們的活動對集聚經濟效益的創造沒有發揮任何作用。用經濟學令人困惑的術語來說，這被歸類為“經濟租金”。

重點是，以合理的道德標準來看，相比于土地所有者為土地增值而勞動，或土地增值反映的是他們通過儲蓄積累的資本產生的回報，讓土地所有者直接得到土地的增值收益并不怎么正當。這并不是說上述土地所有者沒有任何權利獲得土地的增值收益。作為土地的合法所有者，他們可以主張對集聚經濟效益享有所有權，這是基于權利。但這座城市里的全體工作者也都可以集體主張對集聚經濟效益的所有權，這是基于應得性。當兩個合理的標準之間發生沖突時，實用主義要求我們采取折中的辦法，而不是固守某種死板的教條。稅收恰好能對此發揮作用。假設社會一致同意對同時符合應得性要求和權利要求的收入設定一定的稅率，例如農民的農產品產生的收入既是因勞作而應得的，也是因擁有農場而有權得到的。假設社會同意的稅率為30%，那么對反映集聚經濟效益的土地增值所帶來的收入應如何設定稅率？我認為應該顯著高于30%。這表示土地所有者對這筆收入的主張顯著弱于農民對其收入的主張。而且，只有對集聚經濟效益征稅，并用這筆稅收來造福整個城市，創造集聚經濟效益的勞動者才能獲得其中的一部分收益——根據上面的分析，這是他們應得的。

亨利·喬治的思想是實踐理性的早期應用，討論的是租金與其他形式的收入在應得性方面的差異。他謹慎地把土地增值產生的租金和資本收益區分開來，認為后者具有道德合法性。他的主張既不屬于馬克思主義，也不屬于民粹主義。

他的觀點古怪嗎？不。相反，他的道德常識感引起了共鳴：他的著作《進步與貧困》（Progress and Poverty）成了整個19世紀美國最暢銷的書。

不幸的是……

亨利·喬治為對城市土地增值的部分征收重稅提供了有力的道德理由，盡管激起了公眾共鳴，但他提出的政策從未得到充分執行。因為在大城市中心擁有土地而大發橫財的人反對征這樣的稅。他們沒有提出與之相抗衡的道德依據，而是拿出巨大財富的一部分來購買政治影響力。在英國，擁有倫敦市中心大部分土地的威斯敏斯特公爵高居上議院議員之職，他是這個國家最富有的人。在美國，一個曾以紐約地產交易為核心業務的人現在當上了總統。

開征這種稅，任何時候都不算晚。現在選民的受教育水平比亨利·喬治時代高得多，所以現在應該能更容易地打造一個克服既得利益群體阻撓的政治聯盟。而且，1980年代以來大都市蓬勃發展，這反映了集聚經濟效益的劇增。如前所述，這源于經濟復雜程度的大幅提升，以及相伴隨的技能分工程度的加深。因此，與亨利·喬治時代相比，目前可課稅的集聚經濟效益的規模大得多，所以公共政策在這方面毫無行動就更顯得荒謬了。不僅如此，我們還陷入了由舊有意識形態驅動的稅收爭議的僵局。

但本節標題中的“不幸”并不是在哀嘆當前公共政策的不足。這里的“不幸”是指：盡管經濟復雜程度的上升推動新的大都市集聚經濟效益出現，但復雜度的上升也導致亨利·喬治定理失效了。喬治的主張，即我們可以通過對土地征稅來獲取這些收益，已經不再正確了。針對這些收益征稅的理由依然很充分，但要想征稅就需要巧妙地對稅制進行重新設計。以上兩句話是基于一種新的學術理論，我和同事托尼·維納布爾斯在研究一個看起來不相關的問題時偶然發現了這個理論（這樣的情況在學術探索中經常發生）。[[6]](#_6_Collier_and_Venables__2017)我會試著讓讀者也感受一下發現新理論的興奮感。該理論可以用很簡單的方式表達出來。事實上，我們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偶然發現它的。想要觸及經濟學思想的前沿，你只需思考兩種簡單的假想情況。

假想情況一：一個包含有不同技能和不同居住需求的居民的大都市

第一種假想情況是上面所講農民與工業故事的一個變體，只是這一次故事里的人有不同的技能和居住需求，每個人獨自決定是否遷往一座大都市居住。大都市提供的便捷連通性使每個人的技能能夠迸發出更高的生產率：越是高技能人才，在大都市工作就越能提升你的生產率。但像此前的故事一樣，當人們遷入城市時，租金被抬高。那么，哪些人會選擇遷入，哪些人不遷入？很明顯，能從遷入城市中得到最多收益的人，是擁有較高技能的單身人士。所以，一名專業的公司法律師白天在辦公室里長時間工作，晚上下班后到市中心休閑，最后回公寓睡覺。她的生產率會比在小鎮上工作高得多，收入也會非常高，因此房租只占她收入的很小一部分。經濟學里一種通常很有用的做法是，尋找對兩種選擇沒有傾向性的人，本模型里的兩種選擇是搬入大都市和留在小鎮上。我們知道，對于這樣的人來說，生產率提高的好處將恰好被租金的上漲所抵消，但這些人會是誰呢？其中的一部分是中等技能人士：單身，只需住一個寓室，但他們的收入并不比在小鎮工作高很多。另一部分是高技能人士，但因為他們有一個大家庭，所以他們的居住需求很高，因此租金就會抵消他們收入的增值。這些人對我們的分析很重要（在經濟學里他們被稱為邊際因素），因為他們在大都市居住的意愿有限，房東一旦提高租金他們就會離開。這些“邊際”租戶決定著房東可能設定的租金。那位公司法律師會和住在隔壁的中等技能單身人士支付相同的租金。這時我們就能看到關鍵之處：那位公司法律師能獲得一部分集聚經濟效益。

歸納一下：由于技能和居住需求的差別，集聚經濟效益的很大一部分不再為土地所有者獲得，而是為不需要太大居住空間的高技能單身人士獲得。我和托尼·維納布爾斯模擬了倫敦或紐約這樣的大都市可能出現的情況。我們發現，約一半的集聚經濟效益最終為這些人獲得，而不是為土地所有者獲得。如果我們再考慮一重差異，即小一些的城市之間的差異，會發現土地所有者獲得的份額更小。關鍵的推論是，不管對土地所有者征多重的稅，政府都無法獲得大部分集聚經濟效益。

這是個壞消息，因為征收這種稅的道德依據仍然是有力的。為說明這一點，我再概述一下第二種情況。

假想情況二：需要法治的大都市

這個假想情況朝現實又邁進了幾步，而且包含了更發人深省的關鍵推論。假設有兩種產品——食品與服務——和許多國家。任何國家都能生產食品，但只有法治國家才能提供服務。你可以把這看作善政的許多其他方面的一個指標。法治需依靠普通公民的合作和共同努力來維持，如果每個公民都作壁上觀，認為這是別人的事，也就是說，如果每個人都試圖搭便車，那么作為公共品的法治就不會存在。在我們這個假想情況中，大多數國家里的人都試圖搭便車，法治稀缺，因此只有少數具有法治的國家能提供服務，在其他國家里所有人只生產食品。

集聚經濟效益適用于服務而不適用于食品，所以在少數法治國家里會存在一個大都市，那是提供服務的地方。因為能提供服務的國家不多，所以在世界市場上服務的售價高于食品，所以出口服務的國家將比出口食品的國家更繁榮。

我們接下來要研究，在服務出口國里從這樣的繁榮中獲益的是誰。假設所有國家里都有兩類工作者：特別聰明的人和其他人。同時假設聰明這一點對務農沒有幫助，但可能對服務生產有價值，而這取決于有多少聰明人聚集在一起：一個孤立的聰明的服務業工作者并不比農民的生產率高，但聰明人在大都市聚集得越多，他們每個人的生產率就越高。最后是我們已經討論過的租金情況：隨著聰明人聚集到大都市，租金就會升高。

那么，誰會獲得集聚經濟效益？這是不是他們應得的？像在上一個假想情況里一樣，在大都市里居住的工作者和土地所有者分享集聚經濟效益。我們還可以弄清楚二者的比例，但對目前的論述而言，這不重要。關鍵是，在這個場景里，只有一個群體毫無疑義地應該得到集聚經濟效益，因為導致這些收益產生的關鍵行為是以他們為唯一主體的，那就是集體維持法治的國家里的普通公民。但集聚效益一點都沒分給他們，而是被聰明的服務業工作者和土地所有者分享了。在道德上無疑有權獲得一部分集聚經濟效益的群體卻什么也沒有得到。有鑒于此，我們有充足的理由征稅。但和前一種情況一樣，只對土地征稅將無法觸及聰明的大都市工作者所獲取的集聚經濟效益。

這兩個場景有一個顯著的共同點：獲得集聚經濟效益的聰明工作者真心相信這是他們應得的。他們的這一信念系于這一點：因為他們的生產率高，所以他們的收入高。進一步而言，他們認為自己的生產率高是因為他們培養了自己專業化的高技能（假想情況一），或者因為他們特別聰明（假想情況二）。這兩種觀點的確都有一定的道理，考慮到對于他們來說這么想很省事，他們持這樣的觀點是可以理解的。但這兩種觀點都只是部分屬實。大都市的生產率依賴的是整個國家提供的公共品，如法治和已經做出的旨在增強連通性的基礎設施投資。這些公共品為所有人都提供了一些好處，但高技能的大都市工作者從中獲得了過高的收益。更根本的是，集聚經濟效益本質上是由國民集體創造的。是無數工作者的互動，而不僅僅是每一名高薪工作者的獨自努力，創造了集聚經濟效益。高技能人士有權保留其高生產率產生的一部分收益，但不應該得到全部收益。此外，不在大都市里工作的人，由于其生產率并非在其他人的幫助下提高，他們所應得的份額也不應與大都市里的高技能人士一樣多。

對集聚經濟效益征稅的效率依據

到現在，我只考慮了對集聚經濟效益征稅涉及的道德問題。但稅收還有一個方面令經濟學家很感興趣，那就是效率。經濟學家的這種態度很正確。在對集聚經濟效益征稅的問題上，經濟學終于可以提供一些有價值的觀點了。

最重要的是經濟租金的概念。經濟租金是指，向某人支付超出原本可誘使其做某事所需金錢的報酬中，超出的那部分報酬。在我們前文探討的道德標準中，這個概念是無關緊要的。一位明星網球運動員贏得的錦標賽獎金，超出了他愿為獲得這筆錢而付出的代價，這一點不能否定他享受這筆獎金的合理性。這位明星運動員從他的非凡天賦中賺取經濟租金，但既然這是他的天賦，所以因天賦而產生的收入就是他的。但當我們從道德問題轉向效率問題時，經濟租金的概念就變得很有意義了。根據經濟租金的定義，對這筆租金征稅不會影響他參加比賽的決策，所以這筆財政收入不會帶來效率損失。集聚經濟效益是經濟租金，所以根據效率標準，這是理想的課稅對象。

在土地所有者得到所有集聚經濟效益的簡單假想情況中，很顯然，對他們的收益征稅不會導致他們的行為發生不利于城市發展的變化。如前所述，他們可能只是在海灘上休閑度日，而一旦對他們課稅，他們或許就必須和其他人一樣去工作。不過即使在其他場景中，對租金征稅也符合效率原則。對那位住公寓的公司法律師征稅，她那遠遠超出房租的收入就會減少，但只要她的收入仍然比在小城鎮里工作高，她就會繼續留在大都市里。同樣，在第二個假想情況里，如果對在大都市里生產服務的聰明工作者征稅，只要他們的稅后收入依然比務農時高，征稅就不會改變他們的行為。

就稅收效率而言，找到經濟租金就相當于找到圣杯——征稅不會產生效率損失。如果這聽起來美好得叫人無法相信，你還可以再興奮一些，因為除此之外，這么做還有其他好處。要理解這一點，我們需要再提到一個方便的經濟概念——尋租。

尋租是一種有害行為。舉個例子，假設立法機構通過了一項法律，授予一群生產商壟斷權。立法機構為什么要這么做？因為有人游說并用好處收買了議員。這項法律產生了經濟租金，而游說就是尋租行為。杰出的經濟學家安妮·克魯格（Anne Krueger）認為，游說及其他尋租行為會持續進行到每多花費一美元尋租僅多產生一美元租金為止。投入到尋租中的資源是徹徹底底的浪費。

集聚經濟效益是租金，那么，這會吸引尋租行為嗎？經濟學家從未提出過這個問題，他們的忽視有一個簡單的原因。假如亨利·喬治定理是對的，集聚經濟效益只為土地所有者獲得，那么尋租就沒有空間。土地供給是固定的，不會因游說或任何其他行為而有改變。但事實是亨利·喬治定理已經失效。在大都市里，獲得大部分集聚經濟效益的人是居住需求很小的高技能人士，這意味著大量的尋租機會。人們游說交友廣泛的親戚擠走別人，把工作機會留給自己；人們付錢接受培訓以得到額外教育，獲得更多證書；人們參加成百上千次的面試。人們也有可能通過推遲結婚生子來壓低居住需求。上述行為都屬于尋租。為了獲得代表著豐厚利益的集聚經濟租金，人的行為被扭曲。尋租不會讓蛋糕變大，只會讓處在職業生涯中期、相互競爭排擠的人們在健康幸福方面蒙受集體損失。尋租導致的這些損失可能是巨大的。

對集聚經濟效益征稅可以減小人們尋租的動力。大都市里的工作機會依然值得爭取，但收益下降后人們采取極端措施的可能性也降低了。為了能繼續住在倫敦或紐約的昂貴公寓里而推遲生育，也許會變成一種太沉重的代價。繁榮大城市里的集聚經濟租金目前高得驚人，不僅爭搶這些租金的行為可能導致爭搶者的損失，而且這種強勁的勢頭可能會讓他們認識不到自身生活承受的無可挽回的傷害。

所以我們應如何對集聚經濟效益征稅？

對經濟租金征稅目前總體上被認為是明智的做法。近期提出這一主張的最具影響力的人物是諾貝爾獎得主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他是經濟增長理論的創立者。索洛認為社會中的經濟租金已經上升，課稅對象應該從工作薪酬向經濟租金轉移。有了這個保證，我現在把兩部分論點結合起來。從道德和效率理由來看，對集聚經濟效益征稅都是明智的政策。這兩條標準都很重要，能同時滿足這兩條的其他稅種很少。

從道德方面來看，對大都市集聚經濟效益征稅的理由極為充分。通常我們對稅收的期待最多不過是稅負能公平分攤，但在這里，若想讓收益與應得性更好地匹配，對經濟租金征稅是必須的。同樣，從效率角度看，通常我們對稅收的期待最多不過是最小化附帶傷害。很少有稅收能滿足這個看似很普通的條件，但對集聚經濟效益征稅不僅不會損害效率，反而可能通過抑制尋租產生增進效率的效果。

相關的問題是，在實際操作中如何對集聚經濟效益征稅呢？如前所述，這些收益為城市土地所有者和城市工作者分享。因此，要通過稅收獲取這些收益，就需要對這兩個群體征更高的稅。

一個明智的起點是對土地和房地產的升值部分課稅。最好的途徑是，每年按土地和房地產價值的一定比例征稅。[[Ⅳ]](#_IV_An_Nian_Zheng_Shui_Bi_Yi_Ci)由此獲得的稅收應該由全國享有：應該把這筆錢再分配給其他城市，即令大城市獲益的經濟力量所猛烈沖擊的那些城市。目前，對大城市土地升值所征的稅反而輕于對其他收入征的稅，在包括英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它幾乎不被課稅。這是稅制的重大設計失誤。19世紀時，政客為“不勞而獲的窮人”感到苦惱，21世紀的政客應該為因政策疏忽遺留下來的問題而苦惱。現在有成千上萬“不勞而獲的富人”，不幸的是，他們中不少都是政客。右派想保護富人，左派想把富人投進火爐。我們需要對富人區別對待。一些富人對社會很有價值，另一些則只是在攫取國民集體努力的成果。

但我們分析的關鍵是，獲得大部分租金的不是土地所有者，而是高技能的大都市工作者。要獲取這些租金，就需要稅制創新：不是像現在這樣僅根據收入征稅，而是根據高收入和大都市地理位置這兩個因素的結合，來設定差異化稅率。

只具備中等技能的大都市工作者，分不到任何集聚經濟租金。絕大多數中等技能的人都在非都市地區工作，所以倫敦一名每天早上為律師煮咖啡的中等技能工作者的工資將包括兩部分：非都市地區同類工作者的工資，加上他要支付的倫敦公寓超出非都市地區租金的部分。所以，針對全國中等收入群體的基本稅率，也適用于大都市的中等收入工作者。但那位高收入公司法律師確實獲得了更多的集聚效應帶來的經濟租金，應當分出一部分給其他人。因此，她應該承擔比在非都市地區工作情況下更高的稅率；假如她不在大都市工作，她將無法獲得集聚經濟租金。這不是奇思異想，它已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現實：這位律師如果在紐約工作，那她目前承擔的稅率已經比小城市里相同收入者的稅率高了8個百分點。要多交稅是因為她在紐約工作，即使她不居住在紐約。在倫敦工作的人不用多交稅，但是我們可以改變這一點。對經濟租金適度征稅幾乎不會影響人們的就業決定，因此這種稅的損害性將比當前的稅種低得多。我們面臨的挑戰是要確定大都市高收入工作者交的附加稅應該有多高，以避免這種稅造成的效率損失超過當前稅收造成的效率損失（這是一個完全可以靠現代財政分析技術解決的問題）。與紐約已經采取的做法相比，這個建議的唯一區別是稅收的歸屬方不同。在紐約，那8%所得稅帶來的財政收入歸紐約市所有，我則建議應歸全國所有，以幫助像底特律、謝菲爾德這樣的城市復興。

這意味著大多數人都承擔的基本稅率將繼續適用于全國，但每項適用于高收入的稅收都將包含一塊大都市附加稅，其課稅對象是高技能群體獲取的集聚經濟租金。因為技能最高者獲得的集聚經濟效益要大得多，所以附加稅的稅率將具有累進性。

由于稅務部門知道人們在哪里生活和工作，在實際操作上這極為簡單易行。事實上，就像紐約的例子一樣，現在很多稅收已經因地理位置而異了。[[Ⅴ]](#_V_Zai_Mei_Guo__Ge_Zhou_He_Ge_Ch)最可能出現的阻礙是富裕的城市居民不成比例的政治影響力，其主要表現是他們在立法機構中有過多的代表。盡管他們對自身的道德水平評價甚高，但這項道德上公正、經濟上高效的稅收可能會引起他們自以為正義的憤怒。但不要忘了，因為我們是對經濟租金征稅，所以對方提出的可以預料的關于負向激勵和應得性的反對理由都是為自己的利益服務的。準備聽他們傾瀉一大堆“動機性推理”吧。這項稅收不僅有充足的學術依據，而且是對大城市人新產生的傲慢的妥當回應。

### 復興非都市城市：“銬在死尸上”？

如何讓謝菲爾德、底特律、斯托克這樣的城市復興？對大都市征稅的目的不是為這些地方的居民提供福利，而是要用這筆資金來幫助這些地方重新成為生產性經濟活動的集聚之所。如前所述，在破敗的舊產業聚集地，單靠市場的力量無法創造新的聚集地；相反，這些城市只會充斥著零散的低生產率的經濟活動。但是，為什么市場力量無法創造新的產業集群？既然市場做不到，我們為什么覺得政府就能做到？

成功的產業聚集地是許多不同企業的共同所在地，其中部分企業相互競爭。聚集在一起，企業就能收獲共同的規模經濟效益從而降低成本，從中獲益。產業集群形成后，市場力量就能維系它：每個企業都不愿離開，因為知道其他企業將依然在這里，而不是在其他地方。但形成新產業集群的難度大得多。正因為企業是相互依賴的，所以如果一家企業預期許多其他企業會搬到一個新地方，它搬往這個地方的愿望就會大增。但這家企業如何知道其他企業會不會這么做？如果一家企業成為先行者，另一家也許會同往，成為產業集群中的第二家企業，在這種情況下，也許又會有企業決定成為第三家。但并沒有市場機制來形成和揭示這些決策。集群的形成面臨協調問題，所以需要一個協調者。硅谷是以斯坦福大學為基點逐漸形成的。在人氣不夠高的地方，這個問題如何解決？

依靠私營部門解決協調問題的途徑

協調問題出現的原因是，每家企業的決策都依賴于所有其他企業的決策。在經濟學中，這些效應稱為外部性；因為這些效應影響的是其他企業而不是該企業本身，所以該企業在做決策時不會將其納入考慮范圍。但對于這一相互依賴問題，存在著市場解決方案：從本地著眼，或者從“大處”著眼。

從本地著眼……

有一個經濟部門天然地扮演著協調者的角色，那就是金融業。金融業在發揮最佳功能的情況下，可以收集關于企業的信息，并基于未來的機會分配資金。如果法律規定一家銀行的業務限于特定城市，這家銀行就會理解，當地經濟的興衰決定著它自身的未來。對從這家銀行借款的每家企業而言是外部性的效應，將被這家銀行內部化。為了避免這樣的做法導致自身毀滅，該銀行必須深入了解每一家企業面對的機會及其相互依賴狀況。因此，該銀行就不會是第四章中描述的那種金融機構。這樣的銀行是天方夜譚嗎？不是的。在美國，在1994年的一次修法之前，這是銀行業的常態。在英國，變化發生得更早，但像米特蘭銀行（Midland Bank）、約克郡銀行（Yorkshire Bank）這樣的名字顯示它們曾經是地方性銀行，而地方性銀行現在依然是德國的常態。轉向全球性銀行的政策變化，有可能使需要新產業的城市有機會從更多來源獲得資金，從而增強其金融潛力。但在現實中，全球性銀行幾乎沒有什么動力來為收集地方性信息投資。當一座城市開始萎縮時，當地的銀行分支機構會接到削減信貸的指示，收回的錢會轉移到其他城市。回歸本地化將使金融業有動力發揮其有益于社會的作用：搜集和判斷有關實體經濟的信息。

從“大處”著眼……

對協調的需求可以通過一個超大企業來解決：像亞馬遜這樣的超大企業，單憑自身經營就能收獲產業集群式的規模經濟效應，因此它自己做先行者是沒有問題的。這樣的企業本身就是一個產業集群，它到了哪里，發揮支持作用的供應商就會蜂擁而來。在大多數產業里，規模這么大并不是好事，因為集聚效益很容易被管理龐然大物的困難抵消。所以大到能自己構成產業集群的企業是很少的。可能有不少破敗城市的市長希望超大企業進駐，但超大企業的數目與此相比卻僧多粥少。哪些破敗城市能成功地吸引到超大企業？對這個問題也有市場式的解決方法，但不是個好方法。一個尋找新經營地的精明的超大企業會組織一場招標，讓各城市競標，看誰能提供最具吸引力的入駐條件。勝者將贏得的價值是新的產業集群將帶給該城市的集聚經濟效益。比較競標成功與競標失敗城市的新研究證實，這些效益是真實存在的。[[7]](#_7_Greenstone__Hornbeck_and_More)拍賣理論告訴我們，中標者的出價將等于它得到的價值。[[Ⅵ]](#_VI_Zhong_Biao_Zhe_De_Chu_Jia_Sh)所以，針對破敗城市面臨的協調問題，市場的“解決”方式是把所有新產業集群帶來的收益都交給創造該集群的超大企業。我寫作本書時，亞馬遜正就其新總部選址讓不同的美國城市競標。亞馬遜很大，足以讓一個破敗城市復興，它也會很無情地為自己榨取這些利益。

公共部門解決協調問題的途徑

讓政府做企業決策的協調者，這個想法會讓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嚇得發抖。但我是坐在新加坡寫這一節的，從我的書桌前望出去，一座通過公共規劃實現非凡繁榮的城市一覽無余。1980年我第一次來到新加坡時它剛剛上調了最低工資，以驅走政府認為沒有前途的產業——紡織業。這一策略遭到了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嚴厲批評：最低工資只會導致高失業。在美國和歐洲歷史上，政府在扮演協調者角色時確實經常進行政治化的不當干預，這令人難堪。但東亞提供了很有價值的修正：政府協調有時能奏效。新加坡的奠基者李光耀也理解關于集聚的經濟與道德問題。這反映在他的政策里：“我認為，土地的私人所有者不應從經濟發展與用公共資金進行的基礎設施建設造成的土地升值中獲益。”[[8]](#_8_Lee__2000)

這里有一個表面上看起來最不會扭曲市場的方法。既然要對大都市征收附加稅，那么為什么不利用這筆財政收入相應地對破敗城市里的企業減稅，繼而讓市場決定哪些企業遷入這些城市呢？但這個方法不能解決協調問題。而且如前所述，市場作用能維持已形成的產業集群，但不能創建新的產業集群，這中間包含的道理也意味著這個方法不行。一家先行企業知道遷入破敗城市的企業將得到減稅待遇，這絲毫不能幫助它判斷哪些企業將遷移，以及遷到哪里、何時遷移。為讓超大企業進駐而競標依然是破敗城市市長們的唯一選擇。但在這種情況下，圍繞超大企業的競標將出現一個新問題。因為所有破敗城市都將提供減稅待遇，所以這些城市為中標而彼此競價的動力較以往沒有變化。和以往一樣，中標城市所能期待的價值將為超大企業獲得，但在這一新情況下，破敗城市享受的稅收補貼也將為超大企業獲得，成為其額外收入。那么，有什么好辦法？

補償先行者

破敗城市需要有活力且入駐后能很快催生新產業集群的企業。但這樣的先行企業稀少，原因是假如其他企業不追隨它們遷入的話，它們很可能會破產。即使其他企業追隨，先行企業相對于后來者依然處于某種劣勢。先行企業將難以找到需要的熟練工人：既然當地一直沒有聘用此類工人的企業，當地的工人怎么會擁有這樣的技能呢？所以，先行企業將不得不從其他地方招來熟練工人，讓他們逐步培訓當地雇員，這很可能意味著高成本。但假如第二家企業決定在這座城市開業，它將能更容易地招到需要的熟練工人——它可以挖走先行企業培訓過的一些工人。因此，第二家企業的建立成本將低于先行企業，從而能獲得更高的資本回報率。

換言之，產業集群的先行者面臨“先發劣勢”。這很奇特，因為更常見的情況是先行者享有“先發優勢”，但這適用于新市場和新科技的先行者。率先進入一個市場能讓一家企業形成相對于后來者的優勢，因為這能建立品牌忠誠——想想胡佛的例子；率先研發出一種新技術的企業能獲得專利——想想蘋果的例子。但假如一家企業是一個新產業集群的先行者，該產業集群將在成熟市場上使用成熟技術生產并銷售產品，那么這個先行者就將承受一些后來者所不必承受的成本。

但對于一座破敗城市而言，一個產業集群的先行企業具有社會價值。那么有什么辦法能解決這個問題？由于先行者創造外部性這一公共利益，應該用公共資金來補償它。作為一項原則，這是簡明直接的，但要落實該原則，就需要稱職的專業公共機構。這應當如何實施和管理？

開發銀行

分配資金用于良好目標是一回事，有效使用資金是另一回事。引導公共資金投資于企業的機構是開發銀行，其任務是投資于私營部門，以促進一些公共目標。所有主要政府都有開發銀行：歐盟有一個龐大的開發銀行——歐洲投資銀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日本和中國也有類似機構。給開發銀行設定專門促進非都市城市復興的任務，是利用對大都市征收的新稅的一個可行途徑。有些開發銀行很成功地實現了既定目標，另一些則淪為腐敗的巢穴。關鍵在于開發銀行是否有明確的職權，廉潔奉公的高標準，認同本銀行使命的積極的員工隊伍，以及是否受到切合實際的審查。“切合實際”這個詞很關鍵。投資打造產業集群是一項有風險的長期事業；一項投資是否成功往往需要數年才能知道，而且會出現很多失敗。除非監督開發銀行的政客和公眾理解這一點，否則開發銀行就會變得縮手縮腳，難以取得成果。如果開發銀行想復興破敗城市，為可能大幅提高當地工人生產率的經濟活動提供資金，它就需要敢于冒險、集思廣益、積極主動。像風險投資模式一樣，開發銀行的員工有時需要參與日常管理；有時非常積極的員工為一個項目工作多年，最終也會面臨失敗。評判一家開發銀行的唯一標準是看其整體投資組合和長期業績。[[Ⅶ]](#_VII_Zhe_Xie_Xiang_Fa_Fan_Ying_L)但由于（第四章討論的）傳統金融市場存在的普遍性不足，在有合適員工的情況下，利用開發銀行是值得一試的途徑。

為企業到來做準備：企業園區

先行企業進駐一個城市的前提是那里要有適合企業經營的地方。企業可以購買廢棄建筑并按自己的需求進行改造，但企業園區能提供專用空間和基礎設施，這是未來的產業集群可能需要的東西。許多企業都覺得相互靠近很有益。一座失去昔日產業集群的城市，很可能有一片廢棄的工廠區。可以用公共資金為該城市設立一家機構負責清理這片區域，建立并管理一個新的企業園區。

此類機構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它們為土地支付的價格。一旦該機構進入市場，廢棄土地就會突然升值。這不僅與它參與競標購買土地有關，打造新產業集群的前景也會提高土地的未來價值。顯然，既然這類管理機構使土地升值，這筆額外價值就應該歸它所有，而不是土地所有者。在英國，這一原則被納入了1981年的《發展公司法》。但是，法官沒有受過經濟學或公共政策方面的訓練，于是精明的律師試圖曲解法律文本的含義，這正是通過“動機性推理”來尋租的典型例證。精明的律師已通過這種方式成功掠取了公共資金：應用于土地估價的法條的司法解釋，已經變成這類機構進入市場前與進入后地價的折中，土地所有者通常能獲得土地升值的相當大一部分，而它本來應該由管理機構獲得。這一情況是可以糾正的，但立法時應注意不要留漏洞，避免律師揩油水或能力不足的法官因不理解（甚至不關心）公共利益而導致損失。

投資促進機構

建立和管理企業園區的機構目光向內，關注城市及其設施；投資促進機構則目光向外，關注可能入駐城市的企業。假如市場機制像右派意識形態分子設想的那樣完美無缺，設立投資促進機構就是浪費錢。但愛爾蘭人知道情況并不是這樣。1950年代愛爾蘭是歐洲最窮的國家之一。為改變這一局面，愛爾蘭政府率先設立了一家機構來鼓勵投資。在吸引國際企業和就業機會方面，該機構取得了非凡的成功。[[Ⅷ]](#_VIII_Dui_Yu_Ben_Jie_Suo_Yi_Ju_D)它打造了一支團隊，研究可以發展哪些產業，與可能來的企業建立聯系，并從較大的企業中吸引一家入駐，作為潛在的“錨”投資者。

一旦這樣一家企業表示出興趣，愛爾蘭投資局將與之合作，逐步了解如何更好地預測它在愛爾蘭經營時會面臨的問題。在對該企業的業務取得一定了解后，投資局努力提前解決這些未來可能出現的問題，并向地方政府等其他公共機構提出建議，指導它們該如何提供幫助。投資局和企業的關系不會隨著企業做出投資而結束。在此之前負責了解該企業業務的投資局職員仍會與其保持密切聯系，努力發現更多機會。愛爾蘭超過一半的外來投資都是通過這樣的后續工作引入的。

顯然，投資促進機構和管理企業園區的機構需要協作，因為二者都有對對方有用的信息。但二者發揮著不同作用，故而應當作為彼此獨立的機構來運作。

知識集群：地方大學

大多數非都市城市現在都有大學，大學應該對所在城市的復興發揮重要作用。謝菲爾德能從其鋼鐵產業的崩潰中恢復過來，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它幸運地擁有兩所受人尊敬的大學。一些學術領域很容易產生具備商業應用性的知識。研究是很容易讓集群出現的一種活動：知識進步的常見方式是有人把之前相互獨立的兩個新進展聯系在一起，所以研究者彼此臨近是很有意義的。知識也不是只從基礎研究發展到應用。經常是在基礎研究得到應用后，人們才知道應該在哪些地方探索新進展，所以研究活動靠近應用知識的企業，對企業和大學都有好處。斯坦福大學與硅谷之間的關系，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與繁榮的波士頓之間的關系就是這一過程的典型表現。

但學者們可能浮夸地主張研究不應受實用主義污染。繁榮的社會當然應該花費資源來支持純粹的知識，但破敗城市里的大學應當認識到對所處社會所負的義務。地方大學應當重點發展那些有切實可能與企業結成緊密關系的院系。這是公共資金的另一個潛在用途。

大學不僅產生有商業用途的知識，還教育學生；學生們是否掌握具有生產價值的知識既取決于大學教他們的東西，也取決于教育內容與潛在雇主的相關性。最糟的情況是，受危機沖擊的非都市城市的大學將教學重點放在不能讓學生獲得高技能工作崗位的課程上。它們培養出來的學生擁有學位證書但沒有技能，年輕人可能因求學而背負債務，卻學不到足以讓他們償還債務的技能。

破敗城市里適合培育新技能的地方顯然是當地的大學和技術學院。在順利的情況下，作為新產業集群先行者被吸引到這個城市的企業，與當地大學和學院的相關院系聯系到一起，共同開展應用研究，培訓員工。企業、大學和技術學院可以合作制訂計劃，對年紀較大的求職者進行再培訓，讓他們學會所需的新技能。

### 結語：“不惜任何代價”

繁榮城市和破敗城市之間的地域分化不是不可避免的；這一現象是晚近發生的，而且是可以逆轉的。但靠公共政策的微小調整無法逆轉這一趨勢。簡單地說，小幅調整無濟于事，但更根本的問題是，經濟發展的空間動力取決于預期：企業選擇的經營地是它們預計其他企業將選擇的經營地。目前企業的預期是基于近幾十年的情況形成的，因此這一趨勢是自我實現的。要改變這一狀況，就需要足夠大的政策變化，以沖擊企業的預期，將其震入一個不同的軌道。

鑒于上述任何一項政策的有效程度都存在不確定性，所以對每一項都不應魯莽地全盤接受。這些政策需要通過一個謹慎的漸進試驗過程來檢驗。但這樣的過程將無法創造我們所需要的沖擊性。一方面要謹慎試驗，另一方面要有沖擊性，二者的矛盾如何處理？解決辦法是就縮小地域不平等的目標做出總體的政策承諾。2011年歐元區面臨著同樣的兩難困境：政策制定者不知道什么政策能切實有效地保衛歐元，于是他們開始了一系列試驗。但歐洲央行行長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用一個毫不含糊的承諾囊括了這些試驗——“不惜任何代價”。這句話立即產生了持久的效果：投機潮因德拉吉的破釜沉舟而退去。在城市政策方面，我們也需要類似的政治承諾。

[[Ⅰ]](#_I_6)指絕大多數居民靠領取福利為生的貧窮街區。——譯者注

[[Ⅱ]](#_II_7)隨著收入增加，其帶來的邊際“效用”遞減，所以從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轉移收入將使總效用增多，因此功利主義認為這是一種改善。

[[Ⅲ]](#_III_6)為簡化起見，假設除了工資高于此前務農的收入這一點外，人們不在意城市生活與鄉村生活的其他區別。

[[Ⅳ]](#_IV_5)按年征稅比一次性征稅好，因為一次性征稅會使開發商推遲能讓土地增值的投資，轉而動用資源來進行游說，以扼殺投資為借口要求取消這種稅。如果按年征收，這種推遲投資的動力（學術上稱為“期權價值”）就會大大降低。

[[Ⅴ]](#_V_5)在美國，各州和各城市的所得稅稅率不同。目前在英國，蘇格蘭和英格蘭實行不同的所得稅稅率。當前的建議與這些稅制的區別不在稅務行政方面，而在由此創造的財政收入的分配方面。

[[Ⅵ]](#_VI_4)中標者的出價甚至可能超出它得到的價值，這個現象被稱為“贏家的詛咒”。

[[Ⅶ]](#_VII_3)這些想法反映了我與英聯邦開發公司前CEO黛安娜·諾布爾（Diana Noble）的談話。諾布爾曾重振英聯邦開發公司，使其成為致力于引導企業進入貧窮國家投資的最有目標感的開發銀行。

[[Ⅷ]](#_VIII_2)對于本節所依據的知識，我要感謝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系主任、產業經濟學耆宿（也是自豪的愛爾蘭人）約翰·薩頓（John Sutton）教授。

## 第八章 階層分化：享有一切的家庭，分崩離析的家庭

我和我的表親是這種本可避免的分化的縮影。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如何解決？

在許多家庭里，成年人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已達到人類史上最高的水平；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傾向于同與自己相似的人結婚；男性對平等合作的革命性家庭模式的接受程度是空前的；父母在養育兒女方面投入的精力也達到了從未有過的程度。成功讓這樣的家庭穩定下來，父母的成功由兒女繼承。這樣的家庭享有一切，正在成為王朝式家庭。

在其他許多家庭里，成年人受教育程度較低，他們辛苦學會的技能已經失去了價值。他們也更可能與和自己相似的人結婚，但這是因為機會在減少：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之間的配對性婚姻使女性通過婚姻提高社會地位的機會減少；男性仍然肩負著養家糊口的傳統職責，但再也無法履行這個職責；父母延續傳統模式，讓學校負責子女教育。失敗使緊張感不斷加劇，破壞家庭穩定；父母的不穩定狀態被傳遞給子女。這些家庭在分崩離析。

成功家庭所依賴的許多特征不僅有利于這些家庭，也有利于全社會。而導致失敗家庭出現的許多特征不僅是私人的悲劇，也是社會災難。要扭轉這一新的分化，首先應當穩定和鞏固正在分崩離析的家庭。我們必須直面現實，父愛主義的社會管理模式已經失敗，政府不能取代家庭的角色。但家庭需要前所未有的支持，我將這一思路稱為“社會母愛主義”[[Ⅰ]](#_I_Zhe_Ge_Shu_Yu_Hen_Xin__Yi_Zhi)。但并不是所有成功家庭的做法都對社會有益。既然你在讀這本書，你可能屬于成功家庭。本章會在較后的部分展開對成功家庭的討論。

### 向承受壓力的家庭提供支持

從事低生產率工作的人通常生在父母教育能力差的家庭。正如第五章所述，單親家庭兒童和孤兒的人數近年出現了猛增。不幸的是，這經常會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害。這些殘酷的事實意味著公共政策需要從兒童生命的早期就開始實施，包括提供幫助使家庭不致破裂，以及通過其他形式為父母提供育兒支持。

維持家庭的完整

不知為什么，應當鼓勵雙親家庭的主張現已被視為政治右派的主張，即“社會保守主義”。但歷史上只有最極端的無政府主義者才主張完全自由的性愛。正如英國最受尊敬的社會政策專家之一艾莉森·沃爾夫女男爵（Baroness Alison Wolf）所說：“所有已知的人類社會都不以完全性自由的方式運行。相反，這些社會都有公認的婚姻制度……各個社會都有規則，常常是嚴厲的規則，旨在迫使孩子的父親娶孩子的母親。”[[1]](#_1_Wolf__2013___p__240)這樣的規則有充分的依據。在孩子出生時，大部分未婚母親都想嫁給孩子的父親，而大多數父親也打算這么做。但在五年后，這樣的夫妻中只有35%仍然在一起，而且其中真正忠于婚姻的人不到一半。[[2]](#_2_Fragile_Families_and_Child_We)這會造成影響，現在可靠的科學研究終于能提供證據來支持社會科學了。端粒是DNA末端的保護帽，端粒越短證明細胞已受到的損害就越大，人的健康就會惡化。如果母親的婚姻關系不穩定，她的孩子到九歲時端粒會縮短40%。[[3]](#_3__Effects_of_social_disadvanta)要知道，家庭收入翻倍只會讓端粒長度增加5%，由此可見上述影響之大。缺乏父親關愛所造成的損害大到無法彌補。對許多人來說這可能是“令人不快的真相”，但不能因此就否認事實的存在。

鼓勵父母雙方都關愛孩子這種觀念本身并不屬于保守主義立場。而且，它是我們對他人所負義務的一個核心方面，說它更接近左派社群主義的立場而不是右派個人主義的立場似乎更有道理。左派在這個問題上的猶豫是由于把父母對孩子的義務與兩件事混淆了：一是婚外性行為是一種罪的宗教執念，二是婚姻作為壓迫婦女的制度存在的歷史。部分右派樂于污名化某些群體，這也加劇了左派的猶豫。

先來看看罪的問題。許多人認為罪孽是無稽之談，這些人中的一部分認為，既然不承認罪孽，性和義務之間的整個聯系也就被切斷了。罪是違反對上帝的義務，既然沒有上帝，也就沒有義務可違反。菲利普·拉金精彩地刻畫了1960年代迅速發生的觀念轉變：“不再有上帝，不再在黑夜里冒冷汗/不再有地獄”，我們都能“順著長長的滑梯/滑向幸福”。[[4]](#_4_Philip_Larkin___High_Windows)但“上帝之死”并不能讓我們擺脫對他人的義務，而是讓我們的這種義務更牢固了。孩子不成材這一人類的痛苦不是上帝造成的，而是人造成的。正如在1960年代社會敘事因年輕人拒斥上一代生活方式而劇烈轉變一樣，新一代人需要重新組織社會敘事，讓性義務與宗教信仰脫鉤。性行為可以，但對生養孩子的不負責任是不可以的。至于婚姻是壓迫女性的制度這個問題，可行的解決方案不是放棄婚姻制，而是改變其規范，這一情況已經在很多婚姻中發生了。放棄婚姻制不會為母親賦權，反而會導致母親喪失自由，因為女性要獨自掙扎著同時扮演好父母這兩種必要的角色。

再看看污名化問題：人都會犯錯，具有強烈性沖動的年輕人犯錯最多。盡管我們應當盡力減少這樣的錯誤，但它仍然會發生。錯誤一旦犯下，社會做出的合乎道德的反應應該是寬恕，而不是譴責。寬恕是指明確承認這是個錯誤，但沒有任何懲罰的必要。未做好準備便生下孩子的年輕父母不應被污名化，應當鼓勵他們結婚并共同撫養孩子。

證據表明，人的決策很大程度上受社會網絡中其他人觀點的影響，這說明家庭和朋友的反應很重要，因為我們都是社會動物。[[5]](#_5_Da_Wei__Bu_Lu_Ke_Si__David_Br)但公共政策可以再助一臂之力。政府可以通過政策承認親生父母選擇與孩子一起生活所能帶來的巨大價值。對納稅的父母，可以給予稅收抵免作為獎勵，降低其稅收負擔；對不需納稅的父母，可以給予同等金額的補貼。年輕父母盡力養育子女對我們都有好處，我們應該有為此支付成本的意愿。當這些父母不履行養育職責時，社會其他成員就要為此付出沉重代價。

在最關鍵的學前時期支持家庭

為什么英國有7萬名兒童處在政府“照料”之下？因為父愛主義的社會管理的介入：坐等一名年輕女性誕下一個她沒法照顧的孩子，然后把孩子從她身邊接走。這往往頻繁發生在同一群女性身上。例如對哈克尼區（Hackney）接管兒童的案例研究發現，205名被政府接管的孩子僅由49名女性所生。但“社會母愛主義”不會坐等事情發生后再出擊，而是會承認這些女性的生活出現了嚴重問題，并幫助她們解決。看到這些可怕的統計數字后，有一群人共同向她們提供幫助，成立了一個名為“暫停”（Pause）的NGO。[[6]](#_6__Zan_Ting__You_Yi_Ge_Wang_Zha)那49名女性的生活確實是相當絕望的，其中48人都有毒品或酒精依賴問題，一半人有慢性精神健康問題，一半人自己就是在政府“照料”下長大的，父愛主義的社會管理加劇了代際失敗綜合征。“暫停”發現，關鍵性的介入是改變這些女性的生活，而不斷接走她們的孩子只會造成心理創傷，把她們推入更深的絕望，并損害胎兒的健康。[[Ⅱ]](#_II_Shi_Xian_Gao_Su_Huai_Yun_De)改變她們的生活需要同情和指導，并就解決成癮、住房和遭受男性暴力虐待等問題提供實際支持。成功的關鍵是提高對方的自尊心，而不是逼她們放棄救濟。這正是“暫停”所嘗試的。它逐漸將組織擴展到英國一個個被污名化的城鎮。這么做有效果嗎？

最近“暫停”得到了獨立評估，發現它支持的137名女性的生活方式有顯著改善。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中四分之三有顯著改善，濫用藥物和家庭暴力的情況均顯著減少。而這些改善讓她們懷孕的次數下降了：最準確的估計是每年少生了27個孩子。“暫停”也極具成本效益，它每花費1英鎊都會在接下來的五年里為社會節省9英鎊。當然，“暫停”只是個很小的組織，父愛主義的社會管理依然占據主導地位，支配著“照料”兒童的公共支出。

那么，明顯失敗了的父愛主義的社會管理為何依然占據主導地位？這是因為旨在進行社會控制的相互隔絕的科層體系禁錮了敬業的一線專業人士。它是如何阻礙“社會母愛主義”發展的？我就此舉一個例子。有一位心理治療師管理著一個社區精神健康團隊，工作地點是一座破敗城市及其核心區域，受治療的患者們過著屈辱、孤立和緊張的生活。一些母親因害怕遭受“霸凌”而不敢送孩子上學。霸凌受害者不是在校內上學的孩子，而是站在校門口的母親，爭奪有限男性的其他母親會攻擊她們。這個精神健康團隊意識到，這些患者需要一個能幫助她們和其他面臨同樣壓力的女性逐漸建立友誼的安全空間。他們設立了一個項目，在沒落的居民區經營咖啡館，租下一些店面，將其改建成舒適安全的空間。每個咖啡館都是合伙企業，由患者中的志愿者組成。因為這些咖啡館很有情調，所以社區里的各界人士都會頻繁光臨，不會對她們有任何侮辱性的暗示。通過志愿者自己的陳述、治療她們的專業人士的評估和對健康記錄的分析，可以評估該項目對她們心理與情緒健康的影響。患者們表示，這份工作幫助她們與其他人建立起了友誼，從而擺脫了孤立狀態。如果有人哪天沒來，朋友會把聯系她當成自己的分內之事，可見咖啡館培育出了互惠義務。新建的友誼使她們能按自己的節奏探索自己的生活，不再將思維停留于危機應對模式，也不擔心被人羞辱。漸漸地，她們中的一些人生活變得完整充實了。精神問題復發和住院的情況減少了，自尊感形成了。獲得某種就業資格、獲得未來不再是空想。她們成了更好的母親，有了工作。當地其他店鋪經常遭到蓄意破壞，而這些咖啡館卻沒有，這也從側面說明人們認可它們的價值。隨著該項目的發展，財務狀況不斷改善，幾乎達到了收支平衡。該項目產生了令人贊嘆的影響，被人們在會議上當作成功案例。但是，后來它被終止了。

管理這個精神健康團隊的是國民醫療服務體系里的科層機構，他們認為，這個團隊的核心工作是治療，經營咖啡館的做法不應該持續得到財政支持。雖然住院的情況得到減少，但那屬于另一套預算體系。雖然受援助者得到工作后就不再領救濟了，但那是社保預算的事。至于社會服務部門，他們憑什么要從核心工作中撥出資金資助國民醫療服務體系想要取消的項目呢？父母更好的照料能改善兒童的在校表現，但教育預算優先投入的是教學這一核心工作。管理著分散的專門機構、脫離一線現實的科層體制，對一個切中問題核心的創新項目不僅不學習推廣，反而將其扼殺。各機構只顧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正如那位絕望的心理治療師所說：“如果沒有更好的干預措施，這種情況將代代延續下去，只有很少的人能逃離這個怪圈。”

這就是社會母愛主義開始的地方，這個趨勢還在繼續。青年男女意外生下孩子后面臨不知該如何應對的壓力。多數父母本能地感到有撫養的義務，但撫養幼兒可能意味著巨大的壓力：年輕的父母會時常生孩子的氣，也會相互生對方的氣。發生這樣的情況時，要避免事態升級導致持久的傷害，就需要技巧、自律和寬恕。尚不成熟的青少年不得不以壓抑自己的欲望為代價，控制自己的脾氣，進行提前規劃。年輕父母需要金錢、安慰和不帶有色眼鏡的指導。這是社會母愛主義的核心。如何提供這些東西呢？

家庭根據收入來調整生活方式，只需稍加規劃，審慎行事，絕大多數家庭都能滿足子女的基本需求。慷慨的父愛主義管理可能是一把雙刃劍。英國為單身母親提供免費住房，意大利和西班牙沒有這么做，但英國的青少年懷孕率在歐洲居于高位，而意大利和西班牙排在末尾。1999年英國增加了對有孩子的低收入家庭的福利救濟。通過現代統計方法，我們能得出這一政策變化帶來的結果：低收入家庭的生育率大幅上升，據估計每年多生4.5萬個嬰兒。[[7]](#_7_Wolf__2013___pp__51_2)于是，免費住房和有所提高的福利待遇使許多家庭在育兒方面略微寬裕了些。同時這也鼓勵了更多婦女在明知撫養條件不佳的情況下懷孕。這些成本極高的福利項目效果不佳，而另一些使用公共資金的方式能產生確定無疑的好處，得到的資金投入卻不足。我再舉個例子。

年輕夫妻通常還沒有時間積累儲蓄資金作為保障，所以容易受突如其來的挫折影響。因此，針對這樣的沖擊提供緩沖是使用公共資金的有益途徑。最明顯的沖擊是失業。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美國失業率大幅上升，并在很長時間內居高不下。我的一位博士生的新研究令人信服地表明，高失業率會導致對幼童的忽視增加。[[8]](#_8_Brown_and_de_Cao__2017)這種影響很嚴重，而且二者有因果關系。一個郡的失業率每上升1%，兒童被忽視的情況就增加20%，且幼童受到的影響最大。但公共政策可以幫助緩解失業造成的損害。各郡對失業救濟持續期的規定各不相同；在持續期較長的郡，失業引起的忽視兒童的現象要少得多。

關于對育兒的資金支持就說到這里吧。現在看看如何幫助父母更好地完成困難的育兒任務。首先是來自大家族的幫助，因為其他家族成員有協助育兒的義務，但大家族現在已經縮小了。我父親有七個兄弟姐妹，我母親有四個，所以當時有一大群叔伯姑姨幫助父母養育我。現在的父母子女少了，所以現有親戚們的支持義務也相應地變大了。但像我這樣的父母本身都是獨生子女，在這種情況下需要重新借助大家族的能量。規范需要改變；更長的壽命使家族在垂直方向上延伸，彌補了家族在水平方向上的縮小。為了應對新的需求，人們確實在適當地改變規范：祖父母對孫輩的養育投入比以前多了很多。

政府也可以做更多工作。大多數政府都有向養育幼兒的父母提供資金幫助的意識，但逐漸地，這種幫助同鼓勵人們找工作的目標混在了一起。對于壓力較大的年輕家庭，這種措施并不適用于成年人撫養幼兒的時期。不生育的人會從有孩子的人那里獲得一個巨大好處：退休者之所以能靠儲蓄生活是因為下一代正在利用這些儲蓄創造價值。政府應該通過轉移支付的手段補償他們的育兒行為對社會所做的貢獻，父母努力養育幼兒的時期正是實行這種轉移支付的關鍵時期。

但除了資金補助，政府還可以做些別的：可以在家庭內外提供實物支持。對任何新父母來說，為人父母都是一件難事，但一些夫妻的處境格外不好，很可能遇到麻煩。只要麻煩是可預見的，就可以通過有力的預先干預來避免。

正如市場的作用有限一樣，政府通過公共服務支持所能發揮的作用也有限。但目前政府的作用尚未到達這個極限。有力的公共部門支持，目前有一些范例，從迄今為止的評估情況看，這些做法顯示出了成功的跡象。鄧迪項目（Dundee Project）就是一個例子，這是一個為困難家庭提供無條件支持的小規模實驗。為年輕家庭提供日常支持的成本雖高，但與家庭破裂造成的損失相比要低得多。

鄧迪項目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完全獨立于監管家庭的部門。監督是必要的，在極端情況下，是應該把孩子從父母身邊接走。但鄧迪項目成功的基本條件是，父母和提供支持的義工之間應建立信任關系；若項目不與監管部門徹底分離，這個條件就無法實現。在英國，受鄧迪項目啟發，政府把相關項目擴大為“困難家庭支持計劃”（TFP）。但是，盡管動機很好，該計劃仍有兩個不足之處，一是附加了促使年輕母親就業的目標，二是計劃由已有的具有監督功能的社會服務部門管理。這種畫蛇添足的做法降低了該計劃的效力。

把支持與監督結合起來會造成兩敗俱傷的結果，但把物質支持與精神支持結合起來卻可能相得益彰。容易出問題的父母通常有早期的精神健康問題。精神健康干預，如認知行為療法和憤怒管理課程，經嚴格評估，顯示出了不俗的成功率。這樣的預先支持措施需要經費，但長期來看也許能避免為社會帶來更沉重代價的行為。為育兒提供資金支持、精神健康服務和監督，三者應當結合起來，但這三項功能必須嚴格地彼此獨立。

要有孩子的青少年夫妻還不具為人父母的資質，需要不具威脅性的指導。只是偶爾上上輔導課可能還不夠。祖父母可以幫忙，但是，如果一對夫妻很可能成為不稱職的父母，他們的父母也往往不稱職。年輕夫妻需要家庭以外的指導和非正式支持。輔助日益縮小或失去功能的大家族的一種方式是創造指導和支持的新資源。“和平隊”（Peace Corps）和“海外志愿服務”（Voluntary Service Overseas）曾激勵成千上萬的美國和英國青年，我們的現代社會現在也需要這樣的團體。當時，這種新的社會資源匯集了越來越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他們追求的是一種不止于充實自我的使命感。而今天的新興社會資源是，越來越多健康而聰明的退休人士因為有養老金而財務寬裕，但空巢導致他們一定程度上生活空虛。生活經歷讓這些人獲得一定的非認知技能，從而可以用不具威脅性的方式幫助困難的年輕夫婦，提供他們所需的支持。承擔起某種救援義務可以給生活帶來一種能令人深深滿足的使命感，否則老年人的生活可能變得悵惘或無聊。與所有支持活動一樣，他們的角色必須得到明確界定，參與者應得到培訓，以確保雙方關系不會惡化為居高臨下—指責—審查—舉報的模式。也許服務者應當得到報酬，但事先應當經過年輕父母的同意，這能讓他們覺得自己享有權益。也許可以給年輕父母一筆預算，他們可以用來向服務者支付報酬。這不應由政府來組織，一批新的NGO可以招募既有能力又有時間的人來幫助成千上萬無法履行育兒義務的年輕家庭。政府懼怕失敗，因而不適合組織這樣的試驗，而NGO則具備嘗試新方法的理想條件。

“可怕的兩歲”這個說法很有道理：幼童有時會很難哄，即使有經驗的父母也會承受巨大壓力，不堪重負。從兩歲開始，孩子的成長會借助于融入家庭以外的團體——幼兒園。有充足的理由讓國家提供幼兒園，并對所有人免費開放。所有國家都提供學齡教育，而就所有層級的教育而言，國家提供幼兒園教育的理由是最充分的。通常隨著孩子年齡增長，其教育需求變得更加復雜和多樣化。與其他提供形式相比，國家提供幼兒園教育的主要優勢是有利于標準化，而且成規模地建立幼兒園可以壓低成本。幼兒園并不復雜：社會需要幼兒園提供的主要是一個標準化的平臺，讓各種家庭的幼兒聚集到一起。標準化和免費提供幼兒園服務的重要好處是可以使送孩子進入幼兒園成為全社會的常態，這樣一來，容易做出錯誤育兒決定的父母更可能效法他人這么做。因此，向全民免費提供公立幼兒園服務能實現兩個非常理想的結果：在兒童最容易受到社會影響的時期讓不同階層的兒童互相接觸，最需要學前教育的兒童會去上幼兒園。但許多國家并未采取公立幼兒園的做法，而是通過復雜的、過度的補貼來支持私人育兒服務，為滿足每一項明顯需求而提出的新的政府倡議，都在導致這些補貼計劃逐步增加。例如，英國“確保開端”計劃（Sure Start programme）的優先關注點是讓母親投入工作，只要把目標鎖定在剛好符合條件、最容易“成功”的母親身上就能實現虛假的成功。由于這些計劃過于復雜，幾乎可以肯定，它們會被最不需要扶助的人利用，同時因為是由私人提供服務，所以得到服務者必定是經過挑選的。法國的幼兒園（écoles maternelles）是國家免費提供公立幼兒園服務的典范。我們住在布列塔尼地區（Brittany）一個低收入城鎮時親身體驗了這種幼兒園；無論在華盛頓還是牛津，我們都找不到由市場提供的同等質量的幼兒園。

作為支持場所的學校

如前所述，學校里最重要的活動不是教學，而是同學群體內的互動。學校在社會構成方面的差異，會復制和放大最初的家庭間差異。硅谷人士認為他們的科技為低受教育程度家庭的孩子打開了知識世界，但事實與他們的期望恰好相反：互聯網擴大而不是縮小了機會方面的差距。現在所有人都能上網，但近期的研究顯示，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的孩子學會利用互聯網來擴展知識，而低受教育程度家庭的孩子則用互聯網來消遣。[[9]](#_9_Putnam__2016___p__212)

學校可以發生的最有價值的改變是讓學校更具有社會融合性。社會融合性的主要障礙是學區。因為人們會根據自己的社會地位高低來選擇居住地點，所以學區會導致這種社會分層反映到學校里。要打破小學之后的教育存在的這一陷阱，一條途徑是創建公共資金資助的、在全市范圍內錄取的學校，并根據目的而非地域來區分這些學校。有的學校可以把自己打造成培養專業運動員的最佳場所，有的可以把自己打造成培養演員的學校，還有的可以稱自己服務于重視孩子紀律性的家長。參考第二章介紹的理念，我對這個問題的想法是，校長和學校管理者可以嘗試打造擁有某種獨特信念體系的學校，讓學校成為有獨特敘事的網絡化群體。學校將會明白它們必須努力做好，否則居住在富裕學區的家長仍會優先把孩子送到本地僅供富裕家庭就讀的學校。現在已有一些新規定使英國能建立這樣的學校。我所在的一個團隊就嘗試在牛津建立一所這樣的學校，牛津的學區劃分嚴重畸形。我們提出的方案是在全城范圍內以抽簽方式錄取，這遭遇了意料之中的反應——一道既得利益和意識形態筑成的高墻。以最富裕的學區的學校為首，被激怒的當地教育精英憤而提出反對。他們成功地阻止了我們的計劃，也許讀者諸君能有更好的運氣。

作為組織的學校

學校的教學活動可以得到改善。學者對這個問題已有很多研究，但最主要的認識是教師的素質遠比資金重要。提升教師群體的素質有四個簡單的途徑：吸引更好的教師加入教學隊伍，基于有評估的試驗這種實用主義做法來培訓教師，讓最好的教師投入挑戰性最大的地方，淘汰最差的教師。

在英國，“以教為先”（Teach First）計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該計劃的目標很簡單：吸引高素質的大學畢業生在職業生涯的頭幾年做老師，然后再投入其他職業。與此類似，也可以考慮有針對性地招聘老年人做教師，可稱為“以教為終”（Teach Last）。與我合寫過很多論文的簡·威廉·岡寧（Jan Willem Gunning）教授在阿姆斯特丹退休后，成為當地一所學校里的數學老師。他告訴我這是他一生中最有成就感的經歷。但“以教為先”計劃僅限于在倫敦任教，而倫敦是英國最不需要該計劃的地方。中小城鎮的學校才需要“以教為先”計劃，好教師通常不愿去這些地方執教，以免自己陷在這些孤島里。正因為那些計劃終身做教師的人因害怕陷于困境而裹足不前，所以那些想著做一段教師就轉行的人最容易被聘用。除只限于倫敦外，“以教為先”計劃的另一個問題是目前倫敦的教師會賺到更高的工資，倫敦學校平均因每一名學生得到的經費遠高于其他地區的學校。倫敦學校的成績也是全國最好的。“以教為先”計劃、倫敦教師賺到的更高工資、學校得到的更高的生均經費，都應當被從倫敦轉移到真正需要這些東西的地方。“以教為先”是典型的正確的計劃放到了錯的地方。

通過隨機試驗來選擇正確的教學方法是穩妥的做法。但政客和教育建制派對這樣的試驗持謹慎態度。實用主義意味著承認無知，而意識形態帶來的確定感讓他們更舒服。但是，不同國家和學校在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中取得的成績差異巨大，這顯示還有很多情況有待我們了解，而只有通過有評估的試驗才能了解這些情況。應該根據這些不斷了解到的新情況來培訓教師，同時應該教學生如何從中不斷學習。

淘汰最差的教師可能會產生巨大的效果。[[10]](#_10_Hanushek__2011)一些非常復雜的社會科學研究證明最差的教師正在造成巨大的破壞，但我們不需要多少研究就能理解為什么人們沒有采取行動來解決這個問題。對于任何敢提議采取措施的政客，以各種工會為代表的教師行業既得利益集團都會發出威脅，誓要將其消滅。這樣的做法可以理解，但并不道德。

有一些課堂政策似乎有助于解決成績問題，盡管具體方式不同，意識形態也再次阻礙了分析。除教學外，學生的努力也至關重要，問題是如何以最好的方式誘導最不配合的學生也努力。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正在利用實驗來測試不同的做法。[[11]](#_11_Levitt_et_al___2016)他們發現，很簡單的方法可以產生實質效果。一是任何獎勵要實現效果都必須在學生付出努力之后迅速兌現——在幾分鐘內，而不是在幾個月內兌現。至于獎勵的類型，給予尊重比金錢更有效（這再次顯示出人類更大程度上是社會性動物而不是貪婪的動物）。但獎勵并不是最好的激勵方式。人類避免損失的動力比獲得收益的動力強烈得多［專業術語稱此為“損失厭惡”（loss aversion）］，所以針對努力不足的情況，迅速讓學生承受與尊重相關的損失可能會產生最大的鞭策作用。然而這一觀點在師范學院中并不被倡導。

學生分層問題受到意識形態爭議，是一個迫切需要以實用主義態度對待的問題。一個可信的心理學理論是，兒童尋求同伴的尊重，并愿意付出一定努力來獲得尊重（或者避免失去尊重）。最有影響力的同伴群體可能是班上的其他學生。如果對年級組進行分層，以使每個班中的好學生和差學生保持較小的能力差距，差學生就會覺得為獲取同學尊重值得努力一下，而同樣，最強的學生也必須更努力才能保持領先。但如果不進行分層，而是把同年級學生隨機分到不同的班級，那么好學生與差學生的能力差距就會很大，在這種情況下，差學生的努力就變得沒有意義，好學生則沒有必要努力。有一些經驗證據支持這個觀點，但截至目前我看到的檢驗還不夠，該觀點還需要得到更徹底的檢驗。我們在學校里最需要的不是教條，而是各種各樣經過嚴格、獨立評估的試點。

最后是資金問題。目前，公共財政支付的生均補貼的差距可能會擴大其他方面的差距。最大的差距是地域：大都市擁有不斷擴大的稅基和強大的游說團體，破敗城市這兩項都沒有。在英國，這種差距可以想見是非常之大的。截至目前，公共財政支付的生均經費在倫敦是最高的，而我的家鄉約克郡和亨伯塞德（Humberside）排在末尾。然而倫敦學生的考試成績已經是全國最好的了，而我的家鄉則是最差的。這個巨大差距是近年來形成的，而且還在不斷擴大中。人們肯定會用動機性推理來維護現狀。我們應當讓仍在維護這種資金嚴重錯配的既得利益者感到羞愧，從而一舉擊敗他們。

學校之外：活動和指導

大多數校外活動是為青少年準備的，但成績和人生機會方面的分化大多出現在更早的時候。對9—13歲的兒童而言，造成分化的最重要的行為因素極其簡單——閱讀。受教育程度高的階層的孩子讀書，受教育程度低的階層的孩子不讀書。閱讀開啟機會之門，而精英的孩子能夠獲得這些機會。按道理，學校通過教兒童閱讀技巧應該能解決這個問題，但這與養成閱讀習慣絕不是一回事。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如何來鼓勵父母不讀書的孩子養成閱讀習慣，但我們還沒有在這方面下多少功夫。任何關心這件事的公民團體都可以帶來改變，下面我說說要怎么做。

羅瑟勒姆（Rotherham）是一座飽受歧視的城鎮，在英國已經成為被邊緣化的標志。和附近的謝菲爾德一樣，這是一座鋼鐵和礦業城鎮，就業崗位已經消失。[[Ⅲ]](#_III_Jin_Guan_Luo_Se_Le_Mu_De_Re)在這場悲劇及隨之而來的落魄消沉氣氛中，一小群公民決心幫助最被邊緣化家庭的孩子提高識字水平。他們搜索可以借鑒的先例，并選擇了一個似乎在一座美國城鎮奏效的先例。他們根據本地情況對這個先例進行了改良，與謝菲爾德的一所大學合作，在推進這項工作的同時進行量化評估。他們的做法是有效的，從學校的考試成績上可以體現出來。他們成立了一家慈善機構，選中市中心的一個廢棄酒吧（那里有很多這種地方），并說服當地企業將其改造成一個很神奇的場所。我用“神奇”這個詞既是比喻，也是寫實，因為孩子們可以在這個中心里學習魔術。門上寫著這個地方的名字“格林與伙伴”（Grimm and Co），掛著“成年人不得入內”的牌子，窗戶全部涂黑，這些都能吸引兒童進來，通常不是拽著他們猶豫不決的父母，就是按照預約和同學一起來。進入中心后他們就能看到一個巨大的豆莖，還有一塊牌子寫著“請不要吃我們的員工”，以及各種各樣能讓孩子產生魔幻感的東西。這些都只是前奏，最終是要吸引孩子穿過一扇隱蔽的門，登上圖書館的樓梯，經過暫時不在的格林先生的辦公室，進入一個房間，那里有格林先生的新故事，它寫在未裝訂成冊的紙片上，會被讀給孩子聽。接著出現了大麻煩：最后一頁不見了！需要趕緊把故事補全，請問誰能幫幫忙嗎？如果你能把故事寫完的話，這里有幾支鉛筆。

結果，孩子們爭先恐后，紛至沓來。看到從不主動拿起鉛筆的孩子在這里興奮地寫作，有的教師甚至激動得落淚。接下來一切就很順了：羅瑟勒姆的一些班級出版了詩集，流傳到世界各地；皇家莎士比亞劇團（Royal Shakespeare Theatre Company）來為他們演出；鮑勃·吉爾道夫[[Ⅳ]](#_IV_Bob_Geldof_Ai_Er_Lan_Ge_Shou)為他們寫了一個故事。孩子們的學習欲望可以被激發出來，習慣可以得到改變。由一位充滿激情的女子想出的這個杰出創舉可以被推廣，并根據不同地方的情況因地制宜。它已經吸引了中國和韓國來的代表團。沒錯，東亞人在向羅瑟勒姆學習，而不是向漢普斯特德[[ⅩⅢ]](#_XIII_Hampstead_Lun_Dun_Fu_Ren_Q)學習。如果羅瑟勒姆人能做到這一點，你或許也能。[[12]](#_12_Ru_Guo_Ni_He_Wo_Yi_Yang_Ren)

還有許多像這樣能在校外幫到孩子的辦法。非認知技能不是通過學習形成的，其形成途徑包括受信賴的導師的教導，以及運動等可以讓孩子學習合作和領導力的團體活動。能否找到一位知識淵博、值得信賴的導師，取決于孩子社交網絡的廣度，而這又反映家庭社交網絡的廣度。我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決定是在進入大學前的一個月做出的：我已被法律系錄取，但申請轉入了經濟系。在做出這個決定的過程中，我竭力征求意見，因為我知道這將意味著兩種不同的人生軌跡。[[ⅩⅣ]](#_XIV_Ruo_Du_Le_Fa_Lu_Wo_Ke_Neng)但我家的社交網絡里沒有任何有相關經驗的人。在無望之下，我問了我的牙醫（不出意外，他的意見沒什么價值）。如今，不同階層的孩子面臨著社交網絡廣度方面的巨大差異。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對家庭社交網絡中可能存在的九種人進行了調查，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比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在其中八種都認識得更多，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只在清潔工這一種有優勢。八種人中差距最大的是教授，正是我在做那個決定時找不到的請教對象。對我小時候所在的那種家庭而言，“你認識教授嗎”這個問題跟“你認識女王嗎”一樣。但我的孩子能找到很多教授。當我17歲的養子丹尼爾對納米技術產生興趣時，他請教的第一個人就是我的鄰居。

但是，青少年選擇聽取導師的意見不僅可以獲得信息，還可以從導師那里得到敘事，以指導自己的人生。父母獎懲范圍之外的健康敘事能產生高尚的熏陶效果，讓誤入歧途的青少年返回正軌，因為父母的權力會妨礙孩子聽從的意愿。[[13]](#_13_Zhe_Fang_Mian_Yi_Ge_Hen_Hao)

不同的技能，不同的企業，不同的養老金

學校其實并不是為人生做準備的，而是為將來要接受的培訓做準備。學校充其量能培養一些人的認知能力，這些能力可以幫助他們獲得技能并在一些職業中產生高生產率。但非認知技能在學校中不會得到同等程度的關注。許多生產性職業更依賴的不是良好的認知能力，而是非認知能力，如毅力。在從學校轉向職業培訓的過程中，與繼續發展認知能力的人相比，從發展認知能力跳躍到發展非認知能力的人，需要克服更多的挑戰。

畢業后的技能發展

我們知道怎么做有效，怎么做無效。大多數高收入國家對學生畢業后的技能發展都有一些正確的做法，但各國正確的部分不一樣，而且幾乎沒有彼此學習的意愿。

對擁有最好的認知能力并有興趣發展這些能力的人來說，美國和英國提供了世界上最好的技能發展途徑——優質的大學。兩國都有很多好大學——有五所美國大學和三所英國大學位居世界前十。相比之下，歐盟其他27個成員國的大學沒有一所躋身世界前十，而這反映了這些國家大學體系的一般性缺陷。差別的根源是大學的管理方式。高水準是通過競爭和分權式管理實現的，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率這么高也源于同樣的原因。相比之下，法國在標準化、低復雜性的學前教育環境中集中控制的教育管理模式發揮了卓越的作用，但該模式應用到大學層面時，結果就令人失望了。

但是，對沒有受過精英教育的大多數人來說，美國和英國的環境不適合發展技能。如前所述，大多數年輕人應當從只加強認知技能的訓練，轉向發展被忽視的非認知能力的訓練。因為這是一個更為艱苦的轉型，所以理應成為畢業后政策的首要重點。從年輕學生的角度看，這樣的轉型意味著躍入未知領域，因而對心理的要求更高。從政府的角度看，因為所需技能與政府通過教育系統的其他部分管理的技能很不一樣，所以在組織意義上這也意味著更大的挑戰。與攻讀大學學位的人相比，政府應當為每名學生提供更多的資金投入。

專業人士知道需要什么：高質量的技術性職業教育與培訓。年輕人可以選擇走這條路，而不是繼續沿著以訓練認知能力為重點的軌道蹣跚前行。幸運的是，專業人士甚至知道如何實現這一點，因為德國已經這樣做了很長時間，并因此擁有了高生產率和高薪的勞動力隊伍。那么德國是怎么做的？他們如何組織這樣的培訓？他們如何促使無數年輕人實現這樣的心理飛躍？更重要的問題是，為什么其他國家沒有仿效德國？[[14]](#_14_http___www_winchester_ac_uk)

德國的關鍵組織要素是特定行業內企業與大學的地方化合作關系。學校圍繞這些技能設計課程，企業派資深員工提供現場工作經驗和指導，學生的時間一部分花在大學里，一部分在企業里。學生通常接受三年這樣的培訓，然后進入企業就職。培訓有幾個目的，均非無關緊要，有些很微妙。事實上，成為一名可被聘用的年輕工人需達到的要求聽起來幾乎和吉卜林（Kipling）著名詩作中對成為男子漢的要求一樣高。一項要求是形成常規的專業技能：技能越練越熟，在反饋中不斷磨練。另一項要求是在必要時能自主思考：有充足的知識和信心，足智多謀。工匠精神帶來一種精益求精的倫理規范，一種把工作做好的自豪感。這種精神可以通過與已成為榜樣的人共事學到。此外還有實用能力：計算能力、讀寫能力、溝通技能和繪圖能力。由于大多數工作都在私營部門，年輕人需要像商人一樣的態度，包括要認識到使顧客愿意付錢購買自己的產品是自身崗位的基礎。與此類似，年輕工人需要自我展示和按時、保質完成任務的能力，這些能力能讓他們畢生受益。最后是適應能力：好奇和堅韌的態度，如自信、同理心、自我控制、毅力、協作和創造性。讀到這些，牛津大學的普通學生可能感到氣餒，但要讓天生不具備認知天賦的那一半人口高效地投入21世紀的工作，這是必需的。

培養這些技能既是地方任務，也是國家任務。公共政策的效力還有賴于企業的使命感。這里又回到了道德企業的概念：企業的整個團隊把一項比個人致富更大的使命內化為自己的追求。道德企業認識到自身對年輕員工承擔的責任，投入時間和金錢來提供完善的培訓，不只是培訓僅限于本行業的技能，還包括德國技術性職業教育與培訓所涵蓋的廣泛能力。在英國，兩家零售業巨頭約翰·劉易斯和BHS代表著企業對員工截然相反的態度；在美國，這樣的代表則是豐田和通用汽車。如前所述，講道德不一定意味著愚蠢。最后破產的是BHS和通用汽車，而不是約翰·劉易斯和豐田。

我們也知道什么是無效的做法——脫離現實世界工作的培訓。兩種常見的公共政策表面上試圖解決技能問題，其實不符合實際要求。

一些國家的政府為了回應社會對技能缺乏的擔憂，鼓勵開設表面上具有職業技能培訓性質的課程，但課時僅持續幾個月，課程內容與未來在特定企業里的工作無關，而且僅限于基礎性的職業技能。這些課程無法培養技術工作所需的一般性技能，無法真正符合企業的要求。

同時在大學里，低品質的職業課程大量增加，這種做法更為大張旗鼓，當然也更浪費。在美國和英國，由于學位所帶來的光鮮感，目前有一半的年輕人選擇上大學。在英國，這些學生的三分之一最終找到的是過去由非大學畢業生做的工作，而這些工作的技能要求沒有發生變化。擁有學位并沒有提高這些學生的生產率。[[15]](#_15_Alison_Wolf__Financial_Times)在中學里，許多孩子夢想著在社交媒體上看到的光鮮職業。不同職業的出鏡率和占總職業的比例之間存在著巨大偏差。孩子們確實應該有夢想、計劃和抱負，但總的來說，這些抱負必須與現實相妥協。從夢想落到腳踏實地的工作，是成年過程中要經歷的痛苦。正如挪威作家卡爾·奧韋·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ård）描述16歲到40歲成長歷程的優美語句：“現在浩瀚而包裹一切的，將不可避免地萎縮凋落，直至成為一個我們能把握的東西，它不會讓我們無比心痛，但也不會像當初那么美好。”[[16]](#_16_Dancing_in_the_Dark__Knausga)

成年人不應該沆瀣一氣，從這場轉型中牟利。在光鮮行業工作的人（如法醫）痛苦地告訴我，大學表面上是為他們的職業提供準備的，但其實是在虛假承諾的基礎上招生的。從這些項目中畢業的學生負債累累：在美國，那些在頂尖大學攻讀其他有價值學術課程的學生，負債通常比他們少。與夢想職業掛鉤的“學位”，把他們引入了一個成本高昂的死胡同，而他們其實只需要一個跳板，借以進入一個高成效但不像前者那么誘人的職業。

在美國和英國，大量缺乏訓練的求職者最終進入的是必須依靠較低生產率和相應的較低薪酬才能盈利的企業。這樣的企業通過在需求下降時裁員，不投入足夠資金用于培訓，以及排斥工會來節省開支。它們學會了應對員工不滿導致的高流動率，依賴急切需要工作和容易上當受騙的人來取代那些辭職的人。在一些領域，這種低生產率、低成本模式的利潤率高于在企業員工身上投資的高生產率、高成本模式。在這樣的領域，低成本企業將把高成本企業趕出市場。這導致人們盡管在作為消費者時獲益，卻在作為勞動者時受損；因為他們的生產效率變低了，所以他們的收入也變低了。用更正式的語言來說就是，市場在技能形成過程中失靈了。如果大家在消費時多花一點錢，并從勞動中多賺一些錢，那么大家的境況都會更好。但目前沒有機制能促使這樣的交易承諾鏈產生，以在總體上帶來這種更優的結果。這樣表述這個問題并不能解決問題，社會需要采取行動來緩解這個問題。最低工資法、強制培訓費和工會權利都有助于限制企業以犧牲生產率為代價壓低勞動力成本。舉一個關于監管及其后果的簡單例子：在巴黎和倫敦營業的同一家連鎖餐廳面對的最低工資法存在巨大差異。在最低工資高得多的巴黎，餐廳會對菜單與員工進行規劃，并為員工提供處理更復雜服務流程的培訓，以使每位侍者能夠服務的顧客比倫敦更多。因此，巴黎侍者的生產效率高于倫敦侍者。餐飲的價格沒有區別，但平均每位用餐者在巴黎得到的侍者關注比在倫敦少。然而最重要的社會差異是，巴黎的侍者賺得更多。倫敦的確有很多就業崗位，但都不怎么樣。

在闡述了良好的非認知技能訓練應該是什么樣子，以及許多年輕人目前被引上的另一條道路后，我們終于可以轉向背后的心理學問題了：年輕人會不會更傾向于這個選擇，它是由什么因素決定的？《國富論》所代表的粗糙心理學認為人們只關心錢。《道德情操論》所代表的更準確的心理學則告訴我們，人們也關心自己的社會地位：他們尊重別人，并被別人尊重。關于人為什么事而后悔的證據證實了我們的直覺：人更在意尊重而不是金錢。但即使以金錢為標準，許多英美年輕人也被引入了發展認知技能的死胡同。他們這么做是因為目前這樣的選擇能帶來最大程度的同伴間尊重。當他們告訴朋友自己要上大學時，那些上不了大學的人就一臉羞慚。當他們告訴朋友自己正在攻讀法醫學時，朋友腦海中浮現的就是影視劇中的光輝形象。問題的核心是，人們過于重視認知技能訓練，相對忽視非認知技能訓練。這是英美社會普遍存在的深層次觀念，其他人告知年輕人的敘事使他們形成了這樣的觀念。這種觀念根深蒂固，以至于你很可能覺得必然如此。但實際并不是這樣的。在這件事上，德國的情況也顯示人們對這兩種技能可以有不同的排序。

我可以在這里列舉數據，但我是從更個人化的途徑了解到這個情況的。一位很能干的德國互惠生曾在我家住過一年，她正處于需要選擇繼續上大學還是轉向職業培訓的人生階段。如果她愿意，她有足夠的認知才能來繼續接受學術訓練。她收到了一些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但她更想參加由她家鄉的一家企業和一所學院合辦的職業培訓。[[Ⅴ]](#_V_Ying_Guo_Ceng_You_Zhe_Yang_De)她準備參加的培訓課程很有挑戰性，甚至有點令人望而生畏。她選擇的職業是市場營銷：這家企業生產的是一種技術上很復雜的設備，也是她將要營銷的東西。在開始學業的第一周，她和制造該設備的工人一起在車床上工作。第三年她在拉美學習西班牙語。現在她是該公司的雇員，收入豐厚，生活安穩。也許她將與某位英國銷售員展開正面競爭，而后者從中學畢業后所得到的訓練只是為了得到一個學位。我們當時為她的選擇感到驚訝，而她對我們的反應也感到驚訝。她選擇的道路不僅比繼續接受課堂教育更具挑戰性，而且更能贏得社會尊重。無論是為獲得尊重還是物質回報，她當時都應當走這樣的道路。

為了在美國和英國創造同樣的風氣，我們必須揮別那些象征著認知技能優越性的東西。“學位”這個詞需要被祛魅：車床和拉美可以比在課堂上再學三年更光鮮。德國在這方面做得很好，但最領先的是瑞士。瑞士的職業培訓是嚴肅認真的：課程通常持續三到四年；企業會密切參與，因為他們要支付一半的學費，而學費不菲。這種培訓也很受歡迎，受到60%的年輕人青睞。一部分原因是學生在學習期間可以得到收入，但另一個原因是通過這樣的培訓可以獲得高級職位。[[Ⅵ]](#_VI_2016Nian__Zai_Ying_Guo_Jie_S)除了世界一流的職業培訓外，瑞士還有一所大學躋身全球前十，這更凸顯出瑞士成就的不凡：讓非認知技能的培養途徑茁壯成長，不一定意味著要削弱對認知技能的培養。

職業培訓需要得到更多社會認可，不僅要給參加培訓的人，也要給提供培訓的人。教授認知技能很容易得到榮譽：我們有像“教授”這樣的頭銜，從屬于某所“大學”。職業培訓目前過于分散，因而無法提供這么容易得到的榮譽。也許我們需要給林林總總的職業課程一個共同的更高地位，以表彰其為實現國家的重要目標所做的貢獻。我們可以建立國家技能服務體系（National Skill Service），所有該體系的成員都將引以為豪。

穩定工作前景

在得到一份工作后，勞動者應該享有多少就業保障呢？勞動者承擔著長期債務，如抵押貸款，因此需要盡可能多的就業保障。相反，對企業所生產產品的需求會發生周期性的劇烈變動，所以企業希望盡可能靈活地聘用勞動者。雙方的博弈能產生什么樣的折中結果，取決于雙方的相對議價能力，而這種能力又受到政府政策的深刻影響。以法國為代表的一個極端是，政府立法使就業保障成為就業的一項必要條件。以1920年代的美國為代表的另一個極端是，政府立法限制工會。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由于各行業的勞動者通常存在議價權的差異，各行業的博弈結果也就各自不同。每一名教授，無論多么平庸，都有終生的工作保障，因為沒有這樣的保障可能會引起焦慮，而這可能干擾我們思考大問題的能力（無疑其他教授還會提出更多理由）。然而我那得過獎的當演員的侄子在求職者飽和的演員行業里，一生都會面臨失去工作的可能性。

在重新思考就業權時意識形態沒什么用：左派意識形態分子憎惡勞動力“市場”，右派意識形態分子將其神圣化。自由市場派最常見的批評是最低工資會導致失業。失業是出差錯最明顯的表征，但并不總是最重要的表征。勞動力市場有兩個不同功能：其一是將擁有特定技能的求職者與企業為這些技能而設的職位配對，這個匹配的過程會影響失業率；另一個功能會影響社會的普遍繁榮，即對培養這些職業技能的投資。這兩個功能之間存在著固有的張力。如果能做出具有約束力的承諾，投資就會更可行。勞動者需要通過培訓獲取技能，而培訓成本高昂，必須有人付費。在由勞動者付費的情況下，他會擔心企業會不會以更高的薪酬在足夠長的時間里聘用他，以免自己為培訓所做的投資不劃算。而在由企業付費的情況下，企業會擔心勞動者在受訓后馬上辭職，去另一家企業尋求薪酬更高的工作。企業承諾工作保障能給予勞動者信心，使其克服第一種擔心。工資控制產生的副作用——失業，能給企業以信心，使其克服第二種擔心。所以在這兩種機制下，勞動者和企業都更可能增加對培訓的投資。但工資控制與企業承諾的工作保障會降低企業雇傭勞動者的動力，因而會妨礙勞動力市場的匹配功能。因此，要解決企業為培訓投資不足的問題，更好的做法不是用高失業率來使勞動者不敢辭職，而是政府通過課稅來承擔培訓花費。

但勞動者需要工作保障不只是為了收回其對技能的投資，另一個原因是他們承擔著需要用未來的薪水來履行的責任。他們如果有能力承擔諸如撫養孩子、購房這樣的責任，對社會是有益的，因此工作保障具有社會價值。在需求疲軟時期，企業調整對勞動者的付薪義務，這種做法也許比讓勞動者承擔被解雇的風險更有助于保持經濟效率。如果規定企業不得解雇勞動者，企業也許會培訓勞動者掌握更多的技能，以便在對某項技能的需求降低時可以把他們調到需要另一項技能的崗位上。

但這樣的工作保障必然有其限度。盡管企業應該能應對暫時的波動，但在需求長期性下降的情況下，企業必須裁員，否則無法生存，壓力到達極限時就會破產。盡管在這種情況下失去工作不可避免，勞動者的損失依然是實實在在地發生了。對于這類沖擊，我們需要一個比企業更大的實體——政府。諾貝爾獎得主讓·梯若爾（Jean Tirole）提出了一個聰明的方法，既能讓政府引導企業在市場低迷時期留住勞動者，也能讓企業在面臨長期性的需求收縮時裁員。這個方法就是，就裁員向企業收費，以彌補裁員給政府在福利支出和再培訓方面造成的額外成本。

被認為應對此類就業沖擊最得力的國家是丹麥和瑞典。它們提出了靈活保障（flexicurity）的概念。這項政策與復興破敗城市的挑戰密切相關：如果一個產業崩潰，這將對特定地區造成嚴重沖擊，該產業的勞動者將需要再培訓。《簡斯維爾》（Janesville）是一個不多見的案例研究，可供我們觀察在一座美國小城的主要工廠關閉后再培訓計劃能產生的效果。[[17]](#_17_Goldstein__2018)在這個案例中，再培訓沒有起到作用。參加該計劃的失業者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低于不參加者，即使找到了工作，收入也低于沒有接受再培訓的人。這項計劃為何一敗涂地？我認為是因為忽視了三個關鍵因素，而且這種忽視可以直接追溯到學校教育：失業者從來沒有學到過最基本的現代學習技能。在他們受雇于工廠的漫長時期里，這種忽視一直在持續。那家企業從來不用擔心（梯若爾建議的）因裁員而被收取懲罰性費用，所以沒有動力讓工人掌握更廣泛的技能；假如有那些技能的話，工人本來可以更容易地找到新工作。但最重要的一項忽視是，再培訓并沒有與任何旨在吸引新產業入駐該城的針對性刺激措施相配套。相反，集群效應引發了惡性循環，工廠的關閉導致當地其他企業也相應萎縮，所以接受再培訓后的勞動者可選的就業機會很少。簡斯維爾的經歷表明，沒有這種高規格的配套措施，再培訓就是一個提供虛假希望的陷阱。但很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即使失業工人曾受到更好的教育，提前掌握了更廣泛的基礎技能，政府也大力推動當地形成一個替代性的產業集群，他們也會猶豫要不要花費自己的儲蓄來接受再培訓（他們因失業而需要儲蓄作保障）。芝加哥商學院的兩位教授路易吉·津加萊斯（Luigi Zingales）和拉古拉邁·拉詹（Raghuram Rajan）建議向所有勞動者提供終生信用額度，在需要時可以用以支付再培訓的花費。[[Ⅶ]](#_VII_2018Nian_5Yue_Fa_Guo_Zheng)

方興未艾的機器人革命及其后的任何科技革命都將需要很多人接受再培訓。我認為機器人技術不太可能使工作崗位減少，因為人類的需求可能是永無饜足的，但它將改變需要人工完成的任務的種類。這是一項有益洞見的精髓。我們先把一般的工作看作是由一系列任務組成。即使看起來最常規的工作，也不可避免要在某些時候需要勞動者做出個人判斷，擁有與其他人溝通的能力，并采取一些非常規的行動。機器人技術將使一些任務消失，大幅降低生產成本。但仍有一些任務不適于由機器人來完成，且對機器人的依賴還將創造一些新工作，普通工人將轉而從事這些工作，他們的生產效率可能大大提高。[[18]](#_18_Acemoglu_and_Autor__2011)因為在不同工作中適合由機器人完成的任務差別很大，所以必需的工作技能可能會不斷發生大幅度變化。每隔一段時間，人們就需要接受再培訓才能執行新的任務組合。就像巴黎侍者比倫敦侍者收入更高一樣，未來的勞動者將比現在的勞動者收入更高，但前提是他們必須像巴黎侍者一樣掌握不同的技能。一個必然的推論是，未來需要大規模擴張的一個高度勞動密集型行業將是培訓業。

退休保障

我想退休，但最好是先別退休。但我已經知道我將從政府養老金和大學養老金中獲得多少收入：我在去世之前將一直有財務保障。但其他許多人不是這樣。

風險可以被很容易地分擔。大多數類型的風險只要分擔起來就會消失。但是由于“道德風險”問題，在分擔風險時要謹慎。在一些情況下，一旦風險被分擔，每個人都會更冒險。比如，因為我們都有火災保險，所以我們變得更粗心。但是，許多養老金領取者都要承擔的一項風險并不涉及任何道德風險，那就是所有固定繳款養老金計劃所包含的總風險。幾乎所有企業都認為像我享受的那種固定收益計劃的成本高得離譜。我享受的為英國大學服務的養老金計劃證明了這一點：其累積赤字已達到世界養老基金史上最高水平。對我來說幸運的是，這將由下一代學者和將支付更高學費的學生來承擔，不會影響我的權益。他們要是知道我真的很感激，應該會感到欣慰吧。[[Ⅷ]](#_VIII_Ji_Shi_Ta_Men_Bu_Man_Yi_Wo)

而所有其他人都被納入了固定繳費養老金計劃，他們因此面臨三個風險。一是他們為之繳費的養老金的整體表現可能比其他基金差；與固定收益計劃不同的是，資金短缺不由雇主承擔責任。二是他們在養老金內選擇的投資組合可能比其他雇員的平均選擇表現得差。最后一個風險是，在他們退休的那一天，當他們的收益兌現時，市場可能已經跌到長期平均水平之下——股市有時波動劇烈。由于這三個風險，有相同養老金繳費歷史的兩名雇員最終領到的養老金可能相差很多。

像我享受的那種固定收益計劃過于慷慨，把所有風險都轉嫁給了社會，但固定繳費計劃使人們在最脆弱的老年時期毫無必要地承受本可避免的風險。這種做法不是通過分擔來使風險消失，而是把風險拋給個體，讓他們在最脆弱的老年時期承擔。這是一個明顯可以修正的機制設計錯誤。

但面臨最嚴重的退休保障問題的人，是那些一生在各種極差的企業中工作的人。他們甚至沒有積累起享受固定繳費養老金計劃的權益。當他們不能工作時就會被拋入社會，成為社會的負擔。這也是一種市場失靈：他們的雇主被允許過度削減雇傭成本，不向養老基金足額繳費。像最低工資法的情況一樣，法國的政策似乎比英美模式優越：法律規定雇主要繳納高昂費用，這確保人們只要工作就能積累起領取養老金的充足權益。當然，這一附加條件意味著，必須通過經濟的運行為每個人創造足夠的工作機會。這是最關鍵的標準，唯有通過培訓計劃才能實現；用糟糕的工作來吸收失業者是一種失敗，而不是一種合理的替代方式。

歸屬于社會

我一直強調家庭、工作場所和國家是歸屬感的基石，但在所有健康的社會里還存在各種網絡化群體結成的密網，人們對其有歸屬感。羅伯特·帕特南的名著《獨自打保齡》（Bowling Alone）哀嘆了這種形式的歸屬感在美國的衰落。這樣的歸屬感鼓勵人們養成承認互惠義務的習慣，對抗孤立及伴隨孤立產生的自尊喪失和抑郁。美國社會歸屬的衰落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西方的普遍情況。在德國，正式注冊的公民社會團體（vereine）很常見，而且數量在不斷增加。一半的德國人加入了至少一個這樣的俱樂部，過去20年里俱樂部的數目增加了三分之一。德國參加此類團體的人口比例約為南歐國家的三倍。[[19]](#_19_Financial_Times__10_Septembe)

### 抑制享有一切的家庭

新的高受教育程度階層的崛起無疑擴大了社會不平等。但讓這個階層得以取得如許成功的大多數行為，并沒有以犧牲社會其他階層為代價。對他們所應采用的策略最好是學習而不是抑制。但高受教育程度階層的成功在一些方面是以犧牲其他人為代價的，包括零和的住房需求、零和的工作，以及零和的社會行為。

住房：是家還是資產

人們購房的動機有兩種，對大多數人來說這是自己的家，對少部分人來說這是個資產。在1950年的英國，全部住房存量的一半是被當作資產持有并出租給需要住宅的人的，只有30%的人真正擁有自己的房子。社會民主主義的偉大成就之一就是改變這一狀況。到1980年，個人租房所占比例急劇縮減，降到10%的低位，而自有住房占比近乎翻倍。1980年代初，公共政策進一步調整，允許居住在社會保障性住房里的租戶以折扣價買下房子，自有住房比例因此達到了70%的高點。

自有住房比例從30%升到70%是公共政策不斷改進帶來的偉大成就。擁有住房能增強人的歸屬感，如前所述，這是一項至關重要的社會之善。歸屬感是互惠義務的基礎，擁有住房還能讓人形成與社會更加休戚與共的感覺，并促使他們變得更謹慎：心理學家發現，一旦人們擁有了某樣東西就非常不愿意失去它。擁有住房還能讓人獲得穩定感。牛津的一條街道曾以租住房和自有住房為界，景象完全不同，至今這一差異依然可以察見，因為樹的高度不同——只有自有住房者種樹。

當時有四項公共政策使中等收入家庭能負擔得起房價：地方政府實施的建設計劃使住房供給增加，對凈移民的限制抑制了家庭數目的增長，對購房出租的限制抑制了純投資性的需求，對抵押貸款與收入之比的限制壓低了購房者的出價。向居住在社會保障性住房的租戶轉移房產的做法，使低收入家庭能擁有自己的住房，進一步增強了上述政策的效果。

從1980年代末開始，這場進步的勢頭開始消退。自有房屋比例到現在已降到60%，且仍在下降。年輕家庭再也買不起房。過去20年，房價從居民平均收入的3.6倍躍升至7.6倍。這不奇怪，因為此前抑制房價的四項政策都被推翻了。地方政府停止建設住宅，寄希望于私人企業起到替代性作用（這個希望落空了，原因之一是私人企業要想得到獲規劃許可的土地要比地方政府難得多）。移民控制被放松，這成為家庭數量增長的主要推動力。曾經對購房出租的限制性規定被鼓勵性規定取代，釋放出大量新的投資性購房需求。購房出租住房占住房存量的比例翻了一倍，達到20%左右。最后，政府解除了對抵押貸款融資的限制，接著便出現了貸款狂潮，裹挾各家銀行在懸崖邊上展開一場渴求額外利潤的賽跑。這就是房價暴漲的原因。另外，新的低收入家庭雖不斷出現，但已不再有類似于以前的向保障性住房的租戶轉移房產所有權的計劃。

由于高企的房價和無限制的信貸，把住房作為資產的人能夠以高價壓過想把住房作為住宅的人，后者通常是年輕家庭。20年前，超過一半的年輕家庭申請了抵押貸款，現在該比例是三分之一左右。被擠出的不是高技能的伴侶，而是低受教育程度階層的夫婦。新焦慮的核心是這部分人無力買房，而且買房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但以高價壓過他們的人是誰？隨著房價上漲，每個人都想買房，而能買房的人是能借到最多錢的人。這場競賽的贏家是高受教育程度階層中年齡更大的人，以及充分利用“借款買房再出租”機會的聰明人。一個引人矚目的例子是，一對教師夫婦辭職后逐漸建立了一個巨大的房產帝國。富人和聰明人獲得了雙重優勢：他們比年輕家庭的借款能力更強，所以可以在購房后收取高于他們要支付的利息的租金。因此隨著房價上漲，他們獲得了巨額的資產增值。

那么，我們對此能做些什么？在這個問題上，意識形態也會壞事。左派希望恢復1940年代的租金管制；與當時一樣，這將把人們捆在他們當前租的房子上，因而會降低工作流動性。右派希望增加為首次購房提供的融資；這會進一步刺激需求，從而進一步推高價格。然而解決這個問題并不難，因為我們知道什么做法奏效過，而且這樣的政策還能再次奏效。

合理的做法是增加住房供給，而最可行的途徑是打破規劃方面的僵局。由地方政府規劃新的建設項目是最合適的，同時可以與開發商合作實施規劃。地方政府可以規劃修建用來自住而非出租的住房。但住房供給的增加需要循序漸進，因為大幅增加可能導致房價暴跌，使許多年輕房主陷入負資產的困境中。相應地，通過恢復對移民的限制來抑制家庭數量的增加也是合理的做法。放松金融管制引發的信貸狂潮并沒有引發“涅槃”，而是最終造成銀行擠兌，這是監管的恥辱。儲戶包圍北巖銀行（Northern Rock）各分行這樣的景象還是英國150年來首次出現。和住房建設計劃一樣，改變需要循序漸進地進行，但方向是明確的：我們需要恢復抵押貸款與收入比率、抵押貸款與存款比例的上限。限制購房出租也是合理的做法。由于擁有住房對社會有正面作用，我們應該更重視那些以房為家的人，而不是以房為資產的人。

上述所有政策都是漸進性的，但在不造成房價下跌的情況下實現自有住房比例的大幅回升是可行的。具體途徑就是存量住房轉讓，類似于1980年代允許以折扣價購買社會保障性住房的做法，當時那種做法提高了住房擁有率。1980年代的社會保障性住房在當前的對應物是被政策吹大的出租房屋。許多這種房屋的房主坐擁巨額卻不應得的資產增值。政府應通過立法賦予租戶購房權，使存量房屋從房東向租戶轉移，具體方式或許可以模仿1980年代的大幅折扣。為避免這給房東帶來經濟困難，可以規定折扣應以抵押貸款余額為上限。[[Ⅸ]](#_IX_Zhe_Jiang_Xian_Yu_Gai_Zheng)顯然這與房東眼前的利益相沖突，但重新分配房價上漲產生的經濟租金，將其中一部分轉移給房屋的居住者，既是道德的做法，同時歸屬感增強為社會帶來的好處也與富人的開明自利相協調。

有目標感地工作

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生產率高的人對社會都大有裨益；但也有很多人在利用自己的技能，以犧牲他人利益為代價謀求自己的財富。

金融業和法律業的很多工作就是才能沒有用到正確地方的主要表現。我們再來看看金融資產交易的驚人規模。盡管活躍的交易有助于提高資產流動性，但大部分這樣的交易是零和性的，假如交易量減少，社會不會蒙受任何損失。既然是零和性的，這些交易為何會發生？答案是，最聰明的人智勝略遜一籌的人。資產市場在很大程度上與“錦標賽”類似，在這樣的競賽中，贏家比輸家擁有微小的信息優勢。擁有超乎尋常的能力和資源、能夠智勝他人者是贏家，并因此賺得驚人的財富。由于信息優勢所具有的潛在好處，人們始終有爭取獲得信息的動力。一家公司投資建造了一條芝加哥至紐約的高速光纜，這條光纜可以使這兩個市場之間的價格信息傳輸時間縮短幾毫秒。[[20]](#_20_Michael_Lewis_and_Dylan_Bake)這項投資的商業回報依賴于其在電子化的交易中創造微小的優勢，因此可以說服幾家公司為它投資，它們將從中獲益，而仍像以前那樣在幾毫秒后收到信息的公司將受損。有人投資修建這樣的光纜，沒人管的橋梁卻因為年久失修而倒塌，這樣的社會沒有分清事情的輕重。

過度的資產交易除了像第四章探討的那樣會損害企業前景，還會造成一些社會成本。一是它會無謂地擴大社會不平等。聰明絕頂的人為自己的利益工作，這正是投資銀行獎金制度的含義，投資明星實際上只把個人收益的一小部分支付給企業，以補償企業提供的服務。德意志銀行是為投資明星服務的投資銀行中最極端的例子，它為明星員工支付710億歐元獎金，卻只付給股東190億歐元股息。[[Ⅹ]](#_X_Sui_Zhu_Gu_Jia_Bao_Die__Gu_Do)

權力不再掌握在資本所有者手中，甚至不再掌握在替他們管理財富的人手中。養老基金無力支付聘請投資明星所需的巨額薪酬，因此養老基金的管理者是聰明程度略遜一籌的人。隨著這兩個群體之間展開交易，未來的養老金領取者的財富逐漸被轉移到了聰明絕頂的人手中。

另一項社會損失是，這些零和錦標賽鎖住了一些社會上最聰明的人，使他們從事對其他人毫無用處的工作。但這些人本可能對社會有巨大的價值。與資產管理對立的光譜的另一端是創新。經濟學家估計，創新者通常只獲取其創造的總收益的約4%，其余的96%為社會其他成員獲得。因此，就市場為無比聰明的人提供的激勵機制而言，促使他們把稀缺的能力用于創新的機制太弱，而促使他們把這些能力用于資產交易的機制則太強。我還沒看到過任何把這種形式的社會成本量化的嘗試，但我感覺這項成本不小，因為創新和資產管理都是龐大的部門——在美國，金融業產生的利潤占所有公司利潤的30%左右。從另一個角度看，金融業提供的服務被認為能提高經濟效率，但若要使金融業與其他經濟部門達到平衡，金融業需要帶動其他經濟部門的利潤提高43%[[Ⅺ]](#_XI_30Chu_Yi_70Yue_Deng_Yu_0_43)，才能彌補它為自身獲取的利潤。這似乎不大可能：假使我們的金融業小一些，我們真能注意到有那么大的不同嗎？

律師的情況和資產管理者相似。花旗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威廉·比特（Willem Buiter）恰如其分地指出：三分之一的律師創造我們稱為“法治”的巨大社會價值。還有三分之一的律師在處理本質上是零和博弈的法律糾紛：各方都會為贏得這場博弈而過度投資，所以這些投入對社會無用。法治代表著巨大的公益，但沒有任何商業律師致力于實現“正義”，他們只想努力在博弈中勝出。法律糾紛的當事人購買的最后一小時的律師服務，其產生收益的方式不是創造更多正義，而是以犧牲對方當事人的利益為代價來增加贏得博弈的機會。最后三分之一的律師是社會掠食者：他們受雇借助法律騙局從高生產率者那里分一杯羹，是終極的尋租者。美國發生過一場這樣的法律騙局：有人買斷多余的專利權，以此來發起不正當的法律訴訟，從創新的企業那里勒索金錢。這場騙局駭人聽聞，使已陷入僵局的國會都毅然彌補了這個法律漏洞。在英國，在一種依賴醫療保險騙局的訴訟被法律禁止后，一家專門打這種官司的律師事務所的市值在一夜之間減半。

律師很有價值，但現在律師太多了。眾多的激勵機制把年輕人吸引到這個行業。我最初選擇法律作為專業是因為我天真地想象律師就像現代的牧師，提供建議、裁斷、幫助，有時他們就是牧師。但當我發現英國律師70%的收入來自住房交易時，我改變了自己的選擇。尋租主宰著這個行業。我不會成為牧師，而是寄生蟲。現在，為正義而戰的想法吸引了很多年輕人——法庭上的戰斗是影視劇里的常見主題。倫敦金融城律師七位數的收入也可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律師像演員一樣，數量太多了。哈佛大學著名經濟學家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曾提出，一個社會中工程師與律師的人數比與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存在相關性。這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一個更大的問題：市場力量無法使掠奪性活動與具有社會價值的活動（例如創新）實現正確的平衡。

那么，我們能做些什么？和針對大都市問題的做法一樣，征稅是一條解決途徑，但這中間有個重要差別。大都市創造的租金是有社會價值的，只是分配得不公正。對大都市里的高技能勞動者征稅不是為了抑制他們的行為，而是為了重新分配租金。而資產交易者和律師攫取的租金是不具有社會價值的，這些活動本身需要被抑制。因此應當針對這些活動的目的而不是其發生的地點征稅。

已經有很多針對金融交易征稅的提議。任何此類稅收都要精心設計，以對準該受到抑制的交易類型。例如，股票交易遠遠比外匯交易更需要被抑制。目前的常態是，大企業的股票通常一年內被換手七次，這對社會毫無益處。

至于對訴訟征稅，稅制設計應當達到兩個目的：減少糾紛數量，減少律師目前依靠糾紛攫取的高額租金。律師并不對自身利益的誘惑免疫。當以合同的字數為依據收費時，律師會認為合同需要寫得很長；一旦根據合同件數而非字數收費，合同很快就會變短。訴訟費用不斷攀升，吞噬了訴訟中存在的租金。舉一場許多英國人熟悉的近期的訴訟為例：政客安德魯·米切爾（Andrew Mitchell）起訴一家報紙誹謗。這場訴訟的實質是要確認，米切爾在與一名阻止他把自行車推過大門的警察發生口角時究竟使用了什么樣的言語。由于沒有決定性的證人，法官要決定該相信哪一方的證詞——是米切爾先生的還是那名警察的。在審理這樁小案件的過程中，雙方的律師費都高達300萬英鎊，將全部由敗訴方承擔。換言之，這起瑣碎的案件消耗的成本，相當于三個英國家庭一生收入的總和。我們可以通過對這樣的訴訟征稅，促使其更多地以更簡單的方式解決，同時把一部分過高的律師費所造成的租金轉移給社會。律師肯定會用各種理由把這一提議說成是對司法的侮辱。[[Ⅻ]](#_XII_Dan_Ye_Bu_Yi_Ding__Zuo_Wei)

還有另一個途徑：使其羞愧。正如我們需要有道德感的公民施壓讓企業感到羞愧，督促它們采取更具使命感的行動一樣，社會制裁的力量也會剝去尋租行業的光鮮外衣。我們需要讓有才華的年輕人直面其職業選擇的社會影響，讓他們知道巨額收入究竟是如何產生的。

抑制社會分化

1958年之前，白金漢宮每年為初入社交界的上流社會的新人舉辦舞會，這是一個英國上流社會的擇偶活動。當足夠多的人認識到，以這樣的方式固化社會分裂有害無益時，這種做法就停止了。顯示上層階級變得更具開放性的標志性事件是威廉王子和凱特·米德爾頓（Kate Middleton）的婚姻，凱特的母親曾是一名空乘，像凱特這樣的人是不會被邀請去參加新人舞會的。然而，舊有上層階級內部的“配對性擇偶”雖然不存在了，但取而代之的新精英的配對性擇偶更高效。[[21]](#_21_Zai_Ying_Guo__Ji_Yu_Jiao_Yu)威廉王子和凱特在圣安德魯斯大學（St Andrews）學習時相識，這是一所精英大學。相似者之間的婚姻是造成社會不平等的強大力量。這樣的配對性擇偶是一種有助于婚姻穩定的力量，也在無意中擴大了階層分化，然而我們幾乎沒有辦法改變這一現狀。

但是，一些行為是具有剝奪性的，并可以得到遏制。在美國，從1981年到1996年，小學生的學習時間驚人地增長了146%。[[22]](#_22_Harris__2018)過去十年里，英國大學生的自殺率上升了50%。由于“虎爸虎媽”所執迷的成功有其零和性的一面，他們的壓力不僅會傳染給自己的孩子，還會傳染給其他人。在一定程度上，這個問題可以在學校里得到解決。學校領導和他們的員工自然會試圖建立學校的主流文化。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奮斗的目標是給學生的努力程度設定下限，但或許也需要規定上限。雖然英國不能落后于全球水平，但我們不能讓青少年的校園時光變成投資銀行里殘酷競爭模式的翻版。

關于殘酷競爭，2013年登上頭條的一則新聞是，一家投資銀行的暑期實習生急于給人留下好印象，在連續工作20小時后猝然倒地身亡。這是逐底競爭的極端例子，它使很多群體成了工作狂。少工作會使每個人都獲益，但沒有哪個人敢先行一步，因為這會使他們輸掉爭取晉升的競爭，而且違反主流規范會使他們失去尊重。這是一個經典的協調問題，有一個直截了當的解決方案——公共政策。可以通過征稅來抑制，或者通過監管來減少長時間的工作。法國政府實行了把每周工作時間上限降到35小時的舉措，卻遭到廣泛嘲笑。但我記得在一個奉行工作狂文化的組織里，一名疲憊的經理向往地告訴我他的CEO正試圖推行35小時工作制。為了將不斷提高的國家生產力轉化為國民更美好的生活，逐步減少工作時間并相應延長假期是合理且必要的途徑。不采取這些做法及上文提出的政策，社會將進一步分裂為兩個對立的階層：一是工作狂的高技能階層，有大把金錢但時間很少；二是低技能階層，有大把時間但金錢很少。

### 結論：有鋒芒的社會母愛主義

工作應該給人生的核心歲月帶來目標感。目前，對許多幸運者來說，工作有這樣的效果，但并非對所有人都如此。許多人發現自己從事的工作幾乎不提供獲得尊嚴感的機會。因為這些工作的技術含量太低，不足以成為自豪的來源；或者這些工作無法讓人覺得對社會有貢獻，因此無法產生滿足感。這才是失敗的癥結，而不是因為簡單的薪酬差異；由于這樣的失敗，家庭的分化變成了工作的分化。收入不平等問題很重要，而且隨著不同人的人生繼續推進直至退休，收入不平等會越來越嚴重。但如果只通過再分配解決這個問題，不僅需要花費巨額的稅收和福利，而且目標感（或意義）缺失這個核心問題將變得更加嚴重。許多人將依賴他人的生產力過活。

目前的挑戰是縮小不斷擴大的生產率分化。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我們進行一場長征，首先就要從父愛主義社會管理（國家強制管理拒不服從的家庭）轉向母愛主義社會管理（國家以實際支持來為這些家庭提供緩沖）。如前所述，父愛主義社會管理的矛頭應該從分崩離析的家庭轉向最成功的那一小部分人的破壞性行為。要建設一種使每個人無論生活在哪里都能有尊嚴地工作的資本主義，這兩點都是必需的。

[[Ⅰ]](#_I_7)這個術語很新，以至于拼寫檢查認為它拼錯了。

[[Ⅱ]](#_II_8)事先告訴懷孕的母親孩子一出生就會被接走，會使母親孕期壓力陡增，給胎兒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

[[Ⅲ]](#_III_7)盡管羅瑟勒姆的人口是牛津的兩倍，拼寫檢查卻認為“Rotherham”這個名字是個拼錯的單詞，真是和“邊緣化”的地位很搭；而拼寫檢查可不會對“Oxford”這個單詞提出質疑。

[[Ⅳ]](#_IV_6)Bob Geldof，愛爾蘭歌手、作曲家。——譯者注

[[Ⅴ]](#_V_6)英國曾有這樣的學院，稱為理工學院。這些學院都被改成了大學，這暴露出英國太看重學術性聲名的弊病。

[[Ⅵ]](#_VI_5)2016年，在英國接受繼續教育的學生中只有4,000人獲得技術水平獎，不到英國總人口的萬分之一。（艾莉森·沃爾夫，英國《金融時報》2017年12月28日）

[[Ⅶ]](#_VII_4)2018年5月法國政府出臺了一項類似的政策。

[[Ⅷ]](#_VIII_3)即使他們不滿意我也敢向他們保證，我能在法律上制住他們——感謝上帝賜予我們律師。

[[Ⅸ]](#_IX_2)這將限于該政策首次宣布之日尚未償還的抵押貸款，以避免房東通過再抵押繞過這一政策。

[[Ⅹ]](#_X_1)隨著股價暴跌，股東最終承擔巨額損失，遠遠超過這些股息。

[[Ⅺ]](#_XI_1)30除以70約等于0.43。

[[Ⅻ]](#_XII_1)但也不一定，作為對本書求真性檢驗的一部分，我請一位很有經驗的律師評價這些建議。他的回應是：“我喜歡這個方案，它把目標對準了富有的倫敦金融城和其他大都市的律師。”但也許他不具有代表性，因為他是一名貴格會教徒。

[[ⅩⅢ]](#_XIII_1)Hampstead，倫敦富人區。——譯者注

[[ⅩⅣ]](#_XIV_1)若讀了法律我可能已成為一名尋租的律師，而不是在寫書。

## 第九章 全球分化：贏家和落后群體[[Ⅰ]](#_I_Ben_Zhang_Shou_Yi_Yu_Yu_Tuo_N)

全球化已經成為提高全球生活水準的強大引擎。在許多公共政策問題上有分歧的經濟學家也幾乎一致這樣認為。但公眾對經濟學家不斷提出的建議已經失去了信心。在一定程度上，經濟學家由于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喪失了權威。但還有一個更具體的原因：經濟學家對全球化的熱情太籠統，不夠細致。這很奇怪，因為“全球化”甚至不是一個經濟概念，它是新聞界對各種差異極大的經濟進程的總稱，這些進程不可能產生同樣的影響，更不用說產生普遍的良性影響了。

經濟學家沒有謹守專業性，由于擔心任何批評都會壯大民粹主義，他們對這些不同進程的負面影響幾乎沒有進行什么研究。但普通公民對這些負面影響有切身體會，經濟學家對這些影響的否認導致人們普遍拒絕聽取他們的“專家”意見。為了讓經濟學重建聲譽，我們必須提供更為平衡的分析，承認并妥善評估這些負面影響，以便制定緩解這些影響的對策。相比于繼續憤憤不平地為全球化辯護，認錯更有利于經濟學的發展。

### 在貿易問題上認錯

認錯從貿易問題開始。貿易在各國內部及各國之間導致了有效的財富再分配。

比較優勢的主張告訴我們，在各國內部，由于貿易帶來了共同的收益，只要在每個國家里通過再分配進行合適的補償，就有可能使每個人的境況都得到改善。而經濟學界已經偏離了這一正確的命題，轉向了一個明顯錯誤的命題：貿易確使國家里所有人的境況都變好了。國際經濟學對各國的內部補償機制幾乎沒有表現出任何興趣。這是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因為在簡單的模型中有兩個特征被忽視了：損失主要通過勞動力市場傳遞，且在地理上是集中的。當謝菲爾德失去其鋼鐵業時，盡管英國其他地方的消費增量可能超過了謝菲爾德的失業者所經歷的消費損失，但這一點并不能帶來多少安慰。

在各國之間，全球貿易推動各國走向不同的專業化。簡而言之，歐洲、美國和日本的專長是知識產業，東亞是制造業，南亞是服務業，中東是石油業，非洲是礦業。這使東亞和南亞都以驚人的速度向高收入國家靠攏，以史無前例的方式降低了全球不平等。但自然資源開采面臨著特別的治理壓力，因為它會產生巨大的租金，其所有權必須以政治方式決定。一些國家成功應對了這樣的壓力，但許多國家轉向了大規模的尋租模式。例如，石油并沒有讓南蘇丹獲益，反而引起了武裝沖突，并引發饑荒和大規模的流離失所。2000—2013年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高漲似乎推動了非洲和中東的發展，但這一點現在看起來值得懷疑。新全球數據整理了衡量人均國民財富的綜合指標，不僅包括資本存量等傳統組成部分，還包括教育和自然財富。[[1]](#_1_World_Bank__2018)這些數據展現了兩幅時代快照——1995年和2014年，恰好包括了大宗商品的超級周期。我們從中可以看出窮國自然資源收入史無前例的暫時性增長是否帶來了可持續的收益。數據揭示的是，最窮的國家與其他國家的差距進一步拉大了。低收入國家人均財富增長的絕對值和百分比都遠遠低于中高收入國家，而且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區，財富事實上減少了。和貿易對各國內部的影響一樣，樂觀的模型只是顯示出潛力。把潛力變為現實有賴于公共政策，而這些模型略去了這樣的細節。

### 在監管問題上認錯

企業已經全球化，形成法律關系復雜的子公司網絡，這些子公司相互交易，但都受母公司控制。對這樣的企業而言，納稅變成了依靠自覺的事情。在英國，星巴克就是這方面的例子。盡管星巴克的英國子公司售出了數十億杯咖啡，但在整整十年里它幾乎沒有創造應課稅的利潤。據發現，位于荷屬安的列斯群島（Dutch Antilles）的另一家子公司盡管沒有售出任何咖啡，卻創造了極高的利潤。這家公司不賣咖啡，只是把使用“星巴克”名稱的權利賣給英國子公司。它理直氣壯地宣布，它已經在荷屬安的列斯群島繳納了所有應繳稅款，但它沒有提的是，那里的稅率是零。在欠發達國家，與此類似的情況存在于自然資源開采業。例如在坦桑尼亞，一家金礦公司一邊向坦桑尼亞稅務當局報告損失，一邊向股東派發巨額股息。

企業全球化的一個更惡劣的方面是空殼公司與銀行信息保密港的增多。空殼公司是隱蔽真實所有者的公司，一般由技能高超的律師在大都市（通常是倫敦或紐約）設立。如果這樣的公司在保密港管轄區內開設銀行賬戶，賬戶中的存款會受到雙重保護，不會被審查。這種結構已成為包庇腐敗與犯罪資金的主要手段。近年來比特幣也成為一種選擇。

像貿易本身一樣，若想要企業全球化的潛在好處成為現實，公共政策必須做出反應。實踐中，情況并非如此：企業全球化了，但監管并沒有相應地全球化。征稅和監管的職權依然牢牢留在國家層面。正如我在第六章中探討的，我們的超國家協調機制，包括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盟、G7和G20，已經喪失了以開明自利為基礎構建有約束力的互惠義務的能力。各國都更傾向于加入這場逐底競賽。這樣的治理失敗已經成為現代全球化最丑陋的現實。作為這個問題的重災區，英國在2013年擔任G8主席國期間，開始帶頭解決這個問題。[[Ⅱ]](#_II_Wo_Zhua_Zhu_Ji_Hui_Wei_Zhe_Y)例如，英國率先打擊律師借以隱瞞資產所有權的“空殼公司”。英國現在規定，所有英國企業的真實所有權必須進行公開登記，這切斷了腐敗資金的一條主要傳輸渠道。

### 在移民問題上認錯

企業利益高度影響了經濟政策的制定，其關注焦點之一是移民帶來的好處。企業顯然有理由青睞移民——移民使企業可以招聘的勞動者增多。然而，企業和公民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盡管一些移民對企業和公民都有好處，但有時移民會降低公民的福利，卻依然有利于企業。

全球化把貿易和勞動力流動放在一起對待，但這里存在一個根本性的學術差別：貿易是由比較優勢驅動的，而勞動力流動是由絕對優勢驅動的。因此，盡管按照標準教科書的假設，移民能在全球范圍內增進效率，但沒有理由期望移民既對接收國有利，也對輸出國有利。遷徙帶來了第三類受益者——移民自身，他們是唯一肯定受益的群體（假如他們不受益就不會遷徙）。驅動勞動力流動的絕對生產率差異構成他們獲得的利益。移民能在全球范圍內增進效率，因此理論上，假如移民向其接收國及留在母國的同胞轉移財富，所有人的境況都會變好。但在沒有這種轉移的情況下，移民可能造成兩方受損的結果。對他本人來說移民是合理的，但它不一定會使社會整體上獲益。例如，假如一名蘇丹醫生遷到英國開出租車，全球GDP會上升，但這明顯是浪費了這位醫生的稀缺技能。

一旦在第七章介紹的大都市租金的背景下考察移民問題，移民可能給公民造成的成本就顯而易見了。大都市產生的“集聚經濟租金”部分流入土地所有者手中，但主要流向那些技能高、住房需求低的勞動者。如果國家向移民開放邊界，潛在勞動者的規模將會擴大。對一般規模的國家來說，全球勞動力約為本國勞動力的100倍，因此全面開放邊界將帶來巨大的影響。許多外國人具有高于本國人的技能水平，而住房需求低于本國人。這些移民有動力去競爭這些高生產率的工作崗位，所以他們將會取代本國人。

這個過程能在全球范圍內增進效率：大都市經濟增長，集聚經濟租金也將隨之增多。但這些租金會落于誰手？這一群技能水平較高、住房需求較低的勞動者加入后，租金將從土地所有者向高技能水平工人那里轉移，這將使租金更難以被征稅。在高技能水平群體中，那些在大都市保住高技能水平工作的現有市民將會獲益；通過與技能水平更高的人一起工作，他們會變得更有效率。但競爭失敗、喪失大都市高技能水平工作崗位的公民，將失去原本能享有的經濟租金。他們將在非都市做效率較低的工作。這使租金從公民轉移到移民手中。如果說公民表達的政治態度反映了其自身利益的話，我們可以預期這兩種效果的顯示方式：大都市高技能水平公民將表現出親移民情緒，其他地區的公民將表現出反移民情緒。

可以說英國就發生了這樣的情況。今天倫敦的人口數量與1950年代一樣，但其構成發生了顯著變化。2011年，倫敦37%的人口是第一代移民，而1950年該群體少到可以忽略不計。那么假如沒有移民，倫敦人口就會縮減37%嗎？不大可能，任何大都市都沒有發生這樣的情況。更符合現實的情況是，比許多市民技能水平高、住房需求低的移民來到倫敦，比過了這些市民，獲得了倫敦的就職機會。就全國范圍而言，英國脫歐公投揭示了兩種身份認同的分歧（第三章中關于“理性社會人”的討論解釋了這一分歧）。但倫敦與英國其他地區的差異，可能反映了移民對倫敦的兩個新階層產生的不同的經濟影響。事實上，通過分析英國脫歐公投，我們可以驗證兩個多少有些違反直覺的預測。[[Ⅲ]](#_III_Hou_Wen_De_Shu_Ju_Shi_Niu_J)根據此處的理論可以預測，那些沒有被移民搶走工作的受教育程度高的階層的成員，會因高技能水平的移民流入倫敦而在工作中有更高的效率，因此與非都市地區的受教育程度高者相比，他們投票支持脫歐的可能性較低。我們發現這個預測是對的：他們支持脫歐的可能性要低個25%。而屬于受教育程度低的階層、面臨來自低技能水平移民的競爭但尚未離開倫敦的人，事實上因移民流入而受損，因此與生活在英國其他地區的同階層人士相比，他們投票支持留歐的可能性應該會較低。這個預測也是對的：他們支持留歐的可能性要低個30%。因此，“理性經濟人”假說也許在倫敦依然符合現實。與流行的大都市視角敘事——非都市居民排外相比，用階層構成差異和移民對其造成的不同經濟影響來解釋英國脫歐公投，或許更有道理。

移民給公民帶來的另一個很不同的代價是，移民傾向于破壞社會中建立起來的互惠義務。如前所述，1945—1970年人們取得的超凡成就是利用共同身份建立了許多新的互惠義務。生活更好的人接受義務，幫助生活不幸的人。另一個為遵守義務賦予意義的敘事強化了這一關于義務的敘事，那就是命運無常，說不定幸運者的下一代就將淪為不幸者，所以這樣做符合每個人的開明自利。這些關于共同身份、互惠義務和開明自利的敘事的形成過程，并沒有移民的參與，所以一國公民可能會懷疑移民是否接受了這些敘事。因此，過得更好的公民可能不再像以前那么愿意繳納既讓移民也讓本國公民獲益的稅收。對缺乏技能的憂心忡忡的非都市居民來說，這一情況的影響尤為不利。正當他們需要同胞履行義務時，同胞卻因移民而不再管他們了。不幸的是，我們已有令人信服的證據來證明這一效應的發生。

來自歐洲各地的新調查證據記錄了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人對旨在幫助窮人的再分配性稅收的態度。[[2]](#_2_Yi_Xia_Jie_Guo_Lai_Zi_Rueda)不奇怪的是，在歐洲各地，與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人相比，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人對再分配所懷的熱情較低。但當我們既考察這些反應，也考察移民占總人口的比例時，一個清晰的規律就出現了：移民占比越高，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人支持再分配性稅收的意愿就越低。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人顯然仍對較窮的同胞懷有某種責任感，但外國人的加入導致這一身份鴻溝進一步擴大時，這種責任感就逐漸減弱了。一種新方法是模仿醫療實驗，隨機把人分為兩組，只讓其中一組接受某種“待遇”[[Ⅳ]](#_IV_Ying_Wen__treatment_You__Dai)。兩位西班牙研究者用這一全新方法研究同樣的問題，問兩組人同樣的問題，但對其中一組，通過不斷討論移民來“突出”這一問題，讓他們對此形成更深的印象，對另一組則突出某個輕松的話題。[[3]](#_3_Munoz_and_Pardos_Prado__2017)他們發現了與上一項研究相同的傾向：一直被提醒要注意移民問題的那一組繳納再分配性稅收的意愿明顯較低。

因此，盡管一定規模的移民可能對接收國、輸出國及移民自身都有利，但沒有理由認為，由市場驅動、追求自利的私人決策所創造的移民規模，是社會意義上最合理的移民規模。意識形態在這個問題上和其他問題一樣誤導了人們。左派本能地對市場驅動的進程持懷疑態度，只有移民是例外，右派全盤性地為自由市場歡呼，也只有移民是例外。實用主義和實踐理性是更巧妙的做法。我們應該問，多大規模以及什么樣的移民對社會有利。

### 結語：經濟學家的認錯

像我這樣的經濟學家一直熱衷于為全球化辯護，反駁其批評者。這樣做的凈效果是積極的，但全球化不是一個要么全盤接受要么全盤拒絕的整體現象。全球化是各種經濟與社會變化的大雜燴，這些變化都是可以單獨拿出來分析的。公共政策的任務是：鼓勵全球化中肯定有益的成分；有的成分大體是有益的，但會對某些群體造成重大損失，對這些成分要安排補償機制；有的成分會導致財富再分配，而我們無法快速地通過補償機制來糾正這種再分配，對這些成分則應限制。

[[Ⅰ]](#_I_8)本章受益于與托尼·維納布爾斯的無數討論。本章借鑒了Collier （2018a）。

[[Ⅱ]](#_II_9)我抓住機會為這一努力做出了貢獻（Collier, 2013）。

[[Ⅲ]](#_III_8)后文的數據是牛津大學選舉學家斯蒂芬·費舍爾（Stephen Fisher）博士基于最可靠的英國脫歐民調數據得出的。我們很晚才意識到可以用這些數據來檢驗這些假設，所以未能在本書出版前完成論文，但我們計劃將研究結果提交專業評審并發表。在此期間，這些研究結果必須被視為臨時性結果。

[[Ⅳ]](#_IV_7)英文“treatment”有“待遇”和“治療”兩種意思。——譯者注

# 第四部分 重建包容性政治

## 第十章 戰勝極端派

資本主義正在制造分裂的社會，其中的許多人過著焦慮的生活，但它是唯一一種已被證實能創造普遍繁榮的經濟體系。近年來發生的情況并不代表資本主義的固有趨勢，而是必須糾正的具有破壞性的功能失調。這并非易事，但以審慎的實用主義為指導，基于符合我們當前所處環境的證據和分析，就能制定將逐漸起效的政策。在大蕭條之后的時代，務實的政策讓資本主義重回正軌，而我們可以讓這一幕重演。但這樣的政策無法從我們的政治體制中產生。和經濟體系一樣，我們的政治體制也失靈了。為什么我們不再能務實地尋求問題的解決方案？

上一次資本主義運行良好的時代是1945年至1970年。當時，一種社群主義形式的社會民主主義指導著政策，主流政黨普遍奉行這一精神。但社會民主主義的倫理基礎逐漸瓦解。社會民主主義的源頭是19世紀人們為解決當時的焦慮而發起的合作運動。以團結敘事為基礎，人們結成不斷深化的互惠義務網絡，解決了當時的焦慮。但是，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領導者逐漸從合作運動變成了功利主義的技術官僚和羅爾斯主義的職業法律人。他們的倫理觀讓大多數人缺乏共鳴，于是選民逐漸收回了對他們的支持。

各政黨為什么沒有轉向實用主義？選民很可能要為此負責。實用主義要求人們關注具體證據，運用實踐理性來評估被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否真的有效。這需要選民付出努力。知情選民是最佳的公共品，而像所有公共品一樣，每個個體提供公共品的動力都微乎其微。大多數其他公共品都可以由國家提供，但這種公共品只能由選民自己提供。

實際發生的情況是，填補社會民生主義崩潰造成的真空的卻是一些承諾選民不用付出努力就能解決問題的政治運動。實用主義有兩個敵人——意識形態和民粹主義。二者都抓住了自己的機會。左右兩派的意識形態都主張不用關注具體情況，不用采取審慎態度、奉行實踐理性，某種萬能的分析能告訴人們適用于所有情境和時代的真相。民粹主義提供了另一條捷徑：超凡魅力領導人，他們擁有顯而易見、可以立即見效的解決方案。二者常常融合，變成一股更強大的力量：充滿激情、兜售誘人新療法的領導人把曾經名譽掃地的意識形態重新搬出來用。且來看看他們大展身手的先驅：激進左翼有伯尼·桑德斯、杰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和讓—呂克·梅朗雄；本土主義者有瑪麗娜·勒龐和諾伯特·霍費爾（Norbert Hofer）；分離主義者有奈杰爾·法拉奇（Nigel Farage）、亞歷克斯·薩蒙德（Alex Salmond）和卡萊斯·普伊格德蒙特（Carles Puigdemont）；娛樂界名人有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和唐納德·特朗普。

當前政治戰場的主要形勢似乎是，震驚和憤怒的功利主義與羅爾斯主義先鋒隊，正在遭受民粹主義意識形態分子的進攻。這是最糟糕的政治局面。要擺脫這一狀況，實現根本性變化，需要把一種不同的倫理話語注入我們的政治。但我們的政治體制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導致了目前的兩極分化，這是我們將在本章探討的。

### 政治是如何兩極分化的？

我們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但其架構的一些細節使其日益趨向兩極分化。大多數西方國家的投票制度都對兩個最大的政黨有利，因此選民面臨的選擇取決于這兩個政黨提供的政策內容。這里最重要的危險步驟是，許多國家的主要政黨以增進民主的名義授權其所有成員選舉本黨領導人。而在過去的體制中，政黨領導人是從黨內最有經驗的成員中挑出來的，并通常由選舉出來的代表選出。

最傾向于加入某個政黨的人，是已經成為某種政治意識形態追隨者的人。因此，上述變化傾向于使更多的意識形態分子被選為領導人。在三種主要意識形態中，事實證明社會民主主義最脆弱，原因我在第一章中已有闡述。它是功利主義和羅爾斯主義哲學的結合，并不是牢固地以我們的共同價值觀為基礎的。這導致激起兩極分化的意識形態主導了政治領域。納粹大屠殺徹底粉碎了本土主義的聲譽，這段歷史至今仍歷歷在目，但當中間偏右的主流政黨在移民政策上采取功利主義與羅爾斯主義倫理的混合體時，本土主義政黨找到了突破口。[[1]](#_1_Pardos_Prado__2015)

許多選民是實用主義者，但由于意識形態分子的崛起，他們面前的選項是由極端派別選定的。此外，許多人發現這些選項都沒有吸引力而脫離了政治，這使領導者的制勝策略發生變化：他們不再試圖采取吸引中間搖擺選民的政策，而要確保所有有意識形態動機的選民都參加投票。為了促進“包容”，投票和加入政黨的最低年齡可以被下調，但缺乏責任感和經驗的青少年最容易受到極端意識形態的影響。那些感覺喪失了自己的利益代表的非意識形態選民，則成為民粹主義者的爭取對象。

近年來的幾次重大選舉表明這一進程正在發生。在2016年的美國大選中，左右兩派的意識形態民粹主義者能通過對資本主義失敗之處的簡單化的批評來主宰選舉進程。左派方面，伯尼·桑德斯以微弱劣勢受挫，但在這一過程中，他嚴重削弱了民主黨基層選民對典型的羅爾斯主義職業法律人希拉里·克林頓的認同，希拉里則系統性地尋求“受害者”選民群體的支持。[[2]](#_2_Chua__2018)右派方面，作為名人的唐納德·特朗普利用高超的媒體技巧，戰勝了所有更偏中間派的候選人。在贏得各自黨派的提名后，特朗普繼續進行他簡單化的批評，而希拉里未能成功建構一種更成熟的批評，使她看起來更像是當前體制的辯護人。

在2017年的法國大選中，兩大主要政黨的所有潛在領導人出局。左派方面，時任總統、典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奧朗德因認識到自己太不受歡迎而未參加選舉。他的總理、另一名社會民主主義者曼努埃爾·瓦爾斯（Manuel Valls）在黨內初選中就被淘汰，社會黨內的左派意識形態分子貝努瓦·阿蒙勝出。右派方面，前任總統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和中間派的阿蘭·朱佩（Alain Juppé）都失敗出局，共和黨右翼的意識形態分子弗朗索瓦·菲永（François Fillon）勝出，他后來在大選中因個人原因而出局。因此要選出兩名最終候選人的大選第一輪成為五位非主流領導人激烈角逐的舞臺，其中四位是意識形態分子，一位是實用主義者。兩個主流政黨的候選人都沒有進入第二輪，最后的競爭在實用主義者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和右翼本土主義民粹主義者瑪麗娜·勒龐之間展開。然而，只要3%的法國選民在第一輪競選中做出不同的選擇，最后的競爭者就將是兩名意識形態化的民粹主義者——右翼的勒龐和左翼的讓—呂克·梅朗雄。法國的選舉體制差一點就讓法國陷入困境。與希拉里·克林頓不同的是，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對現有體制表達了清晰、非意識形態化但又成熟的批評，把爭取對象定位為普通法國公民而不是“受害者”群體，同時揭露了民粹主義者所兜售的藥方的空洞性。他的競選方案是實用主義的典范，運用良好的溝通技巧，他讓人們接受了他更復雜的主張，挫敗了民粹主義的江湖藥方。

在2010年到2017年兩次英國選舉之間的時期里，工黨改變了其推選領導人的程序。2010年，典型的功利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工黨領導人戈登·布朗作為工黨議員毫無爭議地成為黨首。2017年，領導工黨的是民粹主義者杰里米·科爾賓，他在工黨議員中獲得的支持微乎其微，但由于工黨已賦予年輕人輕松入黨的權利，熱情的年輕理想主義者遂把科爾賓選為黨首。這一做法幾乎完全改變了工黨的組成結構。右派方面，2010年當選的中間派領導人戴維·卡梅隆（David Cameron）在2016年被不為人知的特蕾莎·梅（Theresa May）取代。這是保守黨議員為避免遵循新黨章而采取的緊急舉措。新黨章規定黨魁應由黨員選舉產生，這很可能導致某個非主流的意識形態分子當選，2001年首次實行時就導致了這一結果。目前，英國兩大主要政黨的領袖選舉制度幾乎肯定會導致這樣的結果：選民必須在處于兩個極端的意識形態分子之間做出政治選擇，不是全素就是全葷。在2017年的選舉中，杰米里·科爾賓提出了左派意識形態民粹主義綱領，而特蕾莎·梅未能提出一項邏輯完整的戰略，這使選民無從選擇，最終導致“無多數議會”（hung parliament）出現。

即使在德國，默克爾總理也曾短暫地嘗試過一種羅爾斯式法律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奇妙結合，開放德國邊界幾個月，僅此就導致八分之一的選民在2017年選舉中支持一個新成立的本土主義政黨。她的中右翼基督教民主聯盟的得票率大幅下滑，降到該黨自1949年成立以來的最低水平。但中左派并未從中右派的崩潰中獲益，社會民主黨的得票率下跌得更多，也降到1949年后的低點。中間派在萎縮，導致民粹主義意識形態分子占據政治舞臺。

### 重建中間派：一些政治機制

我們需要一個促使主流政黨重新回到中間立場的進程。有兩種改變領導人選拔規則的方式都比當前制度民主得多。

最直接的辦法是規定，政黨領導人必須來自該黨經選舉產生的代表。與黨員直接選舉領導人相比，經選舉產生的代表有兩個特征使他們更適合選舉黨魁。首先，他們有吸引廣泛選民群體的動力，這促使他們更傾向于選舉偏中間派的候選人。其次，作為局內人，他們不太可能被名人的政治把戲欺騙，他們是知情的投票者。例如在英國，2001年的保守黨領導人本應是肯·克拉克（Ken Clarke），他是一名中間派，曾在多個部擔任部長；假如共和黨是由經選舉產生的黨員代表來選舉其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就不會入主白宮。

與普通黨員相比，經選舉產生的代表更具民主合法性。總的來說，他們所代表的本黨支持者的人數要遠遠多于正式登記在冊的黨員人數。但如果我們仍希望讓最多的人參與選舉政黨領導人，那么也許可以退而求其次：至少對主要政黨而言，讓所有選民來選舉政黨的領導人。不過這么做的歷史記錄并不令人樂觀，因為普通選民對候選人所知甚微，所以傾向于選擇魅力型民粹主義者。

如果不改革政黨領導人選拔機制的話，最安全的替代選擇也許是以某種程度的比例代表制為基礎重建選舉制度。這么做雖然有缺點，但聯合政府會限制政黨實施其意識形態，并鼓勵基于證據的實用主義。長期以來，挪威、荷蘭和瑞士都通過比例代表制產生聯合政府，三國都沒有出現現代資本主義最有害的問題。回頭來看，2010—2015年的英國聯合政府時期和2011—2017年美國政治的僵局期，都看起來比兩國之前和之后的政府略勝一籌。

### 重建中間派：知情的社會

修補我們的政治體制可能有助于使其以基于道德的務實方式制定策略。但政治是社會的反映，社會不好，政治也不會好。只有當一個社會有足夠多的公民要求符合道德和務實的政治時，這樣的政治才會產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本書主要是為公民而非政客寫的。足夠多的公民并不意味著所有人，而是說人數要多到能給政客以行動的勇氣。幸運的是，人們既能用社交媒體來傳播壞想法，也能用它傳播好想法。作為備忘，我將在下面總結前文提出的能直接解決這些新分化的政策，以及重建家庭、企業、國家倫理的更根本性的策略。

務實的新政策

本書篇幅不長又涉及面廣泛，所以無法全面論述新政策的細節。這里的所有建議都是以學術分析為基礎，但還需大量的后續工作才能付諸實施。然而，實施中會遇到的障礙更可能是政治上的，而不是技術上的。

扭轉大都市和破敗城市之間的新分化需要資金。通過對大都市里集聚效應產生的巨大經濟租金征稅，可以籌集到這筆資金。第七章闡述了為什么大都市的超高生產率是一種經濟租金，獲取這筆財富的人并不是全靠自己的本事賺來的。但第七章也強調了對這些租金征稅的困難：許多租金并不像人們以為的那樣被土地所有者獲得，而是由高收入的高技能勞動者獲得。大都市土地承擔的稅負應當比其他地方重，基于同樣的理由，這些高技能勞動者也應承擔更重的稅負。我預計自身利益受威脅的人將會憤怒地反擊。之后如何以最合理的方式用這筆錢來復興破敗城市呢？關鍵是要采取協調一致的努力，吸引朝陽產業入駐，也許可以吸引適合各城市傳統的產業。協調行動依賴于形成一系列正確的關系：為了形成共同認知，可能入駐某城市的企業需要知道其他企業在做什么；城市也許需要吸引一整群相互關聯的企業。培訓必須與這些企業的具體需求相關，最好是由企業參與培訓項目的管理，這樣培訓才能有價值。

扭轉高技能、受教育程度高者與技能過時、受教育程度低者之間新出現的階層分化，也需要兼顧兩方面的問題。一些人陷入低生產率工作無法轉型，他們的劣勢通常是從幼時開始并延續一生的。我提出了“社會母愛主義”的策略：為面臨破裂風險的年輕家庭提供大量的實際支援和指導，再對上學的兒童提供指導。導師的指導對社會母愛主義的意義恰如監控對父愛主義社會管理的意義。但扭轉階層分化不能只靠對受教育程度低者的幫助。高技能者的一些掠奪性行為需要被抑制——贏得“博弈”的能力可能以輸家的利益為代價，帶來巨大的私人收益。有太多極具天賦的社會成員把他們的能力投入這種零和博弈，而創新等能給全社會帶來巨大益處的活動遭遇了人才流失。一些行業最容易出現零和博弈，另一些行業的收益則幾乎不會歸其從業者所有，前者應當被課以更高的稅。

縮小富裕國家與貧窮國家之間的全球差距所需的不僅僅是一顆博愛的心。貧窮、停滯社會中的人做出的個體反應是，富人把錢轉移到國外，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移民外國。這些反應是合乎理性的，但總體來說，它往往會對這些社會造成損害。非洲每年的資本外逃達2,000億美元；海地85%的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年輕勞動者外流。把這些行為定義為“人權”是在輕視這些行為違反的義務。大多數人都不是圣人，盡管人們會認識到自己的義務，但當誘惑擺在面前時，人們就會接受誘惑。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引誘者要承擔道德責任。幾十年來，倫敦的律師和瑞士的銀行為資本流出非洲提供了便利。同樣，非洲的人力資本外流是由于一些公共政策為其創造了機會。我用一個極端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挪威已經積累了人均20萬美元的主權財富基金。如果一個五口之家離開貧窮的家鄉定居挪威，他們就有權按比例獲得價值100萬美元的資產，遠超該家庭成員的收入。其祖國的政府沒有任何辦法遏制這種移民沖動。然而對這100萬美元，兩個群體有更充分的理由索取：存下這筆錢的挪威人，和本可以分享這筆錢的成千上萬的窮人。貧窮國家需要趕上富裕國家，為此，貧窮國家需要從富裕國家得到自己沒有的東西——能發揮出人的生產價值的企業。我們還可以做很多努力來鼓勵我們的企業在最貧窮的國家創造這一看似平凡的奇跡。

以道德方式重建家庭、企業和國家

本書始于道德問題，也將終于道德問題。我已努力勾勒了道德政治的基礎，以改變怪異的和具有分裂性的功利主義道德信條，代之以更深植于人性并能帶來更好結果的道德信條。

在功利主義者看來，人都是自主的個體，從自己的消費中獲得效用，在計算總效用的宏大道德算術中具有同等的分量，而現實社會與此截然相反，人際關系是其基本構成單位。人并不是自私到變態的“經濟人”，需要在社會家長制中由柏拉圖筆下的“衛國者”來約束，相反，正常人知道人際關系會產生義務，而履行義務是我們人生使命感的核心。柏拉圖筆下的“衛國者”和“經濟人”的有害結合已經主導了公共政策。這種思維無情地剝離了人的道德責任，讓父愛主義國家來承擔義務。像中世紀宗教的詭異翻版一樣，普通人被認定為罪人，需要由杰出的道德精英來統治。隨著功利主義先鋒隊的崛起，圣人們紛紛進駐政府。在義務上升至國家的同時，消費權等名目繁多的權利則下沉至民眾中——我們現在都是巨嬰。

但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承擔了只有企業和家庭才能充分履行的責任。父母對子女的義務感來源于愛，這種養育遠勝于父愛主義國家提供的任何替代品；企業對員工的義務感來源于長期的互惠關系，這遠勝于父愛主義國家提供的任何培訓。政府應該通過設計總政策發揮作用，力求恢復這些義務的地位。削弱家庭內部義務感的文化變遷是，一心追求滿足自身欲望的“權利個體”取代了道德家庭。但政府也從優先照顧家庭變為優先照顧個人，通過修改法律、稅制、福利政策，縱容了這一轉變。現在，政府可以通過改變敘事、法律、稅制、福利政策來重建道德家庭。削弱企業對員工和社會的義務感的文化變遷是，商學院向一代經理人教授企業版的“經濟人”理論，告訴他們企業的唯一目的是為企業所有者創造利潤。但追逐季度利潤的投資基金經理的崛起推動了物質激勵機制的轉變，也加劇了這場文化變遷。政府可以利用敘事、法律、稅收和補貼來重建道德企業。

功利主義父愛主義管理的固有傲慢在應用于全球層面時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本應無條件履行的援救義務成為道德帝國主義的工具。原先在特定政策領域內逐步建立互惠義務的國際俱樂部被過度擴張，成為涉及廣泛領域的“包容性”組織，互惠性因而逐漸瓦解。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道德世界，但在1945年到1970年間，我們在實現這一目標的方向上取得了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大的進展，而這些進展現在已經逐步瓦解。為了恢復前進的勢頭，我們需要回到謹慎務實的現實道路上來。為需要救助的人提供有效的救濟既是我們能夠負擔的，也是可行的；應對全球焦慮的最好方式不是功利主義的說教，而是建立國際俱樂部，在富國之間構建起新的互惠義務，以履行援救義務。

因共同歸屬感而成為可能的互惠義務網絡會使各國政府變得更受信任，因而也將更為高效。將林林總總的義務廣泛分布于社會之中不僅能讓這些義務得到更好地履行，也能讓人們在積極履行義務的過程中獲得更大的充實感。這樣的社會比功利主義的父愛主義社會更幸福。即使以父愛主義管理者自己的目標來看，他們現在的做法也不利于達成自己的目標。“效用最大化”是約翰·凱所說的需要“迂回”達成的例證：靠直接瞄準這個目標是無法實現它的。依靠人們的自愿互惠來實現它是更好的做法。

### 關于歸屬的政治

政治主要是國家層面的。要讓政治發揮其潛力來打造一個互惠義務組成的密網，一個國家的民眾需要接受某種身份認同。要讓認同感產生凝聚效果而非分裂效果，作為英國人、美國人或德國人的身份就不能限定于某個特定民族。同時，盡管一些人有一廂情愿的想法，但共同身份的含義也不能是共同持守某些獨特的價值觀。唐納德·特朗普和伯尼·桑德斯有哪些能把他們與奈杰爾·法拉奇、杰里米·科爾賓區分開來的共同價值觀呢？在同一個文化多元的國家里長大的人擁有的共同身份，只能根據共同的地域和目標來定義。這種共同身份的構建可以以人和家庭、地域的硬性從屬關系為根據，也可以強調有目的的共同行動所帶來的共同利益。這是民眾形成共同體意識的基礎。但道德政治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增強對共同歸屬感的本能追求，以及共同目標的合理性。

為實現某個共同目標而進行的集體努力能起到這種增強效果，無論該目標多么微不足道。事實表明連國家足球隊的勝利也能起到這個作用。[[3]](#_3_Ren_Men_Xi_Huan_Ren_Tong_Shen)在共享空間中自然發生的相互交織的社會互動能增強共同歸屬感。完全相互隔絕的群體可能不會有多少共同身份感，因此一定程度的社會融合是可取的，這能遏制由教育、意識形態、宗教等原因導致的文化分離。我們需要接觸彼此。但最能起到增強效果的方式是傳播關于歸屬感的支持性政治敘事，這是我們的政治領導人的核心職責。他們現在放棄了基于地域和目標的歸屬敘事，這就給制造分裂效果的歸屬敘事創造了機會，它們主張將國民身份認同限定在部分人之內而排斥其他人。

領導人可以推廣新敘事，但對政治領袖信任的下降已經使權威發生顛倒；人們更關注處在自己社交網絡中心的人，而不是在電視上侃侃而談的人。但社交網絡已經成為自我封閉的回音室，因此我們甚至連交流的共同空間都沒有。這非常有害，因為只有通過參與一個共同網絡，我們才能形成“我們都在接收同一種敘事”的共同認知。如果沒有這個條件，即使傳播關于共同身份的敘事，人們也難以相信自己接受的義務將得到他人的回報。回音室不能傳播關于共同地域歸屬的敘事，通常只會詆毀“他者”。2017年在曼徹斯特的一場音樂會上殺害多名兒童的薩爾曼·阿貝迪（Salman Abedi），是在曼徹斯特長大的，但他的成長環境是一個封閉網絡，該網絡宣傳對所謂“卡菲爾”（kaffirs）的仇恨，因此他對周圍的人缺乏最基本的同理心。這種回音室對社會結構有毀滅性作用，但要恢復共同的討論場所，我看不出有什么切實可行的方法。在沒有這種場所的情況下，新近在這些回音室里獲得影響力的人，包括笑星、演員、宗教人士和好表現的外向者，現在都必須承擔起這種責任。他們是去中心化的社會領袖，是在這些分散網絡中構建共同地域身份的最佳人選。他們傳播的故事應該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人們應當向其施加壓力，制止其兜售那些已成為其專長的分裂性意識形態敘事。

像其他共同身份一樣，共同的地域歸屬感或共同的目的性行動可以支撐起多種義務，所以是極重要的。因為公共政策主要是國家性的，所以政治也主要是國家性的。有些政策是在地方、區域或全球層面制定的，但在所有發達經濟體中，國家都極為重要。在美國，盡管人們高度關注州權，但約60%的公共支出是通過國家而非各州完成的；在歐盟，盡管人們高度關注布魯塞爾的權力，但97%的公共開支是通過國家而非歐盟委員會完成的。國家及其公民是公共政策的基本框架，在可預見的未來也將繼續如此。共同身份的首要政治功能是使各國成為不斷增長的互惠義務網絡的載體。正是由于這種網絡受損，資本主義近期的發展所激發的焦慮才不斷惡化，演變為我們社會的深重創傷。

正如基于地域和目標的共同歸屬敘事能增強國民身份認同一樣，關于公民互惠義務的敘事也能增強上述倫理網絡。不奇怪的是，薩爾曼·阿貝迪從未接受最基本的互惠義務：他的鄰居說，阿貝迪的車經常堵住他的車道。開明自利的目的性敘事也可以強化互惠義務。公民會開始認識到這樣的因果關系：納稅這類不符合其眼前利益的行為，可以促成符合所有人長期利益的結果。阿貝迪倒是接受了一種敘事：他為升入天堂的前景犧牲了自己的眼前利益。敘事會產生強大影響，而我們應當精心設計更好的敘事。

一言以蔽之：共同身份會成為遠見式互惠的基礎。與基于個人主義或任何復興主義意識形態的社會相比，成功建立這種信念體系的社會運轉得更好。崇尚個人主義的社會喪失了公共品所包含的巨大潛力。復興主義的意識形態都是基于對社會里某一群外人的仇恨，是導致沖突的死胡同。在健康的社會里，對互惠義務網絡的接受是成功者自小經受教育形成的。互惠義務網絡還能激發幸運的人對不幸者的支持。成功者會遵守這些義務，因為他們會得到回報——履行義務所帶來的自尊和同伴的尊重。針對拒不服從的少數人，更多地使用強制權力將是合法的。

這種道德實用主義可以引導我們的政治從兩極分化的失敗走向合作，解決困擾我們社會的分歧。我們對很多人有未盡到的照料義務：逃離災難的難民；在世界上最貧窮的社會里陷于絕望的人；自身技能失去價值的中年人；即將受困于沒有出路的工作的青少年；破裂家庭的孩子；因無法獲得住房而絕望的年輕家庭。我們必須盡到這些義務。但我們還有一個挑戰性大得多的任務：重建曾基于我們共同身份而產生的互惠義務。

這種看起來好像馬克思主義的再分配可能讓右派駭然。而它承認家庭和國家的獨特義務，有違羅爾斯主義和功利主義準則，可能也會讓左派駭然。但這兩種擔憂都是不必要的。

至于羅爾斯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夢想，無論是奉揚對所有兒童履行平等義務而貶低家庭的義務，還是奉揚對全球受害者承擔義務而貶低對本國國民的義務，都無法建起伊甸園。這樣會使下一代人滑入“權利個人主義”的深淵。回顧歷史，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對功利主義和羅爾斯主義主宰中左翼的時期做出評價：傲慢，過度自信，極具破壞性。中左翼若要復興就應該回歸其社群主義的本源，并重新肩負起重建以信任為基礎的互惠義務網絡和解決工薪家庭焦慮的任務。[[Ⅰ]](#_I_2017Nian_12Yue_Wo_Ying_Yao_We)同樣，在獨斷個人主義主宰中右翼的時期里，“經濟人”概念把一個偉大的傳統誘入歧途。當中右翼恢復其道德立場時，它將回歸“同一個民族”的政治。這些新的焦慮是很嚴峻的問題，不能留給極左派去解決。地域歸屬感是一種強大的力量，如果利用得當會產生很強的建設性，不能留給極右派去操縱。

面對新的焦慮，我們應當看到，真正重要的經濟威脅是不同地域、不同階層命運發生的新的嚴重分化。面對極端宗教與意識形態身份認同的崛起，我們應當看到，真正重要的社會威脅是社交媒體的回音室效應導致的對立身份群體的社會分裂。在英國脫歐事件和唐納德·特朗普崛起后，我們應當看到，真正重要的政治威脅是排他的民族主義。自由派放棄共同歸屬感及本可由這種歸屬感支持的良性愛國主義，也就是放棄了唯一能把我們的社會團結起來共同尋求解決方案的力量。自由派大意而不負責任地將這種力量交給了江湖騙子式的極端派，他們正得意洋洋地為實現自己的偏激目的而扭曲這種力量。

我們可以做得更好：我們曾經做到過，我們也可以再次做到。

[[Ⅰ]](#_I_9)2017年12月我應邀為丹麥社會民主黨人發表演講。該黨杰出的新領袖梅特·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得出的解決方案與此完全一致，她積極推動該黨回到合作式社群主義的本源。該黨此前長期下滑的得票率已經得到逆轉，并逐漸上升，僅在受教育程度高的大都市居民中是例外——“怪異者”（WEIRD）憤憤不平地轉向了強硬左派。

# 致謝

本書源起于《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的托比·利希蒂格（Toby Lichtig）邀我為該刊2017年第一期寫一篇關于“社會狀態”的文章。動蕩的時代促使一系列診斷各種社會病癥的書籍面世，托比允許我依自己的判斷借鑒這些書。整個圣誕節期間，我的膝蓋上一會兒是書，一會兒是孩子，一會兒是筆記本電腦，最終我做出了診斷：當下我們需要的書是《資本主義的未來》，但不幸的是，還沒有人寫出這本書。文章發表后引起了極大反響，最終安德魯·懷利（Andrew Wylie）從紐約帶來消息：有三家出版社搶先出價，想買這本我還沒說要寫的書。我的英國出版社企鵝讓我推遲一本已簽約書稿的寫作，先完成這一本。

在對智識的要求上，這是個艱巨的任務，因為我認為寫這本書需要綜合道德哲學、政治經濟學、金融學、經濟地理學、社會心理學和社會政策等學科。這些學科都在自己周圍設置了雷區，旨在阻止和摧毀入侵者。我很幸運，一些杰出的學者愿意通讀書稿并給予評論。他們的建議無疑使最終稿得到了極大的改進，我對他們深表感激，但這不代表他們要為最終文本負任何責任。

在哲學家中，我要特別感謝這幾位：湯姆·辛普森（Tom Simpson），他通讀了初稿，并以堪稱典范的清晰性和耐心解釋了微妙的問題；克里斯·胡克韋，與我就實用主義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杰西·諾曼，他對亞當·斯密了如指掌；康拉德·奧特（Konrad Ott），與我深入討論了互惠問題與康德的視角。

在經濟學家中，科林·邁耶和我高興地發現，我們寫了兩本實際上是姊妹篇的書，并會在同一時間出版，他的著作是《富裕》（Prosperity）。我一直景仰約翰·凱的思想，他既博學又務實，擁有良好的判斷力。他仔細通讀了初稿，并花了很長時間給我評論和建議。蒂莫西·貝斯利是現代分析經濟學的領軍人物，令人稱奇的是他在道德哲學方面也造詣頗深，他不僅對初稿進行了評論，還在牛津大學萬靈學院為本書組織了一場研討會，并說服艾莉森·沃爾夫作為嘉賓，與我討論“社會母愛主義”。托尼·維納布爾斯顯然對第七章有深刻影響，他也對整篇初稿進行了詳細的評論。最后是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所長丹尼斯·斯諾爾，他不僅對草稿進行了詳細的評論，而且就支持和促進我們所說的“第二代行為經濟學”的發展發揮了寶貴作用：他努力將社會心理學的見解引入對群體行為的經濟分析，以區別于個體決策偏好。我們在“身份、敘事與規范問題經濟學研究會”里的同事們將在本書各處看到我在學術上受益于他們的研究。

牛津大學長葆的學術優勢有一個常被人輕忽的原因：其學院體系能促成跨學科的隨機互動。就我而言，我可以在兩個不同學院參與活動，這種不同尋常的優渥待遇使我能更好地利用這種互動。在圣安東尼學院的一次午餐中，研究日本社會學的羅杰·古德曼教授讓我了解到日本精英女性對孩子的態度。在三一學院的一次午餐中，英國首屈一指的選舉學家斯蒂芬·費舍爾告訴了我檢驗英國人脫歐態度的方法，我將其用在了第八章中。此外，斯蒂芬針對初稿寫的學術評論是所有人中最詳盡的，這對我是堅定而慷慨的幫助。企鵝出版社不知疲倦的勞拉·斯蒂克尼（Laura Stickney）提供了同樣重要的協助，提升了文稿的可讀性。

最后，我要感謝很多基于自身經驗貢獻了證據的人：基爾大學世界事務論壇（Keele World Affairs）主席比爾·博因頓（Bill Boynton），他為特倫特河畔斯托克城（Stoke-on-Trent）的民眾打造了一個精彩的論壇；“格林與伙伴”的中堅力量黛博拉·布利凡特（Deborah Bullivant）；聯合工會的保羅·科尼克（Paul Cornick）；社會學家馬克·埃爾查杜斯（Mark Elchardus）教授及布魯塞爾“P＆V合作運動”的成員們；伊恩·摩爾（Ian Moore），多年來他在謝菲爾德領導著一群認知行為心理治療師；歐洲社會黨與社會民主黨聯盟主席吉安尼·皮特拉（Gianni Pittella）及其顧問弗朗切斯科·隆奇（Francesco Ronchi）；律師、貴格會教徒艾倫·湯普森（Alan Thompson）。

好讀的書不好寫，在我勞心勞力之時，家人與我站在一起。跟以往一樣，保利娜（Pauline）既肩扛團結全家人的責任，又以誠實讀者的銳利眼光提出建議。我從小受到的教育是不要出風頭，所以寫這么一本個人化的書是個艱難的決定；但假如沒有這些個人化的內容，本書文字中透出的激情鋒芒就會顯得做作而不自然。

# 注釋

### 第一章 新的焦慮

[[1]](#_1)Case and Deaton (2017).

[[2]](#_2)Chetty et al. (2017).

[[3]](#_3)Chua (2018), p. 173.

[[4]](#_4)例如，Mason (2015)，以及我對這一最新文獻的評論，參見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25 January 2017。

[[5]](#_5)邊沁和穆勒對亞當·斯密開創的經濟學分析進行了嚴重的扭曲，對此的清晰歷史記述，參見Norman (2018), ch. 7。

[[6]](#_6)Haidt (2012).

[[7]](#_7)Financial Times, 5 January 2018.

[[8]](#_8)一本具有可讀性的新記述是Roger Scruton的On Human Nature (2017)。

[[9]](#_9)Chua (2018).

[[10]](#_10)喬治·阿克洛夫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我們與雷切爾·克蘭頓和丹尼斯·斯諾爾（Dennis Snower）一起成立了身份、敘事與規范問題經濟學研究會（Economic Research on Identities, Narratives and Norms）。托尼·維納布爾斯是一位世界聞名的經濟地理學家。過去三年里，我們一直在合作指導一個關于城市化經濟學的研究項目。科林·邁耶是牛津大學金融學教授、牛津大學商學院前院長、英國科學院“企業的未來”項目主任。他的著作Prosperity: Better Business Makes the Greater Good (2018)與本書十分契合。過去三年里，我們一直在共同努力促進對貧困地區的投資。蒂莫西·貝斯利（爵士）教授現在是計量經濟學會主席，曾任歐洲經濟協會主席、《美國經濟評論》編委。我們目前正在聯合指導英國科學院“國家脆弱問題委員會”。克里斯·胡克韋教授是全球最著名的研究皮爾斯與實用主義學派源頭的學者。他曾任皮爾斯學會會長和《歐洲哲學雜志》（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編委。他2015年退休時，為向他致敬而召開的會議的主題是“實用主義思想”。碰巧，他是我認識最久的朋友。

[[11]](#_11)Tepperman (2016).

### 第二章 道德的基礎

[[1]](#_1_1)有充分的理由證明，就連我們的情感最終也是由社會構建的。參見Feldman Barrett (2017)。

[[2]](#_2_1)Etzioni (2015).

[[3]](#_3_1)我剛寫完《資本主義的未來》，蒂莫西·貝斯利就把我介紹給了哲學家、政治家杰西·諾曼（Jesse Norman），他也剛剛寫完一本關于亞當·斯密思想的書。我們有些忐忑不安地交換了書稿。我從他的書中學到了很多，其中的一些將在后面的注釋中反映出來，但我欣慰地發現，斯密若是泉下有知，應該不會反對我對他思想的闡釋。

[[4]](#_4_1)Norman (2018).

[[5]](#_5_1)Towers et al. (2016).

[[6]](#_6_1)這是休謨和康德之間的分歧所在。

[[7]](#_7_1)Haidt (2012).

[[8]](#_8_1)Mercier and Sperber (2017).

[[9]](#_9_1)Gamble et al. (2018).

[[10]](#_10_1)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概念。

[[11]](#_11_1)如海特（2012）所說：“義務論和功利主義是‘單一受體’（one receptor）的道德觀，對缺乏同理心的人有吸引力。”

[[12]](#_12)Dijksterhuis (2005), Christakis and Fowler (2009).

[[13]](#_13)Hood (2014).

[[14]](#_14)Thomas et al. (2014).

[[15]](#_15)如Cialdini (2007)。

[[16]](#_16)Akerlof and Shiller (2009), p. 54.

[[17]](#_17)Mueller and Rauh (2017).

[[18]](#_18)關于禁忌，可參考Bénabou and Tirole (2011)。

[[19]](#_19)在Collier (2016)中，我更全面地闡述了這些想法。

[[20]](#_20)一部很好的介紹性著作是Identity Economics, Akerlof and Kranton (2011)。

[[21]](#_21)Besley (2016).

[[22]](#_22)如果你對細節感興趣，我近期對這方面的最新文獻做了綜述： Collier (2017)。

[[23]](#_23)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7.

[[24]](#_24)這分別是約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和馬克·扎克伯格的感受。

[[25]](#_25)描述這一現象的術語是“同源性”（homology）。

[[26]](#_26)正如麥金太爾（MacIntyre）在1981年的開創性研究中闡述的，道德語言的本質是不只把他人當作達到自利目的的手段，而是把他人當作目的本身。參見MacIntyre (2013)。

[[27]](#_27)我已按分析性順序解釋了共同身份、互惠和目的性行動，但關于這三個組成部分都是道德集體行為的必要條件這一點的實證證據，來自諾獎得主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eanor Ostrom, 1990）及其后繼者的研究。

[[28]](#_28)有關基本理論和證據的更全面討論，參見Collier (2018d)。

[[29]](#_29)這個現象被稱為政治經濟周期；Chauvet and Collier (2009)。

[[30]](#_30)Putnam (2016), p. 221.

### 第三章 道德的國家

[[1]](#_1_2)歐洲各國社會黨和民主黨的領導人認識到了這一事關生死存亡的危機，邀請我去他們2017年10月的年會和2018年6月的青年大會發言。

[[2]](#_2_2)我在Collier (2018b)中更正式地提出了這個模型，并闡述了其規范含義。

[[3]](#_3_2)Wolf (2013), p. 32. 這句話不僅反映了人們的突出身份向工作的轉變，也反映了對個人成就的強調，我將在第五章討論這一點。

[[4]](#_4_2)參見Edelman Trust Barometer。其2017年年度報告的開頭是：“信任在世界各地都處于危機之中。”https://www.edelman.com/trust2017/.

[[5]](#_5_2)為應對焦慮問題而進行互惠合作的范例是合作保險運動，這場運動誕生于羅奇代爾（Rochdale）——英格蘭北部的一座工業城鎮，類似于謝菲爾德和哈利法克斯。2017年11月，龐大的比利時保險合作社下轄的“P＆V基金”（P and V Foundation）授予我公民獎，我借此機會了解了該機構的起源。羅奇代爾的先驅者們曾來到佛蘭德語區的根特（Ghent），推動保險合作運動在比利時生發，而這場運動迅速跨越語言障礙，傳播到法語區的瓦隆尼亞（Wallonia），并逐步擴大為全國性運動。頒獎典禮是用三種語言進行的。

[[6]](#_6_2)Elliott and Kanagasooriam (2017).

[[7]](#_7_2)對國民身份與全球身份之間的這種對比，David Goodhart (2017)曾有更多闡述。

[[8]](#_8_2)這句引語來自Nicholas Crane,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Landscape (Weidenfeld ＆ Nicolson,2016), p. 115。

[[9]](#_9_2)Johnson and Toft (2014).

[[10]](#_10_2)Elliott and Kanagasooriam (2017).

### 第四章 道德的企業

[[1]](#_1_3)這是英國2017年的數據。英國，而不是美國，才是弗里德曼學說及其后果登峰造極的表現。其中的原因會在本章后部探討金融力量對企業的影響時浮現出來。

[[2]](#_2_3)Gibbons and Henderson (2012).

[[3]](#_3_3)這些話是一名前高級員工說的，請見報道‘The Big Bet’, Financial Times, 11 November 2017。

[[4]](#_4_3)Financial Times, 23 October 2017.

[[5]](#_5_3)這也是職業道德淪喪的問題。會計行業迷失了自身的道德方向。參見Brooks (2018)。

[[6]](#_6_3)占GDP的1.7%，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平均占比是2.4%。

[[7]](#_7_3)Kay (2011).

[[8]](#_8_3)Haskel and Westlake (2017).

[[9]](#_9_3)Hidalgo (2015).

[[10]](#_10_3)Autor et al. (2017).

[[11]](#_11_2)Scheidel (2017).

### 第五章 道德的家庭

[[1]](#_1_4)我對家庭規范變化的了解受益于羅比·阿克洛夫。

[[2]](#_2_4)即使到了1975年，像我母親這樣的勞動女性（她高中肄業），花在照顧孩子上的時間也和大學畢業生一樣多。到2003年二者花的時間都增加了，但現在受教育程度較低者花的時間僅為大學畢業生的一半；Sullivan and Gershuny (2012)。

[[3]](#_3_4)我要感謝研究日本現代社會學的專家羅杰·古德曼（Roger Goodman）教授，他提供了這一有趣見解。

[[4]](#_4_4)Wolf (2013), p. 236. 這是大學畢業的白人母親的數據。

[[5]](#_5_4)Ibid., p. 183.

[[6]](#_6_4)Putnam (2016), p. 67.

[[7]](#_7_4)Eliason (2012).

[[8]](#_8_4)Putnam (2016), p. 70.

[[9]](#_9_4)Ibid., p. 78.

[[10]](#_10_4)Heckman, Stixrud and Ursua (2006).

[[11]](#_11_3)Clark (2014).

[[12]](#_12_1)Bisin and Verdier (2000).

[[13]](#_13_1)Brooks (2015).

[[14]](#_14_1)Seligman (2012).

### 第七章 地域分化

[[1]](#_1_5)Venables (2018a, 2018b).

[[2]](#_2_5)請見Jed Kolko的近期著作。

[[3]](#_3_5)這一令人不安的事實是基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研究。對此的易于理解的探討，參見The Economist, 21 October 2017。

[[4]](#_4_5)我要感謝蒂莫西·貝斯利確認和澄清這一點。

[[5]](#_5_5)Arnott and Stiglitz (1979).

[[6]](#_6_5)Collier and Venables (2017).

[[7]](#_7_5)Greenstone, Hornbeck and Moretti (2008).

[[8]](#_8_5)Lee (2000).

### 第八章 階層分化

[[1]](#_1_6)Wolf (2013), p. 240.

[[2]](#_2_6)Fragile Families and Child Wellbeing Study Fact Sheet: www.fragilefamilies.princeton.edu/publications.

[[3]](#_3_6)‘Effects of social disadvantage and genetic sensitivity on children's telomere length’, Fragile Families Research Brief 50, Princeton, 2015.

[[4]](#_4_6)Philip Larkin, ‘High Windows’ (1974).

[[5]](#_5_6)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在The Social Animal (2011) 中對這一命題進行了精彩的討論。

[[6]](#_6_6)“暫停”有一個網站。訪問并加入它。文中的數據取自http://www.pause.org.uk/pause-inaction/learning-and-evaluation。

[[7]](#_7_6)Wolf (2013), pp. 51-2.

[[8]](#_8_6)Brown and de Cao (2017).

[[9]](#_9_5)Putnam (2016), p. 212.

[[10]](#_10_5)Hanushek (2011).

[[11]](#_11_4)Levitt et al. (2016).

[[12]](#_12_2)如果你和我一樣認為這件事了不起，我鼓勵你為“格林與伙伴”捐款，這是一家正式注冊的慈善機構。網址是http://grimmandco.co.uk/。

[[13]](#_13_2)這方面一個很好的信息來源是Wilson (2011)，他的書名正是《返回正軌》。

[[14]](#_14_2)http://www.winchester.ac.uk/aboutus/lifelonglearning/CentreforRealWorldLearning/Publications/Post2014/Documents/Lucas%20(2016)%20What%20if%20-%20 vocational%20pedagogy%20% 20RSA-FETL.pdf，這是下一段的根據。

[[15]](#_15_1)Alison Wolf, Financial Times, 28 December 2017.

[[16]](#_16_1)Dancing in the Dark, Knausgård (2015), p. 179.

[[17]](#_17_1)Goldstein (2018).

[[18]](#_18_1)Acemoglu and Autor (2011).

[[19]](#_19_1)Financial Times, 10 September 2017.

[[20]](#_20_1)Michael Lewis and Dylan Baker (2014), Flash Boys.

[[21]](#_21_1)在英國，基于教育的“配對性擇偶”現象大增，其中增幅最大的是大學畢業生之間的婚姻：Wolf (2013), p. 232。

[[22]](#_22_1)Harris (2018).

### 第九章 全球分化

[[1]](#_1_7)World Bank (2018).

[[2]](#_2_7)以下結果來自Rueda (2017)。

[[3]](#_3_7)Muñoz and Pardos-Prado (2017).

### 第十章 戰勝極端派

[[1]](#_1_8)Pardos-Prado (2015).

[[2]](#_2_8)Chua (2018).

[[3]](#_3_8)人們喜歡認同勝利。Depetris-Chauvin and Durante (2017) 指出，在國家足球隊獲勝后，國家認同會變得更突出。

# 參考文獻

Acemoglu, D., and Autor, D. (2011), ‘Skills, tasks and technologies: implications for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In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Vol. 4B).Amsterdam: North Holland/Elsevier, pp. 1043–1171.

Akerlof, G. A., and Kranton, R. E. (2011), Identity Economics: How Our Identities Shape Our Work, Wages, and Well-Be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kerlof, G. A., and Shiller, R. (2009), Animal Spirits: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rnott, R. J., and Stiglitz, J. E. (1979), ‘Aggregate land rents, expenditure on public goods, and optimal city siz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3 (4), pp.471–500.

Autor, D., Dorn, D., Katz, L. F., Patterson, C., and Van Reenen, J. (2017), 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nd the Rise of Superstar Firms. Cambridge, Mas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Bénabou, R., and Tirole, J. (2011), ‘Identity, Morals, and Taboos: Beliefs as Asset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6 (2), pp. 805–55.

Besley, T. (2016), ‘Aspiration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equality’. Oxford Economic Papers, 69, pp. 1–35.

Betts, A., and Collier, P. (2017), Refuge: Transforming a Broken Refugee System.London: Penguin.

Bisin, A., and Verdier, T. (2000), ‘“Beyond the melting pot”: cultural transmission, marriage, and the evolution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trait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 (3), pp. 955–88.

Bonhoeffer, D. (2010),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Vol. 8). Minneapolis:Fortress Press.

Brooks, D. (2011), The Social Animal: The Hidden Sources of Love, Character and Achievement. London: Penguin.

Brooks, D. (2015), The Road to Charact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Brooks, R. (2018), Bean Counters: The Triumph of the Accountants and How They Broke Capitalism. London: Atlantic Books.

Brown, D., and de Cao, E. (2017), ‘The impact of unemployment on child maltrea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837, University of Oxford.

Case, A., and Deaton, A. (2017),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in the 21st Century,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Chauvet, L., and Collier, P. (2009). ‘Elections and economic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nomic Policy, 24 (59), pp. 509–50.

Chetty, R., Grusky, D., Hell, M., Hendren, N., Manduca, R., and Narang, J. (2017),‘The fading American dream: trends in absolute income mobility since 1940’.Science, 356 (6336), pp. 398–406.

Christakis, N. A., and Fowler, J. H. (2009), Connected: The Surprising Power of Our Social Networks and How They Shape Our Lives. New York: Little, Brown.

Chua, A. (2018), Political Tribes: Group Instinct and the Fate of Nations. New York:Penguin Press.

Cialdini, R. B. (2007), Influence: The Psychology of Persuasion. New York: Collins.

Clark, G. (2014), The Son Also Rises: Surnames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ollier, P. (2008), The Bottom Billion: Why the Poorest Countries are Failing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llier, P. (2013), ‘Cracking down on tax avoidance’. Prospect, May.

Collier, P. (2016), ‘The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failure: a conceptual toolkit’.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26, pp. 5–24.

Collier, P. (2017), ‘Politics,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 pp. 111–25.

Collier, P. (2018a), ‘The downside of globalisation: why it matters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 The World Economy, 41 (4), pp. 967–74.

Collier, P. (2018b), ‘Diverging identitites: a model of class formation’, Working Paper 2018/024, Blavatnik School of Government, Oxford University.

Collier, P. (2018c), ‘The Ethical Foundations of Aid: Two Duties of Rescue’. In C.Brown and R. Eckersle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llier, P. (2018d), ‘Rational Social Man and the Compliance Problem’, Working Paper 2018/025, Blavatnik School of Government, Oxford University.

Collier, P., and Sterck, O. (2018), ‘The moral and fiscal implications of anti-retroviral therapies for HIV in Africa’. Oxford Economic Papers, 70 (2), pp. 353–74.

Collier, P., and Venables, A. J. (2017), ‘Who gets the urban surplu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https://doi.org/10.1093/jeg/lbx043.

Crosland, A. (2013),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new edn with foreword by Gordon Brown; (first published 1956). London: Constable.

Depetris-Chauvin, E., and Durante, R. (2017), ‘One team, one nation: football,ethnic identity, and conflict in Africa’. CEPR Discussion Paper 12233.

Dijksterhuis, A. (2005), ‘Why we are social animals: the high road to imitation as social glue’. Perspectives on Imitation: From Neuroscience to Social Science, 2,pp. 207–20.

Eliason, M. (2012), ‘Lost jobs, broken marriage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5 (4), pp. 1365–97.

Elliott, M., and Kanagasooriam, J. (2017), Public Opinion in the Post-Brexit Era: Economic Attitudes in Modern Britain. London: Legatum Institute.

Epstein, H. (2007), The Invisible Cure: Africa, the West, and the Fight against AIDS.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Etzioni, A. (2015), ‘The moral effects of economic teaching’. Sociological Forum,30 (1), pp. 228–33.

Feldman Barrett, L. (2017), How Emotions are Made: The Secret Life of the Brain.London: Macmillan.

Gamble, C., Gowlett, J., and Dunbar, R. (2018), Thinking Big: How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Life Shaped the Human Mind.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George, H. (1879), Progress and Poverty: An Enquiry into the Cause of Industrial Depressions, and of Increase of Want with Increase of Wealth. The Remedy. K.Paul, Trench ＆ Company.

Gibbons, R., and Henderson, R. (2012), ‘Relational contracts and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Organization Science, 23 (5), pp. 1350–64.

Goldstein, A. (2018), Janesville: An American Stor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Goodhart, D. (2017), The Road to Somewhere. London: Hurst.

Greenstone, M., Hornbeck, R. and Moretti, E. (2008), ‘Identifying agglomeration spillovers: evidence from million dollar plants’. NBER Working Paper, 13833.

Haidt, J. (2012), 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 New York: Vintage.

Hanushek, E. A. (2011), ‘The economic value of higher teacher quality’.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30 (3), pp. 466–79.

Harris, M. (2018), Kids these Days: Human Capital and the Making of Millennials.New York: Little, Brown.

Haskel, J., and Westlake, S. (2017),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 The Rise of the Intangible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eckman, J. J., Stixrud, J., and Urzua, S. (2006),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abilities on labor market outcomes and 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4 (3), pp. 411–82.

Helliwell, J. F., Huang, H., and Wang, S. (2017),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world happiness’. In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7, edited by J. Helliwell, R. Layard and J. Sachs. New York: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Hidalgo, C. (2015), Why Information Grows: The Evolution of Order, From Atoms to Econom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Hood, B. (2014), The Domesticated Brain. London: Pelican.

International Growth Centre (2018), Escaping the Fragility Trap, Report of an LSE–Oxford Commission.

James, W. (1896), ‘The will to believe’. The New World: A Quarterly Review of Religion, Ethics, and Theology, 5, pp. 327–47.

Johnson, D. D., and Toft, M. D. (2014), ‘Grounds for war: the evolution of territori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8 (3), pp. 7–38.

Kay, J. (2011), Obliquity: Why Our Goals are Best Achieved Indirectly. London:Profile Books.

Knausgård, K. O. (2015), Dancing in the Dark: My Struggle (Vol. 4). London and New York: Random House.

Lee Kuan Yew (2000),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Singapore: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evitt, S. D., List, J. A., Neckermann, S., and Sadoff, S. (2016), The behavioralist goes to school: leveraging behavioral economics to improve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8 (4), pp. 183–219.

Lewis, M., and Baker, D. (2014), Flash Boys. New York: W. W. Norton.

MacIntyre, A. (2013), After Virtue. London: A＆C Black (first published 1981).

Martin, M. (2018), Why We Fight. London: Hurst.

Mason, P. (2015), Postcapitalism: A Guide to Our Future. London: Allen Lane.

Mercier, H., and Sperber, D. (2017), The Enigma of Reason.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ueller, H. and Rauh, C. (2017),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prediction of political violence using newspaper text’. Barcelona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Working Paper 990.

Muñoz, J., and Pardos-Prado, S. (2017), ‘Immigration and support for social policy: an experimental comparison of universal and means-tested programs’.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 https://doi.org/10.1017/psrm.2017.18.

Neustadt, R. E. (1960), Presidential Power.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p. 33).

Norman, J. (2018), Adam Smith: What He Thought and Why it Matters. London:Allen Lane.

Ostrom, E.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rdos-Prado, S. (2015), ‘How can mainstream parties prevent niche party success?Centre-right parties and the immigration issu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7, pp.352–67.

Pinker, S. (2011),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New York: Viking.

Putnam, R.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Putnam, R. D. (2016), 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Rueda, D. (2017), ‘Food comes first, then morals: redistribution preferences,parochial altruism and immigration in Western Europ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80 (1), pp. 225–39.

Scheidel, W. (2017), The Great Level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chumpeter, J.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s.

Scruton, R. (2017), On Human N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eligman, M. E. (2012), Flourish: A Visionary New Understanding of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Smith, A. (2010),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London: Penguin.

Smith, A. (2017), The Wealth of Nations: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New Delhi: Global Vision Publishing House.

Spence, A. M. (1974), Market Signalling: Informational Transfer in Hiring and Related Screening Processes. Harvard Economic Studies Series, vol. 143.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ullivan, O., and Gershuny, J. (2012), ‘Relative human capital resources and housework: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Sociology Working Paper (2012–04),Department of Sociology, Oxford University.

Tepperman, J. (2016), The Fix: How Nations Survive and Thrive in a World in Decline. New York: Tim Duggan Books.

Thomas, K., Haque, O. S., Pinker, S., and DeScioli, P. (2014), ‘The psychology of coordination and common knowledg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7, pp. 657–76.

Towers, A., Williams, M. N., Hill, S. R., Philipp, M. C., and Flett, R. (2016), ‘What makes the most intense regrets? Comparing the effects of several theoretical predictors of regret intensit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 p. 1941.

Venables, A. J. (2018a), ‘Gainers and losers in the new urban world’. In E. Glaeser,K. Kourtit and P. Nijkamp (eds.), Urban Empires. Abingdon: Routledge.

Venables, A. J. (2018b), ‘Globalisation and urban polaris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n press).

Wilson, T. D. (2011), Redirect: Changing the Stories We Live By. London: Hachette UK.

Wolf, A. (2013), The XX Factor: How the Rise of Working Women has Created a Far Less Equal World. New York: Crown.

World Bank (2018), The Changing Wealth of Nations, Washington DC.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7 (2017), edited by J. Helliwell, R. Layard and J. Sachs.New York: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